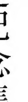
鄧演達紀念集

毅　君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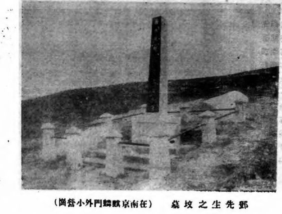
鄧演達先生遺像



鄧先生被捕後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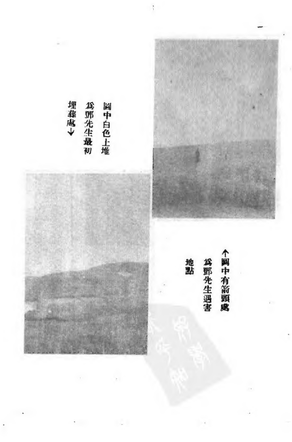
郭先生在齋內攝影



鄧先生之坟墓　(在南京麒麟門外小營崗)



鄧先生之遺體（先生爲殘酷的反動統治祕密所害，月，日及地點，無從探查，事後半月，始稍得端倪；由先生家屬及知友覓得葬地重行棺殮圖爲易棺後所攝）。



圖中白色土堆爲鄧先生最初埋葬處↓

↑圖中有箭頭處爲鄧先生遇害地點

卷首

一個革命者的生命的價值，正如自然界的一朵美麗之花一樣，只要牠是美的，那末，不管牠今朝正在含蕊怒放，黃昏就被那無情的暴風雨加以摧殘而夭折凋謝，畢竟也是值得人們讚美的，因爲牠曾經美化了自然界，曾經美化了人間，雖然是時間很暫。

我們的朋友——中國農工平民革命的導師鄧擇生先生死去忽忽一年了，在今日如同黑暗地獄一般的中國社會裏，我們既沒有感覺到苟且生存的意義，就不必爲着我們的朋友死去而悲哀，而且，人只要在生存的期間，盡到了他生存的責任，死算一回甚麼事呢？所以我們懷想先生，紀念先生，也不如一般以『長壽』爲人生幸福的人一樣，說些怨天尤人的頹廢的話。

先生生前似乎不大爲人們所了解，這是每一個革命者應有的命運，先生自然

不能例外，現在，在獻身的奮鬥之下，先生是盡到他的責任了，蓋棺論定，他的思想，他的主張，不獨沒有和他的肉體被那殘酷的統治者一齊用黃土掩埋在麒麟門外的小磐崗上，而且，顯然已是深入人們的心嵌，願給他以最大的同情，而正在發揚光大；其尤是先生的盤個革命人格的偉大，在目前充滿着十分墮落的空氣的革命環境裏，能給與人們一種深刻不忘的印象，使知中國許多『猪仔頭』式的所謂革命領袖都不外不負責任的標榜主張，造機會，以出賣人格，出賣羣衆的今日，究竟尚有『人』在，這樣，先生雖死，是終于不死的！

這本册子，是朋友們爲着紀念先生死難一週年所做的文章彙集而成的，如同上面所述的原因，我們很不願意多講感情的說話，只是各自對于先生的思想，主張和人格方面觀感而來的心得，雖然因爲時間和其他的關係，未必很能令人滿意，但是，至少是可以幫助人們了解先生的。

中國革命依然在險惡的波濤中邁進而奔向牠遙遠的前程，這中間最重要的問

題是：誰能夠把握着中國社會的病的癥結所在？誰能夠對症下藥。誰就得到勝利！我們的死者對于中國革命的貢獻如何？革命羣衆今後的努力方向又如何？那只好讓聰明的讀者細心體會去。

在先生逝世後一週年，帝國主義強盜益加瘋狂般進攻，國內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反動，越發是登峯造極了，廣大農工平民被剝削，壓迫所引起的破產，失業以及完全失掉生存自由的苦痛，急切地需要解除：於此劃時代的今日，我們謹以此紀念我們的死者並呈獻于全國農工平民大衆之前。

毅君　一九三二，十一，廿九日。

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原則是：

第一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使中國土地的生產機能，漸漸脫離個人主義的經濟進到集體經濟——社會主義。因此土地問題解決的最後目的是土地國有——土地社會化。

第二是根據現時事實的要求，因爲應付封建殘餘及前期資本主義時代的整個生產關係，故首先使土地的佔有和勞作的矛盾和限制生產發展的障礙——即高度佃租農民無地或耕地不足的問題——得到解決。這就是「耕地農有」或「耕者有其田」的原則。

鄧擇生先生被害週年紀念告同志

親愛的同志們：

我們的領導者，復興中國革命，致力農工平民政權的先驅，為解放中國民族而堅決反帝的天使——鄧擇生先生，不幸於去年八月十七日被無恥的，殘酷的反動統治者勾結帝國主義所刼捕，並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被毒惡的劊子手殺害了。今天已是擇生先生離我們而長逝的一週年，在這一天，我們臨風祭悼，環顧萬象皆非的四週，回憶先生宛在的音容，省識自己責任的繁重，是何等的感傷而興奮啊！

鄧同志在不忍出賣革命的叛徒斷送中國農工平民快要獲得的利益，不忍共產黨忽視客觀要求而無意延宕中國革命，創立革命復興理論，遠從海外歸來，領導同志們和廣大農工平民羣衆與敵人爭鬥還不及兩年，遂為反動統治者所嫉視，謀

害，這種悲慘的事實，不是鄧同志個人事業未遂的遺恨，而是我們全體同志反封建統治，反帝國主義的民主民族鬥爭中一個嚴重的打擊，整個中國革命的巨大損失！

不過，鄧先生的精神，是永遠存在人間，他的犧牲，祇是像太陽一樣的西沉，光輝是要永遠普照大地的；他的軀體雖然幻滅了，他所遺給每個革命者的鬥爭武器——全部遺教，早已深刻在萬千鄧演達信徒的心底，而且永久深刻在萬千鄧演達信徒的心底。他的熱血，開闢了未來的革命大道，將要熔成光明燦爛的結晶——農工平民政權！

同志們！在這悲壯紀念中，我們雖是萬分不幸，冀望不到領導者親切的指示，但在偉大崇高的遺像之前，他遺留給我們的任務，這時還沒盡其萬一，我們要如何警醒，努力，切實不斷地去實踐呢？先生生前最使我們銘念不忘的，便是革命典型的人格，中國革命歷史上獨放異彩的人格。

第一是堅毅不移的精神：在致力於農工平民革命時，先生所遭遇的威脅，讒忌，毒害，無不萬分惡辣，而他終是站在被壓迫，被剝削大衆的利益上，爲實現無階級社會而奮鬥，他對一切惡魔們冷笑，刻刻祇記得準備以革命鬥爭回答，直到遇害的最後一秒鐘，先生仍是爲革命樂觀而含笑長逝。這樣鉄般堅實的意志，是每個革命者應當耐心培養的，從今天起，我們的責任愈重，因之更要把這滋養料吸取，作爲行動的動力。

第二是問博嚴正的智力：先生不祇是一個英勇的實行家，同時更是一個創造的思想家；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革命高潮中，他雖仍是國民黨黨員，並曾多少同情中國共產黨的工農運動，但從許多實際題材裏，從客觀的精密檢討和分析裏，他得到了只有農工中心的平民革命，纔能使勞苦大衆得到解放，民族得到獨立自由的結論，並且樹立了復興中國革命理論的全體系，致國民黨和共產黨對着發抖的武器。先生的偉大發明，固源於他過人的材識，然那艱苦不息的治學精神

，却是使他完成新革命武器之最大助力，我們要理解先生的全部遺教，要使遺教發揚光大，必須首先學習他的治學精神。沒有革命的理論，便不能有革命的行動，然而除非奮勉不懈，革命理論是不能瞭解深刻的。

第三是熱烈眞摯的情緒：先生對於一切反革命者是比對於毒蛇猛獸還疾惡，而對於國內農工平民以及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勞苦大衆，則是像兄弟愛護，他的觀念和生活，始終是與農工密合，並且常用此指示同志，教我們刻苦修養。同志們！這一點，像是較易認識的部份，却也是最難實行的部份，在紀念先生的今天，我們應深深地加以反省，把自己的觀念和生活檢閱一下，殘餘士大夫意識，一切假革命者的個人主義，務須澈底肅清，在農工平民沒有獲得政權以前，以及在政權樹立之後，我們要永久記住鄧先生的遺訓！

同志們！這些都是鄧同志感化每個革命者的偉大的人格，是鄧同志艱苦卓絕的人生觀、我們要問在與敵人的血搏中動搖不動搖，就看這些體認得充實不充實

。在失去領導者的一年中，毫無疑義，我們犯了不少的錯誤，雖然這錯誤不是有意構成的，而確毫無原諒的餘地，從此時起，我們唯有以自我批評，努力把錯誤糾正克服！時刻發現自己的錯誤，時刻以自我批評的武器來嚴切糾正，即是時刻在有意義地紀念鄧同志！

同志們！復興中國革命的任務，鄧先生已于去年今日全般交給我們了，我們要把握住正確行動，要實現農工平民大衆的要求，必須對他的遺教澈底理解，從而發揚光大，纔可不致誤入歧途。首先應該肯定的，先生的思想，非但不是純粹的三民主義或馬克斯主義，而且不是三民主義或馬克斯主義的修正派，他祗承認孫中山先生挑起中國革命的偉大，和三民主義的革命性，却未認定三民主義就是直到現在還能全部適用的中國革命理論的全體系，同時，他也只承認馬克斯主義的唯物史觀而否認某宇宙觀。所以他用自己精確的見解所得的斷論，中國是一個封建殘餘的半殖民地國家，掃除封建士大夫意識（對三民主義）和排棄純粹國際目

的（對馬克斯主義），是執行民主民族革命的前提，這在他的遺著中曾經詳細指示過，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先生的主張，完全是中國現實社會矛盾中的產物，卽使有某些部份是與革命前驅所見一樣，但決不能曲解先生是部份地接受了三民主義或馬克斯主義，而祇是適應歷史行程非這樣不可。同志們！我們的領導者被害之後，一切遺害農工平民革命的惡魔，是盡其能事地冀圖誣陷我們，減少我們在廣大羣衆中的信仰，這種無恥的造謠，我們不應徒然冷笑，我們須拿理論武器攻破他們的毒計！防止羣衆無意地被欺騙！

鄧先生說：中國革命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性格，是土地革命和產業革命，這兩點所含的內容是非常廣博，我們要從遺著裏找出所有的具體方案，決定緊接着實際要求的精密步驟，有為的鄧演達信徒，非獨須把理論當做批判一切曲說謬見的武器，尤須使之灌入每個革命者的心靈，成為總動員的日常綱目。

同志們！因為我們所負的使命是土地革命，那就該時刻努力去組織農民，領

導農村鬥爭，打倒地主軍閥，廢除種種封建剝削，實行耕地農有，樹立農村新生產關係，盡一切可能發展農業，提高農工生活，一直做到土地國有；又因為我們所負的使命是產業革命，那就該時刻努力去組織工人，改善工人待遇，推行國營公營產業，防止私人資本，發展國家資本，掃除帝國主義的束縛，促進生產分配社會化，一直走上社會主義。這是一個長時間的艱苦任務，要能切實保障完成，又無疑地須在革命爆發時趕快建立農工中心的平民政權，只有把政權奪在自己手裏，一切合理的新建設，纔能如願以償。同志們！從學習理論到實際行動，是連貫一氣的，我們不是空談家，我們是農工平民的急先鋒，是革命炮火中的戰鬥員，我們須以鄧同志遺留的預言，去在行動中獲取實證！

同志們！這一週年中，國內的經濟恐慌和政治危機，益發加深了。農村經濟破產的現象，是繼續擴大，由於鴉片公賣，軍閥火併，穀價慘落，以及共禍糜爛無已的結果，農民遭受的苦痛，是比一年前更嚴酷了。在工業生產方面，因為世

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下之傾銷政策暢行於中國市場，銀價日見下落，關稅保護仍舊無法實行，高額的新稅層見迭出，而原料和交通的損壞，又依然如故，所以始終不能有甚麽轉機。自工業中心的上海蒙受一二八事變大破壞後，多數工廠相繼停業，至今尚沒恢復原狀，失業人口不斷地激增，同時，資本家們爲欲補償自己的損失，向工人進攻，也是空前的殘酷。他如一切從事勞動生產的勞苦平民和革命青年，也是同樣遭遇着急劇破産和毫無生存自由的苦痛。反動統治者對於平民大衆之恩賜，是鉅萬公債的搜括，一切苛捐雜稅的榨取；對於革命青年之恩賜，是逮捕，下獄，屠殺！

總之，自鄧先生被害這一年來，一切更比前黑暗，恐怖空氣，籠罩住了全中國。在此情形下，農工平民大衆，爲欲爭取生存，解除當前的苦難，自然非鬥爭不可，所以無論都市或農村，反封建統治的運動是有着猛速發展了，這局勢擺在每個同志的面前，我們怎樣去切實領導，在紀念鄧先生的今天，應該加以深刻的

考慮！

同志們！自鄧先生長逝後，帝國主義強盜也是越發肆無忌憚地向中國進攻！她們有的囊圖獨占，有的囊圖瓜分，促成了立刻滅亡中國的嚴重時局。整個東三省失去之後，日帝國主義既挑起上海血戰，屠殺了幾萬的中國民衆，又在猛力攻取熱河，準備進奪華北；法英主持的國際聯盟，更在露骨地計劃瓜分中國，與英法日不同調的金元統治者美帝國主義，也祗是藉着門戶開放，保持中國主權的完整的巧妙口號來鞏固其地位。同志們！國際帝國主義已經是總動員了，已經是盡集中目力在我們的國土了　這是何等危急的關頭！然而，反動統治者是怎樣的可恥啊！他們始終抱定不抵抗主義，任聽東北義勇軍和上海抗日軍的失敗，制止民衆的一切反日運動，甘心投降帝國主義，出賣中國民族利益！這一切，完全證明了反動統治者是民族鬥爭中的奸細，因此，無論他們是怎樣可恥，而民族鬥爭的怒潮却日高一日的沸騰，引起了世界弱小民族的無限同情和贊嘆。鄧同志給我們

指示了，民族解放是我們的緊迫任務，但要保障這個運動的徹底勝利，必須農工來領導，怎樣實踐先生的指示，又是慘痛的紀念中應該決意努力的。

同志們！我們的領導者是犧牲在農工平民革命的最初階段中，他的血染遍了中國農工平民革命史開始的一頁，從今天起，我們還要用無量數的血，染遍這部整個的中國農工平民革命史。革命便是流血的鬥爭，除了血，不能換取偉大的成功，除了血，不能留存永遠的紀念。先生的人格，先生的全部遺教，以及應證了先生預言的客觀情勢，上面僅曾約略地述說，希望我們的每個同志，時刻去修養，學習，行動！尤其要準備以血作爲革命的敬禮！紀念中國農工平民革命導師鄧擇生先生的敬禮！

末了，我們高呼：

鄧同志精神不死！

打倒反動統治！

誓死為鄧同志復仇！

組織農工武裝收復失地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實行土地革命！

反對反動文化政策！

實現農工平民政權！

中國農工平民革命勝利萬歲！

中國民族解放萬歲！

鄧擇生先生殉國周年祭

南溟

美酒不可飲，吾醉甯問天？
馳驅在長途，忽失先路賢。
拔劍嗟莫及，張弓徒空拳。
懷此不雪恨，耿耿迄周年。
魂兮儻有知，何以恕我愆？
昔在丙寅歲，伐罪動戈鋋，
公奮其智勇，所向銳無前。
於時余小子，左右適執鞭。
三楚既底定，生民苦顛連，
首標廉潔治，庶政悉改弦；

除苛蠲貪墨，有如穢遇湍；
復膺戎機重，諸軍資繫聯！
北逮秦隴晉，西及滇黔川，
信使所往來，皆公與周旋。
事煩食不暇，晷短夜無眠。
或規以節勞，形健神乃全。
曰：「余豈自逸，身爲生民捐。」
我時聞此語，心銘骨亦鐫。
丁卯元凶叛，中樞墮其權。
公首申大義，威信得昭宣！
儒夫持首鼠，殊功未獲竣，
援浙出國門，回顧意蕭然。

三載默不語，絕學苦攢研。
不忍久喪亂，投袂遽言還。
相見歎且愕，示我革政篇，
瞭如指諸掌，整若肆列廛，
知本在重農，「耕者有其田，」
坐言起而行，將爲天下先，
蕩虜冒萬險，不息日乾乾，
撥亂而反正，衆生望拳拳。
事機偶疏略，功敗身亦殞。
所嘆大無畏，不早躍在淵。
猶謂今楷模，性命苟可延。
豈知豹與虎，當門刈蘭荃。

鄧擇生先生殉國周年祭

噩耗旣傳播，哀痛心如煎！

峨峨紫金山，碧血流猶鮮。

仰首望穹蒼，日月當空懸，

光輝之謂大，不磷乃曰堅。

後死故有責，相誓視龍泉。

悼鄧擇生同志

亞子

噩耗傳聞雜信疑，傷心此度竟非虛！
爰書三字成冤獄，誰向臨安叙岳飛？

歐刀灼酒血流紅，玉敦珠槃正合同。
自壞長城檀道濟，忌才豈獨是梟雄？

舉旛太學慘輿尸，黃鳥殲良又此時。
哭過中山陵下路，沉吟天意總難知。

悼鄧擇生同志

北海當年重豫州，避人一面覺無由。
胥門抉目覩吳沼，太息乾坤剩幾頭!?

平民革命軍必然是成爲人民——農工平民的武先鋒，是永遠爲解放中國民族，建立平民政權，促進社會主義而產生而犧牲作戰。

哭鄧演達先生

澤民

一

不忍同爲豁一坵，天方到處亦縲囚。
若教一死能超脫，君自便宜我幾籌。

二

舉世今成喋血場，餘生贏得也何強？
堪嗟五十無聞我，猶自悲君爲國殤。

三

不爲君弔爲君歌，革命犧牲算甚麼？
一死能留天下法，媿他冠帶自峨峨。

四

被捕勞君問訊馳，　　知君爲我自忘危。
何期尺素遙頒日，　　即是承君永訣詞。

「按七月廿一日余爲港當道傳訊，旋即釋歸。君以余爲被捕，馳函問狀。詎料八月十七日，拘君之禍作矣！」

平民政權的特質

平民政權是由生產者所造成，而進行社會，經濟，文化的解放。并使之平民化的一種權力機關。

嗚呼擇生！汝今得所安息矣，哀人生之苦惱，嗟來日之大難，爲譯海恩利希海湼(Heinich Heine)之述事詩一首，用寄予之感歎云爾。

田田生

（一）

在聖靈堂的面前站着兩個男子，
穿着紅色的衣裳，
一個是劊子手，
一個是國王。

國王對劊子手說：
「僧侶們的歌聲歇了，我知道

「結婚的儀禮旣告完畢——，
你好把你的斷頭斧拿好。」

鐘聲大動，琴聲亂鳴，
羣衆洶洶跑出了那一座禮拜堂；
好一個紅紅綠綠的行列，
那一對新婚的夫婦正在行列的中央。

嬌滴滴眼波微歛的公主
帶着一副驚惶悲苦的慘顏；
晴朗朗笑口微開的阿臘福先生
做出一種大無畏的榜樣。

微笑的嘴唇開處，
他對那個形容陰暗的國王說：
「岳父大人，祝你清晨納福，
我的頭顱今天便要爲你斷絕。

「我今日便要永辭人世——
吁，讓我直到今夜夜半還活着罷，
我要沉醉我的新婚，
並要舞出我今生最後一度的繁華。

「我還要生活，我還要生活，

直到舞完了最後那一套舞樂，
直到喝完了最後那一杯酒——
直到今夜夜半我還要活着！」

國王對劊子手說：
「把他的頭保留到
今夜夜半——
把你的斬頭斧拿好。」

（二）

阿臘福先生高坐在結婚的盛筵上面，
把最後那一杯酒喝乾，

他那個新婚的少婦
偎倚着他的肩膀愁歎——
劊子手站在門口。

舞樂才動，阿臘福先生
便緊抱着他的新婦
在搖搖的火光之下狂舞，
最後的那一回舞——
劊子手站在門口。

小提琴的柔音這樣歡悅，
驚惶的笛聲這樣淒楚！

誰看見他們兩個對舞，
心裏都要感覺得萬分難過——
劊子手站在門口。

　阿臘福先生私語他的新婦的耳邊，
那時他們倆的舞步來得分外起勁：
「你不知道，我是怎麼樣的愛你——
墳墓是裏樣冰冷——
劊子手站在門口」

（三）

阿臘福先生，現在是夜半了，

你的生命便要完結！
你曾在自由的愛的享受當中
點汚了國王女兒的高潔。

僧侶們低聲誦出死的祈禱。
那個穿着紅衣裳的男子
跑到那個斬頭砧板面前，
手拿着那把寒凜凜的斬頭斧。

阿臘福先生步下庭階，
牽引着一把把的火光照耀得劍光如雪。
俠士的朱脣逐漸開了，

他笑微微的說。

「我爲在天的星月祝福，
天上的太陽
和空中飛翔的小鳥
我爲你們祝福無量。

我爲海洋祝福，我爲土地祝福，
並爲開遍在綠草茵上的鮮花祝福。
啊，你們當中的紫羅蘭花
你怎這樣酷肖我的愛妻的美目。

啊，我愛妻的那一雙美目，
我因爲它斷送了我的性命！
我還要爲那一棵嘉樹祝福，
在它的綠陰之下我初次同我的愛妻定情。」

新時代的開始，不但是在思想的戰線作戰，而，……是實際的行動上去勞作。所以現時，引導啓蒙時代的中國青年——具有農工平民意識的青年——到實踐的行為裏去；到眞正摧毁舊社會的寄生剝削秩序，建立生產勞作的新社會秩序程途上去，才是眞正解決中國青年問題的唯一道路，才能眞正的把新舊士大夫肅清。



鄧先生墓地遠望（有箭頭處爲遇害時埋葬地）

目錄

卷首

次

鄧演達先生與中國革命

光濤

(一)

人類歷史的結構，常循着人與物之交互作用的方式，以演着進化與變革之不斷的行程。

在某種物質基礎的定型上面，一定發生其時代環境相適應的歷史變化；在某種歷史行程的嬗變裏面，又必一定產生適合新時代發展的需要之物質條件；從特定的物質環境與歷史精神所產生之富有天材的個人，無論在思想與行動的形態方面，不是發揮闡述固有的歷史之內在的傳統精神，就是具有支配與改造新歷史的動力。

我們打開世界歷史的全部來看，像這樣神奇似的史蹟，是常見不鮮的現象；在宗教改革運動，思想啓蒙運動，政治變革運動和階級解放運動，以及其他各種

當有歷史意義之革命運動，都必然在一定的物質背景之下，由一定的特型的人物，一面認識着舊歷史之內在的崩潰性，另一面則把握着新時代之必然的前景，去執行變革與創造之主導的任務。如馬丁路德，克林威爾，馬克思，列甯以至孫中山等都是代表時代精神之範疇的人物。『歷史可以創造個人，個人亦可以創造歷史』。上述的歷史人物就這種歷史哲學的方式之證實的史例。

（二）

然而，時代的逆流，與歷史惰性的抗爭，則往往對於當時新興的力和新興的人，給以對抗的阻撓，使歷史的進程轉入歪曲的途徑，使許多推進時代的動力，犧牲或湮沒於社會黑暗勢力之抑壓下面。我們習見歷史上不少的天材的個人，往往不免『中道夭折』的悲劇，不能使他對於社會，時代與歷史完成一切應盡的責任。

但在另一面，我們又要了解歷史上個人的功業，恆在偶然與必然的軌跡上表

現盤旋的姿態；從短狹的片段的時空來說，任何特型的人物之成功與失敗，多爲偶然的定律所支配，而他的思想與行動則爲必然的定則所決定，並且必然繼續其存在的價值。所以，我們評斷一切歷史人物之社會的價值，應站在歷史性和時代性的觀點上，求其最公正的定論。

（三）

中國社會的發展，文化的演進，無論從法制，學術，思想，宗教及工藝諸方面來觀察，牠在世界史的全範疇裏面，構成一個東方式的特殊的形態，牠與近代的西歐，古代的希臘羅馬及東方印度諸文化宗派，及其系統的結構相比較，顯着差異的性格。

中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西方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尚未匯流於東方古國時代，牠的歷史演變的現象，完全是農業經濟商業資本及手工業生產方式之物質的反映，一切生產關係，生活方式，及意識形態，都沿着純單調的延綿的獨特路徑，遲

緩地前進；在政治方面，是地主豪紳及士大夫階級構成之東方式的官僚統治，而以中央的專制君主與地方藩閥及官吏衙役各等級的掠奪組織，爲搾壓農工平民之金字塔。在思想與意識的形態方面，一面以宗王重道之儒教精神，行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說教方式，以愚昧下層勞苦民衆，而使其在『樂天知命』與『逆來順受』的麻痹勢力之下，貢効其血汗；另一面，則放任雜家的異說，而以黃老之陰柔譎詐的權術思想，以至星相巫卜等之低級的技藝，爲彌補空洞與虛矯的儒教之方劑。在被抑壓的勞苦人民方面，生活與智慧，固然降落在一般人生所應有的水準以下，而其遭受鞭撻與掠奪之悲苦的程度，尤覩上層統治者之所謂『仁心仁術』的施發爲轉移；被奴使的農民一旦到了忍無可忍的限度時期，常循着天災與兵役的結果，在梟猾的豪紳的利用之下，爆發週期的變叛和反抗，而事變的終局依然是『以暴易暴』之環循的宰割。在數千年歷史的行程中，雖然經過異種民族之政治的侵略，和佛家思想的輸入，但宗主國民族之領導的文化與

權力，終較侵略民族爲優越，不但保持固有的主幹地位，而且發揮同化和克服的作用。

然而歷史的定運，豈能永遠繼續？歷史的車輪豈能常久循環？

從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壓力衝破了鎖國的長城以後，舊有的農業社會經濟和手工業生產方式固然遭着根本的推毀，而一向被視爲逐末的商業資本更起了變質的作用，藉着資本主義下之金融資本的虎威，發展其寄生與蝕食的功用，融合了地主官僚與軍閥之共同的經濟分野，形成半殖民地國家之資本統治；于是中國社會之木乃伊纔發生根本的酸化作用，一切舊有的社會秩序與其上層的結構纔達到新價值之必然的評定的階段。

現代的歷史，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階段之帝國時代，是財政金融資本之獨裁的富人政治與新興勞動階級的抗爭之對壘時代；然而佔據世界最大一角的中國，正是走上固有農業經濟劇烈破壞過程中的社會，正是企圖脫卸舊有封建的蟒袍

，穿上資本主義的外衣，而又恰好碰着世界社會主義新興勢力萌芽的階級。他的歷史命運正是演着悲喜劇的交響曲，殘存的封建勢力固然迫近了死刑的宣判，而近代資本主義的桂花冠，在國際金融資本的巨掌所控制之下，又豈能獲得扮演出台的希望？

（四）

中國農工平民革命運動的領導者鄧演達先生，他個人歷史的命運，思想的內涵，政治上的改造綱領，以及其行動的生活方式，一面是世界歷史與中國社會所決定之產物，另一面又是創造歷史與變革社會之具體的象徵。鄧先生歷史的勳績及其思想的體系，雖然正在蓬勃生長的時期，猝遭時代的反動性——中國反動的統治與支配中國主權的帝國主義——之摧毀，沒有進到絢爛成熟之完成階段，而使中國歷史之轉變發展的歷程，走入彎曲的歧路，這在鄧先生之偉大的理想方面，求仁得仁，本無遺憾；但在整個中國革命出路的觀感上，實爲絕大的損失，

成爲歷史的悲哀。

我們從鄧先生一生人格，思想，工作，及其行動之全體系的分析來說，正是中國社會轉變期中之特型的人物，正是中國歷史內在的變革運動之主導的動力。我們在數節裏面所敘述之歷史的動向，個人與歷史的關係，以及中國社會之現代化的歷史性，都可以從鄧先生的奮鬥歷史裏面，獲得證實的解答。我們不必以鄧先生比擬於任何已往時代之任何歷史人物，但我們確信鄧先生的一切正是中國未來新社會的典型；所謂「其生也有所自來，其去也有所自去」，正是鄧先生在一定的歷史法則之下，必然地出現，必然地犧牲，並不是悲觀與樂觀的情感所能主宰的支配。

一系列之陳腐的歷史行程，既然行到必然崩潰的末日，自然要在否定的定律之下，產生新興歷史的精神，去轉換新時代的命運。同時，在新歷史精神尚未獲得穩固發展之物質基礎，而舊有的保守勢力尚圖掙扎的鬥爭中，當然逃避不了殉

道主義者的命運。鄧先生個人之歷史的遭際，就是這種歷史運動法則之具體的史實的表現。

（五）

鄧先生萃聚了一生的精力，集中於中國革命運動之發動與開展，而且盡瘁於指導革命行動之理論的探討，他不但掘發了中國傳統文化之腐朽的陳屍，並且檢閱了近代西方兩大文化宗派之內在的癥結，（即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以決定其今後對於中國社會繼續存在與發展之支配因素。他所採取之檢討的方法，一面廢棄東方虛玄哲學的觀點，和排擊從來西方高度資本主義所產生之觀念主義的論點，同時，他更拋開近世時髦哲學之機械唯物論的主觀觀察方法，痛惡以一切定式化的公式，來決定中國革命理論的說教。他始終站在人類最高的原則上面，所謂人類至上的博愛理想，去把握現實客觀的事物，現象和運動，完成他絕對客觀的歷史的唯物的斷論，決不蹈襲一切因陣的歷史傳說，而以實現性的討論爲一切問

題解答方案的中心。

在武漢革命時代，有許多政敵的誹謗者，或以速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殘餘這樣的毒口，來譏毀先生；在先生第二次回國領導中國革命時期，更有不少的政敵，發出願意中傷而實際無損於先生的偉大的僭毀，比先生的革命理論爲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其實，先生生平之革命主張的根據，完全注重於客觀眞理的追求，求實際問題的解答，一向不標榜任何主義的號召。他始終認定中國革命的發展與出路，應取決於中國歷史及物質的條件，應在世界歷史之整體的趨向下面，構成中國革命系統之獨特的理論的途徑，這是先生超越的偉大，而爲一切政黨的誹謗者所不能了解的地方，所以，我們論定先生之中國革命主張，是出發於實質理論的方法，絕不是依據形式理論的推演。

（六）

歷史哲學之修養是一切革命領導者必具的基本因素。投機取巧的政客與黨閥

固不能有確定的歷史哲學的見解；而盲從附和的唯物論的機械主義者更是搖擺不定，隨革命波浪的高下，而決定其趨利乘便之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鄧先生時極致力於中國社會發展歷史及世界史之深刻討究的工作，他主張革命者的人生觀應基立在歷史發展法則的認識之上。他認爲一切不了解歷史進化行程的政治運動的人們，他們最終的政治行動目標，不外個人地位與需要的滿足，決不能發生爲歷史奮鬥的努力；同時不根據歷史所決定之政治鬥爭，不是落於疎遠虛無的陷坑，就要違背客觀現實的要求，陷入於盲動的錯誤；所以，鄧先生在深切了解歷史法則之下，一貫地認定中國革命的發展應保持其獨立的特殊的體系，應該從太平天國之原始式的民族革命運動反專制君主運動，中經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以至一九二五年時代的國民革命運動，進展爲農工平民革命，以行轉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完成；同時這一序列之革命的史的發展，一面保持中國社會革命之必要的獨特性格，另一面又是符合世界革命的一般範疇，兩種革命的進行，

原在一定的互相翼助之方式下面，完成其歷史的任務；所以，鄧先生之中國革命觀與世界革命觀本是一元的論證，是歷史辯證的認識。但是強制主張中國革命爲實現世界革命的手段之國際主義者，他們首先存着硬性的形式化的主觀見解，認定鄧先生所主張之中國革命僅是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而反動階級所標榜之三民主義革命則立在另一極端的竿頭，揭着國族中心的旗幟，以掩飾其背叛革命的行動。

（七）

社會結構之史的分析，與社會組織之解剖的認識，同是革命領導者對於創製革命方略之必備的前提。中國歷史上已往的革命運動往往循着社會經濟之原始式的週期崩潰的形勢，爆發農民反抗地主官僚及專制君主的鬥爭，當然沒有任何理論的指導，與政治方案的提供，即在近百年間所表演太平革命與辛亥排滿革命，雖然有着比較成文的政治主張，但亦簡略異常，直覺的行動，多過客觀的認識，甚

至一九二五年國民革命的高潮時代，政治綱領的具體化，較諸已往，固爲進步，但確實根據中國歷史與社會之科學的觀察及分析，尚在幼稚的階段。

鄧先生從革命失敗的經驗中，深切地認識了這種理論工作的必要，因而銳意探求，擺開一切傳統的成說，和反對流行之錯誤的觀察，認定中國社會之史的發展是一部農業社會之經濟商人資本與手工業生產之傳統的歷史，是地主官僚及涵育於儒家黃老思想的士大夫所共同構成之東方君主專制的統治，而在西方資本勢力侵入以後的今日，則爲一種轉變期中的畸形社會，在經濟的結構方面，形成前期資本主義的統治，而以商業資本爲主要的特徵，一面是舊有的農業手工業踏到加速破產的過程，一面是國際金融資本大量的流入，扼住民族工業資本的咽喉，在沿海通商的都會，只見着官僚軍閥與地主買辦，藉着高利貸，公債票，高品推銷以及苛捐雜稅等方式由農村吸吮來的大批現金，除建築輝煌的城市，百貨商店，以供帝國主義之搾取而外，則掃數歸入外國銀行的金庫，流到東京紐約巴黎及倫

敎各帝國主義者的腰包裏面，所謂民族工業資本僅保着氣息奄奄的生命，同時，在內地各省，則呈着滿目荒涼，飢餓載道的貧苦農民之流亡圖，一切農業經濟與家庭副業完全破壞，陷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絕境。在政治形態方面，一切最上的權力自然執掌在帝國主義者代理人的手中，所謂中央與地方的實力完全掛在大小軍閥槍桿的尖端上面，一面構成狼狽爲奸的姻緣，另一面，又因利益的衝突，造成互相兼併彼此對壘的敵勢；而一切吃慣了不勞而食的新舊士大夫與官僚政客等則依然奔走於權貴之門，盡其趨仰迎奉的能事，發揮爲虎作倀的技倆，藉以共同吸吮農工平民的血液；至所謂『黨』與『主義』，不過用爲期騙與榨取的手段；凡一切政治的措施，法令的施行，和什麼計劃與議案等等，都是以掠奪民衆利益爲中心，即最低限度的人民自由權都在獨裁統治之下消滅無餘。最後，在文化思想方面、中國現社會的演進，既然沒有經過正式產業革命的洗禮，封建思想與殘存的東方文化依舊抓住軍閥官僚的心窩，保存原有的意識形態，作爲統治人民

的工具，所謂『禮義廉恥』和『名教綱常』的觀念，常爲軍閥利用的口號；同時，資本主義的思潮與生活方式則由帝國主義者，買辦階級與東西洋留學生盡量地批發進來，更藉着基督教的蔓延，而與舊有的傳統的東方文化共同融成愚弄人民的毒劑；至於新興社會主義的新潮，更隨着革命運動的巨流，一致地湧入；結果，形成極大混亂的現象。

（八）

在這樣黑漆一團的中國，社會的轉變歷程，正在醞釀與嬗化的時代，社會階級的分化還沒隨着資本主義的成熟，達到顯明清算的階段；階級爭鬥的意識，還沒有受着長期鬥爭的經驗，與文化水準的提高，達到堅決與統一的限度；同時，民族資本的命運，則因爲次殖民地的國家地位關係，一切主要經濟命脈完全落在帝國主義者的掌握，使其不能獨立生長，此外 更加上買辦性商業資本的跳梁，和封建性的軍閥之政治割據與戰爭，以致決定民族資本的前途，絕對沒有飛皇騰達

的希望。綜合這樣的觀察，我們堅決認定中國革命的出路，決不是無產階級的直接社會主義革命，工人獨裁政權的建立；更不是歐美式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前程，牠必定依據現社會客觀條件，需要一種適合於解決目前中國問題而且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之轉變時代的革命。

鄧演達先生依從社會科學之理論分析的結果，和革命歷史的體驗，在武漢革命完全失敗以後，即絕決提出中國革命後應走之獨立的歷史路線，即認定中國國民黨的革命任務，已隨着上層領袖之變節，與其理論的蕪雜，不能繼續發展，同時，又肯定中國共產黨所主張之無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路線，必然的陷於失敗的途徑；所以，鄧先生首先勇敢地主張建立領導中國革命鬥爭之新集團(黨)，並且重新確定中國革命之政治綱領，排斥一切反對論者的異議，認為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是農工平民革命的要求，牠的主要的內含是：(一)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二)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三)解放農民羣衆的土地革命，(四)準備社會主義建立

的條件而富有反資本主義性的國家資本主義之建設，(五)建立農工平民政權，掃除一切地主官僚軍閥買辦及新舊士大夫之剝削階級的統治，以爲完成上述各種革命任務之人民的機關。

我們現時對於鄧先生政治主張，及其說明的理論因爲篇幅所限，當然不一一臚列，要求詳細明瞭的朋友們，自然可以參閱鄧先生的遺著；但是我們爲紀念先生，爲讀者的便利，試給以如次之概約的說明：

(a)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　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下之最重要的一個範疇，前次在世界戰爭以後，金融資本主義的猖獗，已達到最後掙扎的階段，牠的唯一的解救方法是對於殖民地及次殖民地進行高度的侵略，所以被壓迫民族之解放爭鬥是決定世界資本主義最後存亡的關鍵；中國雖爲名義上的獨立國家，而實際是一切帝國主義共同支配的對象，中國歷史之不能正軌的發展，完全因爲受帝國主義宰治的關係，同時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程序中，尤以中國民族的解放爭鬥

爲決定的因素，因此，中國革命之民族革命部份是含有世界歷史的意義；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與自由，一面是中國民族之神聖任務，另一面又是推動世界變革之動力。但是，我們應有深切注意的要點：就是中國民族獨立的要求，在其牠自身方面，是一種完整的目的，不祇是手段，在鬥爭方面應居於自動的領導地位，絕不能以依賴的心理，僅看作實現世界革命之手段，而立於被動的立場，聽候國際主義革命與國家主義的互相爭鬥之自然的解決。

（b）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中國社會的現勢，無論從政治或經濟的組織來看，當然沒有進到資本主義的統治，一切地主豪紳及大小軍閥所掌執的權力依然保持封建的殘餘；中國目前革命之重要的對象，當然是鏟除上層封建政治的形態，掃絕經濟上一切封建的殘骸，使由破壞的農業經濟，手工業生產和行會的組織，進到近代科學的產業組織階段，轉入於國家經濟社會化的程序。所以，我們在民主革命的課題之下，側重於土地制度的改造，國家資本的建設，以及農工民主政權

的樹立；牠的本質，當然受着世界歷史前途的決定，不相同於前兩世紀之歐美民主革命的性格。

(c)土地革命　封建領主與地主經濟是一切封建勢力之強固的基礎。無數勞動的農民都變成甘受烹割的羔羊；世界革命史上所有民主革命過程，大都經過土地改革的階段。中國二十年來之民主革命，一再流產之主要原因，厥爲土地革命的任務根本沒有執行，最大多數的農民依然保持牛馬般的生活，成爲地主豪紳軍閥官僚之搾乳品，始終沒有抬頭起來；因此，他們在政權方面，固然絲毫無分，在經濟方面又一向被束縛於高利貸商業資本，高額地租與政治剝削之下，以至苟安於原始生產方法，最近數年來，中國農民在天災戰爭的影響下面，爆發了廣大而又殘酷的爭鬥，所以，我們爲要完成及保障民主革命的工作，及掃除封建經濟的基礎，就當首先履行土地革命的要求。

其次，世界工業資本發達到登峯造極的階級以後，都市與農村形成對立的形

勢，農民經濟的解放成爲日常爭鬥的問題；在這次世界經濟恐慌的現象裏面，農民問題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因此，土地制度改造運動不僅在今日的中國有極端重要性，即在資本主義諸國亦成爲革命之重要部份。

土地革命之重要性固十分明顯，但土地革命之解決方案亦各四異其趣。在歐戰前已有所謂德國式與美國式的方法；在歐戰以後，則有蘇俄的土地改造方案與羅馬尼亞的土地改造法；在現時的中國，許多人們已把土地問題當作政治上時髦的口號，如東方文化派之村治運動，江浙買辦資產階級南京統治者包括在內之農村改良運動，五光十色，不一而足。

然而鄧演達先生則始終排斥這一切落伍或欺騙的土地改革方式，第一，他認爲解決土地問題這一着就是判定一切革命黨的政治生命之特徵；在武漢革命時代，他說，中國國民黨如不能担負解決土地問題的責任，國民黨的革命就是完了大吉，然而當時執掌政權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們竟拒絕了鄧先生的主張，放棄

土地革命，結束了國民黨的政治生命。第二，鄧先生認爲中國土地問題之確實的解決方案，應本着中國農民本身之客觀的需要，以及參攷世界各國之最進步的土地改革方案，而切忌抄襲任何既成的方式，所以鄧先生在其政治綱領裏面有許多原則上的決定（此地恕不詳擧）。

現時我們更當論及的，就是村治派的主張，完全站在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合於軍閥的脾味，所以他們的運動始終以北方落後社會爲競技場。其次江浙買辦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其目的（一）在於緩和已爆發之農民恐怖的爭鬥。（二）爲資本，商品尋找國內的市場，根本沒有爲農民打算。最後，中國共產黨所頒佈及實行之土地方案，主要目的在以土地革命爲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手段，顛倒了因果關係，在最近的失敗經驗中，已證實了這種批發來的蘇俄的道路，絕對走不通。

（d）國家資本主義　歐戰告畢而後，破產的世界資本主義由合理化運動，收到相當復興和穩定的效果，然而，自一九二九年以來世界經濟大恐慌出現以後，

各資本主義國家又從新喊着國家資本主義的口號，企圖在統制經濟計劃經濟的方式下面，保存殘餘的生命，同時，蘇俄由戰時共產主義實施的失敗，為改新經濟政策的實行，以至再演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建設，而以五年計劃的方案，樹立實現社會主義之物質基礎，在成效方面，確已得到不少的成功，並且引起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重視。

落後的中國，好像只富於模倣的本能，一切的一切，不外照抄與批發，南京統治者固然因為政治失敗，把堂皇的三民主義拋在糞坑，也跟喊出國家資本主義的前前途，卽在野的政客們也是同樣的高叫起來，什麽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更有什麽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等運動，一齊露面出來，這眞是一步一趨，跟着尾巴跑！暴露中國民族的劣根性！

其實，中國經濟的出路，自有中國社會的客觀條件與人民的要求，來加以決定，我們應該用自己的腦汁和眼光，來診斷中國經濟道路應走的方向。鄧演達先

生早在一九二七年，因革命失敗求學國外的時代，提出國家資本主義的建設，爲中國現階段解決經濟問題之答案，同時他所主張的國家資本主義更與中國革命問題之完整性有十分密切的關聯，如農工平民政權，土地革命，及民族革命諸方面都是息息相關的。

在帝國主義握掌全國經濟最高主權的前提下，買辦商業資本發生強大的作用，國家資本從何集中？從何自立？在大小軍閥割據的統治沒有消滅以前，貨幣不能統一，財政不能統一，交通不能統一，國家資本統制的基礎何在？在地主階級宰治鄉村，貪污官吏佈滿天下，農民生產無力，消費無力，國家資本的來源與去路又在何處？總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建設是目前絕對必要的東西，但我們不應該忘記中國革命的前提。先進資本主義諸國家有了強固的資產階級，有了階級的民主政治，他們有資格去講國家資本主義；蘇俄同樣有工農統一的政權，有獨立國家的地位，自己有力去實現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幾個五年計劃，但是現在的中

國是怎樣的情況？

（ｅ）農工平民政權（亦稱農工民主政權） 人類階級社會之政治爭鬥的最終目的是在奪取統治工具的政權；在階級社會的國家，政權是一種階級的集體意志之權力的表現；一個支配階級或幾個聯合的階級，爲實現本身利益的要求，爲掌握經濟利益的支配權，爲保障及鞏固生存與發展的機能，牠必定首先掌有軍事警察法制等權力機關，以及統制文化思想的特權。世界史上之政治權力的嬗變，雖其表現的方式，因各個時代之社會發展形式的差異，構成性質的判別，不能顯著劃一的色調，但主要的演變的形態，則自貴族政權，封建政權，資產者政權以至新興勞動生產者政權之史的序列。

中國社會結構之史的演進，已略如前節所述；從延綿的小農經濟商人資本與手工業生產之長期的歷程裏面，自然產出與這樣物質基礎相適應之東方式的專制的封建統治；從前世紀之末以後，中國維新派的士大夫雖然企圖在封建的廢墟上

面，改建近代式的政治組織，然而舊有之生產方式的基石終不能載着這樣新式的建築物；辛亥革命的爆發，以中小資產階級為中心的國民黨更是努力實現歐美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移植的工作，而結果，因為中國民族資本勢力，一面受制於國際金融資本的高度壓力，一面為封建地主與殘存的軍閥官僚所控制，國民黨的幻想以及其他各種民主憲政的企圖，只有葬埋在共和的墓碑之下。在一九二五年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地主豪紳，買辦資產階級，及軍閥官僚等所構成之新式的聯合政權，當然在組織機構方面，依着階級爭鬥的經驗，與鎮壓農工大衆之革命勢力的興起，顯著不少的進步，但政權之階級的基礎與政權的性格上，依然保持中國歷史上之傳統的性質，所以， 我們堅決地斷定這樣政權的前途， 必定隨着物質條件的崩潰而沒落， 根本沒有持久的價值， 與扭負中國民族和社會復興的希望。

我們依據政治科學與哲學的觀點來說，每一種強固政權的確立，牠必定具有

這樣的基本條件：(一)有一定的由社會生產關係所決定之代表的社會階級的基礎；(二)在社會生產方式未被變革以前，支配階級所掌握之經濟統治尚能滿足社會的要求；(三)被統治的各階級沒有發展到爭奪政權的階段，和沒有備具爭奪政權的能力。中國現時統治者的政權試問建立在那種固強的社會階級上面？試問由中國現時之舊有的生產方式是否走進被變革的階段？試問中國新興的階級之政治與經濟的要求和爭鬥已進到如何猛烈的程度？經濟之必然的沒落，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買辦階級的商業資本根本與民族主義相對立；民族資本勢力又早在國際資本主義的鐵蹄下面；同時中國農工平民大衆之革命的需要，與其爭鬥力量之廣大的推動，又是共見共聞的現象，在這樣的形勢之下，試問地主豪紳買辦資產階級及軍閥官僚所構成的聯合政權還有什麼存在之真實的基礎？

南京政權的崩潰，固然是時間的問題。但代替的新興政權應該是什麼？我們的問答是：適合於中國現社會轉變期中所需要之農工平民政權——或稱農工民主

政權。其理由如次：代表封建社會及資產階級之任何方式的政權既然不能成立；那末，其次就是無產階級之獨裁政權的問題；這種性質的政權在歷史的行程上，當然是階級社會完全消滅之前期的政權，當然是高度資本主義國家之革命政權；然而在現時的中國，既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單純無產階級之社會主義革命尚非現代中國歷史的要求，所謂無產階級之工人政權或蘇維埃政權自然是缺乏客觀事實的條件。中國目前需要政治與經濟解放的社會階級，不僅是工人階級，尚有廣大鄉村的貧苦農民，和都市平民羣衆，就中遭遇最苦，壓迫最甚的還是無田可耕及有田而不能耕的勞動的農民；所以，我們的結論是：爲完成解放中國民族，解放中國經濟與政治壓迫之任務的統治政權只有代表農工平民大衆之革命階級的農工民主政權。

其次，我們更當說明的：(一)這種革命過程中的農工民主政權當牠進展到中國社會經濟之進一步的發展，卽農業經濟的工業化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化

時期，以及世界革命達到成熟的階級，中國革命政權性質之辯證的轉變必然達到無產階級政權的方式，以實現社會主義社會之全部的建設。(二)革命政權之形成與發展，必定依着社會經濟與經濟關係所決定的階級之辯證的發展律來取決的；在現時中國革命的營陣裏面，既然列有反封建勢力之民主革命與土地革命的農民階級，既然列有反買辦性商業資本高利貸以及反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統治之都市平民大衆，他們自然要求革命政權之共同掌握，中國工人無產階級在革命勢力之質與量的條件上更當與被壓迫的農民平民大衆締結堅固的革命同盟。(三)革命問題的解決是整個的；只有社會民主改良主義的機會政策，調協主張才持着局部的見解；中國革命的工作，社會經濟的改造，民族解放的完成都與革命政權的建立具有深切連帶的因果關係，如若沒有農工民主政權之建立的前提，則一切土地革命，民主革命，民族革命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建設都是空想而已。所以，鄧演達先生之中國革命程序是統一的主張，不能加以局部的竊取。

（九）

關於鄧先生之革命的政治主張說給以概要的說明；我們再看鄧先生對於中國思想與文化革命之趣旨是什麼。

任何革命運動之爆發，自然決定於社會經濟條件；任何革命運動的目的自然在解決政治與經濟所產生之必要的問題；然而指導革命運動，醞釀革命運動，以及發展和保障革命運動又必須首先啓發革命運動的思想與文化。歐洲大革命運動成熟的前期，首先就有思想革命運動的發生，就有哲學革命的表現　中國傳統的思想與文化原來產生於中國社會經濟的組織；儒家的教義與黃老權術思想共同支配了數千年的歷史，充了帝王官吏之統治的利器。在過去歷史上之週期的農民變亂，只是順從物質的條件，成爲自發的表現，根本沒有產生思想與文化上的叛逆運動，結果，只有朝代的更換，沒有性質的變革。太平天國之革命運動雖然帶有宗教思想的色彩，然而只局限於表面的形式之利用，缺乏內在的根基與精神的變

化，終至折服於封建性的士大夫反動勢力之下。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初期運動與維新派的變政運動，雖然比較進步，接近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但是前者的思想背景，只是南方下層社會之密祕會社的羣衆，和少數富有近代思想之智識份子，尤以排滿的民族狹隘意識爲領導的主幹，沒有眞正資產階級的思想；而維新派的士大夫更是拿着『西學爲用中學爲體』之半封建意識做思想的骨幹。中國新思想之啓蒙運動的開始當然要算五四思潮的爆發。牠的產生的背景，一面是國際潮流的波動，一面是中國社會經濟之巨大的變動；中國國民黨之後期革命運動，和幾次反帝國主義的抗爭，都是受了這種思想運動絕大的影響。

然而，時代思想的進展，伴着世界經濟的動異，呈着日新月異的色調：歐戰結束，蘇俄革命成功以後，中國思想的動向，自然不能循着『五四』的路線，一貫地前進，方向的轉換成爲必然的需要。在前次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思想界之厖雜和混亂更是有目共睹的現象，社會主義思想之闖入的資本主義思想之渲染，

新孔教的復辟，以及黃老權術思想之潛滋暗長，此猶就其主要的思想系統而言；其次，更從各個主腦體系，別樹支派的旗幟，從哲學以至文學的領域，都有各是其是，入主出奴之成見毫無調協統一之趨向，這完成反映了中國現社會之分崩離析的現象。

但是中國民族歷史的前程，中國社會發展的前路，必定從沒落的矛盾過程中，發生新興的主導思想之精神的動力，才能摧毀陳腐古朽的渣滓，才能排擊一切貌爲時髦而實際不洽需要之空想的思潮，形成一種強力的民族的社會的與歷史的革命思想。我們認爲一切思想與文化之體系只有經過長期精神鬥爭的歷程，只有透過大衆社會的要求與認識的意識，更藉着許多思想家與行動者的智力和實踐之集體的努力，才能達到完成的階段；單就支配近代史上民主革命與社會革命之兩大巨流的思想系統而論，决不是從某一天才者的腦海獨自冥想地創造出來的，牠必定有社會的條件與歷史的背景，爲人類精神之歷史鬥爭的成果。所以，任何理

論的體系決不能有什麼『主義的閥』和『理論的閥』所能獨占。

鄧演達先生本著平生精力探究的結果，本着社會實際鬥爭的經驗，認定中國革命運動之急切，必定先有中國問題所產生之獨立的思想和文化系統來担任先驅的工作。鄧先生的觀點是這種：(一)在消極方面，中國新興的思想應加力排除傳統的東方文化的餘毒，特別是名教綱常之儒家的說教和陰柔險毒之黃老權術思想，與一般士大夫的意識；其次，就是消滅西方富人階級之資本主義的掠奪思想，尤其是口善心狠的基督教的麻醉思想；(二)在積極方面，中國農工平民大衆及其思想的先驅者應當繼續『五四』啓蒙運動之精神，抓住科學社會主義思想之精髓，針對着中國現社會的病癥和歷史的民族的需要，以及未來新社會的理想，發動『新啓蒙運動』之思想與文化的爭鬥，對於世界史上既成的革命思想體系或理論應該用一番客觀的科學的檢討，分別其民族的與歷史的因素，更加以中國社會之實際鬥爭的體驗，使在長期的生長和發展的歷程內，形成中國革命之獨立的理論

或思想的體系，我們應切忌抄襲與批發的錯誤，走入摹倣的陳套，切忌蹈襲異國思想或文化的形式，拋開牠們的實質問題。所以，鄧先生在思想問題之形成的方法方面，是唯物的歷史的而又辯證的客觀方法，在內容方面，是革命的民族的社會的而又實踐的實質。

（十）

思想與實踐，行動與理論，同是受着統一律的支配。英雄主義者往往輕視理智的判斷，而以超人與權力的心理為一切實際行動之指導原則，結果，社會的正義，大衆的福利，均為英雄主義的鐵蹄所踩躪。但是革命的領導者，農工大衆的領導者，卻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場；他的天才個性已融化於羣衆集體的意識；他的超人的能力已結合於時代與歷史的要求，化為社會鬥爭的動力；同時他的思想與行動混成統一的結晶，他的生活與精神形成一貫的表現。

中國農工平民革命的領導者鄧演達先生，他偉大的人格，正確的政治主張，

固然深入了中國農工革命羣衆的意識，成爲中國革命歷史的象徵；然而鄧先生之革命生活的方式，更與其思想及言論構成完整的表現；東方式的僞善哲學，權術思想，文人的空論，以及只擇手段不問目的之所謂階級鬥爭戰略，都是鄧先生生平深惡痛絕的。我們認爲革命者之實際生活的表演，個人的處事接物，以至公共的政治鬥爭，都應當在同一的一貫的原則之下，用眞正的光明的態度，發揚出來；革命的煽動，固然在爭取民衆的擁護，但是我們不能用空頭的政治口號，而缺乏實現的可能性，去欺騙民衆，革命集團的組織，固然注重嚴格和機巧的運用，發揮推動與先鋒的功用，但是我們絕不能抱着工具主義之機械的觀念，忽視了人的價值。所以，鄧先生在人生之實際鬥爭的生活方面，表現着充實的革命的意義：(一)精神生活方面，鄧先生無論在研究學術及對人接物上，富有濃厚的中國墨家哲學的精神，他對于中國黃老及僞善的儒教固然深加抨擊，但對於墨家之『崇實』，『克己』和『求是』之言行統一的精神，則完全承襲下來；刻苦的享受，名利

觀念的屏斥，和精審的治學方法，同是鄧先生日常用以自勗而且持以勗人的規律；另一面對於近代西方思想家及革命領導者的生活與精神同樣地景仰着，努力在自己的生活的線內，求其實施的運用。(二)物質生活方面，站在農工階級革命鬥爭的觀點上，一切領導者的私生活，自然要眞實地表現農工階級一般生活的形態，所謂『以身作則』的格律還是富于矯揉造作的意味；鄧先生平民化的生活方式不是出發于道學先生之之却慾主義的觀點，但是從農工階級意識的把握，與鬥爭的需要裏面，自然地反映出來。其次，現代中國政治界的掠奪者，如軍閥官僚等，在北洋軍閥時期，固然以直率明坦的方式，搾取國家和民衆的血液，充實其私囊，享受豪華淫侈的生活；而在今日的統治局面下，所謂新式軍閥和政客們更是張着政治與革命的假面具，進行更殘忍的掠奪政策。鄧先生從事於政治與軍事鬥爭生活，已歷多年，深切地認識了這一切罪惡的根源——經濟的搾取——一切社會和政治腐爛的因素；所以，他決然鏟除這種惡劣的根性，一面使個人物質生活

極端的單純化，排除一切誘惑的客觀條件；一面嚴密政治制度的組織和工作人員之廉潔性格的訓練與養成。(三)鬥爭生活方面，革命的領導者不僅要用思想與理論去領導羣衆，不祇在深宮裏面做發縱指使的工作，他必須站在民衆生鋒的前哨地位，以肉搏的方式，引導革命大衆向敵人進攻；鄧先生在領導國民革命時代，在軍事工作方面，他的入死出生衝鋒陷陣和身先士卒的苦鬥固然表現了革命軍事家之英勇的品格；同時，在政治及社會運動的鬥爭行列中，他更加發揮前哨戰的英勇精神；我們記得在廣州反英帝國主義運動，武漢收回租界鬥爭，以及旅歐時期的反帝運動，鄧先生都是拿着領導者的資格，置身鬥爭的前列，激動民衆奮鬥的熱情，以爭獲得革命的成果。其次，鄧先生認爲政治鬥爭是人類政治理想與橍力意志之爭取實現的抗爭，他的成功與失敗，完全取決於客觀的需要，不是憑着鬥爭者之主觀的企圖；所以，鄧先生在執行鬥爭戰略的場合，絕對保有兩種必要的基本觀念：卽政治道德與社會的正義；他從來對任何敵人或反對政黨，不採用

權術的手腕，排除力詐騙搆陷的陰謀；只有政治綱領的論辯，民衆信任的爭取，纔是致力於民主革命運動之政黨或領導者之正大的態度；投機，陰謀，造謠，以及搆陷等等卑劣方式，只有侮辱或降低中國革命運動的價值，增加中國民族政治鬥爭的罪惡而已。在鄧先生領導實際鬥爭時期，反動統治者的誣陷，固爲當然，但同時在野的政黨亦往往以蜚語中傷，希圖毀壞先生的政治人格，然而先生處之淡然，聽任事實之自然的答辯。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擇生同志的思想輪廓

太任

（一）

擇生同志的犧牲，忽忽已是一年了。但是我每想到擇生同志。我總不信他竟然已是死了，此生再也看不到他了，——他的音容宛在他的活潑潑的精神還是活躍在我面前，我每一想到他，就像在同他對面談笑一樣，他的態度舉止，他的精神，以及他的一切一切永遠活躍在我的腦際，雖然他的形體是再也看不到的了。

擇生同志因爲是軍人出身的，故一般人都祗知道他的堅苦耐勞，勇往直前的精神，爲一革命領袖中不可多得的事業家；但卻不知道他還是個深刻的思想者。他的頭腦不特細密，而且有條理；不特清楚，而且具有眞知灼見；不僅能分析，尤長于綜合。他最大的長處是能理性的精確的去考察一切，他始終不會被某一種某一派的思想理論所束縛。他沒有先入爲主的偏見。這一點，或者平常的人多不

注意，但是這是一個科學思想的人所必具的條件，所最難望於當今之一般所謂理論家的。

擇生同志如果不以事業聞于世，他必然會以學業聞于世。在他本身雖未必以此為念，只在努力於解放農工平民的實際運動，但他求學精思，尤其不可多得。

（二）

擇生同志的思想系統，和思想路向，是早卽確定的了。他對於各種問題的根本見解，以及思想的出發點，都早已有把握在胸；這就是他思想和行動的一切基礎。

擇生同志在哲學的立場上不是唯心論者，但他在實際鬥爭人生中間，常持着最高理想他說：『我們分析事理的時候，不能不用極嚴酷的態度；但是一個人如果沒有理想，决不會有勇往的精神；歷史上的大事業家，在客觀上說來，固是環境的產物；但就主觀上說來，這些人都是帶得有宗教家的精神』。他又時常說：

帶兵打仗，一般人都看作是軍事上的事；其實這是一個哲學的實踐。有哲學的人，必能帶兵作戰，而且還能決勝』。他亦這樣說過：『要衝破一切羅網；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國，民衆們被數千年來的禮教所束縛，種種的傳統思想所蠱毒，——要衝破這些羅網，我們必須要極力提倡唯物論，決不怕有太偏之弊。我們實在不忍心看見這許多人還醉在中世紀的思想中』。

擇生同志在哲學上自己承認是『相對的實在論者』（見其所著，我們的思想系統及主張根據一九二九年出版），他說：『宇宙是一個大謎，我們是在謎中求眞，求解答』（見該書總結）。他又說：『宇宙不可認識的世界會永遠存在』（該書第二頁）。他這個見解，或者可被視爲懷疑論者的態度，但是，凡是知道最近科學思潮的人，都可明白，這是現代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學對于宇宙唯一的結論。（參觀W yl的空，時，物——本相對論講演）不獨機械的唯物論者所不可與語，就是自命爲「辯正法」的唯物論者，自然也是不會了解的（記得擇生同志的思想系

統及主張根據發表後不久，某黨的機關報上面即以辯正法的立場極力攻擊之)。

事實上，擇生同志的確是個實在論者，他深明機械的唯物論武斷不合科學，他自然更深明純粹唯心論的脫空妄想，他的立場與大哲學家康德的立場極接近，他說：『人類認識宇宙底工具是根據於經驗底複現律和不可證知的玄學，他并且是人類認識宇宙的必要條件』。所以擇生同志這個見解，實在與康德的立場完全相同。一部『純粹理性批判』，(康德的名著)說來說去也不外這兩句話；但從他方面看來，擇生同志的這種思想與最近呼塞爾(Husserl)等的現象論亦極接近。

雖然，擇生同志的哲學思想，早即有人說過是小資產階級的，但是這種批評却并無答覆的必要，反正這一些話決不足以詆毀擇生同志于萬一；現在且把擇生同志自己對于宇宙問題所發表的話錄下(我們的思想系統及主張根據，第一節)：

『第一節　宇宙

『A宇宙底認識。宇宙底認識，起初由於單純的感覺，由感覺世界底逐漸擴

大，及主觀的科學底發達（數學及理論學），成就了許外經驗科學；因此經驗科學的發展，更擴大了認識宇宙的範圍，成功了我們今日能感能知能臆測的世界。部分）

『B宇宙不可認識的世界，(不可思議的部份)底永遠存在。

原因：

『1因爲人類的本能是有限的——尤其是認識宇宙的能力是受了限制的，所以不能了解全體的宇宙底內容。

『2從經驗知道：每次科學發明，一方面雖然把認識的範圍擴大，却同時又把不可認識的範圍推進。結論：宇宙不可認識的世界會永遠存在。

『C宇宙可認識部份底內容，及其實在性。宇宙底現象，大別區分爲自然的現象及人類社會底現象，或簡稱爲社會現象。在這些現象界裏被人類認識的部巳和現時世界的人類努力範圍相當，人類去認識宇宙現象底工具是：1數學，2

論理學，3假設的眞理前提(玄學)，4歸納的科學方法，5已知的定律根據。上述的工具中1 2，是先天存在的，他不待別種事實作證明，而可以自證爲眞的。3，是主觀的，是時常隨人變易的。4，爲方法，他的根據是在過去的經驗及新發生的現象。5，與是得到新發明新定律以前底發明和定律。

『因此我們可以判斷！人類認識宇宙底工具是根據於經驗底『複現律』和不可證知的玄學。照論理：凡一個概念包含有不可證知的部份，則該概念必屬於不可證知。因此宇宙可認識的部份不是可以絕對的證知的。如果我們以爲可證知的才是實正，那麼，我們應該承認宇宙可認識的部份不是絕對的實在。

『D相對的眞理。

『我們如果把推求最高原因」—絕對的原因——底問題暫時放下，我們是可以承認相對的眞理的。因爲我們已經把宇宙認識的部份認爲相對的實在，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相對實在的部份用經驗推求出底定律約束成若干組。因爲每組的事

，物，現象，都適用那個定律，所以我們可以相信那些定律爲相對的眞理。一切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底眞理都不能超過這個相對的眞理範圍。

『B宗教底永遠存在。

『我們叫做宗教的，是把宇宙問題中不可認識不可究知底部份，用一種解釋或教義斷爲信仰，使人生對宇宙不生衝突或懷疑，因爲人類對於宇宙底究竟問題是終不能解決的，所以宗教的基礎永遠存在，因此宗教是可以永遠存在的，宗教的信仰中有許多問題，因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底發達可以陸續得到解答或被其推翻。因此在宗教歷史中發生不少的『迷信』（卽信條或教義中已被推翻或得到科學的答案的部份）底爭論結果宗教的教義或信條每每因時改變，但形式縱然可以變換推移，內容或可以增減，而宗教底存在常爲論理的結果』。

（三）

對於人生問題，擇生同志的態度完全與他的行動一致，他是個樂觀主義者，

是勇往直前者；他永遠是積極的，向前的，與他一生的行動完全一樣，且把他自己的話錄在下面(系統，根據『第二節』)。

『第二節 人生

『A客觀的人生。

『要求宇宙的絕對解答，是人類常有的要求和傾向。特別是關於人生的問題要求合理的解答，更是常有的要求和傾向。但從宇宙的認識問題可以生出兩種「客觀的人生觀」，1懷疑論者不相信人生底合理，不相信人類欲求底合理，因此總是懷疑着生活，或竟然自殺。2實在論者，相信人生底實在，並且合理（相對的）。更相信人類社會的流行法則為真，而且可以不絕地進步。

『B主觀的人生。

『關於人生價值問題加以主觀的評判，這叫做「主觀的人生觀」。

1悲觀論者認人生為機械，為無價值，無趣味，因此厭棄人生，或竟然自殺

或更積極的去毀滅人類社會（如佛家）。

『2樂觀論者認人生爲和諧，爲有趣，因此常英氣勃勃的去生活。

『C只有實在論及樂觀論的人生觀爲人類社會客觀存在的本能，而且只有如此才能積極的往前生活。這個是易明的道理，不待解說。』

四

就社會思想上說，擇生同志大體上是接受馬克斯的理論的；不過他決不是盲目的信徒，而是批判的採取，他相信唯物史觀的根本見解，把一切社會現象的原動力，歸宿在社會的生產關係上，所以他很明白的承認政治，倫理都是生產關係的反映。他自然承認階級鬥爭，而且接受馬克斯的根本定理，說過去一切的歷史，都是階級爭鬥的歷史。不過他畢竟是批評的接受者，而不是狂信的盲從者，所以他同一般的馬克斯信徒完全不一樣。第一，他承認馬克斯的社會理論；但不像一般馬克斯信徒的普遍的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把辯證法誇大到超過一切；直欲支

配全宇宙；他在哲學上是實在論者，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取批評的態度，能舍其所短，取其所長的表現，事實上，馬克斯的學說本來以社會理論爲中心，哲學問題非其要務。馬克斯本人很少談到，除片斷的言論以外，幷無整個的系統，所以採納馬克斯理論而必須把辯證法，誇大到全宇宙，這正是狂信盲從的表現。擇生同志的哲學思想不以誇大的辯證法的唯物論爲出發點，單接受其社會理論，這是他的批判的接受之表現。其次，擇生同志很明白的主張客觀的階級鬥爭論，而不同情于『主觀式的階級鬥爭論』這也是他的批判的接受之表現；不過他很明白的聲明，他不是社會民主黨的同情者，而是與獨立社會黨相接近的人，（見，系統，根據』『第三九頁』『總結）這個分別是很明顯的，社會民主黨雖以馬克斯主義相號召，但是按其行動，實在是成了羣衆的欺騙者，是少數官僚欺騙羣衆捲的圈套。無論在德國，美國，比國，都是一樣的，獨立社會黨是由社會民主黨裏所分出來的左翼份子，他們既不能與社會民主黨同流合汚，也不願捲入狂信的漩渦

，所以自然而然自成一派，雖勢力不大，但是他們的態度是完全對的，所以擇生同志承認是與他們接近的。

擇生同志的社會思想，在他自己所著的『我們的思想系統及主張根據』內已表顯得很明白，已無可引爲疑義的了，我們不如讀他自己的原文最爲妥當『系統及主張根據』。

『第三節　社會

『相信實在及樂觀的人生觀，或者可以說是宗教的信仰；但是除此以外更得不着人類求生的根據，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更是建築在實在及樂觀的人生法則上面：1，人人有生存底慾望，2，自然界可以供給人類社會，使生存欲望滿足。

『社會底生存根據爲上述底條件；社會底發展，則爲上述二條件底擴充。1，人的欲望不絕的擴大。2，自然界可以適應人類欲望底擴大不絕的被人利用，使人類欲望不絕的向着達到滿足底目標。

『社會底生存及發展已如上所述，故凡否認及反對上述的根據的，必不能承認社會，更不能研究社會底行程』。

『第四節　社會的進化律

『我們已經了解社會進化(發展)底唯一條件是擴大欲望，利用自然，因此我們必須承認社會進化需要：階級鬥爭，生產力進步。因爲在人類社會中自有歷史以來都是階級的，而在人類社會的生活，一方面固然是各階級及各個人互相依賴幫助而生存，他方面我們更知道是這階級壓迫剝削其他階級，蒙蔽其他階級的欲望，意識，而得到較好的生活，達到較高的欲望。因此社會內部必然不能免去階級爭鬥。而且階級爭鬥的結果，往往可以增大人類底欲望可以促進生產力底進步，結果社會向前發展。

『Karl Marx 底辯證的唯物論，就是說明這種社會發展底行程及其規律。因此我們[illegible]這個社會進化律。Karl Marx 底進化規律主要的是：

『社會底進化是生產力發達底結果。而生產力底發達，在技術底發明。在有產階級底社會裏，社會內部含蓄着互相矛盾敵視底力量。這兩個力量底互相爭鬥往往促進了技術底發明和生產力底發達，而社會向前進化。

『我們認為這個規律是可以解釋有史以來底社會現象的；因此我們認他為合理，而相信這個規律。』

『第五節　政治，經濟，倫理、及其互相關係

『在上面所述的社會進化律裏，我們知道兩個重要的概念：1.階級爭鬥，2,生產力，我們便應該明白：自有歷史以來的人類社會是構築在上述的兩個概念上面。所謂政治是解決階級爭鬥的問題。所謂倫理是解釋階級爭鬥的態度及人與人的關係。所謂經濟是解決生產力的問題。因為階級爭鬥和生產力是息息相關。所以政治，經濟，倫理也息息相關，論理的大部份是包括在階級爭鬥的範圍裏，也包括在政治的範圍裏。我們現在再往前去討論政治經濟的問題。』

『第六節　政治

『上文已經述及政治是解決階級爭鬥的問題。我們現在應該較詳細一點去探求他的原始。

『人的生存必須要滿足他的欲望，要完成這種欲望必須彼此的互助。故互助的需要爲一切「經濟的合作」及「政治組織」的第一個基礎。人類在進化的階段裏發生了私有財產及各種不同量的私有財產，因此階級發生。爲的要保護財產及抗拒財產底被侵奪的危險，因此而政治組織逐步的嚴密，人類社會裏底政治生活也因此而日繁。政治制度雖有各種不同，形式雖有許多差別，而實質則在某種進化階段裏維持一種社會秩序，使在那種社會秩序裏的各階級按着一定的工作和報酬的關係去分配生產物。因爲各階級對生產行程上的工作有多少的不同，或者簡直有不須工作而得到生產物的多量分配，故政治的客觀意義是一階級——不工作

或工作極少的階級）壓迫及剝削其他階級——工作者或工作極多者——的工具。因被壓迫剝削的階級不絕的向壓迫剝削的階級反抗爭鬥，故政治的作用在壓迫剝削階級利用政治機關及武力防止被壓迫剝削階級底反抗及爭鬥。故上面說：政治是解決階級爭鬥的問題。

『在歷史上，我們知道，被壓迫剝削的階級，常常用武力推翻了當權的階級，結果被壓迫剝削的階級得到了統治的地位。這個權力的移轉叫做政治革命。但是革命以後要防止其他階級的反動，及維持新的社會秩序，必然要使用武力。故政治與武力是不可離的。

『如果要問，有沒有非階級的政治？那我們一定答：非階級的政治是在階級消滅以後。但是如果階級已經消滅，則人類社會的內部矛盾已完全解除，人對人的爭鬥已完全停止（概要的說）。因此無須乎武力的強制。在這種理想的社會裏——無階級的社會——已經無政治組織的客觀需要。那就已經到了無政府的社會。

在這種社會裏只有極度的向自然爭鬥，有高度的生產技術以生產物品以應人類的需求。社會秩序只有經濟生產的秩序。此種經濟生產秩序運行已無待於政治力量底維護，故人類社會至此才可以叫做「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

『我們研究的政治，當然是階級社會裏的政治。因此，除非我們反對階級爭鬥，我們才可以無條件的贊成Demokratie，不然我們就應該承認階級的統治，承認只有階級內部的Demokratie而不是全民的Demokratie。因此，我們贊成階級，Demokratie制度，反對全民的Demokratie，制度。

『其次，我們應該了解階級的Demokratie的意義，在歷史的行程上，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未曾發現社會上祇有兩階級存在的社會。社會的爭鬥，雖然主要的是矛盾最甚的敵對階級底兩方，而參加爭鬥的人員却兩方都各包含着其他階級的成份。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實際，階級爭鬥絕不是單獨的階級爭鬥，尤其是在政治的爭鬥，而是多階級聯合的爭鬥。因此我們應該承認：階級的Demokratie不

是單獨階級的Demokratie，而往往是多階級聯合的Demokratie。這個聯合的範圍，就是聯合戰線的範圍。因爲在政治的爭鬥上需要聯合戰線，所以我們主張，政治制度要建築在客觀上需要的聯合階級底Demokratie上面。

『至於政治爭鬥所需要的聯合戰線底範圍，是客觀的經濟關係問題。因此政治制度理論上的解決一定要依經濟關係底客觀分析而定。

『(附)我們對於所謂寡頭專政(Jouhep Dektatnu)底態度。

『有些人主張寡頭專政的政治制度而反對Demokratie他的理由是：

『政治的問題是理性的問題，科學的問題，而科學的問題是祇有合理與否底答案，絕不能以多數代表合理的Demokratie是一種多數取決的制度，不一定合理而且常常是最不合理的．所以他們反對Demokratie。我們反對與上述的主張是完全反對。因爲：

『政治的合理固然是客觀的事實，而反人在人的主觀認識能力上面不必一定

在一人身上。有時同樣的許多人可以有相同客觀認識。

『2，政治的合理問題是複雜的，不一定一個人能夠完全認識全部的內容，常常是一個人祇認識了一部。因此Demokratie的制度可以合許多同樣認識客觀事實的人而各不相妨，而且可以合許多部分的客觀事實而成全部的合理。寡頭政治恰恰相反。

『3，如果主張寡頭專政的人們要批評多數的人不認識眞理，往往錯誤，那們一定也要承認每個人都有這個可能的不認識和錯誤。如果他們說：眞正懂得眞理的人底計劃在會場裏未必爲多數人所贊成所了解，那我們一定要問，爲什麼專政的寡頭獨獨能爲人贊成及了解？

『4，如果他們說：眞理只有自證的爲眞，絕不能令他人了解，那必定有人人自認證知眞理，不承認他人爲眞理的時候；因此政治生活——共同生活爲不可能，如果可能，一定要承認人的差別爲應該的，而且盲從爲應該的；因此我們不應

該作反抗的爭鬥，不應該作政治的爭鬥。

『Demokratie的制度，是一個共同利害的聯合內底，討論制度。他的根其建築在辯爭上面。因為眞理的出現，尤其是政治的眞理，——在議場上討論的都是實際的辯法問題，——必需要搜集各方的報告，徵集各方的意見才容易成功的專門的人材，特殊的賢哲明達，當然可以有機會在議場內說話報告，只要有特殊的眞理，一定可以折服人叫人相信。所以Demokratie的制度一面有得到眞理的可能，一面可以免去Diktatur的危險，所以：我們反對一切的個人專政主義，贊成Demokratie。

『總之，政治的原則是構築在經濟利益底分配上面。經濟利益底分配關係如何，是一種經濟制度，由這種制度成功了一個社會秩序。政治的原則是在保持及施行一種社會秩序。為保持及施行這種秩序，所用的一切方法都是技術的問題。故所謂「權」「能」分配問題，「央中集權」及「地方分權」問題，「選舉法法

問題等等如何實行保持那種秩序的技術，這種技術一定要建築在原則上面。』

『第七節　經濟

『前面已經說過，經濟係解決生產力的問題。我們更可以說：經濟爲一切社會現象底基礎。因爲人類之所以生存，第一在人的慾望底努力滿足，第二在自然界底利用，二者是互相關聯的環扣，而均爲經濟科學底對象。

『怎樣才能提高生產力，怎樣才能把羣衆的幸福(享受物質生活)增進，爲經濟科學努力底總出發點，但此種努力一面爲技術能力所限，一面更爲階級的觀點所限，故從有經濟科學以來到現在，常常發生彼此攻擊敵視的理論，方法。這種攻擊敵視的現象，自然免不了階級爭鬥底反映。因此經濟與政治成爲不可離的事件。但如詳爲分析，則可以概要的說；經濟是主在生產方面，而政治則主在分配方面。其實經濟制度自成一個系統。在一個經濟系統內，必生產與分配——卽生產關係　同時連結發生作用而後經濟制度乃顯其特性。故經濟制度爲政治制度

的根源。一個經濟制度發生成熟，衰亡，必反映到與此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底發生，成熟，衰亡。反過來說，如果一個經濟制度正在發展，則與他相應底政治制度必不會向衰亡的路向。

『我們要估定一經濟制度之是否發展，只要看在這個制度內他的生產總量——生產力的強度——是否增加。如果一個經濟制度內底生產總量正在向着增加的路向，那這種經濟制度是不會卽時衰亡的。反過來說，如果一種經濟制度正在發展的時期，卽便因或然的關係，一時中斷或擾亂了他的作用，但是終必要回復到他的程序——恢復舊時的生產關係；這個我們應該可以叫他做經濟的規律。這個經濟規律爲一切社會現象底量尺。

『階級社會裏底生產關係是剝削人與被剝削人底關係。自然，人們的分配享用物質生產品，建立在不均等的原則上面。因爲生產關係底敵對，發生階級鬥爭，而經濟的規律又規定了經濟制度發展衰亡底限度；不能用主觀的力量去轉移。

因此經濟的規律與被壓迫剝削的人們底主觀意識發生矛盾。

『要解決這個矛盾，發生了下述的兩種主張：

1，主觀的階級鬥爭論者。他們以為只要被剝削階級底階級意識發達，階級的覺悟加速，則自然可以破毀當前的經濟制度，可以建立新的經濟制度。同時他們只承認被剝削是一種恥辱，而不顧實際生活幸福底平均標準，即生產總量底反映——降落或高漲。因此他們把階級爭鬥看成了宗教的教條，把「倫理」看成了超經濟關係以外底「玄學。」這種宗教式的玄學式的態度，自然是主觀的態度。主觀的選擇自然是個人底自由，但是在客觀上的觀察，是違背經濟的定律的，他們——主觀的人們——恐怕一定要得到相反的結果。

「2，客觀的階級鬥爭論者。他們主張階級爭鬥和上面所述的一派相同，但是他們不用盲目的主觀見解，而用客觀的分析，考察那個爭鬥的限度。社會主義的實現，人人希望的，並且人人為要求那個制度實現而爭鬥。但是社會主義底實現

，必有他客觀的備具條件。在這個客觀條件十分缺乏以前，主觀的力量祇能促進那客觀條件底成熟，而不能立時破毀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者，他們主張在客觀條件備具以前，不斷做日常鬥爭工作，經濟的，文化的，……以促進客觀條件底成熟，他們反對用暴力在這個時期奪取政權，他們主張議會的爭鬥政治，

『上述兩派爲目前社會主義者當中底最大區別，這兩派勢力在各國分配的狀況，亦爲經濟狀況底反映。卽：經濟落後的，貧困的國家裏，前派的信仰者爲多；經濟先進的，富裕的國家裏，後派的信仰者爲多。因此我們更可以知道，卽兩派發生的根據，仍然逃不出經濟規律底支配。』

『第八節　倫理

『倫理是人和人關係底規律。這個規律雖然是狠複雜的，但是大別不過兩種：1.互助的規律，2.爭鬥的規律。其實，互相與爭鬥是社會現象底兩面，是同起

一源：求生，人之所以需要互助是因爲一面「人」要對「自然」爭鬥保衞「人」的生存；一面在有階級的社會裏階級要對階級爭鬥保衞及發展階級的生存。故互助的倫理成爲通古今中外不能離的產物。雖然形式容有不同，而主要的內容無大差別。如「信」與「愛」爲人類底共同要求。階級的互助倫理可以在階級消滅後的社會消失，而人類在自然界內生活着必不能無共通的生活要求。故共同生活要求的條件如果存在，則倫理的根基仍然存在。

「爭鬥的倫理規律是對抗其他階級或現象——如自然界——而成立的。對敵對方面雖爲爭鬥的規律，而在本階級或本界方面則適爲互助的規律。故他的存在與否與互助的規律性質相同。如「勇敢」「忠實」爲各級社會內所提倡，但他的存在價值和「信」「愛」不相上下。

我們觀察社會發展的軌跡，知道人類社會中的倫理，一面是遵循上述軌道而進行，一面更發現倫理的一個附屬的特性，即：統治及剝削階級無一不利用倫理

學說信條作蒙蔽被壓迫剝削者底工具及禁錮他們底枷鎖。因此在社會運動中，尤其是在革命運動的過程中有一個主要特徵，是：破毀衡斷舊社會秩序中的倫理學說網羅而形成新的倫理。這個就是倫理的階級性。

倫理的發生巳隨人類欲望後生的，所以他不是先天的。他巳經帶着階級的性格，他必然隨着階級權力轉移而發生變化。故上面曾經說過：倫理爲政治所包含，但政治的作用巳隨階級的消滅而消失，則無政府時代的倫理，祇成爲人類對自然界抗爭的倫理，這種倫理恐怕不會滅亡的，因爲人到那時還是永遠要對自然界爭鬥。』

(五)

末了，我們仍舊把擇生同志的話引來作爲總結，(系統及主張根據第九節)：

『第九節　總結

『概括以上所說可以得到以下的結果。

『我們是相對的實在論者，我們贊成樂觀的人生觀，我們主張階級爭鬥；但是客觀的階級爭鬥。但是我們和SPD不同，我們相信我們與USPD相近，我們贊成Demokratie，但是祇贊成階級內的Demokratie。

『宇宙是一個大謎，我們在謎中求眞，求解答。

『人的生活是爭鬥的生活，我們應該盡我們的力量去爭鬥，去求解答。

『我們的慰安是尺寸進步，是閃爍的微光。

『我們的爭鬥口號是平等，自由；而得到的結果是博愛。』

中國現社會的分析

——爲鄧先生殉難週年紀念而作——

蔚然

一　序說

革命不是主觀的要求，而是適應客觀需要的產物。某個時代應產生如何的革命，是由那時代裏特定的社會條件所決定。沒有十八世紀法國王室，貴族，僧侶的支配，是不能發生一七八九年的平民大革命；沒有堅強的資產階級勢量，亦不能完成英國的克林威爾的革命。可知社會條件是決定革命的要點，忽視社會條件而言革命，固然是空想家，是烏托邦的革命唯心論者，即錯認了社會條件，而侈談革命，無論主觀力量如何的強大，也不能使革命達於完成。因此要完成某個時代的革命，應以把握住那個時代的社會是怎樣的結構爲先決條件。

中國革命自一九二七年失敗以來，反動政權，漸形穩定，整個社會墮在黑暗

的迷霧中，統治者對於民衆的壓迫，剝削以至屠殺，都無所不用其極。在這個嚴重的教訓中，檢討過去失敗的原因和決定以後的革命路綫，是我們重要的任務。中國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高喊着國民革命，在相安一時的局勢下，包含了許多矛盾。成千成萬的農工平民大衆，雖然是抬頭喊出他們的要求，但不過是在新舊軍閥的敵對矛盾中，稍稍沾潤了一點便宜，所謂革命基礎，祇是建築在幾個軍閥的槍桿上，到了軍閥暴露出眞面目後，革命便一敗塗地。由此證明含混不清的國民革命，其失敗是在忘却社會的條件，祇空洞的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兩個口號相號召，對於當時的社會是怎樣的結構，應取何種方式的革命，却沒有人去注意，這樣，必然是要失敗的。

中國革命有牠的特殊條件。數千年來的封建支配，種下了深固的根底，牢牢的在中國社會佔下了廣大的領域。帝國主義在八十年前以堅船利砲衝破了中國藩籬，挾着他的過剩商品侵入了中國內地，商業資來的活動範圍擴大，買辦商人也

應運而生，在社會上成了特殊的勢力。在政治上，則軍閥的暴虐與專橫，官僚的貪污與卑鄙，可說是愈趨愈烈。在社會上，則男尊女卑，買賣人口也是普通的在各地流行。這樣的一個社會，是如何的結構？是在那一個社會條件之下？是應當過渡到何種社會？目前的革命性質是如何？這些都是中國革命的特殊問題，主要問題，是值得爭論的問題。

對於中國社會的論戰，由各人的觀察不同，有各種的見解，莫衷一是。我們爲探求中國革命的眞路，應當根據實際的材料，對中國現社會加以考察，那末自然可得到眞正的答案了。茲分別敘出來。

二　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狀態

要明白中國社會的結構，先應把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狀態加以考察。

考察中國的近代資本主義形跡，自然祇有在近代都市裏去找尋，沿江，沿海，沿鐵路的區域，很容易看見資本主義的生產。

我們就現成材料，且看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社會的力量是如何？一九一九年的統計中國進出口有一二一五一隻輪船，載重一〇三，八六三，五八一噸。有鐵路二十七綫，共長一二三三五英里。再據一九二〇年的統計，有農業公司四三八一個，共有資本一萬四千四百萬元；鑛業中有資本一萬四千四百萬元，生產一千一百餘萬噸；全國有大小工廠一九七五家，紡織廠一三二家，資本四〇二百萬元，紗錠四〇三二千錠。全國共有產業工人二，七五〇，〇〇〇人。全國各地共有一四一個銀行，名義上有資本三七五，一五〇，〇〇〇元。（在這個數目中，兌現的有一五八，一六〇，〇〇〇元，準備資本有一六，八七四，九五七元。）各個銀行的資本總額約從五萬元到六千萬元。執行政府出納作用的銀行有二千萬資本，普通的商業銀行則有百萬元的資本。外國銀行資本，有詳細統計，茲限於篇幅，約計其總數共五十餘萬萬元。再將近年來各種工業狀況列表如下：

年份	工業部門	廠數	資本

一九二八	棉織	一二〇	二九七，四〇〇，〇〇〇兩
一九二八	麵粉	一九三	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六五廠）
一九二七	電氣	二三一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八二廠）
一九二八	火柴	一八九	九，五〇〇，〇〇〇元（一〇三廠）
一九三〇	絲廠	一〇七	二，五〇〇，〇〇〇兩

由上述各項數目，大概可看出中國資本主義的情形。若是簡單的從數目上看來，一定會說中國社會是在資本主義統制下了，至低也可說資本主義在中國社會是佔着優勢。但是我們試就我國生產數字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數字比較起來，那便知道中國現實的情狀定不如是。

煤的生產。美國在一九二九年為五萬萬三千萬噸，英國在一九二七年為二萬萬五千九百萬噸，德國在一九二七年為一萬萬五千四百萬噸，中國則在一九二七年為二千六百萬噸。

鉄的生產，在一九二八年，美國爲三千八百萬噸，德國爲一千二百萬噸，俄國爲四百萬噸，中國僅一百萬噸。又中國每年消費的鋼鐵爲六十萬噸，每人平均消費爲一，五瓩（Kilogram），而美國每人費消額爲二五〇瓩，英國和德國每人爲一三〇瓩，俄國每人三〇瓩，日本十四瓩。

煤鐵是工業生產的主要原素，根據上述中國產額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產額的差度，卽可明瞭中國工業還在很幼稚的時代，資本主義僅僅正在萌芽而巳。

中國現有鐵道爲一二三三五英里，美國爲二十五萬英里，俄國爲四萬英里。

航業，據一九二九年統計，中國共有大小船隻五二八艘，共四十二萬三千噸，英國則有船隻七八一〇艘，共一千九百七十五萬四千噸，美國三六五三隻，一千三百七十萬三千噸，日本二〇四八隻，四百一十八萬七千噸。

棉織，中國在一九三〇年僅有四百萬紗錠，日本則有七百萬紗錠，美國三千加百萬，英國五千五百萬。

由這些交通業和輕工業看來，也可以說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和各國比較，眞是小巫見大巫。至於汽車，機械製造等工業，中國是完全沒有，自然更不足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了。

總之，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照全國的面積，人口來作比例，便可知資本主義的力量是很微小的，雖然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起始，遠在各帝國主義勢力衝入中國之初（一八六二年李鴻章設製礮局於上海，一八六五年曾國藩設江南造船廠於上海，一八六六年左宗棠設船政局於福州，一八六七年李鴻章設江南製造局於上海，）但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中國產業便受扼制而難於進展，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雖予中國產業以興旺機會，但隨大戰告終，這機會便逐漸消失了。在目前，中國的主要產業，如鐵路十之八九是外國資本建築的，現在大多數操於外國人的手中，銀行資本外國佔四分之三，中國只佔四分之一，電政幾乎全屬外國資本，鑛業的外國資本佔三分之二，重工業大部分在外國手上，輕工業最重

要者如紡織業外人經營的亦佔三分之二。此外如交通的輪船，也同樣是大部分在外國人手裏。因此，說中國的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毋寧說帝國主義侵略的深刻。

其次據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的機器進口，雖有朝前增加的趨勢，但若考慮到中國人口的廣大和外國工業投資的雄厚，也難用作中國產業發展的佐證。

	農業機器	推進機器	織造機器	發電機器	其　他
一九二三年	三〇一•七二六	一•四七四•三四九	二•二二六•四八五		一二•五八五•二四五
一九二五	一六一•二六八	一•九一九•七六四	三•四〇六•八二七	八五六•一五一	九•二三一•〇三七
一九二六	五一一•五四〇	一•九〇一•四〇七	四•〇五七•七九六	八三二•六〇六	九•四三五•一八一
一九二七	六六五•九七六	二•九七九•九六一	三•七一九•二五四	一•二九一•九三一	九•四三一•一三一
一九二八	七四三•三六四	一•五六五•九八八	四•一〇五•一五七	一•三一五•九一三	一〇•七四一•七四五

（單位海關兩）

由上表看來，這五年間（機器輸入最高額）的機器收入，以廣大中國爲比例，可知工業發展是如何的遲滯。假使中國是像美國一樣的產業國家，自然不需要機器輸入，同時中國若是資本主義突飛猛進中的國家，機器的輸入亦不限於這區區的數量。並且輸進的機器，大半是供帝國主義在中國設立工廠之用，因而可說機器輸入之增多，不獨於本國土着資本沒有多少有利的影響，而且要如鄧先生所云：「因帝國主義經濟的競爭而日就崩壞」。

最後說到一四一家中國的銀行，尤其是資本主義色彩最濃厚的上海數十家銀行。這些銀行和各資本主義國家的銀行相比較，任務亦完全不同，外國的銀行多數投資到產業上面，補助產業的發展和活動，中國的銀行則投資於土地，公債，高利貸以及其他吸取人民血液的投機的買賣。這樣的銀行，雖然具備了新的組織規模，實際上和商業資本時代的錢莊相差無幾，不能負担近代資本主義時代的任務。（中國的銀行是在四十三個外國的銀行——尤其是英國的銀行統治下的，還

有二十個中外合辦的銀行，地位也在中國的銀行之上）。

但以上所述，是一般經濟結構的情形，我們也不能因爲這些情形而說中國是完全停滯在封建經濟的社會裏，因爲在全國沿江，沿海，沿鉄路的區域，却很容易看出資本主義經濟的統制力量。大都市固不必說，卽附近近代都市的農村，亦爲近代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所侵佔，一切新式工業製造的商品，佔了主要的市場，卽農村中的生產，也多變爲商品而生產了。在此情勢下，這些區域裏舊的農村自給經濟基礎——自然經濟，已完全破壞了，一般農人非與市場發生關係，差不多不能生活，不能再生產了。由這點看來，在都市及都市附近的農村，確是受了資本主義的支配。所以鄧先生說：

「如果我們只是根據沿江，沿海，沿鐵路的地區的經濟結構來說，那我們又容易得到第一個答案：卽中國已經是形成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因爲不但那些地方的農村經濟已經完全爲資本所統治，農民爲商品而生產，而且

都市中已經有近代資本主義的影像，新式工業到處可見。」（遺稿第三一九頁——三二〇頁。）

但是，這僅是在近代都市中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才有城市經濟領導農村經濟的作用，而照全中國整個經濟的結構上和比重說，却不能不注意農業手工業的生產情勢，因此，我們又轉向第二方面去考察。

三、封建制度在中國社會的情狀

除了國內的近代城市之外，廣大的農村和農村人口，是怎樣的情狀呢？在號稱四萬萬左右的全國人口中，農民佔三萬萬餘，（據一九二八年南京統計全國總戶共七八，五六八，二四五戶，農戶共五八，五六九，一八一戶），而這三萬萬餘的農民，有土地的農民佔百分之四十五，無土地的佃農，傭農，兵匪，游民佔百分之五十五。若再加以分析，還有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五的農民，情形又千差萬別。其土地的分配如下：

	畝數	人數	佔地
貧農	一—一〇	四四%	六%
中農	一〇—三〇	二四%	一三%
富農	三〇—五〇	一六%	一七%
小地主	五〇—一〇〇	九%	一九%
大地主	一〇〇以上	五%	四三%

按上表，富農和大小地主佔有地農民中總數百分之三十，但他們佔有的土地面積爲全部百分之七十九。

（武漢政府時代的調查）

又據布哈林的報告：

（一）中國農民每家有土地一畝至二十畝者，佔全農家數量百分之四十九，但他們僅有全國耕地百分之十五。

(二)二十畝至四十畝的中農佔全國有耕地者二三%，佔土地二二%。

(三)四十畝至七十畝的富農佔全國有耕地者一五%，佔土地二五%。

(四)七十五畝以上的大地主佔全國有耕地者一一%，佔有土地三六%。

由上面的兩個統計，雖不完全相同，但貧農數最佔絕對多數，而其土地佔絕對少數，則是一致正確的，這樣可說中國的農村經濟是在地主的統治下，地租形式是用極兇暴的手段去強制掠奪，地主對佃戶差不多是主權的關係，對於地租的繳納，除一定的高度租價外，還有例外的誅求，並且高利貸，農產品的壟斷，都是由地主一手包辦。地主對佃戶的關係上說，可稱是半奴隸的，非歐洲式的，不文明的，非近代資本主義的(馬扎亞爾著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

「在廣東對於不付租的地租繳付者曾設有牢獄，並有地主並為「對付自己的佃戶而設拘禁他們」的牢獄。在浙江不按期繳付地租的佃農，同樣是要關到牢裏去的，惟在農忙一期間，則解放他在田裏工作，這即是說他並不是

在牢裏休息，而是給地主去作苦工。地主幷霸佔不付租的佃農的女人和小孩，或者強迫他出賣爲奴隸…… 民團用拷打來強迫農民付租，如果農民一點也不繳付，地主便霸佔他的牲畜和農具……

「在許多地方，佃農對地主稱作父親，他必須按照節氣給地主送鷄鴨，菜蔬等禮物……在租佃之下地主供給佃農以住屋，種子，牲畜，甚至農村經濟的用具，因而在實質上便只是一種雇傭工人，但不是資本主義的僱傭關係，因之，此種雇傭關係是與債權和債務關係相交纏着的。這制度在滿洲，內蒙，以及在中國的北部特別風行。……

「在江蘇的北部和江陰一帶，與實際歐洲中世紀的租佃關係，表現有以下類似之點：(一)佃戶不僅必須繳納地租，而且還有一定的個人的勞役，此種勞是與歐洲的「柯爾威」相適合的；(二)無條件的服從地主成爲佃農的義務，伴着繳付地租而同時併行的，還有個人的勞役。這些義務普通是規定於

書面的契約中，而契約係由地主所保存。這些契約類似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契約，所不同的只是在這契約中僅說到關於佃戶的義務，而不曾敘述到後者的權利。(二)地主不承認佃戶對所租佃的土地之形式的權利，并且任何時候都可驅逐佃戶。在廣東所通行的，是非書面契約的租佃，而僅是在一種口頭協定的基礎上。

「但是市場即便在中國閉關自守時代即已形成，而貨幣的力量還不能抵住中國的佃租關係。在最近十年來已表現出新佃租形式，而此種新的租佃形式，只是在市場擴大，農民經濟商品性質的加強的基礎上才發生出來的。特別是在墾植區域以及中國的中部和南部，常常遇到這種制度，即佃農設備經濟行爲的工具之部分，而土地佔有者則供給另一部分，生產品即由他們來分配。但如佃戶是富裕的，他能夠履行一切條件，則地主便不能將一切剩餘生產品都掠爲已有了。就這樣來創造「從原始的地租形式到資本主義的地租之

過渡形式」（馬克斯語）。（以上見馬扎亞爾著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第三〇七頁至三一二頁）

就上述的情形看來，農村間的剝削關係，完全是野蠻的，非近代資本主義的掠奪形式，這種剝削無疑的只有在封建主義才可以存在。地租形式在中國各地通行的是現物支付，這種形式以及其兇暴程度都是封建主義的遺留餘緒。即近十年來的新佃租形式，雖然使地主不能將一切剩餘生產品完全掠去，但這並非近代資本主義的特徵，而是在過渡期間的一種形式。因此，在農村間的封建剝削，還是很濃厚的。

地主兇暴剝削的累積，在目前城市工業的不振狀態，祇有投資到土地上面，于是土地日益集中到地主手上。不過還得注意另一事實，土地的買賣雖然是由自由買賣形式發生出來，而實際上主要的是導源於政治的掠奪，例如在安徽，湖南，河南以及其他各省，許多大地主的前身都是當朝顯宦。

在中國雖然有幾千個農業公司，和每年數百萬的農業機器的進口(見上表)，但這種農業公司大部分是購買或轉運農產品的商業組織，並非新式的農業生產機關。農業機器的進口，大部分是運往東北(即在日本人經營下的農業)，一部份是各口岸用的殺牛機，機器的農業生產，在中國內部仍未見形影。

資本主義的浪潮雖然是衝進了交通便利的區域，而大部分的區域——農業區域是仍然在封建經濟的剝削關係上，商業資本的高利貸和不等價交換，在中國各內地仍然是盛行着，但這種極兇暴的剝削，明白是產業資本發生以前的現象，而非近代資本主義的本質，所以由內地的觀察，我們又很容易找出封建勢力在盤據社會的情形。

四　中國現社會是那一種社會？

由上面的敘述，我們可知道中國社會是怎樣的一個複雜社會，一方面看見資本主義的形影，另一方面又看見封建勢力的牢固，在這矛盾的進程中，中國的現

社會是在那一種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呢？抑是封建主義社會呢？

「要了解一個社會的全般結構，必須從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三方面觀察分析，把牠們的結果綜合起來，然後才能得一個明確的結論」（鄧先生遺稿第三一八頁）。於此，我們先從經濟的方面去觀察分析，關於這點，我們須明白中國全般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剝削是取何種方式。鄧先生對於這點，很明白的指示說：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差不多百分之三十的人口住在城市中，差不多只有百分之三的人口住在有新式工業影跡的城市裏，其餘的城市差不多只是行着簡單再生產的手工業及半農業的城市。產業工人及碼頭工人算在內也不過佔全數人口千分之五。在各地農民所生產的農產品當中，自行消費的，平均約佔百分之四十，拿去和手工業及機器工業製品交換的，平均約佔百分之十五，其餘的百分之四十五的農產品，是被地主，商人以田租，高利貸及「不等價交換」（商業的欺騙）等等形式，被政府以捐稅徵發

掠奪的形式剝削去了。再從工業的消費品來說：農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約爲三〇元，其購入工業品的價値至多爲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城市人民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約爲五〇元，其購入工業品價値多至爲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又中國人民全體所消費的工業品中由外國輸入的約佔百分之四十五，由本國自製的約佔百分之五十五，而且本國自製品中，手工業生產品約佔其大部分，由新式工業所製的不過佔其小部分。又，在中國的新式工業當中由外國人資本經營的佔百分之八十，本國人的不過佔百分之二十。如果我們考慮這些事實，那麼，就可以得到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影像：中國的社會經濟從主要點說，實在還是在農業手工業生產的階級中……」（鄧先生遺著第三二〇頁—一三二一頁。）

鄧先生給我們的指示，是非常確正的，他在這裏，給了資本主義論者一個強力的糾正。而且就中國的產業狀況加以考察，更可以證明鄧先生遺教是鉄般的堅

實。沙發諾夫在他的中國社會發展史上說：

「在工業發展的需要及其可憐的實際的水平綫之間的不相稱，使中國產生出空前未有的農業人口的過剩。甚麽都沒有而念圖得到補助勞動的人們，努力去爲自己得到一塊麵包而去做苦力，乞丐，小飯和僕役。

由於農村經濟的繼續崩壞，「農業人口過剩」這危險，現時更加嚴重化了，但另一原因，則是由於產業部門不能吸收多數勞動者。所謂民族工業，僅限於紡織，火柴，麵粉，製絲而已，毫無重工業之發展。卽就輕工業而論，資本總額達一千萬元者，僅榨油，製粉，紡織等而已。由此看出產業資本的力量，是如何的微弱。再就地方人口的比較，如果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人口是會集中到城市來(卽農民有離村的現象，)而且不至找不到勞動市場。英國在產業革命後，都市的人口是絕對超過地方人口，據卑爾得氏 (Beard)的「產業革命論」所載，當時人口的比率如下：

	都市人口	地方人口
一八六一年	六二，三	三七，七
一八九〇年	七一，七	二八，三

但在目前中國是怎樣一個情狀？就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地方如江蘇，廣東而論，根據一九三一年朝日年鑑的統計，便可知道了：

	四埠人口總數	上面四埠以外各地全人口
江蘇	上海南京蘇州鎮江四埠人口總數 三，二七一，三〇〇（其中上海佔二，七〇〇，〇〇〇）	三〇，五〇四，七六四
廣東	廣州汕頭瓊州北海四埠人口總數 九五〇，八〇〇（其中廣州佔八一一，八〇〇）	三六，二二七，〇〇〇

以此與英國產業革命後的情形比較，恰恰絕對的相反，這就證明中國經濟的主要點不在產業生產階段中，而在農業手工業生產階段中。

其次說中國社會的經濟是取何種剝削的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是以工

廠工業的大規模商品生產佔社會的統轄地位，生產主要的是工錢勞動的工人，他們和生產手段脫離，剝削關係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剩餘價值的掠奪。封建主義社會的經濟，是佔有土地的地主以政治的力量對農民行生產品的剝削和掠奪，並壓迫農民做無償的勞役。目前佔中國經濟主要部份的農村經濟，恰好是第二種性質。所以鄧先生曾明白的這樣說：

「……在這個階段中，地租雖然以土地私有及自由買賣的形式發生出來，而實際上主要是由政治掠奪發生的。商業資本的高利貸和不等價交換，雖行着極兇暴的積累，而不過是工業資本發生以前的現象，並非近代資本主義（工業資本）的本質。其他官僚的剝削及政府的捐稅也是封建政治的附屬物，與貢賦徭役實無二致。微弱的本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一方面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競爭，他方面因為農村破產的緣故，得不到消場，所以不但不能發展，而且最近有日行破產的現象」（遺著第三二一頁。）

這是一點都不錯，微弱的本國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受着壓迫不但無法向上發展，并且要日就衰頹。所謂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在中國是比較輕微。剝削的對象是廣大的農民，其主要剝削的途徑，是由帝國主義通過買辦，軍閥，官僚，以及銀行錢莊乃至中國的產業，利用官吏紳豪商人的剝削到最後的農民，即以農民為土台一層一層的剝削，而帝國主義便握着剝削尖頂。這是最殘酷的剝削制度，一切的中國軍閥官僚資本家高利商人等，組成一大買辦式的網，帝國主義是持網的漁翁，用這網剝削中國農民的魚。政治上的一切租稅等，都是不合理的封建式的剝削，與徭役貢賦無二致。鄉村中的經濟關係，更是完全建築在地租剝削之上，地主徵收農民的農產品，從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還有額外的貢獻。因此，農村中的地主以土地收入擴大其土地，進其農業複生產，又以其收入借貸農民而收買其土地，「自耕農變為佃農，佃農變為傭農，佃農受制於地主，必須納全世界所未有的高度以佃租求得土地耕種，半

死牢活的生活實在比農奴時代更爲悲慘。傭農更受着非人類的勞役的拘束，做兩足的牛馬。」（遺著第二五〇頁。）至於高利貸資本的剝削，也是農村普遍的情形，執行高利貸任務的人，就是地主、高利貸商人，鄉紳等。這些剝削形式，是商品剝削範圍之外的，並非近代資本主義的剝削，而是近代資本主義發生前的現象。

在此，我們且將農業生產之外的其他生產，加以考察。帝國主義的商品侵入內地之後，沿海沿江沿鐵路的農村中，受這廉價商品的侵略，舊日的家庭工業，於是破壞。「男耕女織」的社會生產，雖然因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引起破壞，但紡織是農村中的主要副業，對於紡織生產仍然是不能放棄，因此古代的紡織尚有一部的殘存，改良的木織機也代之而起，仍不失爲家庭工業的主要部門。據馬扎亞爾的見解，「在中國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的紡織品，是用着手工業的方法的」。這種原因是：（一）因農民無力購買新紡織品，（二）農民在田間工作外，多餘的時間是空着的，從事紡織是不費之費。「這樣，近代的家庭工業，是資本主義大生

產的發展途上之阻碍物了。他破壞了舊式的生產方法，然而他阻滯了大機器生產的發展。」（馬扎亞爾說的）

說到商業資本，在社會經濟上是有相當控制力量，（如中國現時的銀行，錢莊）牠的活動方向是在推銷商品，吸收農業生產品，經營各種商業及投機買賣，使交換的範圍擴大。商業資本，無論在封建制度的生產上，或資本主義的生產下，都是可以依附着存在和發展的，這種情形，是被決定於中國經濟的兩重性格。在目前中國的農業手工業生產的階段中，演着重直的剝削方式，因此，商業資本的蓄積雖多，亦不能促進生產的發達，祇是使中國經濟很牢固的停留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同時在國際帝國主義經濟統制下的中國經濟，更盡其崩潰作用。

關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力之居於統治地位，是不用重述，我們可以概括地說，幾乎無論那一產業部門，或者無論何種經濟生活，都能看出是困頓在帝國主義的控制下，特別是外國在華的金融資本，竟成功了中國政治的支配者，例

如上海的外國銀行，簡直成了包辦借款的經手人。中國民族資本，遇着這個雄厚的阻力，當然發展不起來。

從上述中國社會的生產方式，剝削關係，和帝國主義經濟侵略，都可以證明中國現時是由封建社會無法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中間階段中，所以鄧先生很明白的定出下面的結論：

「因此，爲中國社會經濟的主體之農業手工業生產，一方面因政治的掠奪及帝國主義經濟的競爭而日趨崩潰，他方面則無法過渡到一個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的新階段，只是殘留在原日的階段中，不絕的朽腐，不斷的掙扎，這個就是從經濟方面觀察中國社會所得的結果。」（鄧著第三二一頁）。

由這種經濟結構所表現的政治形態，我們也可以證明目前中國社會是在那一個階段中。

中國的政治組織，很有些人是認爲軍閥政治，不錯，南京政權的形成，全然

有賴於軍閥武裝，但是要使政權發揮積極作用，仍在於政治的組織與經濟的機能。目前的統治，雖然藉武裝以維持其存在，而其政治組織，確實是封建的官僚主義。中國的官僚制度源遠流長，雖說政權外形是隨數千年來的經濟變化而多少變化，而這種官僚制度的傳統，則是依然保持着。（參看鄧先生遺著第七七頁——八八頁，及一二四頁——一三〇頁。）「這種官僚主義雖爲歷朝統一的集權組織的骨幹，而實則每區行政區域內的官僚首長都保有任免下級官僚及自行徵收賦稅訓練兵馬的全權……中央政府徒具形式的統一規模，一切放任於省區的官僚……省區的官僚更委之于縣……最後才有縣官的爪牙聯絡着紳士們去宰制農村。每個官僚形式上是對職守負責，而實際是對他們的主人（長官）個人負責，這樣形成一個多層階的統治。各個層階都是長官爲中心，而以血緣及過去的主屬關係去團結及布置爪牙僚屬，構成一座很高而專以壓迫剝削人民，包辦軍民財政爲務的金字塔，塔底是農民及其他平民羣衆，塔頂爲皇帝，總統，或主席，總司令」。（鄧

先生遺著第三二二頁。）這種官僚，軍閥，都以地主，士大夫爲基礎，正是目前經濟組織下的產物。最近如南京統治的政治操縱的人物，都是這些脫離生產行程的人們。所謂中央政府雖然以假統一爲號召，而實際上各省區軍閥的割據仍是一樣。在中央政府儘管喊着「國難」，「停止內戰」，而各省的軍閥火併，仍然是各行其是。由財政政策的表現，更是證明是使農村破產的剝削方法，其他如間接稅剝削方法，實爲高利商人開一剝削路道。所以現在的南京統治是地主，豪紳，高利商人，買辦的政權，恰是目前經濟結構的反影。

至於社會方面由經濟結構的反影，孔教的「禮教」，「名分」意識支配着社會的大部分，最近以來如蔣介石的提倡曾國藩，胡林翼的道德，和提倡臣下對長上片面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都是可以證明封建意識的遺留餘緒。至於血緣關係的支配，是從南京統治者乃至平民都是如此，成爲社會生活的中心。婦女奴屬於男子，奴婢賣買及處分尤爲地主家庭自由的事件。凡此種種都是很普遍的事

實，很可以證明社會是在封建意識支配下。

由上面各種的觀察，對於中國現社會，可得到這樣的結論：

(一)中國目前是在小農業手工業生產階段中。(向來的各種生產方法殘餘的存在。)

(二)地主階級和其他上層階級的存在。

(三)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佔相當優勢。

(四)流行著「禮教」「名分」的意識。

(五)官僚政治。

這樣的社會形態，恰是前資本主義時代的現象，馬克斯對於前資本主義的解說，以「國家生產方法廣大的基礎，是由小農業與家庭工業聯合構成的」(資本論第三卷)。中國是在小農業手工業生產的階段中，一切的經濟剝削以及社會意識，政治形態都帶着封建式的色彩，並因國家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國主義的

剝削和壓迫，是阻碍中國社會無法過渡到新階段中，祇是日在掙扎和朽腐而已。所以鄧先生對於整個中國社會的結構，定下了下述的結論：

「……我們只是認爲中國現時的社會，在形式上固有異於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內容的性質而論的確還離不了封建勢力的支配。因此，整個的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的時代。同時又因帝國主義勢力支配着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益呈複雜的狀況。這兩重支配，都是使中國社會不能向前進展的大障碍。」（遺著第三二三——三二四頁。）

中國的現社會已經分析得清清楚楚，鄧先生更定下中國革命的大路，決定中國的社會的歷史前程，以建立農工平民政權，運用過渡期的經濟政策——國家資本主義的組織——達到社會主義。舉起農工平民革命的大旗，燃起革命的大炬，照出光明的大道，這便是鄧先生的遺產，這便是鄧先生留給後死同志的事業！

鄧達演先生之死與帝國主義

鉄生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鄧先生在上海愚園坊二十號，被南京的反動軍閥蔣中正，串通英帝國主義之偵緝機關拘捕以去；閱二日轉解至南京，閱經幾多方面證實，先生乃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前二時，遇害於南京城外紫金山角之鄉下，至今已整整一年了！這一年當中，我們所經到的，只是帝國主義的凶燄日高；軍閥的殘暴，官吏的貪污，民生的困苦，以及統治者之無能無恥，沒一樣不是一天比一天加甚。我們既痛革命導師之失墜，復悲中華民族之將亡；在先生殉難的第一個週年紀念日，我這裏特揮淚來說一說帝國主義對於先生之死有怎樣地關係。

一　殺鄧先生的兇手

殺鄧先生的兇手，蔣中正汪兆銘而外，英帝國主義者也算一個。

以流氓身手而兼帝王頭腦的蔣中正，對於民國十六年春，鄧先生與大部分中央執監委員成立中央黨部，組織武漢政府，使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陰謀無由得逞，這是他懷恨之始。及同年十一月「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成立，對於蔣中正一手所製造的南京政府之腐敗貪污，揭發每不遺餘力，類乎十六年底「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衆宣言」中說：「不料北方軍閥才告崩頹，本黨指導下的軍隊領袖，卽乘本黨組織尚未臻完善，民衆力量尚未十分充足的時候，圖收戰勝之功爲己有，與仇視農工民衆的反動勢力勾結，反口相噬，因此有南京僞中央之組織。南京派叛徒，實爲新軍閥及土豪紳士地主及剝削農工份子的集團，他們只是收買窮苦兵士與北方軍閥爭雄，他們拿——打到北京則革命成功——的口號，以欺朦民衆，……因此本黨多數同志率領農工羣衆，與南京叛徒派決裂，並聲討其假借黨部名義之大罪」。乃十九年秋所發表之「對時局宣言」，其於南京統治者的罪惡，暴露更覺淋漓．如謂：「南京的政權，開始卽與革命民衆對抗，屠殺人民

，加緊剝削人民，變民衆運動爲屠殺恐怖，變二五減租爲加倍交租，變保護佃農爲保護地主，變加工資加薪餉運動爲減工資減薪餉的命令，變青年運動爲蒙蔽青年屠殺青年，變發展產業爲消滅產業，變減除苛捐雜稅運動爲加捐加稅勒捐軍餉勒派公債的苛政，變打倒貪官污吏爲獎勵貪官污吏，變言論自由爲言論箝制，變國民會議的要求爲軍閥獨裁爲閹宦政治，變打倒帝國主義運動爲投降帝國主義。這些壓迫人民及剝削人民的手段，只有日甚一日。這種反動的黑暗統治如繼續存在，人民只有饑餓，恐怖，死亡，或被屠殺。我們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必須推翻南京的反動統治，才能夠得到出路』。凡此言論，都足使蔣中正及其僚屬，走狗，見而驚心；且鄧先生又積極領道農工革命羣衆，直接對反動軍閥及帝國主義者戰鬥；因此蔣賊中正，乃不惜與帝國主義互相勾結，派出大批偵探謀得先生而置之死地。吾故曰先生之被害，蔣中正實爲第一個兇手。

至於汪兆銘氏，本一無恥政娼，他的出賣武漢政府，出賣革命青年，出賣革

命民衆，還是凡有血氣的中國國民，提起來都要裂眦痛恨的。一般人說：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中國沉淪，汪兆銘的罪，是在蔣中正之下吳稚暉之上；這話半點也沒有寃枉。但總沒有鄧先生在各期「革命行動」中解剖的清切，我們只隨便舉出幾條來看：如「中國到那裏去」一文中說：「鬼要找閻王，閻王也要找鬼的……北方的閻王因為要和南方的閻王鬥爭，一定要找些新鬼——新的士大夫……才能旗鼓相當的去對付南京的統治。恰好改組派的先生們正在魂不附體的亂撞，有博士頭銜的新士大夫自然是非常的合格。於是改組派的先生們就戴了桂花冠到北京榮任了；這就是北方的所謂『黨統』，這樣就功了北方『擴大會議』。……這些都是革命的對象，都是反覆了好幾十次的脚色……翻開擴大會議的宣言及政綱，除了『反蔣』及一些與人民毫不相干的具文以外，只看見『樹立民主政治』六個抽象的字樣……改組派先生們為甚麼反蔣？我們如果不是神精病者，我們大概還記得，『勞苦功高』的蔣總司令自民十六年秋被桂系軍閥驅走之後，不久即由改組派

的領袖們恭恭敬敬地請回來的。他們所以痛恨於蔣的，祗是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汪精衞被蔣「逼宮」的恥辱，及所謂三全大會不被改組派包辦……所謂民主勢力象徵的領袖們，祗有分別到石家莊向閻錫山請訓，到北戴河向張學良問安，像這樣能屈能伸的大丈夫，當然是民主的極致了！……一個政黨，特別是一個革命的政黨，所以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解決歷史的任務，有一個唯一的原則：主張一貫與言行相符。有眞實的代表民衆利益的一貫主張，而且時時刻刻努力的實行牠的主張，才是眞實的政黨，眞實的革命政黨。如果三年之間，主張反覆至於無數，祗有個人的位置虛榮得到滿足，則一切民衆的要求及自己的言論都拋棄如敝屣，我們不知道這種的領導是一些什麼東西」？再則汪兆銘在擴大會議失敗以後，曾自謂「這次反蔣運動，軍事雖然失敗，而政治主張却是勝利」…鄧先生對這話的分析和批判，較平常乃更覺嚴正而有力；最要者爲：「政治主張勝利這句話，實是汪精衞失敗的開端與結局……我們試回憶過去的事實：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蔣介石

的示威，叫汪精衛沉默的出亡，哼都不敢哼一句。一九二七年初，武漢的革命運動正在黃金時期，而當時革命與反革命之分，在對於農民解決底贊成與反對。四月汪精衛由外國回來『復職』，一直到六月，汪精衛對農民問題的態度是曖昧的。六月以後，汪氏很明白的發表了許多痛罵農民運動的言論……當時汪氏一切的氣力都集中於軍閥的拉攏勾串，祇要是高級軍官說的，就俯首聽命，當時他的口號是『討蔣』。果然不久蔣出亡了，汪氏就立刻由武漢『凱旋』入南京……結束武漢的喜劇。可以說『討蔣』是他這次——第一次的主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州變起，蔣氏因受桂系壓迫，難於單獨『上台』，乃不得不和反桂系的槍桿子勾引。……汪氏乃立刻主張請『勞苦功高的蔣總司令』復職，這是他第二次的主張——『擁蔣』。及唐生智的軍隊在武漢被解決，蔣氏之需於汪者已盡善盡美，當然要被一腳踢開。一九二八年，汪氏再默然出亡。我們看看，到一九二八年爲止，汪氏主張了什麼？他的『主張』一共只有兩個，即『討蔣』與『擁蔣』；可

說開始就失敗了！汪氏出亡後，『改組派』三字遂由陳公博樹起；初則接受蔣氏黨費辦『革命評論』，代蔣氏作反對桂系文章；既而桂系被蔣削平，陳公博亦被一脚踢開；於是乎左勾右挽，聯桂聯馮，才再有新的反蔣宣傳。時來運轉，閻錫山的反蔣要求亦告成熟；改組派即趁勢提出『樹立民主政治』，與『整個的黨，還之黨員，統一的國，還之國民』；以及『文武同志精誠結合』三個空洞的口號。這樣一來，閻馮桂系的武同志，『西山』『改組』的文同志，都合成了一體，遂成功所謂『擴大會議』。擴大會議的宣言，把中國現狀的責任，一齊歸到蔣介石身上；不但民衆的要求，革命的對象早已拋到九霄雲外；而且連改組派三字，他們自己都不敢承認了！這時期汪氏的工作，又是集中於『討蔣』的『主張』。跟着軍事的漸漸失敗，更把胡適之暨國家主義派的主張和口號移植進去，那便是：定約法，制憲法，開國民會議；也就是汪精衛最後失敗的『主張』了！……因為改組派的領袖們，時時還以革命自行文飾，所以我們不能不站在革命觀點上把他來分析來批評。如果

中國從此就要結束舊時代的卑汚，那末改組派及其領袖的失節與沒落，正足爲一般以革命自號的偉人和政治團體警惕，正足爲大多數痛苦無告的人民開闢一條自己振奮自己解縛的新路」。在鄧先生雖然站在革命觀點上，爲純客觀的分析與批判；但在革命人格和政治道德完全喪盡的汪兆銘醜威中，未嘗不以爲是肆意攻擊，至少亦當作不留餘地。所以到他第三次『擁蔣』主張勝利之始，頭一件即用「借刀殺人」手段將先生殘害；從幾多方面都足以證明，汪兆銘實此案的第二個兇手。

論到英帝國主義者之幫助反動軍閥等刼捕先生，亦不是毫無原因。當革命軍打下武漢之初，鄧先生以總政治部主任而兼湖北省政府主任；這時候的總政治部，實際上卽等於臨時政府，所有收回漢口九江租界，都是在此期間實現；那時的各帝國主義者，已由上帝一降而爲喪家之犬，這在牠們的記憶中，當然不會很快忘掉。所以這回「李頓報告書」中還隱約提到：「華人對於外僑，每多歧視，因不免造成不良結果。其政策徒知使全國當軸專心抵抗及防範外國思潮，甚至對於各

租界之種種新建設，本可借鏡者，亦橫加阻止」。關於青年運動的不滿，那就更加說得顯然：「不幸在教育青年上，民族主義之建設方面，似不如其破壞方面，能得較多之注意。各校教科書，都以嫉恨之火燄，燃燒愛國觀念，又欲於仇害心理之上，建樹人格。此種猛烈排外之宣傳，初起於學校，既用之於社會生活上之各方面，其結果引誘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徒使各國驚駭。對於現時藉爲唯一保障之權利，更增不願放棄之感」。我們曉得帝國主義者，對於在華利益之損失，是這樣地念念不忘；其對於鄧先生過去所領導的革命工作，心裏是怎樣地仇恨，我們已經不問可知。何況鄧先生回國一年來所發表的文字，幾無處不指明帝國主義爲我們最大之敵人，如「怎樣去復興中國革命」裏說：「平民大衆的敵人，是黑暗殘暴的南京統治，是帝國主義者。這敵人和四年前一樣，不過在軍閥地主豪紳的軀殼上，多穿了一件『南京統治』的外套。這外套所籠罩所包含的，即舊時代的一切與帝國主義所遺贈底一切總和」。先生又在「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衆

宣言」中指責帝國主義的罪惡說：「帝國主義者，初時駭於中國革命民衆勢力之勃興，尚取消極的防備，及見本黨叛徒之毒手，始放胆積極以繼續其侵噬之策略，於是有最近各帝國主義直接派兵進入內地及各口岸之舉，有任意拘捕屠殺人民之事，……本黨以爲中國民衆之痛苦，根本原因，在：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地主豪紳，及大部分與牠們聯合的高利貸資本家的共同勾結所構成之中國政治經濟勢力的統治……而尤爲中國民衆仇敵者，則爲帝國主義所盜竊強佔之『租界』；此種地區，一面爲暴力強奸之武庫；一面爲經濟搾取之支點；更爲包藏一切貪污官吏捲逃民衆血汗之軍閥土豪紳士及反革命叛徒之天堂。此等賊徒叛黨，朝括所得，夕卽輸之租界，盡情揮霍，明朝又因帝國主義者之援助播弄，得入內地重行席捲刼掠生產民衆。故沿海口岸租界，實爲人民膏血之吸吮的分粭場」。其後在「中國社會的結構」一文裏，更詳細表示了本黨的反帝目的，反帝手段，以及其體的外交政策：「(一)我們的目的，是要澈底的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取消一

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羣衆取得政權，要實現社會主義。(二)我們的手段，爲達到上項目的，一定要喚起並組織廣大的民衆，使其覺悟的參加反帝國主義的戰鬥。只有廣大的民衆覺悟起來，組織起來，才能無畏的作反抗帝國主義之戰鬥，直接由國民會議決定，立行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三)帝國主義者的基礎，雖建在對牠本國的生產者並消費者的剝削；但是牠的生命，却依存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之剝削的。所以各帝國主義者對於市場爭奪，彼此間雖有不可調和的衝突；然而同時却也因此各帝國主義者才會對於革命勢力——尤其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勢力——的鎭壓有其共同的利害，常常聯合起來，……；因此我們具體的外交政策是：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重訂完全平等的條約。對蘇聯，以雙方完全平等及不干涉中國革命爲限，與之恢復邦交。與各弱小民族結成親密關係，建立反帝國主義的聯盟」。從種種方面，帝國主義者都可曉得，先生的主義如果實現，先生所領導的農工平民革命如果成功，牠們所有在中國的勢

力都會被肅清的。牠們爲謀自身生命的綿延，爲使中國由半殖民地而化成殖民地，爲報復一九二七年春我方收回租界之宿恨，牠們遂盡力協助其走狗，工具——中國的軍閥政娼——將先生刼捕暗害，所以我們說牠是慘殺的第三個兇手。

有人說：蔣中正的謀害先生；因爲先生死，他的政權便沒有第二個人能奪去。汪兆銘的謀害先生；因爲先生死，他所領導的黨——改組派——便不致很快消滅。帝國主義者的謀害先生；因爲牠們認定，國民黨已完全沒落；共產黨在目前，不論客觀條件，主觀力量，都沒有使共產革命把中國普徧化的可能；那末立刻可以實現，而又必然要打倒牠們的，厥爲先生所領導的農工平民革命；先生死，牠們在中國至少暫時可以高枕無憂。

但是我們要問問蔣中正的「權」，究竟還剩下幾多？汪兆銘的「黨」，現在寄存何處？只有帝國主義的勢力，在中國算是暫時得到些穩定性，並且繼續伸張。然而中國有的是青年戰士，有的是農工羣衆，有的是後死的革命同志……我們

不會放過了賊害先生的兇手；我們不會忘記了先生爲中國革命犧牲，爲民族解放殺身的精神；我們誓死繼續和敵人戰鬥，直至將中華民族的生命從一切惡勢力下救轉。

二　中國革命的三個反帝領袖

在近代中國民族革命史上，很顯明的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第一期爲洪秀全所發動的「太平革命」；第二期爲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第三期爲鄧先生所領導的「農工平民革命」。不幸這三次的革命，皆是功敗垂成！三位領袖，有的是在反動勢力圍困之下自盡，有的是在憤感交集之中病逝，有的是被萬惡軍閥及無恥政娼所慘殺。他們的主要目的，都是在解放中國民族；他們的最大敵人，即是帝國主義；所以他們在反帝這一方面的精神和態度，凡後死的革命同志，均應特別奉爲典式的。

先說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英帝國主義的鷹犬，所謂常勝將軍

戈登者，曾率常勝軍三千，佐以巨礮汽船等利器，力助滿將李鴻章程學啓輩，與太平軍之忠王李秀成軍大戰於崐山蘇州一帶；然一八六〇年忠王致上海各領事書，仍絲毫不肯委屈求全，如謂：「天朝對於歐洲友邦，處處尊重信義，而各國對我，竟首先違背約言。大軍前入蘇州時，法人首本約我貿易，且招本軍至上海，與各國共敦友宜……孰知法人受滿政府賄賂，協以謀我；……又閉各貴國人民，亦參預此干涉之陰謀。……然法人失信於我，已與我斷絕和好，其在上海之商業，我軍不問，若再來內地通商，勿怪我軍凶暴，不能爲彼宥矣。……余願各貴國人民，審察利害，辨別是非，如再來修好，本軍始終以禮義相待。若猶怙惡不悛，余惟有停止本國境內與外人一切貿易，勿謂言之不預」。及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英人以「哀的美敦書」致太平軍，忠王奉旨答覆謂：「忠王已得進攻上海之命令矣。」！其態度之強硬和決絕，眞不愧稱革命政府之下的革命外交呵！

當時的帝國主義者，爲着要保持牠們的幾千萬賠款和鴉片運輸之利益，爲着

要誘迫反動的滿清政府多訂不平等條約，所以才用最殘酷最野蠻的手段，幫助牠來屠殺中國的革命羣衆。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革命，雖然被帝國主義者和牠的工具——滿清政府聯合起來中道摧毀，但是太平軍那種堅決英勇反對帝國主義的精神，却不曾在中國民族的血管裡一刻消去，所以隔不幾久，孫中山先生，卽踏着太平天國的前路，重新將解放中國民族和打倒帝國主義的大旗樹起。

推翻滿清，中山先生的革命工作只算完成了一半。在帝國主義沒有打倒，不平等條約沒有取消，國民革命是算不得成功的。所以中山先生到晚年，還伋伋將國民黨改組；改組宣言中，他說明中國政治經濟受列強壓迫的眞相；謂非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中國沒有生路；並於政綱第一條主張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及決定北上，乃鄭重向留粵同志告別說：「我把改組後的國民黨，這個未滿週歲的嬰兒，交付給你們同志，希望你們大家好好看護它吧！它就是我的靈魂，它就是中國唯一的救星，假如以後它可以長大成人，能夠起來救中國，那不消說，當然

是你們保姆的功勞，我的責任是盡過了的，現在正臨到了你們。……」這些話眞是語重心長！言外我們可以想見，中山先生那時是怎樣地盼望國民革命成功，怎樣地盼望不平等條約，趕快廢除，怎樣地盼望中國民族早日解放……？

待中山先生將到上海時，帝國主義的報紙，居然敢大唱什麼「條約神聖」，「租界神聖」，意欲阻止中山先生在上海登岸，中山先生當時氣極了，所以義正詞嚴的答覆他們：「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是這領土的主人，你們租界當局不過是客位，主人行使職權在這領土之內，想要怎麼樣便可以怎麼樣！我登岸之後，幷且還要住在租界裏，只要不犯普通條例，什麼政治運動我都可以做……」結果屈服了帝國主義者，中山先生仍是以主人的資格，在上海登岸，並受民衆熱烈的歡迎，「收回租界」「打倒帝國主義」的聲浪，竟像洪濤一樣，捲徧了上海全埠。

十三年十二月四日，中山先生繞道日本至天津。因旅途勞頓，肝病大發，遂

不得不暫住津門休養，十八日。段祺瑞派許世英葉恭綽探中山先生病狀，忽談到外交問題；聞知段祺瑞巳送公文於各國公使，謂「臨時執政必尊重歷年條約」，中山先生大爲震怒，乃聲色俱厲的說：「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地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麼緣故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敬重他們，爲什麼還歡迎我呢？……」經此一次盛怒，病陡加劇，後雖轉京就醫，終歸無效；遺囑中猶懇懇以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爲念；良可慨也！

至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革命軍打下武漢，不久又攻克南昌；這時北洋軍閥的中心吳佩孚孫傳芳已先後崩潰；各帝國主義者亦在武裝羣衆的聲勢之下懾服；眼看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這兩個口號就要實現了，乃不料新軍閥蔣中正，卽乘革命基礎尙未穩固，民衆力量尙未充足的時候，首先背判革命，而與帝國主義土豪劣紳流氓地痞相勾結，開始到處屠殺青年及農工羣衆；同時並在南

京組織集反動腐化份子於一堂的僞中央政府，竊謀將戰勝功勞完存收歸一己之身。

此時的鄧演達先生，實爲挽救革命，聲討叛徒，領導民衆，組織武漢政府的最堅決最英勇的一人。不幸，武漢中央的上層份子，如汪兆銘唐生智等，漸漸亦各撕其革命假面具，公然仇視農工羣衆，而向反動的南京叛徒投降；先生至此已責無旁代，遂集合一切革命份子，而有「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之組織。

行動委員會的重要使命，即在繼續「太平革命」，「國民革命」所未完成的「解放中國民族」，「取消不平等條約」，「實現社會主義」各種工作。所以先生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所發的宣言中，曾很痛切地說到帝國主義者反攻的局面：「帝國主義者，初時駭於中國革命民衆勢力之勃興，倘取消極的防備，及見本黨叛徒之毒手，始放胆積極以繼續其侵噬之策略，於是有最近各帝國主義直接派兵進入內地及各口岸之舉，有任意拘捕屠殺人民之事」，同時先生並肯定中國民衆

的痛苦，根本原因在：「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地主豪紳，及大部分與牠們聯合的高利貸資本家的共同勾結所構成之中國政治經濟勢力的統治」。最後先生提出了反帝的堅決主張，便是：「反對帝國主義到底。要得到中國民族的自由獨立；並使國外各弱小民族獨立」。和「立刻由國民會議，宣布無條件的撤廢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

這面「革命」「反帝」的旗幟，洪秀全是盡過了揮動的責任；中山先生是盡過了重新展開的責任；鄧先生更是拿鮮血把它染徧！現在臨到了我們，何時我們才能把它插徧中華民國的領土呢!?

三　從經濟侵略觀點上反對帝國主義

中國本一產業落後的國家，帝國主義者一方面在指揮操縱大小軍閥作循環不已之爭戰；一方面卽從中掠奪內國的主要經濟機關，這樣使中國將永遠沒有自為經濟建設之機會，先生以此觀點，曾說明過世界經濟危機與中國內戰的關係。大

致爲：「現時的經濟生活，一面是各個國家有其獨立支配的範圍，形成國民經濟；一面全世界却已有不可分離的分工及合作的關係，以構成世界經濟。目前世界的經濟危機雖然是由美國爆發，而深入於資本主義領導的國家；但是，一切產業落後的國家，一樣也要被捲入漩渦。中國被捲入漩渦以後的情形，乃是失業人口加多，國民經濟衰落，生活標準降低。（中國每人每年生活費平均約爲十五元至三十元。美國每人每年生活費爲三千元，德國每人每年生活費爲一千元，英國每人每年爲一千五百元，日本每人每年爲三百八十元，蘇俄每人每年爲三百元，印度每人每年爲一百元。）帝國主義者，爲圖消滅自身之危機，越要兇惡的去爭奪市場；越要利用其走狗工具剝削壓迫農工平民。因爲有帝國主義源源不已的供給槍械，因爲有苛捐重稅及農工業破產的大批製造兵匪，所以中國的內戰也就一直不會停止」。照這樣中國主要的國民經濟機關，完全掌握於帝國主義者之手，國內的產業，一方被壓抑於帝國主義者，他方被妨害於封建殘餘，當然沒有發展的

希望。鄧先生對於此點，又曾規定過很適合現階段發展產業的經濟政策，其對外部分有：「欲消除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經濟統治勢力，以建設本國的產業，必要實行如下之對外經濟政策：(一)關稅權絕對自主，並用高度的保護稅政策以保育本國工業的發展及救濟農業的衰頹。(二)收回一切銀行，鉄路，航業，通信機關，鑛山，及其他重要的由外資經營及外人管理的企業。(三)設置國家特許的租營制度；在一定年限內，以完全遵守中國的法律及其他有利於財政及工人為限，允許外國投資團在本國經營企業。中國政府有完全制御的權柄」。在產業十分幼稚的中國，農工平民政權一旦建起，為消除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經濟統治勢力，這對外經濟政策是應該立刻採用，如此國民經濟自可一天一天向上發展，社會主義也就不難逐步實現。

四　國難中紀念鄧先生

東三省的禍變，很早，鄧先生是曾推論出一個輪廓的，他說：「日本對於中

國，總不外採用下邊三段姿勢之一段：第一段，是利用中國所謂中央政府，獨霸中國；如當日之對袁世凱。第二段，是扶助北方大軍閥之一，使其替日本當守衞黃河流域以北的門犬，以防禦英美勢力的北侵；如過去之利用段祺瑞張作霖。第三段，是死力抓住滿蒙，使滿蒙為日本所謂特權範圍；如謀炸張作霖後所表示的態度」。日本之將滿蒙化為「滿洲國」，即鄧先生所說的第三段姿勢的伸展。這在張學良轉變態度有引入美國資本排斥日本經濟勢力之傾向時，鄧先生已早料及；想不到九一八禍變突起以後，鄧先生竟因主張積極和態度堅決而為賣國患民的軍閥政娼所賊害！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國內各方面所有的主張簡括如下：蔣中正和蔣中正羣——南京政府——以及他所代表的金融資產階級，牠們是一致主張「不抵抗」的。不抵抗的表面理由是：中國的「武備」「財政」都不足以對付日本；但實際之原因却是，戰爭一起，不祗軍閥官僚等外國銀行裏存款的數目不能繼續增加，且所

有托命於帝國主義之下，而建築在公債庫劵以上的中國金融資產階級，都有破產之虞，牠們那裏會不強烈的反對對日抗戰呢？什麼「鎮靜」，「忍耐」，「臥薪嘗胆」一類的東西，就是牠們欺騙全國被憤怒之火燃燒着的農工羣衆以反革命青年的口號了。這時的國家主義派，似乎倒很積極(？)牠們一方面盡量攻擊南京的反動統治，一方面又極力對日主張宣戰。但是後來反動政府召集國難會議時，因為允許牠們份子大批參加，牠們的主戰變成請願了。最後希望組織國難政府雖歸失敗，然畢竟取得了身體自由和行動公開，所以從此再也不曾聽見過牠們的聲響。牠們的活動基礎始終就是一部分低能的青年和落伍的秀才；——教授——牠們所代表的階級，很顯明乃是中國的封建地主；國難中牠們的忽而冒險主戰，忽而投機請願，忽而妥協沉默，這正足以反映出一般將亡的下層士大夫的素性；我們實在一點也用不着去批評或奇怪。此外就是改組派的頭目，他在窮無所歸時，曾大喊過「武力收復失地」；果然，同平時一樣，政權一旦騙到，他那張能說善道

的狗嘴，馬上就變作了軍閥的傳聲喇叭！看罷，「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乃是他剛進南京的口號。這豈不是說，東三省已經失掉算了，現在交涉上海問題要緊？但還沒有後來他提出「長期抵抗」所發生的惡影響利害；至這句——長期抵抗——名言出世，不祇「對日宣戰」「武力收復失地」等等口號不准再提，即「經濟絕交」「抵制日貨」一類事體亦都成了犯罪行爲；青年和民衆如要有反日之集會或宣傳，那就非受到嚴厲的取締與懲辦不可。翻過來，奸商倒可以大販日貨，要人且須和日使聯歡，這一切醉生夢死的中國人們——當然不只改組派所代表的游離小資產階級——以及大小軍閥，總算找到了一種辯證法的(？)「不抵抗」的理論根據。雖然汪兆銘的第三次擁蔣，以及他不久又要有的第三次反蔣——假如蔣中正又把他踢開——我們都不屑去想；但他這次對國難所造成的罪孽，實使我們怎樣也不能忘懷。

鄧先生一向是主張要「推翻了南京統治才能鏟除帝國主義之勢力」的，所以

東北事變發生以後，有位同在幽禁中的同志寫信——秘密傳遞，向他作解勸式的建議謂：「東北事起，蔣蠻均主張不抵抗；先生態度可否稍緩，暫以「同赴國難」，相許，諸事待日後再說」？先生覆書，乃斬釘碟鉄的說：「記住我們的家教，不要隨便發言」！語雖了了，然先生的態度和主張，我們已不難通通明瞭。這時在外邊的同志，曾提出兩個口號是：「組織軍民抗日革命政府」，「發動廣大農工羣衆之反帝革命戰團」。如果有鄧先生領導，我們相信這兩個口號現在定已發生了驚人的效力；不但日本帝國主義不會這樣地到處縱橫；而整個的中國也決不會有目前這種混戰，饑餓，暴虐，屠殺的反動局面繼續。

我們曉得，帝國主義在中國時時有被打倒的可能；武漢時代以數十萬羣衆幾日而收回漢口九江租界便是明證。我們斷定，南京的反動政權亦到了最末一個階段；牠們是把什麼革命餘威民衆信仰都已喪盡。目前所需要的，就是一股以農工羣衆爲中心的發動力量，及一位堅苦卓絕的革命領袖；鄧先生可說是唯一適合担

當這段歷史任務的人才；不幸，他被帝國主義的新工具，反動軍閥蔣中正與其僚屬走狗，在去年今日所殺害；是鄧先生之死，不只是本黨的不幸，實爲整個中國革命，整個中華民族之損失！

我們今天紀念鄧先生的意義在：我們要從革命的人格及時代的使命上認識鄧先生；我們了解鄧先生犧牲的原因，就是我們革命黨員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官僚買辦等勢力高壓下革命行動中應努力的工作。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復興中國革命，解放中國民族，實現社會主義，這是鄧先生指示我們的前途；鄧先生有說過：「這工作在我們黨裏是一種要塞攻圍的持久戰」；鄧先生是在這個戰鬥的火線上陣亡了，現在一切責任都落到我們的肩上！

鄧先生的中國土地革命論

(一) 前言

沒有正確的革命理論，則不能發動勝利的革命行動；沒有英邁卓越的偉大的革命理論指導者，則不能把握正確的革命理論而領導勝利的革命運動。所以每當一個新舊歷史交替變革的革命過程中，偉大的革命指導者常常扮演了莫大的英勇的脚色；同時每一個革命指導者又常常在這個時候因爲他能正確的把握革命理論而領導勝利的革命運動於是形成他的偉大。

世界革命史中最偉大的蘇俄革命之成功，乃是由於指導蘇俄革命的偉大的革命指導者列甯，充分正確的把握着蘇俄革命的本質，是以土地革命爲中心的社會主義革命，因而發動廣大的工農同盟的推翻封建殘餘及資產階級而爭奪無產階級政權的革命運動，在正確的理論認識和革命策略之下終於收穫了偉大的最後的勝

利，同時，正因爲此，在這樣的正確的理論認識和革命策略之一點上，於是逐形成了列寧的卓絕和偉大。像這樣相同的例子，古今中外不知是有幾多。總之，勝利的革命必須在正確的理論認識之下始能成功，而正確的理論又必須在偉大的革命指導者始能充分的把握，這無論在何時何地皆是一貫的。

中國革命，客觀和歷史的條件正正確確地規定着乃是以農民爲革命的主要部隊而遂行反帝國主義反前資本主義同時爭奪非資本主義之領導權的平民革命。所以革命過程中土地革命必然的定將成爲首要的核心的問題，可是這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必須依準其特定的方式去解決。

中國革命的性質雖然如斯嚴確的規定着，但是尙有無數人們對於這個眞理的認識不是模糊不晰，就是曲解誤會，不能正確地理解和把握。例如站在中國革命運動左翼立場上的中國共產黨，不是如像取消派那樣將中國經濟社會的性質曲解作與西歐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中國革命完全是與西歐英美諸國同樣的仍爲

單純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忽視甚至輕視中國革命運行中最主要之因子的土地革命；就是如像幹部派那樣，對於中國革命無數因子中不能區別而抽出最首要而最嚴重的土地革命，將牠排列於中國革命日程中的第一面，反而將牠與其他次要的各種因子混淆或並列，因之製造出有名的「革命二元論」，決定出變化不定的非一貫的革命路線。戕折中國革命順利的進行，同時更不依準中國土地問題特定的方式去解決，而生強的輸入蘇俄革命的方式，反而增進農村的紊亂，阻礙革命運動的暢行。又如站在右翼立場上的國家主義派以至國民黨等，他們完全不了解土地問題在中國革命行程中的意義，而且不了解中國土地革命是具有非資本主義的特徵，他們只是醉心於已經走進沒落階段中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之繁榮，而幻想着仍然模仿歐美的純粹的資本主義革命方式以完成中國革命，所以他們根本放棄了土地革命的政策，避諱聽聞土地革命這個口號，進而將一切以中國前資本主義土地關係為基礎的封建殘餘擁抱在一個懷抱之內，並且還向着帝國主義獻媚投降，

形成中國革命巨大的反動集團。這樣一來，不獨中國革命的理論愈加淆亂莫辨，甚而反使中國革命的進行遭受嚴厲的打擊，終致悲慘的敗北。

獨有我們的偉大的革命導師鄧演達先生，他却能正正確確地把握着上述的中國革命之性質，殷殷勤勤地將中國革命之核心在於土地問題的理論闡發而誘導後進的革命同志。他確認中國土地問題之解決必須依準中國特殊的方式，而且在這個偉大的歷史行程中中國農民是背負重大的使命。爲着要使這個中國革命唯一的真理能夠深入民衆的腦經，民衆能夠明確的把握而不爲其他的假革命理論所蒙被計，他不斷地以最毅勇的態度與其他一切假革命者相論戰。年來中國革命運動的進展，愈加證實鄧先生所指示於我們的革命理論之正確，經過鄧先生長年奮鬥的結果，中國民衆不但是深刻地認識了鄧先生的革命主張，欽佩鄧先生的革命理論之卓越，而且還尊仰鄧先生的革命人格之偉大。現今鄧先生確實是全中國革命民衆最崇拜而最尊敬的革命領導者。

然而正因爲鄧先生是如此之偉大，反動的惡魔們遂益加仇視和嫉忌，千方萬計地設法陷害，必欲將他置之死地，使中國革命民衆喪失革命導師，中國革命中道停滯而後快。終於在去年八月十七日反動的惡魔們勾結帝國主義者將他拘捕，十一月二十九日夜間在極黑暗的白色恐怖之下祕密地將他危害。偉大的革命導師鄧演達先生現在是被反動的惡魔們所吞去了，全中國的革命民衆失去了唯一的革命指導者，這眞是中國革命最大的損失和不幸，亦卽是全中國民衆最大損失和不幸，他們悲憤萬端！

鄧先生現在固然是死去了，可是他的偉大至今尙永遠的遺留着，在他那浩博的遺著之中永遠地遺留着他的思想，他的人生觀，他的革命理論和政治主張，以及治學方法等等，成爲我們行動的指鍼。我們爲着尊崇和信仰鄧先生，不但是要接受鄧先生的遺教，而且還要將鄧先生偉大之處發揚光大，這樣纔可紀念鄧先生於永古。鄧先生對於中國革命極力強調之點卽爲土地革命（亦卽是中國革命最首

要的核心問題），在他的文章和談話中無時無地不首先地力倡這個問題，特別是目前中國革命日益發展土地問題之解決日趨迫急，鄧先生所指示於我們的土地問題的理論之闡明更增必要。因之我們遂不能不將鄧先生關於中國土地問題之主張彙輯成章，使中國民衆更加容易把握鄧先生之革命理論，體悉鄧先生之偉大。不過，鄧先生的理論內容異常宏博，非一篇小文章所能羅具，本文僅一素描聊繪其輪廓而已，尚望讀者更進一步地探討鄧先生的全部思想體系。

鄧先生關於中國土地問題的主張，不僅是概括的承認牠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並且還更進一步地精細的確定了把握中國土地問題的方法，規定了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斷定了中國農村經濟的危機和前途，同時再指示出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焦點，以及解決的方式和解決的動力等等。這些都散在他的遺著之中，而為現今從事中國革命和研究中國土地問題的人們遺留着正確的南針，這亦即是鄧先生偉大之一斑。現在我們就根據這個秩序，敘述鄧先生關於中國土地問題的卓

見。

（二）探討中國土地問題的方法論

方法論的問題，原是探討一切問題研究一切科學最重要的先決問題。形式邏輯，形而上學的研究方法，固然已經成爲陳腐之物，一般科學者皆棄置不用，就是機械的唯物辯證法，這是爲聰明頴達的唯物論者所擯斥，只有運用正確的眞實的唯物辯證法始能把握一切事象的正體，這乃是人們所公認了的。

然而辯證法之爲物，決不是多講幾句「辯證法」多寫幾個「正」「反」「合」，多抄幾節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條文和成語所能了解，而是必須要從客觀的事物之辯證法的發展行程中體得思惟的辯證法，思惟的辯證法不但是與客觀事物之辯證法的發展相連繫，而且只有在客觀事物之辯證法的發展行程中始能產生。因此之故，辯證法一定是立脚在唯物論的基礎之上，同時只有這種唯物論的辯證法才能成爲解析事物之唯一的武器。

偉大的唯物論者之運用唯物辯證法以分析事物，只是靈巧圓滑地依準客觀的事物自身之辯證法的發展行程而加以自己的主觀意識之批判和認識，絲毫也不機械的和牽強的事先具着主觀的先入見製作一定的美其名曰辯證法的公式而固意將客觀事物生硬地嵌合於這個格子之內，並且在分析事物之際只是依準事物自身之辯證法的發展法則自然地依次解剖而決不鳴鑼擊鼓一定要高叫「唯物論」「辯證法』的口號以自眩。他所收穫的成果往往比較機械的唯物論者鉅大而良好。這亦卽是他之能夠眞實而正確的把握唯物辯證法之眞諦的偉大之處。非流俗者所可比語並論。

宇宙萬象的生滅和運動皆是循依着辯證法的法則的。無論那一種事物皆是具備着與其現存的形態相反對的矛盾因子，基於這種矛盾因子之生存與發育而使事物不斷地向着運動過程變動，出現各種各樣的姿容，這卽所謂辯證法的矛盾法則。各種事物在其運動行程中，雖然一方面是具着自身的特殊的運動法則，表現各

種獨自的形像；然而他方面則又與一切事物直接的間接的彼此相互影響和作用，在某種共通的法則之下統一，這即所謂辯證法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統一法則。各種事物的運動行程雖然悠遠的持續無間，然而牠的運行步驟却是依次分段，逐段前進，同時在每個運動階段中，又依準其歷史條件客觀條件之規定而出現各種特定的形態，自然這種特定的形態只是能夠存在於這個特定的階段之中和這個特定的時間之內，所以一切事物運動的全行程乃是無數特定的階段之空間與時間之連續，這即所謂辯證法的空間與時間之法則。這三大法則，乃是唯物辯證法最基本的原則，亦即是宇宙萬象生滅和運動的規準。人們苟能循準着這個規準去探討事象，則一切事象的本體自可明如指掌了。

譬如中國土地問題的現實的例子也是同樣。第一，中國農村經濟機構中有無相互矛盾的因子存在，關於這一點，我們是毫不躊躇的答覆，目前中國農村經濟機構中乃是包具着種種互相對立的矛盾因子。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雖然還是前資

本主義的小農經濟，可是資本主義的大農經濟却在許多地方業已出現，半自然經濟的自給自食的農村雖然現在尚存在着，中國全國農村的梗塞狀態至今雖尚頑強，但是因爲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商品積極侵入的結果，農村的關門確已漸次破毀，農民次第被曝露於都市的商品市場之上，終至農村經濟逐漸隸屬於都市，土地的所有雖的益趨集中，然而土地的使用乃仍然是被零碎的細分爲微細的小片，形成中國農業的過小農制；農村之中雖然土地資本佔着主要的地位，可是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之跳梁亦是中國農村當前最嚴重而最顯着的現象，地主階級之徵收地租與剝削農民固然還是行使封建性的剝削，然而土地之買賣與貨幣地租之徵收則又次第踏進資本主義的領域；農村人口之分裂，不單是原有的地主階級與農業奴隸尚存在着，中小農民和佃農還普遍的存在，就是農業資本家與農業賃銀勞動者亦逐漸產生。諸如此類，皆是證明中國農村經濟機構中互相對立的矛盾因子確實存在，而且此等矛盾因子乃是各自向着各自的方向發展，互相撞擊，致使中國

農村經濟變動不定趨向着牠的歷史的方向變轉。因此之故，我們分析中國農村經濟，解剖中國土地問題，第一即須確認這個所謂辯證法的矛盾法則，把握農村經濟機構中各個互相對立的因子，了悉其變動的動向，斷不可形而上學的承認此而否定彼，抹殺一切變動的事實而抽象的確定某種形態和關係爲一定不變，這乃是絕大的錯誤。自然對於各個因子比量較重乃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事情。

第二，中國農村經濟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怎樣？彼此的統一關係是怎樣？很顯然的中國農村經濟因爲遭受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商品之摧毀，和土着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之盤剝和拘束，現今乃是處於自然經濟日趨解體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日增困難的歧途之上，所以牠的性質必然的是與一般的資本主義農業以及單純的封建制度的農業完全不同，而且偏着牠獨自的特殊的性質。並且這種特殊性，不獨是中國農村經濟與其他國家比較關係纔存在，就是在農村經濟機構本身上，也是具有，——例如現今中國農村中活動的各種資本，土地資本，商業資本，

高利貸資本等，各自有各自特殊性質。又如中國現行的各種地租，勞動地租，現物地租，貨幣地租，資本地租等，也是各有各的特殊形態和性質。與此類似的例子實多，要之，中國農村經濟無論在其全體或局部皆是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但是，縱然如此，中國農村經濟亦決不能因此而將牠與外國的各種關係相隔絕，孤立的考察其性質和作用。中國農業乃是世界農業全體的一單位，同時又是中國國民經濟的一部門，世界農業全般的作用可以及於中國農村經濟，中國國民經濟整個的作用也可及於中國農村經濟。例如世界農業資本主義化的普遍作用，可以滅殺中國農業前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又如近代資本主義經濟一般危機，同樣的也可使前資本主義的中國農業也發生危機。因之中國農業經濟不僅是具有獨自的特殊性，同時還在世界經濟與中國國民經濟的大洪流中匯合而受一般的普遍性所轉移，其實牠也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而在某種形式之下統一。這種關係，在中國農村經濟機構自身中各個因子互相間也是同樣。是以在辯證法的特殊性與普遍性之統

一法則上，我們解析中國農村經濟問題，一方面必須注意到中國農村經濟的特殊性，他方面又須將中國農村經濟對外的及內部的各種關係統一的考察其普遍性。要這樣，我們才能收穫美滿的成果。

第三，關於中國農村經濟階段性的問題，這也是研究中國土地問題方法論上重要的問題之一。中國農業自從成立以來，當然是經過了若干次的變化纔演進至今日，今後仍然是將要繼續的轉變而發展，以至於沒有底止；不過，牠在這樣的恆久變化的長綿過程中之一階段的現在的階段之中，牠正因爲現在的這個空間之限制。而顯露着現在的特定的姿容，雖然現在的這個姿容乃是將來悠長的歷史行程中最短暫的一片刻，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將牠完全抹殺。明白的講，中國農村經濟因爲歷史運命的注定，處在資本主義體系日趨搖動而世界革命尚不能遽然實現的現階段中，遭遇着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的二重迫害，原有的自然經濟的基礎雖然崩潰，可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乃益行梗阻，在這種狀態之下，中國農村經濟必然

要出現目前這樣奇異的病態，而這個病態的療治，也必然的是不能循依巳往的英吉利式，德意志式，以及美利堅式等方式，就是最近蘇俄的方式在眼前這個階段也不能做法，必須根據現階段的中國自身之各種條件而採取獨自的特殊的方式。自然，這乃是中國農業全發展行程中最短暫之一過渡的階段，然而正因爲是過渡的一短暫階段，乃背負着一種特殊的使命，非人力所可阻止其實現。基於這個理由，中國農村經濟之考察，如果不了解辯證法的時間與空間之法則，忽視其階段性之發展，而遽然盲目的倡道時代落後或超越時代的論調，是不能得着正確的結論，且將犯着種種嚴重的過失。

上述三端，乃是研究中國土地問題方法論上最重要之點，能了解此三者，則其他諸問題自可迎刃而解。因爲假如第一個法則不了解，則不能把握中國農村經濟機構中諸對立關係，同時又不能認識中國農村經濟變動諸原因及其動向，甚至反而因爲矛盾法則之不理解形而上學的被既成關係所眩惑，作種種至上的不變的

肯定斷語以辯護既成關係，甘心充作支配階級的代辯人。其次，第二個法則假如不了解，則不是井蛙之見僅僅看見中國農村經濟的特殊形態，因執局部現象以否定全般；就是只見森林不知有樹的偏持世界經濟與中國國民經濟之普遍性而抹殺中國農村經濟之特殊性，再不然，就是將中國農村經濟完全孤立，將其內部的各種因子完全解離，而不統一的考察其一切，遂致不能獲得一整個的正確的判斷。最后，對於第三個法則苟不了解，則不能確立中國農村經濟階段性，對於現階段的一切問題不能講求一適合歷史條件的解決方策，不失於時代落後，即失於超越時代。這三種過失，不幸現今不了解或誤解方法論的人們却皆犯着，以致中國土地問題在他們不能正確地解決。

只有我們這位偉大的理論家科學家鄧演達先生正確地把握着這個探討真理的武器——唯物辯證法，雖然在他的口頭上並不曾常常掛着「唯物論」「辯證法」的口頭禪，然而在實際的研究上却始終不曾忽棄過這個唯物辯證法的立場，試觀

他對於中國土地問題之解析，無時無地不是本着這個研究方法出發，極端的說：鄧先生的革命理論之全體系——由世界觀人生觀以至土地問題理論——皆是以上述的三大法則爲基點。第一，鄧先生確認宇宙萬象皆是由於矛盾因子之生存與生長而運動和生滅，並且確認一切在現存關係中處於被支配地位的下層階級皆是現實社會的創造者生產者，同時又是上層的支配者之握墓人，將來社會的主宰者，所以力倡中國革命的任務是背負在下層的農工平民之雙肩上，中國農村經濟之變革只有留待中國農工平民革命之完成，眞實的革命者該站立在最大多數最下層的農工平民的利益上。第二，鄧先生肯定中國農村經濟乃有獨自的特殊性，故不能機械的如像一般公式主義者那樣輸入歐美資本主義的方式和單純的蘇俄社會主義方式以解決中國土地問題，而是必須循依中國自身的歷史條件和客觀條件所規定的方式解決，同時他方面則又不像一般民族主義者形而上學者那樣，完全將中國農村經濟孤立隔絕，而是從世界經濟全般中國農村經濟全般的立場連繫的考察中

國農村經濟，一方注重特殊性同時復注重普遍性，使二者統一中國土地問題獲得整個的圓滿的解決。第三，鄧先生極力的主張中國革命在目前的社會情勢和歷史趨向之下，現階段必須形成一個過渡的階段，自然這個階段的意義也只是局限於過渡的階段而已，可是牠却始終俺然的存在着，無法以避免和阻止，真實的革命者應當努力於這個階段之完成，而不可作時代落後與超越時代的妄舉，因之，中國土地問題的解決，在現階段中亦必然應有一過渡的方式，他主張以耕地農有的政策為這個過渡方式。像這樣的三大原則，乃是鄧先生的革命理論骰子，無論對於什麼問題皆是準據着這三大法則而解析，特別是對於中國土地問題是如此。

鄧先生在他的遺著中雖然不曾明白的嚴整的提示出他對於中國土地問題的研究方法之公式，但是如果精密的了悉了鄧先生的思想體系，和熟讀了鄧先生的遺著的人們，就可知道鄧先生對於中國土地問題的研究方法是有一定的程序。這種程序具體的表現在他所手編的「革命行動」第六卷更生所著的「中國農業問題之

探討與農業政策之批判」的序言之中，當然這是經過了他的審核和更正認爲是正確無誤而始行發表的。現在根據鄧先生思想體系的精神和準則更生提示的方式，可以將鄧先生對於中國土地問題研究方法的基本要件，簡略爲下之四端。

（1）必須從中國農村經濟機構中的矛盾關係出發，以考察中國農村經濟變動崩潰的實則和原因，

（2）必須站立在目前中國農村中處於被支配地位的下層的最大多數的貧苦農民之利益上以解決中國農村問題。

（3）必須注意中國農村經濟的特殊性，同時又須從世界經濟與中國國民經濟的總體以考察其普遍性。

（4）必須把握中國農村經濟現階段的性質，和現階段中中國土地問題解決的方式。

上述的這四端，乃是理解和體會鄧先生對於中國土地問題之主張和理論的首

要的要件，其要旨已經縷述如上了，下面可進而敍述鄧先生對於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之意見。

（三） 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

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是怎樣？簡單的說：乃是前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而且還是過小農經濟。

關於中國農村經濟的斯種前資本主義的過小農制之性質，可以從下列數端以考證之：

（1）農業生產方式：中國農業生產方式數千年來至今還是前資本主義的人間勞動和獸畜勞動。這種狀態，不僅是在西北西南等僻遠省區是如此，即如沿江沿海通商殷盛的東南各省仍是這樣。目前中國農業全般的生產方式，皆是以人間爲勞動行程的主要部份，使用粗陋的耕種農具，驅駕牛馬等獸畜，而深行粗放的農業生產，農作成果完全憑自然的天命，至於近代的農業機械與科學技術的應用

則完全無關，集約的農業生產除開略知曉其爲一名辭外不知爲何物。農業生產方式如斯之停滯落後，必然的定將使農業生產力衰微不振，農村社會持續於前資本主義的自然經濟之狀態。中國農業生產方式停滯的原因，第一，當然係基原於農民的窮困，農民因爲遭遇封建勢力以種種方式之搾取和剝削，終歲辛苦之成果最大部份皆爲封建勢力（主要是地主）所吸取，僅殘留最少的剩餘品以維持最低度的生活，食藜草，衣破服，與牛馬爲伍，貧困至極，單純的再生產逸恐不能繼續，尙何以言改良生產方式？第二，則是因爲中國農村中維持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繼續前資本主義的榨取，比較改良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徵收資本主義的地租得利百倍，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土地儘管不斷的集中，大地主儘管各地皆有，然而他們却始終不曾進一步的轉變爲農業資本家，改良從來的生產方式而遂行資本主義的大農經營，仍然將其集中了的土地零細地，細分爲無數小塊，以最高的地租，出租與佃農，使此等佃農只能在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下經行小農經營；第

三，則是由於中國工業數千餘年不能由前資本主義的手工業家庭手工業，進展爲資本主義的工場手工業及機械工業，於是農業生產方式遂永無變革之機會；第四，因爲中國農村的過剩人口異常龐大，勞銀極度低度，與乎投下鉅額資本以改良生產方式，反不如仍舊持續原有的生產方式，僱傭低廉的勞動者，或農民自己勤苦勞役之爲愈。有此四因，是以中國農業生產方式至今尚爲前資本主義的性質。

（2）農業經營形態：中國現今的農業經營形態，乃是小農經營。經營面積平均以三十畝地的小農佔全中國農民人口的半數，十畝地的過小農佔百分之三十，五十畝地以上的大農則不過百分之五而已。像這樣的狀況，無疑義的中國農業經營形態乃是小農經營，主要的還是過小農經營，試觀北京農商部的調查報告中，佔小農經營最大部份的三十畝地的小農以佃農爲最多數，即是這個事實的有力的例證。中國小農經營之根強的存在，當然是爲支持中國前資本主義經濟社會持

續的強有力的支柱，同時亦卽是使中國農村經濟停滯於前資本主義的階段之主要的因子。無數農民以其耕種面積局限於最小限度的地面之上，勢不能不卽在這最小限度的地面之上厲行極度的土地的自然性之吸奪，使地質過度吸奪而不能恢復，因之地面枯竭，農作不豐，農民貧困益增劇烈；加以近來中國小農，因爲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商品之侵入農村，農民家庭手工業瓦解，各種副業衰落，於是從來藉之以爲生活資助的工具喪失，貧乏愈加，原有的小農經營亦勢不能維持，夷沒爲貧苦的佃農或雇農，不然，則逃離農村，流亡都市爲赤貧的勞動者與無業漢；他方，富農與中農亦因中國農村經濟的總崩潰，而次第降逗爲小農與貧農。如斯，中國農村經濟益趨總崩潰，小農經營益趨零細化和小分化，以大農經營爲基礎的農業資本主義化之機運益難成熟，前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愈加成爲決定的形態。中國小農經營其所以持續至今根深蒂固持續至今的原因，第一，是由於中國自古卽使用原始的粗放的農業生產方式，人間勞動爲農業勞動行程的主體，故只

能耕種面積有限的小塊的土地，而不能如近代的機械農場的耕地之廣大，施行大規模的集約農耕；第二，乃由於地租太高，地主因高地租而可收取超額利得，故一般地主皆樂意其土地分割佃租，坐收鉅利，反較以整塊的大土地耕種或出佃有利；第三，中國實際耕地頗狹，荒地廣大，而農村過剩人口則衆多，無數農民皆缺乏耕地或耕地不足，故競向地主佃租耕地，供給過少，需要過多，此等農民寧願負担最不利的高地租而不惜，因而地主愈可妄增地租，細分耕地以出租，地面分割愈小，佃租者愈多，則地主所獲的地租額必愈多，是爲現今中國過小農經營成立的重要的原因；第四，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結果，農民貧苦，勢不能不只有耕種小塊土地以維其生存。由於這四大原因，所以中國小經營普遍的存在，這亦中國農村經濟特質之一。其實目前中國的小農經營，與乎汎汎地命之爲小農經濟，毋甯稱之爲過小農經濟反爲正確。現在大多數的農民實際上皆是感覺耕地過小和耕地不足。

(3)農村剝削關係： 至今中國農村一般還流行着封建的剝削。地主對於農民除却徵收農民高率的前資本主義的地租而外，還不時的課農民以封建時代之遺物的徭役。現今中國一般流行的地租，無論其形態爲現物地租，或貨幣地租，總之其實質皆是超經濟的前資本主義的地租，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平均利潤超過部分的純經濟的資本制地租，所以這種地租，必然是前資本主義剝削關係的礎石。至於徭役制度，更是前資本主義剝削的典型的形態。不僅只此，中國現在尚有少數地域還有農奴制度的遺跡，例如廣西的猺苗民族間，至今尚存在着奴隸和農奴，這更是封建剝削的極致。至於再加上一般的捐稅和賦役，更可了悉中國農民現今是遭遇着重重的封建剝削。所以就中國全般而論，中國農村中的剝削關係，現在還是前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這乃是不可否定的事實。

(4)農村政治機構： 如講到中國農村的政治機構，更是足以證明中國農村經濟的前資本主義性。中國農村的政治全權，完全是掌握在地主階級及出身於地

主階級與大農階級的士大夫之手中，他們對於下層農民有生殺予奪之權，鄉村中的團保鄉正，完全是他們的當利品與世襲品，團練壯丁，就是保護地主階級之利益的武士。地主們對於農民不僅是經濟的支配者，而且還是政治的土皇帝。實際上往往有地主擅禁農民及私刑拷打和放逐的舉動。由此可見中國農村政治機構的封建性之一斑。

(5)農村金融： 中國因爲國民經濟不能完全進轉於資本主義的領域之故，資本皆不能流入都市爲生產的工業資本，反而退入農村爲高利貸資本及商業資本。從來一般農民皆因爲剝削過重之故，貧乏萬端，資金枯竭，大半皆仰賴高利貸資本以苟延殘喘。高利貸資本在農村的跳梁，利率的苛重，中國而外，全球無兩。以此等高利貸資本，常與土地資本及商業資本相互結合，形成榨取和剝削中國農民之三位一體，中國農村經濟之封建性益加彰著。

(6)宗法思想 中國農民的思想，是完全爲數千年來的宗法思想所支配。觀

宗觀念，家長制度，身分制度，血緣制度，孔教的倫理思想，以及拜神拜物的迷信，皆是牢不可破。這亦可說是中國農民的保守傾向之因。然而正因爲此，中國農村經濟之變質遂又添多一重障礙。

此外，農民的副業的手工業生產，也是具着前資本主義的性質。

根據上列六端，很顯然的中國農村經濟至今還是以小農經濟主要的是過小農經濟爲基礎的前資本主義之性質。雖然土地的購買和農產品的交易帶着幾分資本主義的形式，可是亦不過是初期的單純的貨幣經濟之一表現而已，然絕對的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之現象。從經濟機構的全般以考察，無可疑義的中國農村經濟尚充分的是資本主義時代前的半封建的性質，縱然這種封建性是和西歐不同而且還是日趨崩潰。如果再加上政治機構的成份，這種半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的性質，更可爽然明白了。

關於這點，鄧先生是特別的強調着。他斷然的力斥一般承認中國經濟社會和

農村經濟是資本主義性的人們（取消派）的荒謬；同時更痛詆承認是半封建性半資本主義性（即所謂半殖民性）的人們（幹部派）的二元論之妄誕；而極力的主張是前資本主義性半封建性，因而力倡中國革命應以土地革命爲重心，農民爲革命主力部隊的獨特的正確的革命理論。他在其一切的言論和文章中，特別的注意和提示着中國農村經濟前資本主義性的問題，中國土地革命的問題。玆試舉出他所說的幾段顯着的話來證明：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如下的事實：70%以上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差不多30%的人口住在城市中。差不多只有30%的人口住在有新式工業影跡的城市裏。其餘的城市差不多只是行着簡單再生產的手工業及半農業的城市。產業工人的數量，連煤礦工人及碼頭工人計算在內也不過佔全數人口0.5%（千分之五）在各地農民所生產農業品當中，自行消費的，平均約佔10%拿去和手工業及機器工業製品交換的平均約佔15%其餘的45%的農業品是被地主，

商人以田租高利貸及「不等價交換」(商業的欺騙)，等等形式，被政府以捐稅徵發掠奪的形式剝削了去。再從工業的消費量來說：農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約爲三〇元，其購入工業品的價值至多爲收入的15%，城市人民每年每人的平均收入約爲五〇元，其購入工業品價值至多爲收入的35%又中國人民全體所消費的工業品中由外國輸入的約佔45%，由本國自製的約佔55%，而且本國自製品中，手工業生產品約佔其大部份，由新式工業所製的不過佔其小部份。又在中國的新式工業當中由外國人資本經營的佔80%本國人的不過佔20%如果我們考慮這些事實，那麼，就可以得到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影像：中國的社會經濟從主要點說，實在還是在農業手工業生產的階段中。在這個階段中地租雖然以土地私有及土地買賣的形式發生出來，而實際上主要是由政治掠奪發生的。商業資本的高利貸和不等價交換，雖行着極凶暴的累積，而不過是工業資本發生以前的現象，並非近代資本主義(工業資本)的本質。

其他官僚的剝削及政府的租稅，此是封建政治的附屬物，與貢賦徭役實無二致。……因此，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體之農業手工業生產，一方面因政治的掠奪及帝國主義經濟的競爭而日就崩潰，他方面則無法過渡到一個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的新階段，只是殘留在原有的階段中，不絕的朽腐，不斷的掙扎」(遺著三二一頁)。

「我們只是認為，中國現時的社會，在形式上固有異於古代的封建制；但就其內容的性質而論，的確還離不了封建勢力的支配。因此，整個的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的時代。同時又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配着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益呈複雜的狀況。」(遺著三二三頁)

「中國實在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封建殘餘成份及前資本主義的成份實比其他的成份較多而且重要」。(遺著三二四頁)

「我們認為：中國的農業制度整個的說，是小農制。而其內部的矛盾複雜，實比任何國家為利害。」（遺著二五八——九頁）

「在現時全國約百分之五十的土地由佃農耕種，全體農民約百分之五十為佃農；佃租平均約佔主要生產量百分之五十」。（遺著二五二頁）

四　中國農村經濟的危機及其原因。

基於中國農業經濟停滯於前資本主義的階段之故，必然的定將以此等前資本主義的因子為主要的原因，而使目前中國的農村經濟危機四伏。此等危機，重要的以概括下之數種：

第一，中國農業危機第一顯著的現象，即為農民的貧困農村經濟的衰頹。中國農民貧困農村經濟衰頹的原因，不外下之二端：一為農民負担之增大，二為農民收入之減少。由於農民負担的增大與收入的減少，必然定將使農民不能持續其生產，棄業流亡，農業生產減退，農村秩序紊亂。目前中國農業最嚴重的地方，

即在於此。至於中國農民其所以致有負担增大的原因，厥爲下之三因：

（1）地租的奇重： 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地主對於貨幣的需要增加，於是利用土地所有權而增加地租，從農民徵取享樂的資金，愈徵愈重，出現目前全世界所未有的奇重的地租。中國現行的地租無論其形態爲何，貨幣地租物納地租皆屬一樣，平均徵至百分之七十，雖然間或也有五五分租，六四分租，然其數至少。觀此可見農民辛苦所得的收獲品之最大部份皆爲地主所掠奪，每年最大負担即爲地租，勢必使農民非度其非人間的生活則不能生存。

（2）捐稅的苛繁： 中國農民無論何地皆得負担最苛重最繁雜的捐稅，窮徵暴斂，名目繁多，這亦是目前中國農民最大而最苦的負担之一。

（4）高利貸的盤剝： 農民因地租和捐稅的負擔，不單是貨幣需要量增大，而且還感貨幣缺乏貧困至極，因而專以貸借貨幣資本盤削重利的高利貸者遂乘虛侵入農村而活躍。現今中國高利貸名目之多與利息之大，全球無兩。最大多數的

中國農民皆賴之而苟延喘息，但是他方正因為此，農民殘餘的膏血皆被他吸盡，窮困萬端，終身皆作高利貸的奴隸，無法免除此重荷，此亦是中國農民負担奇重日趨貧苦的有力的原因。

此外，關於中國農民收入減少的原因，則有下述的主要的主要二者：

（1）商人的操縱：　農民因貨幣需要的增大，愈加將其生產品出賣，於是當此買賣商品為職業的商人遂利用農民不悉市場狀況等弱點而點操縱價格，常以最低價格購買農產品，而以最高價格出賣工業品，農民受損莫大，收入減少。這種現象在中國全國異常盛行，而且愈演愈厲，所以目前中國農民收入低減至最低程度。不僅只此，一般商業資本往往以高利貸資本的形式，乘農民需要貨幣同時貨幣缺乏之弱點，遂期先借貸資本與農民，以故低廉的價格預詁來期的收獲品。如斯，農民的受損更屬鉅大，所得激減了。

（2）副業的崩潰：　從來中國農民往往操作種種副業以補農民所得的不足，

例如各種家庭手工業，與出稼勞動。但至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以來，資本主義工業品源源流入農村，完全侵奪原有的家庭手工業之生產品的地位，因而家庭手工業崩潰，農民不能再依藉此以爲生活資助的副業，收入源泉減一。至於出稼勞動，一則因季節的限制，不能以此爲固定的副業；二則農村崩潰的結果，失業的勞動預備軍激增，出稼勞動次第不能實現，收入益加狹窄而些少。有此二大理由，現今中國農民已無復如往昔可恃副業的收入，補助支出的不敷了。

(3)耕地面積的過小：　目前中國農業乃是小農制度，主要還是過小農制。無數農民皆在最小限度的零細的土地之上從事生產，生產的成果，除充作地租與償還債務外，幾無剩餘，所痛感耕地的缺乏和不足。現今中國農民百分之五十是小農，由此可見耕地過小之一斑。耕地過小的結果必然的極力剝削地方，使地質日趨枯瘠，生產成果益少，是亦爲減少農民收入的一因。

基於上述各種原因，中國農民遂日增貧困，農村經濟日趨衰落，迄至現在達

於極點。

第二，中國農業第二個危機，則爲農業設備的破壞。中國農業設備的破壞，因爲天災水患軍事匪禍等積極的原因，以及政治紊亂長年失修與乎農民窮困無力不繕等消極的原因，達於極度。無論水利，運輸，堤防，種畦，任何農業設備，皆摧毁不堪，甚至因此成爲災禍。例如前年的大水災卽其明例。又每戰爭之餘，田園荒蕪，廬宅成墟，這是人所周知的現象。因此之故，苟長此下去，中國農村將因極度的破壞而悉成荒土了，故年來中國荒地面激增不已。

第三，中國農業第三個危機，厥爲農業技術的停滯。中國農業技術凡歷千餘年，未或稍變，至今仍沿用古法，用人力，用獸畜，用粗笨的農具，用簡陋方法，從事耕種，是以生產能力毫無增進，豐歉惟賴天時。其原因，當然是由於農村資金的貧乏，農業科學的落後之所致。然而此種停滯不前的農業生產能力，勢將不能與歐美諸國猛飛突進的以機械生產的農業生產能力抗爭，終至形將爲其所繫

敗。中國農業的崩潰更將加速了　自然，對於施肥改種更是談不上。

第四個危機，則爲政治紊亂影響農村社會不靖，農民不能安居樂業，離棄農村，逃亡於都市。田園荒棄，耕種乏人，盜匪充斥，餓殍載道，這就是目前政治紊亂致使中國農村荒廢的顯著現象。

第五個危機，就是資本帝國國家的農產品傾銷中國。世界經濟大恐慌的結果，世界商品市場閉塞，歐美資本帝國主義諸國，皆將其大量的過剩生產的農產品，輸入自由市場的中國，以最低廉的價格傾銷投資，因而我國內地生產的農產品，主要是米麥，遂遭受莫大的打擊，不能與之競爭而敗北。眼前中國洋米洋麥充溢，米價慘落，內地農民叫苦連天，出現米賤傷農的危局。中國農業在極度衰落之餘，更加上現今外米的侵略，實是百難交集不堪維命了。此種外米外麥傾銷的趨勢，今後將愈演愈厲，不知胡底，中國農業的崩潰的形爲無法挽救也。

總括上述各端，中國農業因爲遭受種種破壞的因子之作用，宜乎積極崩潰發

生目前農村衰落，農民貧苦，農田荒棄，農事不興，飢鴻遍野，盜賊如麻等破產的現狀。

所以鄧先生詳細的指出中國農業的危機和其原因。

『一。經濟的原因　構成經濟的原因是：生產技術的幼稚，耕地的過度分裂，人口分配的不平均，地主及高利貸與商業資本剝削的凶殘，家庭手工業的破產，國際農業的競爭，農村資本的缺乏。

『二。政治的原因　主要的在政治剝削及掠奪：（如苛稅預徵糧錢，雅片稅，不兌換紙幣，使用惡幣，勒捐軍費，徵用牲畜及現物等）國家農業設備（如水利，模範農場，穀倉等）底荒廢，運輸交通機關的破壞，國家對外貿易政策（如所謂「互惠」政策）及財政政策（如包稅及厘金公債等）底反動等等。

『上述各種經濟及政治的原因，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各自獨立，其實是互相關聯，而且循環的互爲因果，因爲生產技術幼稚的緣故，各級農民的平均

生活水平十二分的低下。凶暴的地主，要得到豐裕的生活，只有用統制的威力以重租高利盤剝農民，因爲城市工業不能發展。所以城市及農村所累積的資本只有購買土地，因此耕農日益減少；同時農村的過剩人口無法由城市容納，大部壅塞在農村中，因而佃農日益加多，農村的耕地日見分裂。耕地過度分裂的結果，更不能利用現存的進步的生產技術，因此生產能率十分降低。因爲各地方人口分配不均緣故，致「東北」「西北」各省區，有地缺人耕種，而東南各地的人民每戶平均不過得到數畝耕地，實在不敷生活的需求。因此農民以借貸爲生，終身受高利貸的盤剝。因此耕農的土地被其捲去，變爲佃農，佃農變爲傭農。佃農受制於地主，必須納全世界所未有的高佃租以求得土地耕種，半死半活的生活實在比農奴時代更爲悲慘。傭農更受着非人類的勞役的拘束，做兩足的牛馬。更有許多其他過剩的人口求爲佃農傭農而不可得，不能不流爲兵匪流寇。在閉關時代，家庭手工業還在盛行，大部份

的日用品可由農村及附近鎮市自給。開關以後，帝國主義者以廉價商品侵入農村，家庭工業於是破壞，因此農村人口過剩的現象日益加劇，而商業資本的剝削日益加深。國際的農業，特別是在南北美洲，及英，法，荷蘭，日本，的殖民地（印度、安南，瓜哇，台灣等）利用其高度的生產技術及貿易政策或特殊有利的生產條件以較低廉價格的農產品輸入中國，本國農產品無法與之競爭（特別是因運費過高納稅繁重的緣故！），因此沿江沿海對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外國農產有壟斷市場的趨勢。因此農民的收入更加減少，農業的衰落無法倖免。至於農村資本的缺乏，一方是由於生產技術的幼稚有剩餘生產的積累；他方更由於政治的剝削使農民皮肉不存；及最近商業資本之集中於都市，因公債，特稅，包稅，貿易獨占等方法，間接去剝削農民，使農民生產品亦裸裸的無償的被官僚軍閥買辦等所掠奪徵發，更談不上農村資本問題。因此農業的生產或完全停止，或以自殺的方法，耗費地方，使生產能率大

大的降低，土地改良完全絕望。

『像上面所述的經濟的現象，雖然表面上是生產行程上的結果，而實際多由反動的政治力量所促成。政治的剝削及掠奪，當然驅迫大多數農民陷於破產流散。國家農業設備的荒廢，當在使生產技術更加落後，更加無法改良耕地。運輸交通機關底破壞，當然使交換行程窒塞，使農民不能不低價售賣農產品不能不高價購買工業品，而生活水平更加降低。國家的反動貿易政策只有使外國農產品，更容易壓倒本國產業。反動的財政政策，只有把一切租稅負担轉嫁於農民身上。像這些的政治因素，都是促使農村加速度的破產。因為農民破產的緣故，更增強統治者的反動，行更苛酷的掠奪，以促農業經濟及全國之民經濟的滅亡。像這樣：政治原因與經濟原內的交互循環，遂有數十年來使中國內戰不能停止。使中國民族物質的文明與文化同陷於消亡的地步。這種現象如無消滅，中國人民必無死所，更不用說社會主義基礎的建

設無絲毫希望。』（遺著二四九頁到二五二頁）

此外，鄧先生還更進一步地曾經精確的將中國各地農村經濟崩潰的實況作一素描，以表明其崩潰的原因與危機。

『如西北地區，則因水利設備的完全荒殘，（最近陝西的「引涇」工作雖在進行而能得到灌溉的利益的甚少。河套一帶的灌溉既是備由有義氣的土匪頭經營者。却是區域也不大！）及鴉片白丸毒害的加甚，土地耕種底面積生產力均有顯著的衰退，而軍事徭役及徵發的增加無巳，使人民生活標準大大的降低。再加以蒙古方面貿易爲蘇聯所獨占，中國西北部的商品市場受着莫大的打擊。因此西北各省的農村秩序完全崩壞。甘肅省內的回漢種族鬥爭，陝西的餓莩，山西綏遠的兵變等無不表示出農村經濟的沒落。天津海關的稅收減少，爲必然的結果。

『如長江各省——特別是中部及西部——本來是中國農村經濟的重心；

但是一方面政治剝削無限的增加，一方面年來農村秩序差不多大部破壞，商業資本活動的範圍大大的減小。集中於城市的高利資本，除以投機獨占的形式慘酷的掠奪外，完全凝固於銀行錢莊內面，農村金融來源完全斷絕。這種狀況，必然更加大農村破產的速度。新破產的及早經破產而久離生產行程底流氓無產者，當然一天比一天積累起來，因此使農村暴動底形勢更加順利。中流以上的農村社會成份，現能已完全離開了土地，離開了生產的機能，集中到城市場中來，增加寄生剝削的成份，使城市的生產機能減低，使城市剝削農村的程度加高。更加這個地區的農村潰滅底速度。

『如西南各省——以廣東爲主要省分——本來是商業資本統治最顯著的地區。除廣東以外，其廣西雲南貴州三省，本在極幼稚農業階段，本來人民的生活已甚低下。近年以來，在反動軍閥的統制下面，政治的收括與商業的收括並行，特別是鴉片與賭博的間接掠奪農民，爲使農村經濟崩潰的利器。

絲業因世界市場的狹小及日本的競爭大部破產，因此而最富厚的商業資本地區——廣東珠江三角洲——也不得不衰頹，因此更促進農村的破毀。南洋及其他海外各地的華僑往時每年匯本國的工資，本來爲補償中國輸入超過的成份，却是現時一方面因爲世界經濟危機之波及，一方面更因爲帝國主義者的排外，使大多數的僑工及小商人完全無法生存，結果不能不逃荒而回到原籍——主要的是兩廣及福建——裏去，增加了流氓無產者的數量及城市的寄生人。這種事件，當然也是促成農村崩潰的因素。西南各省在這種狀態下，行着農村破產的進程。

『我們現在試更進一步去檢查東南及東北二地區的農村狀況：

『東南之江浙二省，經濟上早已成爲中國重要地點(特別是自明末以來)。資本主義的規模在此二省最爲明顯。照理，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雖然城市的工業受益最多，却是農業經濟也應該得到相當的益處（土地價格的增加

，差額地租的相對加大，農業工人工資的加多農業過剩人口的減少等！）；却是因爲現時東南的資本主義雖已被統制於金融資本。而大部份的經營形態及其結構尚離不了前期資本主義的素質。居統制地位的金融資本，主要是高利貸資本，而不是生產資本，所以不是近代資本主義的。商業資本的作用在東南還佔主要的地位，再加以現時南京統制下面的財政政策，一切租稅及公債的取給，雖然都以間接稅的形式取之於城市而不取諸農村；却是間接稅的轉嫁，一切都大部負担在農民——一部負擠在城市消費者身上。事實上，現時南京統治底貪汚與揮霍爲空前的，這種空前的揮霍與官僚軍閥的搜括，都是取之於農村。也可以說，反動南京統治是建立在江浙兩省的農民剝削上面。雖然他的政權是限於城市。因此，他必須用間接稅方法以剝削農村，其次，東南的絲業已受世界工業危機及日本競爭的影響先後破產，而農村的豐收巳受世界農業危機的打擊，不得不和國外廉價的農產品競爭，結果農民收入

也大大的減少，這些一切，都已經可以充分的說明工商業最發達的東南地區底農村破產狀況。前期資本主義時代的農村，在歷史上是最受打擊的時期，却是困苦艱難與慘酷的狀況，在今日的江浙二省實比十六世紀的歐洲各國農村為甚。現在剩下的，只有東北地區：

『就最近的東北區經濟狀況說，大家都會以為，東北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現時已成為中國的黃金區域，成為中國本部人民的避難所。因為：東北三省佔有全國30%以上的鐵路綫長；土地的分配，每人平均比本部各省大過六倍以上；佔中國出口貨第一位（約為全國出口貨總數30%）的荳類完全由東三省出產；土地的肥沃，工業原料的豐富，農業墾殖容量的偉大，一般的經濟組織底近代化（如銀行，交易所，保險，倉庫，運輸及農業生產機械化等）；每年容留內地十萬以上的移民（每年由內地移到東三省的約三十萬，却有二十萬是春去秋回的；）農業工人生活比河北山東二省高三

倍（東三省僱農平均每人每年工資百元，河北山東二省約三十元；）；工廠工人及手工業工人的生活，平均比東南工業區高二倍（東三省新式工廠工人工資爲每月三十元，而上海爲十二元；東北的手工業工人每月工資約爲二〇元，而上海約爲十元；）；而且現時國際的投資（特別是日本！）正在十分踴躍的增加，政治的秩序從又未曾破壞。這些簡單的敍述及數目字都足以證明東三省現時的經濟機能與地位已在全國任何區域之上。

『却是我們如果詳細些，深入些，——特別就去年秋到現在的狀況來觀察一下，就會得到相異的結論，至少在農村經濟的觀點上會非常的驚訝！

『現時的東北農村經濟，也已經進入於崩潰的途程。爲甚麼？待我們簡單敍述出來：

『東北三省的富源，在於農產品的豐富。而荳類及麥類的輸出，——特別是荳種——尤爲一切收入的基礎。因爲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爲荳類主要

銷場日本及英德荷等國——特別是日本——均不能不減縮生產的範圍及節約生產投資。因此而荳類的銷場受着莫大的打擊。同時因爲農業危機的擴大及延長，一切農產品都大大的跌價（詳上國際欄）。因此二事：第一，市場的縮小；第二，產品價格的減低！使東三省的主要輸出量大大的降低，輸出品價格大大的減小，因此而使農業收入受着莫大的打擊。據統計：（中東經濟月刊七卷一號山陽君的計算）一九三〇年的東三省特產（荳麥及木材毛皮等）的輸出總價，以金元計算比一九二九年減少三分之一，以哈洋銀元計算則減少二萬四千萬元以上。而今年度（一九三一）的預測，因爲荳麥等特產品的市價現時比一九三〇年度上半期又低落了三分之一以上，因此本年度輸出品的總價又須比一九三〇年度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即以哈洋銀元計算，本年度的輸出總價會減少一萬三千萬元左右。本年度比一九二九年度則共減少約哈洋五萬萬元。而因世界市場的停滯，一九三〇年糧食（豆與雜糧合計）積在東三

省未能輸出者約五十萬噸。而今年(一九三一年)的積存而多，因爲一方面比較的豐收，一方面市場的吸收將更小。

『這兩年來五萬萬元哈洋的短收，實爲現時東三省農村破產的第一個一要因素。

『其次則爲東三省政府的財政剝削。東三省的政權雖比較的穩定，却是因爲政權完全是在高利商人及地主手上，所以一切的剝削一方面在私人方面是透過商業及農業的經營，而在「公」(政治！)的方面則租稅及不兌換紙幣的剝削實爲重要的手段。因此，東三省有秩序的(穩定的！)剝削並不比南方「無政府的」剝削爲小。我們現在舉幾個實例：在租稅一面，平均每畝二角的田賦雖然比較內地爲輕，却是一切駐防軍隊的徵發及貢賦，都是無償的(這是封建時代！)取之於農村。每次戰爭發生(特別是張作霖被炸死的前後)臨時戰費的抽剝也爲數不小。而尤爲利害的是不兌換紙幣的剝削。奉

天官票(奉票！)過去之剝削人民，已爲甚著名的事實。現時雖然已名義上以法定價格(六十元奉票值一元大洋！)穩定！却是新紙幣(官銀號及殖邊的大洋！)的基礎一樣的未曾穩固，將來隨時有低落的可能。其吉林的吉帖與黑龍江的江帖現時還在以加速度跌價的行程，散佈在農村中(官場用種種方法欺騙農民，致落後的農村只好受用落價的不兌換紙幣，而不能得到其他貨幣！)此種在三省發行的不兌換紙幣，他的增發速度比落價的速度還快，因此農民的生產品以通貨膨漲(Enflation)的形式，被大商家及政府無償的掠奪了去。一切企業，無論爲農業及商工業(特別是錢莊，糧棧，油坊，當鋪等等)均爲極少數的官僚軍閥及高工商業資本家所經營，他們佔有了一切，操縱了一切，剝奪了一切。(在吉林，有一句流行的話！「除了剃頭店以外，永衡官錢號都經營了！」)所謂官企業，實際也只是在極少數的官僚軍閥商業資本家手中，絕不是普通所謂官營企業，或國家企業的性質。

『這是租稅，徭役，不兌換紙幣等等的剝削。形成東三省農村經濟崩壞的又一個因素。

『上述的兩個因素：其一是經濟的——特別是國際經濟的原因，其二是政治的，是使所謂中國的黃金區域由極盛到衰頹，使農村經濟崩壞的主因。

『現時崩壞的程度雖尚不至於如長江及南部各區，但是潛伏的危機到處都很大：金融來源幾於斷絕，使農村的生產資本無法得到，農民的購買力完全消失。使商業陷於停頓的狀態。高利的借貸（平均年利由8%到10%是普通的！）無法償還，土地的價格大大的低落。這個行程，一面促成所謂鬍匪的增多，一面更促成富豪兼併的機會(本來東三省的農業經營已是大地主的)而使自耕農及小地主無法生存。

『本來東三省經濟及政府勢力的分野是以長春為區軸，由日俄兩國平分。日本的勢力固是日增，而蘇聯的勢力也正圖恢復。現時，蘇聯正在利用銀

價的低落及鐵路運輸方便的機會，以多量的「廉價」商品向滿洲一齊侵入。在現時農業危機的狀態下，日俄在中國的經濟鬥爭，必然會更加劇烈。這是所謂中國黃金地域——東三省的農村經濟崩潰的危機。』

五　中國土地革命的意義

中國革命的性質，無論何人都知道是，反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革命而是爭奪非資本主義建設之領導權的農工平民革命。革命的對象，自然第一是帝國主義者，其次爲封建殘餘，再其次則爲反動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任務，乃是肅清一切障礙中國國民經濟之獨立和發展的惡魔，而使中國國民經濟的機能脫離個人主義的私利目的，進展於集團主義的公共利益的階段，換言之，就是揚棄私經濟的資本主義而進展於公經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力，是以農工平民大衆爲基本部隊，主要的是農民。因此之故，土地革命遂成爲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

不待說明的，中國的封建制度乃是建築在中國前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以上。

一切封建的剝削，皆是以中國目前的土地制度爲礎石，地主之存在與成長，高利貸資本之跳梁，商業資本之跋扈，工業資本之衰微 ，以及苛稅雜捐之資源，土豪劣紳官僚軍閥之形成與暴戾，官僚政治之維持，宗法思想之根據等等，無一不是基因於中國的斯種前資本主義的土地制度。就是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也是利用中國的土地制度之落後國民經濟停滯於前資本主義的階段，因而牠的資本主義商品和資本之暴威始得肆無忌憚的逞發，而將中國夷沒於半殖民地的地位；並且實際上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無其方式如何，皆通過中國的封建關係，而遂行封建的榨取和掠奪。中國國民經濟其所以日趨危殆，乃能進轉於資本主義的階段，中國前資本主義的土地制度之未革，而廢且還普遍的存在，實爲其法定的原因。

如斯，中國革命必然的是須以土地革命爲最首要的問題。土地革命成功，則中國革命的全歷史道程已去大半；特別是在現階段的革命過程中，土地革命更是絕對的重要，土地革命不能遂行，則全般的革命行動皆無意義。土地革命，在中

國革命整體中實是具備着最偉大最嚴重的歷史的意義。

鄧先生特別的注意中國土地革命問題的意義是非常的重要，同時更承認一般人所說：「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問題」的話爲「大體是不錯」。他很勇敢的提出「耕地農有」的土地政綱，並且還將土地革命的重要意義指示給後進的人們：

「四年來的革命失勝，祇有叫一般落後的人們知道羣衆的勢力尙在潛行的發展，叫一般比較進步的人們了解農民耕地問題在中國革命所佔的地位。許多人說：「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問題」話當然是有可置議的地方，但大體是不錯的。土地問題解決的要求，在從前只是由一般急進份子高叫着，其餘的人，不但反動的社會成份，因爲本身的利害關係拚命的反對和忽視這種要求，卽與土地無切身利害關係的社會成份，也因爲不了解這個問題的意義，而盲目的害怕或者懷疑。現在的情勢，當然已經是兩樣。」（遺著二

四六頁）

六　中國土地革命的性質及其階段

中國土地革命的性質，因其經歷之階段不同，故其性質亦於無階段中各有差異。中國土地革命的階段，準據中國革命的歷史行程，而可區分爲二大階段：第一，過渡的階段，即是耕地農有的革命階段；第二，最後的階段，即是耕地國有的革命階段。

（1）最後的土地革命之階段及其性質

現在試先述，第二，最后的階段。

一切土地革命的最終目的，自然是土地私有權之廢止。基於土地私有權之存在與維持，是以始有過去的封建社會與近代的資本主義農業社會之出現；所有農村中的榨取和剝削的關係，完全是以土地私有制爲基點；特別是前資本主義的寄生階級，更是憑恃着土地私有權以維繫；農民在土地私有權的鉄板的重壓之下，

窮困顛沛，難以生存；農業生產方式與生產技術，亦因遭受私有權的束縛和抑制，而不能自由的積極發展，長時間的停滯不進；農村經濟與都市經濟的均衡關係，也因私有權之障礙而不能圓滑的保持。諸如此等現象，皆是土地私有制的必然的結果。如果欲謀土地關係之根本改革，農業生產之徹底改良，農民狀態之完全改善，都市農村之平衡發展等等，是皆必須以土地私有制之廢止爲先決的前提。所以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卽在廢除一切的私有制度，猶其是土地的私有制。

中國革命的最終目的，原爲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使既成的一切支配關係榨取關係，根本廢止，而促進人類於大同。在這種目標之下，中國從來的土地所有制之根本消滅，自屬意中之事。是以中國土地革命最後的階段，必然爲一切土地私有權之徹底揚棄，將土地完全收爲國有，在這個時候的土地革命的性質，自然必是一般土地私有權之廢止而將耕地歸國有的性質。所以鄧先生曾經這樣的說：

「我們黨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原則是：第一，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

使中國土地的生產機能，漸漸脫離個人主義的經濟進到集體經濟——社會主義。因此，土地問題解決的最后目的是土地國有——土地社會化。」（遺著二四六頁）

「我們為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必須達到土地國有的目的。」（遺著二四七頁）

（2）過渡的土地革命之階段及其性質

其次，則繼續的敘述第一個階段，過渡的階段。

由於中國革命的歷史條件與客觀條件的決定，中國土地革命如欲達到最后的階段——耕地國有的階段，其間則須經過一過渡的階段，即所謂過渡的耕地農有的階段。目前正是這個過渡階段。

這個過渡階段其所以得到成立的條件有三：

第一，中國農村經濟機構的條件。目前中國的農村經濟，在前節已曾說過，

仍然滞具前資本主義的機權。最大部份的土地集中於地主之手，農民人口中佃農佔約半數以上。地主因爲憑恃其土地所有權的庇蔭，並不參與農業生產，對於農民遂行封建的剝削，徵取高率的地租，坐享安樂，成爲尚門榨取和剝削農業生產者（主要是佃農）的農村中之寄生蟲。地主從農民榨取來的資金，並不以之投入於農業生產行程之中，而將他抽出於農業生產行程之外。以一部份充作其個人度奢侈生活的資金，消費於都市生產的奢侈品，一部份則充作擴大農民榨取的手段，添購土地，再行以高率的地租榨取第二的佃農或者就以之作高利貸資本，以最高的利率借貸與農民，不然就以商業資本的形式，以不等價交易的方式剝削農民。這樣一來，地主愈加肥大驕侈，土地益增集中於大地主的手中，寄生的機能益加增大，農村的朽腐現象益著。日之農業生產行程中立於重要地位的佃農，因爲地主之榨取和壓迫，勞勳成果的最大部份，皆以地租的形態而被地主所徵取，其餘的部份，則以債務償息和付還的形式，而爲高利貸者所吸食；同時，在此地又因

爲貨幣需要之增加與急切，以出賣農產品的方式，不等價的欺詐的爲商人詐騙了無數的農產品價值。佃農在這樣的重重搾取和剝削之下，勢不能不淪沒於貧困夷亡的境遇。特別是當着地主高利貸與商人混合爲一的三位一體的場合，更是利害。所以目前中國佃農最感覺耕地之不能自有和不能自由使用的障碍，迫害其生存，窒息其發展，而急思爭取耕地自由使用的權利，以輕減和免除其苦痛。

不僅只此，中國佃農的耕地往往因爲地主貪得高率的多額的地租之故，被耕主細分爲零細的小土片，佃農只能於小農經營，主要還是過小農經營的形態之下從事生產，所以他們痛感耕地之缺乏和不足。正因爲過小農經營之故，勞動成果不足以敷其支出，維其生存，於是勢不能不狂暴地濫吸地力，剝奪地質，既使地質損傷，生產減退，貧苦程度，益加增劇。斯種過小農制之毒害中國農村經濟至大，然苟欲圖謀其消滅，則首先必須廢止地主之獨占土地所有權，使農民得以自由的增大其耕地面積始能奏效。

自然，上述的地主階級之毒害農村經濟，不單是佃農直接的身受其禍，就是一般的自耕農與半自耕農，其受禍的方式雖然不同，但其實質則一樣。自耕農與半自耕農特別的感覺土地之被大地主掠奪集中，耕地過小，和高利貸等痛苦。

總括的說，中國目前的土地問題之所以發生和嚴重化，乃是由於最大多數的土地爲地主所佔有，地主佔着此等廣大的土地，以之爲搾取和剝削佃農，與掠奪貧苦的自耕農之武器，他對於農民遂行封建的剝削，進而以其剝削的滋膏，肥大既成的所有的封建勢力，於是中國農業益趨衰落，農民式微，所以最大多數的農民皆感覺有爭取耕地使用之自由權的必要，使耕地歸於生產的農民所有，而廢止寄生的地主階級。這原是中國土地革命當前最急迫的任務。

像這樣的土地問題的鬥爭，很顯然的是農民爲獲得土地的鬥爭。其鬥爭的對立關係，乃是龐大的無土地及缺之土地的成千成萬的農民羣衆與獨占的地主間之對立。其鬥爭的意義，亦决不是爲像俄國那樣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土地所有者

消滅封建的領主之鬥爭，而是一種完全破產喪失土地的佃農與行將破產的貧苦小農反抗土地不斷集中的地主的鬥爭。其鬥爭的目的，乃是此等農民企圖獲得土地的自由使用和所有的權利，脫離封建地主的羈絆，使其自身不致夷沒於奴隸化的道程，得致由隸屬的地位轉變爲獨立的地位，耕地由地主之手轉歸農民自有的鬥爭。

如斯的革命性質，純粹是將農業經濟機構由前資本主義的階段，渡過到社會主義的階段，其間暫行的過渡的階段。其內容，還帶着幾分資本主義的色彩，在準備耕地國有之前，暫時之耕地歸農有。

第二，中國農業生產力的條件。中國農業因數千年來停滯於前資本主義階段之故，農業生產力微弱，生產方式陳舊落後，農民皆墨守陳法，孤立的單獨遂行其小農經營。並且就是這種孤立的小農經營近來亦因爲封建剝削之加強，尚岌岌的難於持續，何況新式的集團的大農經營，他們更是茫然的不解，而且甚或還將

誤認此種集團的大農經營爲與其原有的生產相抵觸，起而反抗。革命方終的俄國土地革命，卽遭過着這個難題。因之，在社會主義革命尚不能遽然成功，集團的大農經營之利益和經驗，一般農民尙未了解和習得，農業生產力尚未發展至使用機械和農場經營之先，必須於準備的過渡階段中，先行輕減農民當前的痛苦，以蘇其存在和發展的機運，然後迨至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際，農業生產力已經向上進展，始行逐行集團的大農經營，將土地收歸國有，徹底廢止土地私有制。惟在現在的資本主義革命的階段中，則須以耕地農有爲過渡辦法，消滅地主的獨占土地所有權，推翻前資本主義的基礎，恢複農村元氣，而發展農業生產力，始屬正確而合理的方法。當然在相當程度仍然是承認所有權的。

第三，中國革命的歷史條件。中國革命，很顯然的在未達到最終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先，必須通過一過渡的暫時的階段，這卽所謂反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革命而爭奪非資本主義領導權的農工平民革命的階段。現階段的中國革命，就正正是

在這個過渡階段的當中。在這個階段內的革命的中心任務，是肅淸前資本主義的殘餘，和準備社會主義的革命。例如這個時候的土地革命，當然是以推翻前資本主義之主要成份的地主，廢除一切封建的剝削關係，爲當前的最主要最緊急的任務。解放隸屬的被剝削的農民，使之獲得獨立自主之條件，崩潰地主經濟的基礎，而準備未來的社會主義集團農場之建設，自然也是這個階段中最有利而最有效的事業。所以這個場合，必然的是只能提出耕地農有的政策，至於耕地國有，則須留俟將來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

由於上述的三大條件之規定，是以在過渡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階段之耕地國有的階段之先，目前則須經過一暫時的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中的土地革命之性質，決不是如像土地國有的階段之徹底的廢除私有權之性質，而是在某種程度某種條件之下相當的承認土地所有權，主要的性質還在消滅前資本主義的經濟機構和封建的剝削關係，使生產的農民獲得土地的自由的使用權，因而

成為耕地農有的鬥爭。

關於這點，鄧先生曾經簡單的明確的說過：

「第二是根據現時事實的要求，因為應付封建殘餘及前期資本主義時代的整個生產關係，故首先使土地的佔有和勞作的矛盾和限制生產發展的障礙——即高度佃租農民無地或耕地不足的問題——得到解決。這就「耕地農有」或「耕者有其田的」原則。（遺著二四七頁。）

「我們為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必須達到土地國有的目的。但是在目前的階段如果立刻普遍的實行土地國有，則不但容易引起農民的反感，妨碍革命的進行，而且必然的因為生產技術落後的緣故，管理及經營均發生困難，以致民不能安心改良土地，生產力低落，甚至使農地荒廢。這樣不但不是提高農業生產的方法，而且會更增加農民的痛苦，使農民離村的傾向，比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所發生的為更甚。所以我們在原理上主張土地國有，而用耕

者有其田爲過渡的辦法。」(遺著二四八頁)

「我們的主張主要的是這樣：一方面實行大產業，關鍵產業及獨佔性產業的國營公營，以免產業資本家之自由剝削，一方面實行耕者有其田爲土地國有的過渡，以免地主的奪取和削剝。只有這樣才是合理的辦法。」(遺著二四八頁)

「我們認爲要消滅上述的現象，使農民得到解放，使全國的國民經濟向前發展，應有爲下的農業政策。而政策中的耕者有其田底辦法實爲實行農業政策的先驅。因爲一切政治的剝削所加於農民的結果是：土地更加集中，大小地主剝削佃農及僱農更加利害，農民離村的現象更加普遍。就是說，都集中於土地問題。在現時全國約30%的土地由佃農耕種，全體農民約50%爲佃農；佃租平均約佔主要生產量50%在現時嚴重的農村破產現象底下，如果無法首先使農村剝削停止，使農民返村，使農業生產行程恢復，則一切其他農

業政策，其至全國的政治設施都無從着手。而首先解決土地問題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實爲消滅農村的寄生，使農民返農及使農產業行程恢復的唯一手段。」(遺著二五二到二五三)

七　耕地農有的土地政策

根據上節的中國土地革命之階段性，和各階段的特殊性，所以鄧先生在現階段的過渡階段中，對於中國的土地革命，特別的毅然的提出「耕地農有」的土地政策。其項目如左：

『我們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具體方案與程序如下：

甲　立行宣佈耕者有其田的法令，不耕作的人不能有耕地。

乙　立行宣佈免納佃租，其耕作中的佃農及僱農可暫行保有原來佃耕土地的使用權與收益權，聽候詳細辦法解決。但地主同村並能實際耕作者，主佃兩方，暫時共享土地使用權與收益權，其形式以契約定之。

丙　由國民會議規定土地法，幷斟酌各地方狀況，分別規定農戶佔有農地的最高額及最低額。及國家收買土地定價法。

丁　在允許私人佔有耕地最高額以外的土地，應由國家以全國國有土地爲抵押，發行五十年長期土地公債，按照國民會議所規定的土地定價原則及各地方政府所決定的土地價格，收買歸爲國有。在最低額以下的土地，應強迫使其互相合併或加入合作社經營之。

戊　國家以外的公共團體所有土地亦按私有土地收歸國有法，由國家買收爲國有。

己　一切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的及其他反革命的團體的全部財產應沒收爲國有。

庚　所有一切收爲國有的土地應由土地管理機關按照土地分配原則及各地方標準負責分配於耕作的農民。原有佃耕的佃農，及無地的僱農，與退伍

的革命軍人等應有同等機會佃用土地，但只限於使用權與收益權。

辛　佃用土地而不行耕作，或怠工，耕作不力的農民，應被剝奪其土地使用權與收益權，耕作私有土地的農民犯以上條件則并剝奪其佔有權。

壬　不准私行買賣土地，必不得已時的土地佔有權及使用權的轉移按土地法得土地管理機關的允許而後行之。

我們一般的農業政策如下：

甲　消滅奇生剝削的大小地主，使不耕作的不能保有土地，而要從事耕作的人民隨時可以得到土地耕種。即是實行耕者有其田，使農民安心改良土地并提高生產力。

乙　改訂田賦，清丈田畝，依照各地收益情形及農民收益狀況，釐定稅制。

丙　積極的利用科學方法以振興水利，及一切農業改良的設備，發展內地交通，推廣農業教育及研究，辦理農業調查，廣設模範農場，務使各農村

均能進行農業實驗及改良的工作。利用國內外的資本廣設農民銀行，供給農村必需的資本。

丁 提倡及促進農業合作。利用生產合作，使各農戶能自由聯合行大規模的耕作，用進步的技術以改造農業。利用販賣及購買合作以消滅商業資本的剝削。利用合作以消滅高利貸。

戊 辦理國營及公營的農業，盡量的應用新的技術及經營方法，使農民澈底的明瞭大農業及小農業的利弊，使農民能逐漸的志願的由私營及合作的階段進入農業社會化的階段。

己 速行辦理移民及懇植事務，使人口與土地的比例能相對平均』（遺著三五三到三五六頁）

考察上列的鄧先生所提示的耕地農有之土地政策，可以得着這樣的幾個結論：第一，耕地農有的土地政策，乃是現階段的過渡階段之政策。

第二，其目的，在狹義的方面，乃是以生產的農民領有農地，而消滅不生產的寄生的地主階級，推翻封建勢力的基礎，肅清前資本主義的殘渣，在廣義的方面，則是以生產的農民領有耕地，而蘇生凋弊辛極的農村，安定農村社會秩序，發展農業生產力，準備農業社會化的條件，提倡農村合作社，以便逐漸實行集團的大農經營，和平的渡過於土地國有的社會主義之階段，所以是以土地國有為最終目的。

第三，其機能，則在保護生產的農民，特別是下層的沒有土地的農民。消滅朽腐的不生產的地主，尤其是大地主；廢止一切剝削和榨取的關係，由地租，捐稅，徭役，以至高利貸等。

第四，農有的意義，着重於耕地的使用權與收益權，至於佔有權則以國家專有為原則，於最小限度內嚴密地限私人佔有土地的佔有權。

第五，農有的程序，自耕農則以保持其原有的耕地之使用權與收益權為重心

；佃農與雇農以及由都市歸回農村而缺乏耕地的農民，則以分配耕地爲原則。惟佃農仍可保持其原有佃耕的耕地之使用權與收益權。

第六，耕地的收買，可分爲無代價收回國有，與有代價買歸國有之二種。反革命的封建殘餘與公共的土地，則屬前者。一般富裕的領有耕地的農民土地，則屬後者。

第七，耕地購買，只限於國家，私人不能購買任何土地；至於國家購買的資金，則以全國國有地土爲抵押，而發行五十年長期土地公債。其價格，則按照國民會議所規的土地定價原則，與各地方政府所規定的價格。

第八，耕地分配標準，則根據國民會議所規定的土地法，斟酌各地情況，而決定耕地佔有的最高額與最低額。又耕地不足而過小者，則國家可以強制令其相互合併，或加入合作社。

第九，農村金融，由國家設立農民銀行以司理之，嚴禁高利貸資本的活動。

第十，國家提倡或直接管理農業合作社，準備農村經濟的集團化社會化。同時國家又經營新式的農場，以爲大農經營之規器，此外，國家並興建農業試驗場，農業教育所；並且還開拓水利，便利交通，使未來的社會主義大農業得以圓滿暢適的實現，農業生產力激進。

總而言之，鄧先生的耕地農有的土地政策，完全是針對着現階段的中國農村經濟之病態。由於前資本主義的農業機構之存在，遂致阻礙中國農業之發展，加重農民之貧困與苦痛，而鞏固整個的中國封建關係之持續，是以如果不將此前資本主義的農業機構之基礎的土地制度變革，則一切問題均歸失敗。因而確定這個肅淸封建制度的殘餘，啓示社會主義建設的胚種之耕地農有的政策，對症下藥，以期中國革命的功行得以圓證。而且還規定種種實施可能的有效的施行步驟，以便此過渡階段得以早速渡過，而達於最終的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之目的。這實是鄧先生對於中國革命認識正確之處，對於中國土地問題把握的當之處，亦即是鄧先

生超人之處，偉大之處。

八　土地革命的主力問題

中國自古即以農立國，是數千餘年的龐大的農業國家，農民人口約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所以中國革命如果沒有這廣大的農民大衆之參加，則必不能成功，猶其是農村中的土地革命，更是與農民有直接的關連，更是必須以農民大衆爲革命的主力部隊。

中國土地革命行程中，農民所扮演的任務之重要，不單就農民的數量是國民人口的最大多數而言，即就土地革命的內容來說，更加表示出農民之重要超越任何級層的民衆。土地革命，不待說的乃是關係農民切身的利害和得失，而是農民因爲要求和實現其自身之利得，與減消其自身的損害，所發動的鬥爭行動。所以如果沒有農民參與的鬥爭行動，根本就失却了土地問題鬥爭的意義。單就這一點，就充分的證明了中國土地革命，是必須要以農民爲革命的主力的，無論其在現

階段的耕地農有的過渡階段，與在未來的土地國有的最終的階段。特別是在現階段中，關係農民的得失與利害至大，耕地農有的革命目的，純粹是由於農民自身的要求，苟農民不自己起來實現此目的，完成這個階段的革命，其將依賴何人？

加之，現今中國因爲帝國主義之侵略和封建勢力之迫害，國民經濟停滯落後，資本主義的階段不能即速轉變，工業尙以手工業爲中心，資本主義的工場工業僅沿海沿江等通都大邑次第興起，然爲數亦至少，以致近代的產業工人數量輕微，不能形成爲廣大的有力的革命部隊，甚至在有些時候，城市的革命鬥爭尙依賴農民的幫助和推動。中國工人的力量之微弱至此，故農民之參加革命因亦益增必要。事實上目前贛鄂湘皖諸省的紅軍騷動，完全是以農民爲中心的原始暴動，產業工人漠不相涉，不過，此等農民是被一般革命流氓所利用而已。

「肅清封建殘餘的土地革命，是須以農民爲主力」，這乃是鄧先生三次強調之點。

九　中國土地革命方式問題

總觀上述，可知中國土地革命現階段的性質，乃是生產的農民要求耕地使用權與收益權之自由的鬥爭，同時又是準備集團經營的社會主義農業生產之鬥爭。革命的目的，一方面，是努力於前資本主義的封建殘渣之肅清，他方面，是努力於非資本主義建設的領導權之獲得；至於革命的對象，毫無疑義的乃是以封建的地主，與乎以封建的土地關係爲基礎的土豪劣紳官僚軍閥，甚至與此等人羣有綿密的關係的帝國主義者等等爲目標的。

根據上述這幾點，很顯然中國土地革命的方式，乃是有牠獨自的特殊的方式，而不能牽強地以美利堅式，德意志式，甚至蘇俄的方式遂行之：

中國土地革命的方式，簡括的說，必須具備着下列的幾個要件：

（1）基於中國土地革命現階段的性質，不是絕對的否定土地所有權之鬥爭，而是沒有耕地或耕地不足的小自耕農佃農雇農等直接生產的農民，對於

佔有廣大的耕地之寄生的地主要求耕地使用權與收益權之自由的鬥爭，所以不能採取土地所有權之根本的揚棄之方式，而必須將取保護直接生產者之土地使用權與收益權的方式，同時在某種情形之下還須相對的承認某種程度內農民對於土地之所有權，例如在革命初期對於既存的直接生產的自耕農與半自耕農。在這個地方就顯明的暴露着共產黨之絕對的定否土地所有權之錯誤。

(2)由於中國土地革命他方又具有非資本主義建設之性質，所以對於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必須努力於次第的消滅，雖然在某種情形之下相對的承認某種限度內的所有權，可是在窮極的目標之下亦必次第的使之廢止，務期達到農民土地所有權一般的消滅，土地所有權國有之完成。在這個地方，又證明了現今資本主義的小農主義者之荒誕。

(3)雖然如此，中國土地革命縱然具備着資本主義革命的意義——農民對於

地主要求耕地的使用權與收益權之自由，同時更企圖由從來狹窄的耕地面積而擴大的耕地面積，由陳舊的小農經營轉變爲新式的大農經營——然而絕對不是資本主義的農民經濟體制所能實現，而必須要非資本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之實施始能完成，其理由乃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勢力之強大與中國農業資本勢力之脆弱，所以中國土地革命過程中的集團農業與農場經營，必須要在國家資本的經營和統制之下在此地又證明了美利堅主義者——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論的人們幻夢。

(4)中國土地革命之所以日趨嚴厲，乃是因爲封建的剝削關係之苛刻，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拘束，以及資本帝國主義之掠奪等，到使中國農業生產日增凋whose，農民日增苦痛，農村社會日增紊亂。中國土地革命當前的急務，乃爲肅清農業生產之障碍，改善農業生產之制度，增進農業生產之能力，減免農民生活之痛苦。因而土地革命的方式，決不能採取

破壞農村秩序，增加農民痛苦，減退農業生產能力的退嬰的自殺的方式。

(5)中國土地革命因爲具有階段性，因爲現階段乃是由前資本主義的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階段，所以現階段的革命方式，固然是不能採取改良主義的彌縫的方式，然而也不能採取機械主義的盲目暴動的破壞的方式，而是必須採取有組織的鬥爭程序，循序漸進的變革。

(6)根據中國土地革命是以中國農民爲最重要部份，中國城市工人數量與力量少極微弱，所以土地革命方式須以農民利益爲前提，而不能爲共產黨徒的強藉無產革命的方式，抹殺農民的利益。

(7)在現階段的農工平民革命的階段中，農民對於耕地的所有權之保持和要求，尚極堅強，不能遽然強迫的廢止，不然，則對於革命運行上必將遭遇種種障礙。共產黨的無條件的廣汎的沒收土地，就是常常遭遇農民

的強力的反對而失敗。所以在目前中國土地革命最初的階段中，暫時的對於農民耕地施行有代價有限制的買收耕地歸國有，比較順利而有效。自然，對於斯種代償品是有愼重考慮之必要。

(8)中國土地面積至爲廣大，農村經濟機構至爲繁雜，所以土地革命的方式，不能採取某種絕對的一定不變的公式遂行於全國各地，而須因地致宜，酌量當地的實況而決定其有効的方式。固然這種各地特殊方式必須與中國土地革命的總原則不違背。

上面八個主要的條件，乃是中國土地革命方式問題上不可缺一的，而且乃是中國土地革命自身必然產生的，非是一般公式主業的共產黨徒向第三國際之舶來品。關於此點，鄧先生曾經有這樣的一段話：

「第一，我們應該明白我們反對採取無條件的沒收土地的方法。我們認爲共產黨現時所採取的手段——燒田契鏟田界……燒殺等手段，不過是

代表極端感情的暴烈。而不是革命的正常的手段，却只是帶有無政府主義者的「否定」色彩的。我們認爲，政治運動及社會運動——特別是經濟制度的轉移，决不是用單純否定消滅的方式可以做到。而是要用有組織的爭鬥程序，才能向前進展，否則只有滅亡與消毀，得不到甚麼。這是我們和共產黨解决土地問題的方法上的第一不同點。

「我們認爲：中國的農業制度整個的說，是小農制。而其內部的矛盾複雜，實比任何國家爲利害。解决現時矛盾的主要着眼點當然要和整個的經濟政策——國家資本主義．．相適應，一方使集體化的根基逐漸建築起來，另一方面，仍然須設法獎勵生產力的提高，因此而個性的農村經濟還要在相當時期內允許其存在。共產黨所行的無條件沒收政策，不但會妨止農村生產力的維持和發展，而且根本和封建殘餘及前資本主義時代的中國經濟不相適應，如果鄉村農地無條件的沒收，則城市中的生產

工具，非同樣的沒收不可，如果共產黨只是沒收耕地(七地)，而不沒收城市的工廠，則似乎厚於工業資本而薄於地主及自耕農。城市及鄉村的生產工具，如果一齊沒收，則結果必陷於自殺，因爲中國現時所需要的不是共產黨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革命，而是平民革命，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有在資本主義的成熟期才能實行。而平民革命，則爲由前資本主義時代達到社會主義的樞紐和貭桿，不從整個經濟組織上去打算，以解決農民問題，以解決土地問題，剛是從一時問題的狹隘的報復感情着手，則解決了的只是「性的」發洩，而不是社會問題及經濟問題，所以我們反對無條件的沒收土地。

「第二，我們認爲：土地的重新分配及管理、必須由革命的政權機關去實行。甚麼是革命政權機關呢？當然在國有國民會議，在省，市，縣，鄉等有各該地方省民會議，市民會議，縣民會議，鄉民會議等機關爲革

命的政權機關。必定先要使農工平民掌握政權，使人民大家有了政權，然後土地的重新分配，及管理才能奏効，而且在過渡時期——卽全國或全省政權尙未完全在革命人民手上之時期——縣民會議，鄉民會議，實爲一最重要的革命政權底基礎，土地問題的解決，如果等待到全國的測量登記完畢才能實行，則不但爲中國地區之廣，交通之陋，非數十年後不爲功，而且土地關係之複雜及自然條件的分歧，更非舉國一致的標準辦法所能奏效。土地問題的解決，在中國我們很明白的認識，是帶有強烈的地方性的，而且是急迫不能久待的問題，必須立時去做才行。因此，地方的政權機關，特別是縣民會議及鄉民會議，實爲履行本黨土地綱領的基礎。總括起來說：我們解決農民耕地問題的方法是着重在用政治的手段，而不是用沒收的手段。所謂用政治的手段，是以革命的人民——農工平民得到政權爲前題，當然不是依靠那些大人先生新舊士大夫等

統治者和半統制者的恩惠和慈悲，更不是等待眞命天子的出現」（遺者二五八——二五九）

十　農村經濟與都市經濟均衡問題

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第一不均衡的現象，卽爲農村經濟與都市經濟之不均衡，都市經濟因爲工商業飛躍的發展而漸達於完成之域，可是農業經濟則因農業制度之障礙與農業生產之落後而停滯退化，都市支配着農村，農村附庸於都市。農村經濟與都市經濟的均衡關係如斯破裂的結果，必然的將要發生下列的弊病。

第一，破壞國民經濟之健全的完整的發展。

第二，農村隸屬於都市，都市因可將其負担與損失轉嫁與農村，都市成爲農村的支配者和剝削者，加重農民的痛苦和增進農村的窮困。

第三，終於因爲農村之落後和窮困，而阻礙都市圓滿的發展。

第四，農村凋弊，生產減退，爆發食糧不足的恐慌。

這種現象，特別在中國農村經濟與都市經濟問題更是顯著和嚴重。所以鄧先生在討論中國土地革命各主要問題之後，特別注意提出這個問題，並且還樹立了種種方策以解決這個問題。他說。

「商工業支配農業，及城市支配鄉村的現象，是資本主義社會內一般的傾向。因爲在大量商品生產經濟破壞了自給自足的經濟之後，那些握着大量商品生產權的城市商工業者，自然會在實際上支配並壓迫那些難行大量生產品的鄉村農業。結果，城市繁榮，農村凋弊，城市膨脹，農村萎縮，城市集中，鄉村冷落等現象，便不可避免的發生出來。這些現象，從工業化的觀點上看來，雖然是進步的，然其從人口及食糧政策的觀點上看來，却是反動的。爲什麼反動的呢？因爲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的不均衡的發展，一方面會引起國內食糧不足，民食非依賴海外不可的畸形現象（如像英國）；在另一方面會引起困難的剪刀問題（農工業發展步驟不一致的問題），使社會主義建設

的路上發生巨大的障碍(如像在蘇聯)。

我們認爲，在這經濟落後的中國，城市的繁榮，膨脹和集中也是必然的趨勢，然而我們却須得並且也能夠預防農村的凋弊，萎縮和冷落。我們一方面要用合作社的辦法，防止農村之被壓迫被支配；一方面要用金融政策及租稅政策調濟城市和農村間的不均衡的發展。我們認爲在消極的防止和積極的調濟兩種政策下面，一定可以免除國內食糧不足的毛病，一定可以解決困難的剪刀問題。」(遺著三六六頁)

十一　結論

綜合上述各節，鄧先生對於中國土地革命的主張，可以簡略如下：

第一，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鄧先生確定其爲前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猶其是過小農經濟。

第二，中國農村經濟的危機，鄧先生確認其日趨嚴重。這種危機的表現，認

為是農村經濟的總崩潰，農村秩序的大紊亂，農業生產力的銳減，農業技術的停滯和退化，家庭小工業與出稼勞動的減退，農民的極度窮困，收穫減少，荒田激增，災禍頻仍，餓莩載道，死亡劇增，盜賊充斥等等。

第三，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原因，鄧先生闡明的是：外則由於資本帝國主義之侵略，他們是以資本，工業品與農產品各種方式，直接的破壞中國農村，而且還間接的支持中國的封建勢力助長內亂以摧毀中國農業；內則在經濟方面乃由於中國數千年來的前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之束縛，在政治方面是由於封建的中國官僚政治之迫害，在思想方面乃由於中國的宗法思想之毒禍。

第四，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狀況，鄧先生特別的將中國農業經濟的四大典型區域——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四區——各作一縮影圖，以明瞭其一

般。

第五，中國土地革命的意義，鄧先生承認其爲「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亦無大過，」確認其爲中國革命最首要的問題。

第六，中國土地革命的階段性，鄧先生是最強調而最正確的理論之中心點。他確定中國土地革命，必須先經過現階段的耕地農有的過渡階段，始能進到最終的耕地國有的最後階段。

第七，中國土地革命的性質，鄧先生主張應區分二大階段。在現今農工平民革命的過渡階段中，中國土地革命的性質，乃是無耕地與缺乏耕地生產的中小自耕農佃農雇農等對於寄生的地主要求耕地之使用權與收益權之自由的鬥爭，這種鬥爭很顯然的是資本主義革命的性質，具有肅清中國前資本主義的殘渣而使農業生產力改進，準備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任務；在最後社會主義的窮極革命階段中，土地革命的性質，乃是根本揚棄

土地私有權而將土地完全歸國有，實現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

第八，中國土地革命的目的，鄧先生力倡在現階段的過渡階段中，主要的乃是實現「耕地農有」；在最後的階段中，則為完成「耕地國有」。

第九，中國土地革命鬥爭的對象，鄧先生指示出，在現階段的過渡階段中，主要的是寄生的剝削的地主，與乎土豪劣紳官僚軍閥，以及帝國主義者；在最後的階段中，則為一切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之佔有者。

第十，中國土地革命的政策，鄧先生毅然的，在目前的過渡階段中，提示「耕地農有」的政策；在最後的階段中，則提示「耕地國有」的政策。

第十一，中國土地革命的主力問題，鄧先生特別的注重於農民。自然，這並不是拒絕農民與工人的聯合，而是力言農工平民大衆必須強力的聯合，同時更希望農民學習工人的鬥爭技術 ， 把握工人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

第十二，中國土地革命的方式問題，鄧先生主張中國有獨自的方式，而不能生偃的採用舶來品。中國土地革命的方式，必須依準中國革命歷史的與客觀的條件之規定，循據一定的階段，先由有組織的次第限制和減少土地私有權的有效的方式，漸進於根本的廢止土地私有權的最終的方式。

第十三，中國農村經濟與都市經濟均衡問題，鄧先生對於這個最后的問題，提出利用合作社的方法以防止農村之被壓迫和被支配的消極的政策，利用金融與租稅等政策以調濟二者之不均衡的積極的政策。

上述的十三端，乃是鄧先生的中國土地革命論的核心，同時也是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天經地義的眞理。偉大的鄧演達先生，竟能於衆人昏瞶盲目的環境中，獨闡明這種卓絕的正確的革命眞理，指示過去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之不是和錯誤以致中國革命之失敗，企圖中國農工平民大衆皆能把握這個眞理而使中國革命

得以完成。雖然而有不少的盲目和荒謬的人們意識的或無意識的不了解這個眞理，對於鄧先生妄加毀謗，然而眞理始終是眞理，年來中國革命的進展完全證明了鄧先生的中國土地革命論正確無誤。因之鄧先生的偉大益加爲全中國的國民所認識，特別是全中國的農工平民大衆更是欽佩崇敬鄧先生不已。不幸！鄧先生在中國革命的中道遽作了革命的尊貴的殉教者！不能看見他的主張之實際的成功，這眞是一件最不幸而最慘痛的事！可是，他的中國土地革命的理論乃是絕對正確的。將來一定有依準他的主張完成中國土地革命，收穫莫大的革命成功之一日，我們很希望這個時日早速地到來，以慰鄧先生在天之靈！紀念鄧先生於不朽。

（完）

復興中國革命與勞動大衆的出路

紹揚

——爲鄧演達先生殉難週年紀念而作——

一　一九二七前之中國工人

社會進入某一階段，因着生產關係的變化，人羣間遂漸漸分裂，成爲兩個不能融和的營陣，一面是經濟上佔優勢，操持生產工具，從而宰制一切的統治者，一面是失去了經濟自由，全靠出賣血汗勞動以換取生存，從而在政治上或社會地位上都不能抬頭的被統治者。這樣的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已成了整個世界體系——資本主義體系，各國工人，盡陷於同一不幸的境遇。尤其是中國，所有勞動大衆，除去生產工具所有者之種種壓迫剝削外，還遭遇着毫無窮盡的殘酷毒害。由於中國具有半封建社會和半殖民地國家的特殊性，軍閥和帝國主義，同樣是殘害工人的能手，他們對於工人，全離不了屠殺，比之各國資產階級的改良欺騙，

尙落後很遠。在帝國主義軍閥合力統治之下，中國工人生活的苦痛，可說是空前的悽慘！

同時，因爲中國的社會經濟，還停滯在農業手工業生產階段，大規模企業方在萌芽，勞動市場是非常的狹隘，而隨着農村經濟的崩潰，農民離村的現象反益形普遍，於是乎城市失業人口，其數量之多，又爲任何國家所無。廣大的失業預備軍，雖是喝望着產業興旺，甯願無償勞作，祇求生命的苟延，然而這個恐慌，始終不曾減殺，反隨國內社會秩序的混亂而越趨嚴重。

在資本主義國家，向工人身上榨取的，僅有資產階級，而在中國，帝國主義和軍閥，不止會得向工人屠殺，還須直接間接向工人剝削，因此，我們的工人，是在三層搾取之下過日子。這就可以聯想到他們，卽使幸而參加生產，所享的待遇是如何惡劣了。以工作時間論，普遍長到十四小時甚至十六小時，十小時制，幾乎絕無僅有。以勞動貨銀論，有許多是全無報償，重力工作，每日不過三四角

，工人雖是不停的勞動，絕對不能解决一家數口的用費。以言其他待遇，工人好比牛馬，完全沒有自由，怠工罷工，當然談不到。因病缺工，照例扣薪；未滿十二歲的兒童以及產前產後的孕婦，任便可在作場裏看到；工作地毫不注意衞生，空氣惡濁，設備簡陋，時疫惡症，特別容易傳染，工人死亡，從無所謂撫卹。而資本家可以任意開除工人，毆打工人，或者勾通軍警實行逮捕槍殺！至於勞動保險等改良辦法，資本家和軍閥，做夢也不會想到。由這一些情形，我們很可明瞭一九二七前中國工人地位的險惡，是怎樣的不能容忍了。

果然，就在資本家，軍閥，帝國主義的環攻中，中國工人竟在其他被壓迫羣衆之前，澈底地覺醒了。他們潛伏在一切惡勢力之下，開始了對抗強盜們的組織，整齊了自己的陣容，準備了牠們的力量，知道唯鬥爭利器，可以打破不平等，洗除以往的恥辱，從而爭回他們應有的人格和主權。在以往，他們祇懂得敵人的強大兇惡，不敢觸犯，到這時，却已全然擺脫了這種怯懦心理和謬誤見解，認識

出自己週圍，有着強大的友軍，只要新興力量配合起來，毫無疑義是可容易衝潰敵人的。

中國工人有了這樣的決心和覺悟，工會運動，乃應運此生，並且由組織而行動，不斷地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執行了轟動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反帝反軍閥的流血戰爭。所有二七鬥爭，五卅慘案，粵港大罷工，以迄各地時刻爆發的政治罷工或其他武裝行動，幫助北伐軍事的進展，漢潯等處租界底收回，都在中國革命史上留着最光榮的一頁。於今回想起來，眞使我們驚嘆中國工人力量的偉大！雖然我們不能忽視廣大平民的革命威脅，但在英勇的戰士中，工人却是最重要的一羣，成爲革命隊伍裏的急先鋒。我們敢說，一九二七前的國民革命，如若不發動這一主力，是不易有那般順利的。

試想當時的北洋軍閥，是有成百萬的大軍聯合着向革命陣線進攻，力量何等雄厚！鬥爭屢起屢仆，在軍閥鐵騎下慘遭屠殺的，可以血流成河。然而工農和廣

大革命平民，毫不因此鬆懈，反而益加堅決，沸騰全國的革命勢力，畢竟融解了北洋軍閥體系，送他們一個個上了坟墓，北伐不滿兩年，吳佩孚，孫傳芳等軍閥巨頭，盡成了可憐的孤魂。這樣的結局，很顯明地指示我們：革命羣衆和反動軍閥力量的對比，是相差天遠，隨着羣衆反抗情緒的高漲，軍閥罪孽的深重，只消一個總動員，就必然要打得牠落花流水，使牠永遠翻身不轉來。

帝國主義，也是一樣的紙老虎，不管牠們的武裝進攻是如何嚴重，但一遇見中國民族鬥爭抬了頭，自動地實行收回租界，實行廢除不平等條約，便祇嚇得發抖，呆着窮於應付。平時兵艦政策，飛機政策底救急方法，牠們明知道是白費氣力，所以結果逃不出降服，任聽主人翁主持。收復了的潯漢租界，我們看不見半個外國奸細的影子，只有工人和革命大衆在歡呼勝利。一九二七前革命高漲時，情形是全般如此，撫今思昔，應該誰也有發訴不盡的感嘆！

特別關於工人階級本身利益的，是藉着工運高漲而得來的工人地位的興起。

以前工人處在資本家的淫威下，簡直是像牛馬般過活，勞動者待遇，全由資方意志來決定，勞動者唯有絕對服從的義務，勞動關係是建立在純全的殘酷剝削制度上。直到一九二七前幾年，工人敢以罷工武器威脅資本家，並有各業工會，總工會主持互助，要求訂立合理的勞資契約，減少工時，提高工資，改良一切待遇，於是舊的悲慘境地方有相當變更。固然資本家此時是不心願讓步，或者竟僱用走狗在工會內部破壞，對策極其毒辣，但在罷工運動成爲日常經驗的險惡情勢下，他們畢竟非屈服不可，而由勞動者同意的勞資契約，終於普通地在各城市中成立了。

這所謂的勞資契約，雖算不得工人要求已全部實現，確也是當時工人自身力量換來的一種新產兒，有了這種張本，勞動者已不似從前的散漫，馴服，易於支配，一九二七年後層出不窮的罷工運動，應該就是依此而生的結果。由此，我們又可知道，一切對國內階級鬥爭(被壓迫階級與壓迫階級)予以否認，抹殺，或者

高唱勞資協調的人們，全然是違背事實，冀圖犧牲工人既得利益，從新穩固資本家暫時自由搾取的地位。實際上，階級鬥爭，已成爲燎原之火，眼見燃燒及整個中國，一九二七前所下的種子，非但摧殘不了，而且成長得很迅速，工人對於自身利益的保持和擴大，是具備了堅強的信心，認作了日常要求，這是很顯著的客觀事實，除非盲目，不致至於看不清這個。

這是從正面說明多層壓迫，剝削下的中國工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是怎樣由覺醒而組織，由組織而行動，並且在革命高潮中獲得些甚麼利益，而於他們爭取解放的前途，又能有甚麼影響。不過正爲工人快要抬頭的緣故，又促成了新的反動，罩上了新的黑暗，加重了新的恐怖！在這一個情勢之下，中國工人利益是和整個革命被斷送了。革命失敗之後，由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等反革命成份集大成的南京政權，所給與中國工人的苦痛，竟比北洋軍閥時代重什百倍，老百姓們爲了挨不過致命的磨難，居然有人發出甯願回復舊統治的嘆聲來，這就可

想而知南京統治的反動了。究竟南京統治爲甚麼這樣反動，工人和革命羣衆爲甚麼不能以肅淸北洋軍閥的手段推倒南京統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二　南京統治與中國工人

要答覆第一個問題，中國革命導師鄧演達先生指示得很明白。他告訴我們說：中國革命之失敗是由於革命領導的矛盾（鄧演達遺稿一三四頁）。在一九二七年武漢政府存在時，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領導并行存在，非但談不上強固和統一，而且一切路線，都是公開地向着敵對的方向發展，即是一方完全投入豪紳地主的懷抱，另一方踏進了盲動空想的道途，政府設施，始終動搖不定，沒有明確的政綱可以依據。國民黨的領導權既爲豪紳地主高利商人所篡奪，而城市工人以及一切被壓迫民衆，又先後組織起來，已開始着處處與上層利益衝突的工作，於是這種聲勢，使國民黨懾服了，他們人人都感到不安，感到僞的種種快要動搖，結果他們只好藉口「羣衆運動過火」，拋除僞善的面孔而實行鎮壓，屠殺（例如馬日事變）

。同時，中國共產黨亦乘此機會，威迫刼持，他們以爲國民黨領導的反動，卽可不顧中國特殊的社會條件，不需要農工平民聯合的政治組織，直接轉入第三國際的指揮下，開展共產主義革命。因此武漢政府塌台了，而革命的一角，也就遭着空前的挫敗。

武漢政府的塌台，是形成南京反動統治聲勢之助力。鄧先生說：『南京統治初行建立的時期，包含着無數的南北軍閥在內，因爲……要對抗民衆，不能不與一切舊勢力合流。』（前書一三六頁）這就是說，南京統治雖以買辦資產階級爲核心，但買辦資產階級力量薄弱，缺乏自己的武裝，所以牠只有復古，從新團聚新舊軍閥。湘鄂地主軍閥，既是同聲相應，幫同向民衆屠殺，制服了最後的革命威脅，必然要形成軍閥武裝大聯合，因此，南京政府遂完全成爲反動大本營。

關於第二問，鄧先生所提出的正確答案是這樣：『……革命一開始，就必須進行革命民衆本身的武裝組織以準備反抗敵人，反抗反革命武裝，及消滅反革命

的武裝。一九二六年的北伐，名目上雖然一切軍隊都戴着「國民革命」的名號，而實際，則除極少部份係自由革命意識的軍官統率着以外，大多數隊伍都是由舊統治者的武裝和流氓式的武裝改裝過來的。新成的隊伍（如黃埔學生所組成的，）也祇是意識上比其他隊伍強些，實則在代表舊社會勢力的領導——如蔣介石——下面，剛剛起來或者快要起來的人民，依然是赤裸裸地站在下面聽候命令，毫無武裝力量。極少數的所謂工人糾察隊或農民自衛軍，或者因爲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面，增加了革命領導的矛盾，或者因爲本身的脆弱，表現不出甚麽力量來。……在這種運動中，……決心爲人民犧牲的黨徒及官兵，一因數量太少，不能超過反動的勢力，二因領導權在舊勢力手中，不能掙扎出來，所以一天一天的隨着社會勢力的轉變，隨着反動勢力的抬頭，整個的陷入舊統治舊勢力的深淵裏而不能自拔。」（前書二三〇——二三一頁）又說：

『中國共產黨過高地估量中國社會，而用社會主義革命手段去行動，結果使

城市的工商業者被壓迫而入於反革命的道途，而鄉村中的自耕農也被迫而流於放逐流浪的地位，使城市及鄉村的生產機能窒塞，使人民的生活降低，使土豪劣紳及貪汚殘暴的官僚軍閥更容易得到脅從的成分。（遺稿二四二頁）又說：

『中國平民大衆，完全沒有武裝，而反動的統治階級，則由頭到脚都被長槍迫擊礮包裹着，一天到晚磨牙擦爪的去刼掠人民。其次因爲交通條件的缺乏，和由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文化的落後，使平民的團結發生極大困難。這就是反動統治所以比較能維持存在底緣故。』

由此可得出兩個結論：即一，工人和革命羣衆沒有發動眞正自己的強厚武裝，沒有可以十足對抗敵人的軍事預備，所以一臨到慘無人道的白色恐怖，他們就窮於對付，祇好束手就縛；二，玩弄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理論上是機械的左傾，抹殺社會客觀條件，行動上是取消人民現實要求，加深革命危機，阻礙革命運動前進，使大多數比較落後的羣衆對革命灰心或懷疑革命，而反形成似乎利於反動

統治的影響。鄧先生從事實的分析給與我們這些指示，那我們——復興中國革命者——就應深刻認定當前的任務是怎樣去準備革命武裝，怎樣使革命武裝既不同於前時革命青年軍人感情式的領導，又不同於流氓無產者危害農村生產秩序的游擊戰爭和燒殺政策，與怎樣以革命武裝開始實際爭鬥——這幾個嚴重問題。

以上祇是籠統地略論南京統治底由來，至於中國工人在南京統治下所遭遇的命運如何，這裏須加以說明。

雖然表面上，南京統治者時喊擁護工人利益，扶植工會運動的口號，但是這祇能證明他們對於工人的進攻，更比北洋軍閥進步。北洋軍閥只曉得露骨的殘酷屠殺，不會站在工人階級裏來分散工人組織，取消工人要求，反動的南京統治者却除爲屠殺工人的劊子手而外，又復驅使走狗，躲藏在工會之內，加緊工賊的活動。這班東西，在每個合法工會裏，都有其特殊地位，工會領導操在他們手上，一切使由他們擺佈。因爲他們是與資本家接近，或者可說是資本家派來的奸細，

利益當然與工人階級所爭者懸殊，所以每遇工潮發生，南京統治者便令御用的工會協助資本家極力鎮懾。近幾年來黨政機關忙不過來的所謂「勞資仲裁」，所謂「工潮調解」，充其量不過是和平的欺騙而已。我們根據多次調解的經過，常見鬥爭因此平靜，工人的要求却是極少有實現的。甚至敢說黨政機關多出力調解一次，資本家和工賊的兇燄也增高一次，而工人生活，則越陷於悲慘之境了。

這樣，工會非但不使資本家害怕，反而是他少不得的支柱了，因爲有了工會，他可以有恃無恐，可以預先任意開除富於反抗性的搗亂份子，可以藉助工人內部的不調協而作有効的對付。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在反動統治下就沒有眞正工人自身組織的工會，而每次的鬥爭運動，都是蒙着欺騙而一蹶不振了；不，決不，中國工人經驗過一九二七年的寶貴教訓，經驗過暫時的勝利，他們是不易被騙倒的。事實上，潛行的革命工會，在工人羣衆中樹立了堅實的基礎，工人鬥爭時能起領導作用的不是公開的御用工會，而是藏在地下的，時刻被資本家，工賊，窺

政機關目爲敵人的那種工會。工人們在這種工會之下，確能無畏地以階級利益的前提，緊按着自己的鬥爭綱領行動。他們固然不害怕獸性的鎮壓，也早擺却對於統治階級的幻想，透澈了狡猾陰險的種種花樣。故此反動統治者雖自以爲得計，而大大小小的鬥爭，轉如潮湧地比以前澎湃。

這裏有一點要留意，即是「眞正工人自己的革命工會」，並非中國共產黨所謂的「赤色工會」，赤色工會雖與統治階級御用的工會不同，但其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只盲目地追求未來的空想，忽略了歷史現階段上的要求，他們發動工人鬥爭，不是爲着解放工人，爭取工人的利益，而是替第三國際賣力，希冀在中國發揮共產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的獨裁政權。因此，每逢工潮發生，他們如有機會參加，常以誇大狂煽惑工人盲動，使工人得不到實際利益。顯然的，在赤色工會被認識爲兒戲工人現實要求的時候，羣衆定不受指揮，實則脆弱無能的赤色職工組織，也夠不上指揮誰。至於其他藉工會運動冀圖勾串工人而尋求個人出

路的，那更不必說是可恥無聊，與御用工會爲一邱之貉，早已遭了工人的鄙視。只有眞正爲工人自身謀現實利益，而且瞭解怎樣去取得現實利益的工會，纔是我們所謂的革命工會，目前復興中國革命者的任務，就是要號召全國工人，團結在革命工會底下，爆發全國範圍的爭鬥。

現在再回轉來說：因爲反動統治階級是比北洋軍閥更惡辣地對待工人，整個工業生產勞動者的苦痛，着實不堪言狀。人們只看見農村經濟破產，勞動市場如前狹隘，發生了城市中的勞動過剩，失業羣一天一天激增，在失業恐慌下添了許多餓死，凍死，賣兒，自殺的慘痛事實，却不注意在業工人，一樣是挨餓挨凍，活過着地獄生活。今年以前(今年一般物價較低，秋季米賤，是偶然現象，)工人生活必需品的物價指數，比較一九二七年高多了，而工資則是一般的比那時減低，即有少數仍繼續原狀，資本家常借口無法維持，用多種方式削減勞動報酬。同時，工作時間，多半是比從前加長，否則減少工時勢必隨之減少相當的工資。其

他待遇，從罷工工人的呼聲看來，幾乎沒有那一方面不比從前越發惡劣。國民黨第一二次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七年的勞資契約，武漢政府時代的勞工法規，都被反動的南京統治撕毀完了，現時的工會條例，只是統治者束縛工人的工具，在擁護反動統治利益之最高原則以外，工人是不能有行動自由的。上面說過，御用工會底設立，完全爲着消弭鬥爭，所以工潮若是嚴重，不能以欺騙手段應付，軍警彈壓——直接的武裝干涉，遂爲照例不可免的結果。在這樣的防範嚴密之下，凡是工人領袖，都免不掉犧牲，因而越加使工人階級認識南京統治者是屠殺工人的劊子手，是他們尖銳的敵人。他們由以往的經驗，證實最後勝利一定會屬之自己，所以反動勢力儘管囂張，而愈趨愈烈的反抗情緒，卻連比較落後的份子中都具滿了。無疑地，隨着復興革命運動底高漲，勞苦工人必然能配合平民大衆，澈底摧毀反動統治！

三　新力量的準備

革命是被決定於客觀社會條件，只要條件成熟，革命情緒即使偶而低落，僅可證明革命途程是在曲線地進行。一般人以爲國民黨既崩解腐朽，成了軍閥官僚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總機關，共產黨又破碎零離，踏入原始盲動，中國革命的流產，今後一定復興不起來，這種見解，無疑是萬分的謬誤好笑，站在革命利益上，竟可說牠是取消革命，背叛革命！

本黨領導鄧演達先生，首先認清了這一點。武漢政府還未正式宣告下場，他便肯定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包容有不能担負完成中國革命任務的內在危險，而一定的歷史行程，却又必然要將中國推入新的方向去。繼續接受這個歷史任務而仍肯邁步前進的，唯有在當時再度陷於地獄生涯的廣大農工平民，在高度的剝削和壓迫下，勢必使農工平民加深地覺醒，更迫切地要求解放，要求以自己政權保障自己的生存。他的正確見地，一面獲得革命羣衆的擁護，一面更堅強了他自己的勇氣，所以在一般人對革命悲觀的時期，本黨遂應運而生，努力於農工平民政權

的準備。經過這五年的奮鬥，黨的政治口號，雖不敢說普遍到每個羣衆，使每個羣衆都具體地認識本黨，但是復興中國革命的種子，確已早就散佈全國了，廣大農工平民理解本黨是為他們爭取解放的唯一代表者，一齊緊張起來，熱烈地在本黨指導之下從新展開了鬥爭陣勢，一切悲觀論者，也在本黨飛躍的發展中消除了舊有觀念。

不幸去年今日，這位全國農工平民的導師遭了萬惡軍閥蔣介石的慘殺，使我們頓失指導，這是中國革命的損失！全國農工平民大衆的損失！在沉痛地紀念鄧先生的今天，論述鄧先生手創的遺教，我們是要如何感到興奮啊！

我們可以告慰鄧先生的，唯有堅強的信心和一刻不斷的努力，在新力量的準備過程中，鄧先生所交於我們的披荊斬棘的革命大業，快要衝破反動營壘，獲得最後的勝利！

鄧先生死難後，一切反動勢力更加狂跳得利害。國際帝國主義者獨佔中國瓜

分中國的戰爭，一天天在展佈，日本帝國主義，巳侵佔了東北，而且還在積極進攻，英法帝國主義奪取西南的陰謀，亦日形露骨，美帝國主義的金元統治，更因去今兩年的幾批米麥款借而加深，強盜場合的國際聯盟，自調查滿案的報告書發表後，竟昌言共管滿洲作爲共管中國的先聲，在日本尖端強硬外交政策和日內瓦新外交政策決定之後，中國所處的地位，顯然是越發險惡，換句話說，國際帝國主義間雖有不少的矛盾，但牠們都是瘋狂地想奪中國市場，矛盾是減輕不了兇惡的進攻的。

在這種險惡局勢下面，反動的統治階級，只曾無恥投降，以出賣民族利益作爲苟安反動政權底交換條件，所謂「不抵抗」，「長期抵抗」，「倚賴國聯」，「安內方可以攘外」等外交政策，全是一套賣國眞本領。中國農工平民和革命士兵所英勇担當的民族抗日戰，以及普遍全國的對日經濟絕交運動，反動統治階級非但不予鼓勵援助，反而稟承帝國主義意旨來盡力破壞。無論統治者怎樣狡辯，

事實是人所共知的鐵證。

轉來看看國內被壓迫的大衆，在這一年中，切身苦痛，直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經過幾次帝國主義的砲火，十七省的大水災，殘酷燒殺的共禍，粵，贛，川，黔等省的軍閥火併，火上加油的新奇剝削，米穀慘落的意外，工業生產範圍的縮小，他們是日深一日地陷於死境了。然而這是反動統治葬送自己的條件，農工平民大衆的勇氣已在此際倍增了，革命鬥爭已成了農工平民的日常經驗，本黨所負的使命，因之益加緊迫而繁重，從今天起，我們急須把這復興中國革命的新力量總動員，創造一個新局面！

工友們！革命的急先鋒！時機到了，我們要在革命前夜，快些準備開闢道途的武器！殘害欺騙我們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只會置我們於死地，要爭取出路，唯有學習鄧先生遺教，農工永遠聯合，認透無產階級獨裁政權的謬見，努力為實現農工中心的平民政權而鬥爭！

四　農工永遠聯合的理論和實際

學習鄧先生遺教，是每個工人的義務，不過遺教全部不是一下就可貫徹的，這裏我們只就「農工永遠聯合」這一句論斷加以說明，指示全國工人應怎樣行動。

在理論方面，他從國內人口構成及農工業生產底分析，認定中國社會經濟結構，『還是在農業手工業生產的階段中，在這階段中，地租雖然以土地私有及自由買賣的形式發生出來，而實際上主要是由政治掠奪發生的。商業資本的高利貸及不等價交換，雖行着極凶暴的累積，而不過是工業資本發生以前的現象，並非近代資本主義的本質。其他官僚的剝削及苛細捐稅，也是封建政治的附屬物，與貢賦徭役實無二致。微弱的本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一方面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競爭，他方面因爲農村破產的緣故，得不到市場，所以不但不能發展，而且最近有日形破產的現象，因此，中國社會經濟……無法過渡到一個近代資本主義生

產（工業資本）的新階段。』（遺著三二〇頁）

因爲中國社會有這種特徵，所以被壓迫剝削者不祇是無產階級的產業工人，而是廣大的農工平民，不過產業工人政治覺醒較深，鬥爭經驗較富，可稱革命營壘中的骨幹。鄧先生在「告世界革命民衆宣言」上說：

『佔全人口約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尤其是佃農及傭農，他們已苦無土地可耕，即重租所佃之土地，其生產所得之餘，亦爲刼奪征取殆盡。因此顛沛流離，無以爲生。……他們由各個鬥爭失敗之經驗，必能於最近與城市之革命勢力重心聯合，以作大規模組織的解放鬥爭。他們的勢力，必爲中國革命的重要成份新興產業工人，數量雖較農民特少，而因其生活刺激較爲強烈，及經濟政治環境惡劣之故，其對於政治的覺醒程度，實較任何階級爲高，其爭鬥決心，實較任何階級堅決，其對於革命之貢獻，已爲數年來中國歷史上不可磨滅之事實，他們必爲中國革命之機輪。手工業者小商人的政治覺醒，不如產業工人，而在鬥爭之必要上，

他們必須在城市或鄉村中加入革命行列。青年學生，百分之九十九出身窮苦破產或將破產之家庭，一方面無求學機會，他方面無謀生方法，故除一小部份爲舊勢力所刼持收買利用以外，大部份必須走入革命的隊伍。因此，中國被壓迫剝削的革命民衆爲工，農，手工業者，小商人及青年學生，其對抗的仇敵爲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地主，土豪紳士及其他相結托之高利資本家。』（遺著二八八——二八九頁）

鄧先生一面替我們指示出革命的同盟者，另一面認定農工是革命重心，所以爲使同盟堅實，工人和農民，特別要融成一片，不許有任何的階級隔閡，影響革命同盟鬆懈。而且這一聯合，不祇在革命鬥爭中爲然，即到新政權樹立，還須共同扶助生產工業化，社會化，一直進到農工一體，或者無分農工，即是說，工人與農民，祇有職業上的不同，沒有意識身份上的不同。否則，一切反動勢力是在聯合向我們摧殘，而我們却各自分野，有意不使革命力量集中，這簡直是自取滅

亡。中國革命，不害怕反動統治的恐佈，却最怕革命者自己誤中這種流毒。農工永遠聯合這口號，全國工友們要緊緊記住！以此攻破一切的幻想和謬見！

在實際行動上，所謂農工永遠聯合，並非工人屈從農民，忽視工人的迫切要求，反之，使着他們的要求更容易實現。例如總同盟罷工，如果是有革命的同盟者援助，同時在城市近郊發動農村鬥爭，在城市裏實行罷市罷課，使統治者顧此失彼，其成功一定較單獨的工人罷工之孤立無援大。我想富於想像力的工人，在共產黨盲動政策下玩弄罷工或城市暴動所遭的慘敗，必然記得深刻，完全是由故意忽視同盟者力量的結果　罷工或地方暴動如此，整個革命運動，自然更不用說了。工友們起來！永遠與農民兄弟攜手，合着全國平民的步調，殺進反動統治者的老巢去！

五　解放工人的具體方案

我們以爲激底的工人解放，是有待於本黨前途——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底

，只有無階級的社會，纔是我們期望的合理社會，但在目前，工人是一刻不容緩地要過安全生活，所以在適應過渡階級的整個政策裏，又必須施行種種勞動政策，以救濟社會上現存的弊病。

在本黨政治主張上，曾提出：「竭力改良工人的生活，確定女工童工保護法，危險工作保護法、地下工作保護法、確定八時間工作制（地下工作六小時），確定工人罷工權、確定施行工場法，使工人逐漸參加生產管理。施行種種社會保險，成立職業介紹所，規定工資與生活增加的比率、縮小勞心勞力者薪俸的差額。」並主張：

用集中資本的統一計劃，建設大規模國家產業的基礎，大規模企業必歸國營或公營，私人企業，只許在輔助國有公有產業進行生產的原則下作小規模經營，以消除私人資本蓄積的弊害；同時必須推行生產協作，以防止並救濟生產者脫離生產手段的弊害，養成生產者管理產業經營產業的技能及共同生活的習慣，逐漸

促進產業社會化，而這一切，必須眞正用國家權力及人民自覺的力量來推行。

以上的具體綱領，最主要者還在引導工人參加生產管理和推行協作這兩點，因爲這不但有救濟意義，得免於暫時的剝削，而且是積極地使生產者有生產手段，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議的基點。這裏可以看出本黨適應現時過渡階段的方案，是與完成中國革命，實現社會主義密相銜接的。而且只有這樣，纔可保證全國工人的解放道路不至於誤入岐途。

此刻隨着國內以迄全世界經濟恐慌，政府危機的加深，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統治，都在拼命地作最後掙扎，一切客觀形勢，已證明了鄧先生給我們的指示是鐵般實在。全國工人們！這是決定生死的關頭！我們聆聽着上述的遺言，要將興奮情緒，永久抱持住，一小時，一分鐘都不容猶豫！我們的出路，是一條血路，我們急切地需要武裝，需要消滅反動勢力底武裝！一切「幻想」，「悲觀」，「合法觀念」，其危害程度，勝過於敵人的槍炮，每個復興中國革命的担當者，每

個鄧演達主義的信徒，每個爲中國農工平民謀解放的革命戰士，都須在紀念鄧先生的今天，準備和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對陣決鬥的今天，將那一切幻想，悲觀，等觀念全般肅清！而換上鄧演達精神！艱苦，勇敢，堅毅，樂觀的精神！以鐵和血實現鄧先生的全部遺教！

最後，我們高呼：

復興中國革命！

鄧先生精神不死！

實現農工平民政權！

實現社會主義！

工農永遠聯合！

打倒反動南京統治！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中國工人解放萬歲！

中國農工平民解放萬歲！

中國民族解放萬歲！

批評的精神是在現時初發的中國社會所必需的。一定要有批評的精神才能了解過去的汚暗無光；一要有批評的精神，才能澈底的了解歐洲文化的意義及其與中國的關係而系統的輸入進來。

紀念鄧演達先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北漢

在鄧演達先生遇害的消息傳出後，非特本黨同志都有此彌天的悲憤；卽整個中國民族也有此沉痛的呼聲。而今已是鄧先生底週年忌辰了，東北三百餘萬方里是變了顏色，內地農村經濟是加速的崩潰，遍地烽烟，滿目瘡痍，所謂爲世界革命之一環的中國革命，或將斷送予反動南京統治者之手而延誤了其光明的前程。于是，我們更發想起堅苦卓絕忠勇熱烈誓爲中國革命闢一條新路的鄧演達先生；但是他已經死了，已經死去整一週年了！

朋友們可以放下主觀的情感，敵人們可以稍釋固蔽的偏見；試問鄧先生壯烈的犧牲，是否整個中國民族不可彌補的損失？我們爲本黨哀，更爲中國民族哀？

中國是個國際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半殖民地的國家，中國社會底結構，又自有

其特定的歷史條件;一切都在沒落着一切都在發展着的中國，是掙扎着摸索其應由的和必由的革命前程。中國國民黨總算是中國社會底產物，也曾有過若干年奮鬥的歷史，但政綱未嘗實現得分毫，即被黨官們反動的「政績」所湮沒，致使徒具腐朽的軀殼而爲時代的車輪壓了過去。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曾經發生過推動的作用，但自盲目的暴動政策實施以來，只管發洩，只圖邀功，不顧社會革命底先決條件，致使中國社會日益死機，中國革命走入狹隘的所謂「綠林」叢中。試看，究竟那個政治集團是能確切地擔負起中國革命底責任？究竟誰是這條革命路線的創造者？無疑地，惟有鄧演達先生。但是最可惜，在這個新黨名稱尚未確立，革命方案尚未充分發揮和運用的時候，鄧先生就在反動的南京統治下犧牲了。

我們在鄧先生殉難的週年忌辰、目擊中國政治之紛亂漆黑，彌增我們之低徊感痛。

他底精神。只要見過鄧先生一面的，莫不欽佩他底精神之飛躍與偉大。甚至有的朋友說，「鄧先生每一根汗毛都是動的」。他底體魄之魁梧與雄偉氣度之英毅與沉着，神志之凝定，語調之活而有力：殊感到老大的中國民族，竟會產生此傑出的人物！對人對事都極負責，對人尤熱烈真摯；但親的神情裏，總是帶些約束的意味，所以一般人對之，常是有可畏的和可愛的兩種心理。他底部屬或友人即受其責備者也是感激他。紀得有一次，我們往遊湯山，那時正初春時分，天氣晴朗，萬里無雲，我們在到達溫泉池旁時，他忽然講起「亞里山大東征」的故事。他說亞氏如何統軍橫越沙漠，如何攜着若干美女詩人，美女在沙漠裏如何結隊跳舞，詩人們如何賦詩及傳佈希臘文化。說罷，眉飛色舞，手張足蹈，九如乍出柙之雄獅，奮然欲作勢搏人之概。那是多麼充滿了稚趣與詩意，至今猶歷歷活現眼前。

他底生活，他是農家出身，深知民間疾苦及佃農和地主之階級關係。他底階級意識早經確定，生活形態也極簡單。他底生活中心是在學問上和事業上，每日

生活，如無特種事故，常是按照預定的程序去做。他對于各種社會之隱情細節都極注意，尤愛同勞苦的農工攀談，每低聲下氣地詢問到最瑣碎的部分。他最愛作實際調查工作，對于數字的研究尤感興趣。暇時他喜撫鋼琴，常在無譜的亂彈中，傳出妙韵天成的沉鬱而雄偉的格調。他底人生觀，由他底話中可以看出，他答說：「我們只有作驢子；吃的是乾草，走的是黃沙漠漠的長途，做的是煉石補天的工夫，只有工作是安慰罷了！」

他底思想。鄧先生底思想或主義，是尚在形成的過程中，但已經具有大概的規模和輪廓了。在他底思想系統下之中國革命史的分析上，可以說是革命的孫中山主義之辯證法的發展；但在社會科學的一般原則之根據上，也可以說是馬克斯主義之在中國社會的活用。他完全是一個新時代的人物，但是新時代之中國的人物。他在學問的修養上，曾經極力鑽研各種社會科學，根據研究的成果，努力去考驗中國社會的現實，打算建立中國革命之理論的體系。他認為，現代的中國文

化，應當是自我批判的；獨立的中國思想，應不受現存任何派系所拘束；中國革命之指導原則，應以中國社會的現實爲出發點。他嘗說，他最高的哲學思想，是一個懷疑論者；但談到實行，則須是獨斷主義者，因爲懷疑，就是毀滅或自殺。

他底事業。他在少年時卽嶄露頭角，嗣後在軍隊中，因其膽識之過人，數立奇功，至一九二七年所謂中國革命的黃金時代，正是他飛黃騰達的時候。一般人每憶起當年革命的武漢，便聯想到總政治部主任兼總司令部行營主任兼農民部長，兼武昌攻城司令兼湖北省府主任委員兼農運講習所所長兼中央軍政分校校長兼軍委會委員及中央委員的鄧演達；而「鄧演達」三字，已經成了中國革命黃金時代的象徵。兩種反動勢力之對立的發展，結束了武漢革命的喜劇，但是這才到了鄧先生眞的革命事業之預備階段。那時萌生了新黨底幼芽，傳播些締造新黨的空氣，到了一九三〇年夏，他才回國正式負責地開始了新黨底組織與活動。在他積極地領導之下，黨務和民運都有着飛躍的進展和壯闊的聲勢。他計劃在最短期間

，奪取革命根據地，即在新的根據地，召開本黨全國代表大會，確定黨底名稱和政治主張，樹起新黨鮮明的旗幟，以與各種惡勢力決鬥。可惜全部計劃沒有實現，未來事業沒有展開，即慘死于國賊蔣介石及其爪牙之手，而已是「碧血飛花，荒野埋骨」了！

我們回懷想他底過去，我們尤希望而痛惜他底未來。我們嚮往他底精神，我們最痛惜他那無量的精神竟隨着一粒槍彈而斷然消失；我們敬慕他底生活，我們最痛惜他那前途的生活竟隨着一粒槍彈而遽告結束；我們服膺他底思想，我們最痛惜「鄧演達主義」尚未具體形成即橫遭損害；我們欽佩他底事業，我們最痛惜他底革命事業尚未發揚光大即慘然犧牲！

但殺不盡的農工大衆，仍在熱烈希望本黨底領導，殺不盡的革命同志，仍在積極建立本黨底組織；鄧先生未竟的事業，尤在中國革命現實的需要和革命同志之責任心上開始其活動與進展。

一九三二二，二九，北平。

鄧擇生先生被捕始末記

灼華

『革命是站在大衆前面為大衆而犧牲的事，中國為封建的政治勢力所籠罩着，為帝國主義經濟勢力所束縛着，在這種二重壓迫之下，平民大衆要奮起是何等困難，何等艱苦的事！特別是要站在平民大衆前面，在此種反動極盛的局面之下為農工平民大衆而爭鬥，隨時都必須準備着被捕，隨時都必須準備着被殘殺，被捕被殺是革命者應有的覺悟，尤其是我們該充分的準備着，準備那最後的一剎那……。』這樣勇敢堅毅的勉勵詞語還好像我們對談一樣，不幸，鄧擇生先生竟被慘害了。以上的話竟成讖語！

說起這事——鄧先生和其他十二個同志錢福光，黃錦耀，方矩，鄧文，黃素，張小山，李文英，王素清，張昌，等九位是為了訓練班的教育問題而被捕，時間是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午後三時，地點在愚園路愚園坊廿號。因為當時在

愚園坊的集會僅只是一種關於學術上的講演，鄧先生親自出馬演講已是那一班最後的一次。任樹官并不曾參加那個班却是因爲與巡捕吵嘴，同時是同情於我們而被捕。陸志甯雖不參加集會却是訓練班中一個跑腿的人，他因爲收到外間兩個電報和幾通報告要送與鄧先生過目，所以跑到愚園坊去，竟至同時被捕。還有一位朱豐慶原是找門牌錯了，絲毫沒有關係而冤枉被捕。許生祥則在搜查的時候被捉着的。程樸同志則在麥根路三十二號被捕，他單獨的囚在戈登路巡捕房，鄧先生和其他十二人則被囚於靜安寺捕房。當大家被捕之始，他們因爲十分重視鄧先生，所以特別把他和西探洛思同一個手拷鎖着；其他的人，到了捕房之後，則一同關在一間寬不過一方丈的小牢裏；又是夏天，汗淋如雨，坐獄到是平常，沒有水喝眞是件難過的事。

十七日下午六時左右，巡捕房的人特別把陸志甯叫出來到愛文義路和西摩路兩處地方搜查一次，把所有的書籍文件一律拿了去，說是作什麼證據。其實是「

三民主義」，建國方略，，以至史記，漢書，和說部叢刊，以及經濟學全集等都拿去了；甚至自來水筆和一些款項也在犯罪之例！兩處地方搜過了之後，再解回捕房。

於是一個個的蓋手印，把身上的褲帶，皮鞋上的鞋帶，手錶等類的東西都一一解去；然後纔把這些人一齊關在捕房所設的臨時監牢裏。這個監牢，三面是水門汀所造成，外面是磚牆，一面是比大拇指約粗一倍的鋼條作的檻門，地面和屋頂都是水門汀所造成的，門口坐得有一個守檻門的巡捕，但他也是關在大檻門以內，不能自由出入。我們進了監牢之後，雖然仍是懷念着外間的事，特別是有關係的許多同志，不知道他們到底怎樣？不過身體上得到了略為休息的時間，所以也有談話的機會。當時與鄧先生曾談到兩件最要緊的時：

一是要設法把被捕的消息傳佈開去。

二是要設法安慰同難的同志。

對於第一件事我們已算盡了我們力之所能，算沒有完全埋沒；第二件則我們迄今回思也覺着慚愧沒有充分的作到。在巡捕房監牢裏，鄧先生非常沉默，輕易不肯說話。不過我們曾經談到如果南京要以你投降作釋放的條件，你的意見怎樣？先生回答的話是：『決不！牠要我投降，要我拋棄我的主張，那牠拿刀子來好了！』但是他同時又估量着如果這事情公開了，則蔣不致於加以殘害。

十八日早晨九時，我們被解到江蘇第一分院候審，在途中囚車上遇見了程楧，纔知道他不過後我們四五個鐘頭被捕。當在法庭受審時，就完全明白全案計有十五人，其中有兩個人：一個是任樹宣，僅只一面之緣；一個是朱豐慶竟至我們全都不認得。經他們自己一再說明，但還是絲毫不能取得法律上的保障；我們十三個人自然更是「大逆不道」了！鄧先生當時於簡單敘述他的年齡籍貫及履歷之外，曾反詰法官，爲什麼逮捕我們？他的答案是你們反動，問他什麼是反動？他說反對政府就算反動。他並不曾認淸政治爭鬥是什麼東西，甚至並不曾了解什麼

是政治？所以他們對於法律只有曲解，對現實也不敢正視，不懂得正視。所以他只曉得所謂中央的命令，從不曾想到法律應該不要偏倚；可是現在不但是偏倚，而且是枉法殉統治階級之私，所謂「公道」，「正義」都只是白紙上的黑字，拿來騙騙人，作敷衍門面的東西而已。所以對我們一場審問和裁決，引渡到淞滬警備司令部去，都只有敵對的政治關係，決沒有什麼法律。我們自己的說話固然不能發生任何效力；即是律師根據他們所定的法律說話，也是毫無用處；不管三七二一只要執行其所謂中央的命令實行引渡。雖然法官曾問我們對於引渡移提的意見，但這僅只是一種面子話，甚至我們所說的話他們竟不曾聽見亦未可知。律師的抗告，據他們的答覆說是中央要提的，抗告是無用，從此即無異乎宣告法律非特不能獨立，司法決無所謂尊嚴，恐怕法律簡直是一種附屬品，不然就是統治階級的一種殺人害人的工具，只拿來統治平民，拿來壓服大衆的東西，其他決沒有別的意義。這恐怕是歷來如此，特別是在中國，關於政治爭鬭，對政敵總不惜以極殘

酷極野蠻的手段相對付。轉灣曲折也要去比附法律，是滿清專制時代羅致人罪的方法，現時竟是赤裸裸的說是中央的命令，乃以命令代替法律，以命令支配法律。這種中國平民大衆的恥辱，不曉得還要用多少赤血才能洗滌乾淨！

在八月十八日所以還把我們留在捕房不曾引渡的原因，是警備司令部的公文還不曾備齊，手續未能完備，於是又決定把我們解回捕房去。在宣告暫時休歇的時間中，我們感覺着最難過的，是從十七日晚間起到十八日早晨聽審都沒有喝過一滴水。從早晨九點站到下午一點半，也不能不說是疲乏；但是鄧先生還是精神一貫，雖然不吃不喝，仍能保持其嚴正從容的態度，這使我們同難的人十分驚詫與敬畏；同時使持權力的法官也不能不表示若干的同情和敬意。後來經過律師的轉圜纔送與鄧先生一盃茶，但是鄧先生只輕輕地啜了一口，卽遞與同難的人，他說「請大家稍微潤一潤口罷，」同時先生更要求律師再設法弄幾盃茶來，那眞是甘露一滴，比瓊漿玉液都覺着有味，假如那時候能許我們各人盡量的一飲，則雖

小便旁邊的自來水龍頭，我們也決不嫌厭的。（在候審室旁邊，沒有進候審室之前，我們先關在一所臨時的大監牢裏，這所監牢大約見方兩丈五尺光景，我曾留心細數關在裏面的人，竟有二百八十多個，其擁擠可知，小小的寬約兩尺，長有八九尺的小便地方，眞是川流不息，一對一對的去小便，因爲都是兩個人同帶一對手拷，當時與鄧先生同鎖在一對手拷的大概是方矩同志。凡是去小便的人都不見得是爲了小便而是爲了借此在自來水龍頭跟前去喝一點冷水，以解自己的渴。（我們但願把我自己的血化作湧泉供給世人的狂飲，洗滌中國一切政治的社會的汚穢。然而我們自己還是飢渴當前，縱然努力自行克制，究竟是肉做的身體，還是免不了受飢渴強烈的刺激。

十八日的審訊，我們不知道是豫審是什麼……就又馬馬糊糊地解回捕房的小監牢中去，我們從此知道引渡是必然的了！同時我們推敲這次條件發生的來源，爲什麼巡捕房會這樣知道得詳盡，與我們有關的幾個地方他們都一齊曉得？關於

被捕的事，鄧先生親自對我說：『這事情百分之九十九是陳敬哉告密；因爲他進到愁園坊後，聽我談話不過半點鐘，他就說肚皮痛，請先告假。他走了不到四十分鐘，巡捕房的人，偵探等等就來了。……』我又回想到：在訓練班剛開始的時候，上海市負總責的張亦榮卽對我說過三次說是陳敬哉要聽鄧先生最後一次的講話，經請示過鄧先生得到允許之後，纔囑咐他八月十七日十二時半先到觀森里一千零八十九號去自有人同他一塊去，我記得同陳敬哉一路去的是鄧，黃夫婦。那時候陳敬哉雖然卸去了上海市組織的責任，但仍舊住在那個機關裏，仍舊與上海市有密切的聯繫，所以開誠佈公的鄧先生對他并不會懷疑，更不會戒備，以致讓他告密的詭謀成功，革命前途遭受莫大的打擊！

當十九日復審的時候。都以爲任樹宜是二房東的兒子，并且年齡不滿十六歲，事實上絲毫無關應該能夠保釋或者無條件釋放，再一個朱璺慶旣全不相干，更該釋放，許生輧是廚子亦無關係，最多也不過取保釋放。但是當時警備司令部探

員王斌陳述：『這個案子他們都是一夥的，決無疑義。因爲一兩個月之前就有人密函警備部，問我們要不要鄧演達他們這一批人，如果要的時候，則請登時事新報廣告一星期，約定接頭地點。後來登了一天，兩天，三天都沒有人來接頭，到第五天上纔又得着覆信，第六天纔遇見了人。今天他們本來在觀森里聚會的，愚園坊是後來纔移去的。任樹宣是他們一夥的，他雖然年紀小，但他的父親和他和鄧演達在一掉子吃飯，可見他們是一起，說是房東，那是他們的謊話。許生祥是他們送信的。朱豐慶也是他們同黨，所以開釋和保釋的事，都請鈞院不可允許。況且這是中央交下來的案子，尤其不可輕縱。……』

由此我們更明白，更證實鄧先生的說話和我們的假定自己人告密是最痛心，而且是最難防備的事！當我們回到捕房關於小牢裏的時候，鄧先生說：『以耶穌爲民族解放而爭鬥，十三個門徒中有一個人告密，我們也是有一個人告密。……耶穌最後的結果是流了血的犧牲，以他的鮮血來洗滌猶太人的汚穢，以他的鮮血

來表明他的偉大，他的崇高』。不幸鄧先生的話竟成讖語！

十九日再度受審之後，在江蘇第一分院再打過一回手印，警備部就用一乘中國搬場公司的搬場汽車，把我們解到西門白雲觀的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偵察隊去。去的時候他們却很優待，送茶給我們喝送飯給我們吃。……對鄧先生個人另自給影一間房子，不讓他與我們同室；但他的屋子與我們的相隣，并且可以時常說話。先生總是沉默，總是悶想！在十九日下午在警備司令部偵察隊我們各人都曾留他，那些像片中又以鄧先生的相片為最從容。

八月二十日早晨，據鄧先生告訴我們說：『王伯齡來看我，他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說我自己作事自己當，決不推諉，但我不是共產黨。其他就是隨便胡扯一氣，并沒有旁的要緊的說話。』我們當時曾問，據您看這個案子結果何如？先生的回答是：『南京決不至於殺我，但三五年內決沒有出來的希望，借此機會多讀點書也是好的。……』然則我們如何呢？先生說是：『你們頂多一年半載定要出

去的。……』總有一兩個人要被殺罷？先生的意見：『他殺你們作什麼？有什麼用處？所以你們放心，不但殺是絕對不會，卽長久的監禁也不至於的，因爲事實上沒有這種必要。……』

八月廿一日早晨九時光景，偵察隊的人就來說，要請鄧先生到南京去，請他預備。大約十點鐘光景鄧先生去了，臨行時他對我們說：『你們安心，我到了南京之後，我總設法子告訴你們我的情况及其他的一切。……』這是最後的面談，最後的聲音遺留在我們腦子裏！

於是我們就此禁在白雲觀從八月十九日起，到九月初間，其間經過了一些小風波，多數的人都不曾在白雲觀受過審訊。幷且不幾天，楊允鴻，陳石，沈惠昌，黃金章，和其他兩位工友都從法租界引渡了過來關在一起。我們誠然都不同房間，可是每天大小便的時候都可以彼此看見，也可以在相問一聲祝君早安，晚安之類，有時也可以在毛坑邊蹲着說兩句話。九月初爲了一筆款子的關係，又發生

了一點風波，他們早發現了陸志甯是假名，他的眞名是羅任一。經過了三次的殘酷拷打，終於被他們搾去了七千圓，其他六百多塊錢的零錢，我們自己抽烟，吃菜用去不少，又支還了一點作零用。所換得的特別優待是准許與家屬接見，剃頭修面。……

在九月十五日午後就決定把我們解到南京去，路上押解我們的兵對我們似乎表示同情。在北火車站經過的時候，本來說可以答應買幾分報給我們看，但是因爲沒有靠站台，并且我們的車是停在楊旗附近的岔道上，兩旁又有全副武裝的兵士守着，又是兩個人同戴着一副手拷，起居極度困難；大小便都不方便，所以報終於不曾買得，却每人買得兩碗混沌吃。到第二天早晨快到南京下關車站的時候，看見一片汪洋，遍地是水，眼睛所能望見的小屋子都是浸在水裏！不曉得這般窮苦無告被壓迫的只流汗流血的農工平民大衆，到底住在那裏去？我們固然不敢自命是農工的前鋒，但總是爲解放農工平民大衆運動的犧牲者，同時是站在農工

行列當中的人；現在身被撩拷，在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的囚車中，目覩在汎濫的混水中浮游的大衆，豈但是興嘆，豈但是同情！到了車站的時候，月台上「橫七豎八」，站着臥着的盡是被水淹得貧無立椎之地的平民，據說這還是比較好的，因爲他們有車站的鉄蓬，可以避得一些小雨；然而九月天氣已經漸趨寒冷了：他們兩塊石頭架的灶也沒有，只等待着慈善家和政府每日給兩個饅頭聊以充飢；那裏能夠充飢，僅借此吊着命不致於即刻餓死罷了。我們到南京的那天早晨，還是下着大雨，刮着大風，車站上雖然築鉄路的時候，比較高些，但是遍地依舊是濕地，這些出力最多受報酬最少，受壓迫最深的人只好睡在風雨浸襲的濕地上。他們在大水之餘，剩得一張破爛不全的被子，已經打濕了一半。實際上固然早已只好坐着打盹，縱然精神萬分疲勞却也不能睡，何況他們都經受過極嚴重的打擊，又那裏能夠睡，他們念及自己將來的生活，竟至無可求活；眼看着目前的慘象和政府的醉生夢死，又那許他們安睡啊！車在下關停了差不多兩三個鐘頭，解我們

的差頭纔把交涉辦好，租了一輛公共汽車，在大雨滂沱中拖到軍政部軍法司，於是我們就關在禁閉室裏了。我們同去十八人分監兩處屋子，第一禁閉室關七個人，第二禁閉室關十一個人。我們同路十八人於是分作兩下，只好在一個窗口上用眼睛互相注視，用手比手勢還要爲看守的干涉！

同時我們聽到其他囚人告訴我們說是：「鄧演達關在對面的優待室裏，相隔不過一丈多寬的小院子，而天涯咫尺，竟至於無法一面，更找不着說話的機緣了！後來（過了差不多十天纔知道鄧先生的屋子就在我們的對面，他屋裏的後窗恰與我們的牢門相對，）因此就終日在牢門口凝望，凝望着有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會抬起頭來探望窗口以外（窗上掛着一塊白飾布，要站凳子上纔可以看見外面，）則我們也許可以在無意中會看見一面，也能夠聊慰渴思。

某日大約將午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在牢門口閒望，遂遠看着斜對面蒙着綠紗的窗上微露一面，長長的頭髮，方正的顏面，不用再猜疑，正是我們日夜想望所

要看見，所渴念的鄧先生！他高擎着手，做手勢……，咫尺天涯，不能一語；於是同牢的二十多個人都聚集在牢門口來了，即使他們都不來，光我們同室的七個人也夠擠破兩尺多寬的門了，因此惹起了「看守」的注意，擺出他統治者的鐵面孔，下命令叫我們退開，不許我們痴望，更不許我們做手勢，在悵惘、憤恨和威壓底下離開了我們僅可站立的門邊，回到起坐、睡覺、吃飯等等都在同一處所，僅夠放得身子的地舖上去。這時候只有痴念，只有瞑想，只有追懷過去，夢想未來，眼看着當前的苦痛。我們與我們的領導者，只隱隱約約，依稀髣髴一面。

其實我們這樣子吃了就睡，睡了又吃，白無所事，而且十分平安，決不發生有什麼強盜的侵犯，以及其他什麼危險，所缺少的是行動上的自由。然而想到下關車站上被水淹的人，現在天氣又更冷起來了，政府和慈善家所發給的糧糗是否還繼續發下去，即使依舊發放，他們那裏吃得飽，在這種金風送寒的時候，豈能不冷？又凍又餓的日子將如何過下去？

鄧先生和我們的被捕捉，被淩辱，被監禁，與自己個人有什麼關係，所爭的是最大多數最出力的農工平民大衆的幸福。現在平民大衆痛苦不堪，求生無路，求死不得；我們呢，雖然暫時是吃住不愁，穿衣服却未常沒有問題，茫茫的前途，又與車站上的難民相差幾何。然而我們究竟是百事不管，縱使在憂鬱的雰圍中，在絕對的壓迫之下，可是一般農工平民又何常不是在同樣狀態之下呻吟！又那裏去求得暫時的安慰，又那裏有新的希望？

從窗上一面以後，就已經有了特殊的方法，透過看守，與鄧先生通信，第一信(大概是九月廿五以後的，)原信說：

『親愛的××：得到你的信，使我異常安慰。你們在那邊生活怎樣？很是憂念！我將要求他們好好的優待你們。我的生活比在外面反而好了，我的飲食很豐富，以前從來沒有的。我相信你們在那邊的生活，不會像我這樣好。

『當局決不會殺我們，這一層大家都不必憂慮！他們差不多每天有人來看我的，同我談話很多，意見是要我軟化。日本已於九月十八佔領了瀋陽，這幾天外交問題極緊急。昨天他們有人來問我對應付日本的意見？我想我沒有軟化的必要，我仍當堅決的站在我們的立場上，我曾答覆他們，這不是私人的爭執，而是爲社會爲中國。只要他們能接受我們的主張：「開國民會議，解決土地問題，我即可表示與他們合作；否則個人的屈服是無用的，無意義的。』

『我每天讀書，同時還可與同獄者談話，不覺得怎樣苦，請勿爲念。……

……』

第二封信大概是十月初幾寫的：

『親愛的××。過去一切情形，我都已明白；這次事變的來源我也知道了。事情已經是如此，悔恨是無用的，時局更加緊張，據說粵方已與當方接

洽和識。或者不久我們就有恢復自由的希望。大家宜乘此時機，多讀書，好好修養。我們出去時必有更大的使命給我們担負。我們的時候，或者快要到了。希望大家安心修養，讀書，這是最要緊的事。我對於過去的和這次的事情，自然比你還更感覺着難受。但是你們不必再憤恨！

『你們的飲食何如？天氣冷了，你們大家恐怕都還沒有衣服；我將要求他們送些衣服你們們，或者你們亦可寫信出去要。零用錢亦可寫信出去要。我這幾天沒有錢了，過幾天我也可以送些給你們。

『我更憂慮你們的健康，希望你們務必保重。』

隔了兩天「看守長」果然代傳命令叫我們寫單子要東西，無論被子衣服都可以的。我們寫了幾條棉被，幾個熱水瓶，幾件棉衣，送了出去。但是結果不過說了這樣一句話，究竟只是鏡子裏面的花朵。同時鄧先生又來了第三封信：

『親愛的×：你們飲食不良，使我非常憂慮。應該由你設法告×兄要他

多多的設法，這是他的責任。頂好能叫××來南京專門爲你們辦理關於衣食等事。

『我們的時間萬不可空過。特別是你應該負責任督率同人讀書。這就是我們的訓練。如果沒有書，你也該設法子去弄一點書來。我在這裏有書可看。并且他們允許我看報，我從報紙上可以得到一般的消息，現在告訴你們：

『(一)日軍已由瀋陽侵佔到吉林，東北事變愈見擴大，前途的應付更加困難。

『(二)甯粵講和大約會成事實。

『(三)民衆運動已經勃發，現政府的能力決不能加以制止；可是我深慮領導的勢力薄弱，恐怕撑持力不能長久。

『我以後得到消息必然告訴你們。務須注重你們自己的健康。』

接到這封信之後，我們即又回一封信，請問他以下幾點：(一)時局今後的轉

變何如？（二）我們對於日本問題，東北事變的態度是否可以站在民族的立場說話？（三）如果當局者以此相詢，我們當如何回答？是不是可以就民族關係發言？（四）和議如成，我們對牠取什麼態度？（五）在這樣的時候，我們的態度似乎該溫和一點以取得我們自己的方便？（六）聽說天天有一位女士給你送東西，有人說是你的夫人，的確否？希望先生便中給我們以較詳細的答覆。這封信寫起了好幾天，纔得到方便交出去。

第四次信（時間約在十月二十左右：）

『親愛的×：來信已經收到，時期竟延長了這許多，可見傳遞的困難。我們以後非有特殊的必要不可通信，以免啓人疑竇。關於你們的衣服用物等我已和他們要求過，他們已經答應為你們設法。現在何如？

『你所問我的事。（一）今後中國的趨勢，南京無疑的會走向絕路，旁的新勢力:?:一刻起不來，現在我們旣遭受挫折，雖然我們的使命很大，可是困

難也更多。所以今後國民黨的聯合政權，在事實會要形成，并且還會有相當時期的積持性。

『(二)東北問題，不單純是外交問題，決不能靠外交來解決；必須顧到內在的種種條件。而且現政府也決担不起這個責任，和他們談民族問題是不中用的。所以我們還是要堅持解決土地問題眞正「國民會議」的主張，特別是我們自己的政治主張。

『(三)在這時候不可隨便發表意見，特別是你，更不可亂發言。這一點我們該十分注意。

『(四)寧粵的和局是逼成的，究竟作得成多少事，有怎樣的成績，恐怕他們自己都不敢豫斷，我們還是要認定我們的主張，到了相當時期，我們的主張會爲他們所認識，所同情的；到那時候他們許有多少人會諒解我們的。現時不必太注意太費力去求別人的諒解，因爲這種的諒解不容易用人工催促。

『(五)現在我們處困難境地，但是家教還是很要緊！這是萬不能放過的事。

『(六)送東西給我的不是我家裏的人，是另一位朋友。同時付來款子××元，這是前天纔得到的，特分送給你們用。其他的費用，還是由你負責，找×兄設法。當現在這種時候，不可把時間空過，總要使大家用功讀書，雖然在這種苦時候，也是訓練兄弟們的機會，這一點你尤其是該負責』。

收到他這封信以後，我們還回過一封信。卽遵照他的囑咐不寫沒大關係的信，我們依然是枯坐瞑思，和談天。却是買到了幾本線製書大家隨意看看。

十一月三日，聽說是鄧先生要搬家，搬到什麼地方去呢？傳說的人也不甚確實，但說是有監獄官，監獄員各一，聽差一人，看守二人，連一切用具甚至坐的膝椅都一齊帶去。當時我們格外担心，十分的懷念，更猜想，這到底爲了什麼？

後來他們又說從前某人在這裏也是搬來搬去搬了幾個地方，誰也不知道他搬到那裏去了，并且外間都傳說×××已經槍斃。就是我們在外邊的時候也是聽說過×××巳死，但是他依舊還在，并且還將列席於某種會議。鄧先生比他們當然不同，所以我們想該不至於被殺罷？何況蔣殺鄧先生是件蠢笨的事，留到他在的作用比殺了他大得多。所以我們大家一致的推測都以為是平安無事，不過他們借此遮掩衆人耳目，怕羣衆為外交問題牽聯到內政方面去，所以把鄧先生搬開，以防意外。其他似乎找不到適當的理由。

十一月五日，聽說鄧先生臨走之前給我們留得有一封信，這使我們更掛念了。不曉得這封信說的是什麼？急激的要看這封信。這封信終於來了，大家看見了。

第五信（是十一月三日寫的：）

「我已被移往紫金山的荒屋上，以後通信將不可能。」

這封信字是紅色鉛筆寫的，看字的樣子就帶得有幾分神祕的意味，使我們在安慰中，感到有恐怖的境象，覺着這事非同小可！

一天一天的這樣子下去，時常聽見說監獄裏與鄧先生送東西，甚至火油（點燈的油）也常聽說有人送，於是恐怖這纔減輕了些；一線光明，若隱若現的露在我們的意想中。可是總以為悲觀的想法多過於樂觀的；不過有幾位都覺着樂觀的成分多，所以總保持着樂觀的疑想。那時候正是國民黨所謂第四屆代表大會的時候，可是我們却被封鎖得滴水不通，公開的送點食物衣服都遭扣留，只剩下一條特殊的道路了。這條路又不敢隨便使用，恐怕惹起旁的聯帶問題，引出意外。

到了十二月一日對我們的封鎖突然開了，和議也有成議了，可是有一個驚人的消息發現了，就是看守鄧先生的監獄官一齊都於十一月廿九日午後回到軍法司，連聽差的都回來了。這使我們無限驚奨，無貲難堪，堆積滿腦的疑懼，陡然有一天，大約是十二月五日光景，傳出說是鄧先生已經遇害，地點說是在陸軍監獄

，對外極端祕密，這是陸軍監獄官與看守長說起的話，被人聽見了。由此我們非常着急，但着急又有什麼用！設法向外面打聽，外面的回信都說沒有這事，我們又寬了一點心。到了十二月十五確信來了，知道鄧先生被害了，十二月十七日上海的報登出來了。這是決無疑義，今生今世再不能面晤堅苦卓絕，忠勇奮發的鄧先生了！不幸窗口的一面竟成永別！雖然民國廿一年正月我們出了牢門，再進到社會，但是失去了我們的導師，暗夜潛行中沒有了照引我們的星光。

然而他的遺教還在，他的精神長存，他的赤血點燃了革命的火燄！同志們！我們的使命今後更加重大，我們該更努力的猛進！

擺在我們眼前的只有兩條大路：或則是永久的爲外國的殖民地——爲國際帝國主義的和爲第三國際的。實在精神上是一樣的，——或則是由廣大的平民羣衆自己起來，推翻現時的南京反動政權，建立以農工爲中心的平民政權，實行耕者有其田，立行取消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完全解放，向着社會主義建設。

鄧演達先生的政治主張概觀

秋甫

天是在震怒，地是在動搖，風是在狂叫，樹是在發抖，無衣無食的災民是在這當中跳躍。跳躍跳躍，究竟到什麼時候才能跳躍出一個天高地厚風停樹靜的環境，使我們安居樂業呢？

這是沒有用的，單在這風雨飄搖的局面中東馳西突地跳躍着，充其量祇不過是感覺得自己更加不安而已。

首先要明瞭的是社會動盪的緣由：我們日夕所處的社會在現今是如何的形態？這種形態是怎樣形成的？明白了這兩個問題之後，再來問一問自己對于這社會的態度是要保持或改造？假是認定是急須改造的，則改造的手段又將安出？要這樣子一層層都加以精細的考慮，然後纔能得到最後的解決，否則，專門抱着一腔熱血，滿腹牢騷，盲目地跳躍，安能揣其究末呢？

我們的革命導師鄧演達先生，對這些問題，都有過嚴密的研究，曾製出明確的答案，這些答案經過了歷史事實的證明而益增加其確切性。

佔全國絕大多數的農工平民羣衆們啊，依照着先知先覺者所指示給我們的光明大道向前猛進啊！

鄧演達先生的主張端的如何？在這裏略述其梗概。

一　現社會的把握

無論任何社會的發展都是不平衡的，斷沒有一刀兩斷可以把它截然劃分很清楚的階段。英國在十八世紀已經是進展到資本主義的社會，而直到如今尚遺留着不少封建殘骸；同時，也有很多地方是在封建外套之中，早已孕育了資本主義的胚胎。正唯是這樣，所以可發生很多不同的認識。

有許多人僅僅根據了西北西南等落後省區的社會結構，斷定中國還逗留在封建制度的軀殼之中，徭役供應的盛行，人口買賣奴婢養育的公然被官廳承認，以

及自給自足的區域經濟，與土地有黏着性的世襲官僚政治，在在均足以表示封建社會連鎖的鞏固。所以他們就定出『聯省自治』『分治合作』等似通不通的政治主意。

又有一些人祗根據沿江沿海沿鐵路的地區的情況，一口咬定中國已經形成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農村經濟的完全爲金融資本所控制，農民生產的商品化，貨幣在農村中作用的增大，新式工廠的設立，何一而非資本主義的象徵？所以就搬運了馬克斯主義實行其赤化革命。

但是這都不過祗捉住了一物之一端，而沒有施行整個的剖解。病案旣錯，藥不當然無靈了。而且這些不對症的藥反而會加重病態的危險，這眞是不可忽視的。

我們放開眼睛向整個中國社會加以考慮，馬上就可瞭然全人口百分之七十是在農村，百分之三十住在城市。而有新式工業的近代都市却至多佔百分之三而巳；其餘的城市差不多都只行着簡單生產的手工業及半農業方法。各地農民所生產

的農品，除脫被地主商人以田租高利貸或不等價交換等形式和被政府以捐稅徵收掠奪的形式剝削了去之外，大部份是自行消費的；拿去和手工業及機器工業製品交換的僅約百分之十五。在這微乎其微百分之十五數目當中實以手工業佔其大部份，這樣一種事實擺在吾人面前，而謂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統治了中國，不是戴上了紅色眼鏡的人又誰能置信？

同時，在政治方面也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舞臺有否可以左右的勢力？（姑承認已有資產階級）不必遠證博引，只要看看山東的韓劉之戰與四川二劉之爭，資產階級所發起的廢止內戰大同盟所發出的制止辦法有沒有效？軍閥官僚士大夫政客這一類封建遺孽所結納着的力量是如何地根深蒂固啊?!

普遍在中國農村中，尤其是南方諸省農村中的，不是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意識，而是還帶着極濃厚的民族社會的色彩 。血緣關係，是支配全社會生活的中心。

從上面的敍述，可以明白中國現時的社會，在形式上固有異于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其內容性質却確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的階段。同時，因爲帝國主義的侵入，使中國社會益呈複雜的狀況。

鄧演達先生，他就是依據這客觀事實的分析而把現階段的中國把握住的。

二 何以會到這步田地？

社會的進展固然是依着辯證法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上可以殘存着封建遺跡；在封建廢墟上也可以樹立資本主義之花。但有個比重與比輕的區別。到底資本主義壓倒了封建勢力？或是封建勢力束縛住資本主義？終不難把它說明出一個什麼社會。中國既然是兩種形態同時並存，也應該曉得誰的力量大些？可以統制全國的經濟？

可是這在事實上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因爲中國的情形與他國逈異。旁的國家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是始終居于敵對的地位；而在中國，却因有帝國主義這掌握

太上統治權者在，所以把封建軍閥官僚政客士大夫和地主豪紳買辦資產階級都混成一堆，平均担負了替帝國主義做宰割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劊子手的任務。

帝國主義者一面挾其高度資本主義大量生產的商品和巨額的過剩資本以破壞中國的農業手工業經濟，同時壓抑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使之不能長成；他方面更挾其政治的力量以延長中國內戰，使中國不能得到資本主義所必需的統一。以維持帝國主義自己的統轄地位。

因此，中國的資產階級苦無獨立進行資本主義革命的能力。他們一方面不能澈底的掃除封建勢力，無力改造落後的經濟組織；他方面也不能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及廢除不平等條約。

資本主義不能完成既如上述，封建制度倘能鞏固，社會也許不會到了如此混亂的地步？但是，中國的政治組織，一向是封建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雖為歷朝統一的集權組織的骨幹，而實則每個行政區域內的官僚首領都保有任免下級官

僚及自行徵收賦稅訓練兵馬的全權。強固如元代及清初的統治，皇帝尙且不能多所過問，更不必說到每個朝代的衰微期和現時的腐敗政治了。所以經不起帝國主義的兵堅砲利，便都認賊作父當作靠山。甘心情願把中國淪爲國際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永遠受其支配了。

中國社會所以糟到這步田地，大半是應由帝國主義負責任。

三　誰是革命的主力？

依據上二節所述，我們可以瞭然于中國封建軍閥官僚政客士大夫地主豪紳買辦甚而至于民族資產階級都不會存在有絲毫革命的意識；需要革命的，是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剝削壓迫下的大多數勞苦農工大衆們，也祇有他們自己起來方能成爲革命的主力。一切資產階級地主軍閥官僚政客士大夫，對于農工平民大衆們的革命，不但不會有些微的幫助，必然的還會聯合于帝國主義而來施行壓迫屠殺的；所以毫無疑義地，他們以及國際帝國主義都是中國革命的對象。

這些中國大多數的平民羣衆，特別是直接生產者的農工階級，他們在數量上佔中國人民的絕對大多數，他們在政治上受着嚴重的壓迫，在經濟上受着殘酷剝削，客觀環境十二分的需要解放的鬥爭。現在雖然因爲反動的政治壓迫，大部份無法進行；但是革命的情緒却異常高漲，革命的意識也異常濃厚了。

也正因爲情緒太高漲了，意識太濃厚了，所以急不擇食，往往會上當。因帝國主義間的矛盾而中國，也形成各黨各派不同的理論。他們嘗嘗把錯誤的觀念去利用平民羣衆的革命情緒，結果都不過給爭權奪利的黨派拿去做工具，對自己解放的要求却始終難以達到。

不過我們可以曉得，他們這些帝國主義的走狗，雖能夠把革命的平民羣衆消毀在犧牲在無謂的黨派之爭奪中，利過火的盲動主義當中，但决不是斬草除根的辦法；而且把客觀環境形成更需要革命的局面。這些被壓迫剝削的大多數平民羣衆，一次二次被騙之後，總歸會得找出一條正確的路綫去戰鬥的，鄧演達先生的

主張，就是平民大衆由斜路走向正路的先聲。

主觀既然分淸，理論也認識淸楚。必然是要工農平民大衆一致團結參加政治戰鬥，才能建立平民政權，進行經濟解放的工作。

四　戰鬥的目的和手段

假使是祇有帝國主義的侵凌，我們可以用全民革命來實行爭取民族獨立；假使祇有封建軍閥官僚政客的盤剝，我們可以倡議民權革命建立民主政治；假使資本家是有鞏固的力量剝削勞動者的剩餘勞動，我們不客氣地就用階級鬥爭奪取政權。但是中國的情形如何呢？可以用其一種單一性的革命來解決嗎？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地主，以及依附前兩者爲生的高利盤剝的反動的資本階級，都是陷中國平民大衆于水深火熱中的當事者。在這樣一個複雜性的社會結構中，就要具有民族民權民生三種革命性而以社會主義爲依歸的革命才可以解決社會問題，才可以拯救當前的急難。

而且這又必須是一貫的連環的不是後先繼起的才可以澈底肅淸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使中國民衆握有政權，處理一切人間關係，担保生命安全。這完全是由於中國的特殊條件所決定，才有這種特殊的革命方式。

於此，我們可以瞭解中國革命的對象，不是單獨的一個而是排列着好幾個。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均在打倒之列。

根據上面所指出的目標，可見中國的革命主力——農工平民大衆，祇有把平民羣衆的本身組織成堅強的力量，與一切革命的對象，作堅決地澈底地戰鬥；除開自己本身之外，在中國是找不出一個階級可以當作革命隊伍中的朋友，祇有在反帝國主義的戰鬥工作中可以併且應該與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階級聯合起來作戰鬥的同盟。因中國革命可以擴大幷影響於被壓迫民族與階級的解放運動，同時世界被壓迫民族與階級的革命運動也可以促進中國革命，聲援中國革命。

農工平民大衆們，在反帝運動中可以『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在反軍閥反資產階級的戰鬥中，則端賴平民羣衆們自己的精誠團結來組織和人民利益關切不離的政治權力。不應再像歷次改朝換代的把戲，被新的封建統治階級和新的士大夫階級所利用了。

五　政權如何建立？

平民羣衆把革命的對象都打倒了之後，它們要建立怎樣形態的一種政權呢？換句話說，就使它們將怎樣使得被打倒了的對象不再死灰復燃而爲平民大衆之害呢？關于這點，鄧先生用很客觀的態度指示出中國應該是反資本主義的道路，就是社會主義的社會。

這是因爲資本主義的建設對于廣大的平民羣衆，特別是農工階級是無益而有害的事。農工平民大衆既然由覺醒而抬頭，還會再去蹈歐美之覆轍而去形成近代的資本主義嗎？

不過我們從客觀的歷史事實來論斷，社會主義的社會實在不能一蹴而幾；它自有其所以形成的客觀條件。這些條件，在現時生產落後的中國實在講不上。所以，農工平民羣衆奪取了政權之後，必須立卽運用國家力量，進行國營及公營的大規模產業建設，防止私人資本主義的弊害，發展生產，爲產業社會化的基礎，向着社會主義前進。使得由現時前資本主義社會穩然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這種過渡期的經濟組織，就可以叫做國家資本主義。

這國家資本主義是掌握在平民政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現時蘇俄已採用的辦法相彷彿。因爲政權握在平民手裏，才能在產業大規模發展的條件下面，使資本逐漸社會化。假使政權仍舊握在資本家手裏像現時的德美意日等國一樣，則適以爲高度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對本國的勞動階級行高度的剝削而已。所以這一過渡經濟組織，必須以建立平民政權爲前提。

平民政權的組織是由各職業團體及準職業團體派遣代表以組成之，其比數應

以直接參加生產的農民工人佔百分之六十的絕對大多數。同時，中央的權力限應極力縮小，除外交軍事以及關于全國產業統制，全國的交通及財政事項外，全由各地方負責自行治理。同時，爲了要使已經建立的政權確保起見，主張實現普遍的徵兵制，使各生產部門的民衆，組成眞正的人民武力以保護革命。只有這樣，才能眞實的集中平民力量；只有這樣，才能有力量從根本上推翻官僚政治，軍閥勢力及其它一切封建遺骸，而把政權確切的收歸平民大衆手裏，進行經濟的解放。

六　外交手腕的運用。

中國的革命，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環扣，也是最重要的一頁，所以要了解中國革命與世界的其它政治力量的關係，就不能不了解現時支配着世界政治的力量的因素。

大戰後的世界上，顯然劃分成四種力量，互相交錯着互相排擊着，互相影響

着。這就是：一、帝國主義者的力量；二，蘇聯的力量；三，第二國際領導下各國社會黨的力量；四，被壓迫民族的力量。

中國是被壓迫的國家，和世界上任何被壓迫的民族都有聯合一致推翻共同敵人的必要與可能，所以第四種是我們眞實的朋友，眞實的政治聯盟者，第三種，照它們的綱領是可以做我們的朋友的，但實際上他們已經成爲帝國主義的走狗，我們要提防他並攻擊他們的反動，第二種蘇聯，可以在雙方完全平等的觀點上結合起來至于第一種，則正是我們不共戴天之仇，必須針對着他們之間的矛盾，用種種方法去努力和他們戰鬥。譬如美國想伸足中國獨霸太平洋，就想討好中國多數國民，以擊破英日的在華勢力。支配了世界大部至數百年的老大英帝國主義，也因爲在中國大革命時期——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在華的經濟勢力幾乎爲日本所侵代，因此改變了東方政策，聯美抗日的傾向十分明顯。五三濟南事件之後，英國對日的經濟爭鬥轉入于反攻的局面。日本讓步與美國新經濟勢力的進一步

侵入，又引起了英國在東方有聯日抗美的可能傾向。而虎視眈眈的東鄰日本，本來他的資本主義的運命是完全依存于中國與美國。然而美國和它在太平洋上是難于調解的仇敵，所以它有在中國確立更穩固的基礎的必要。最近日俄相聯以制美，和俄美相結以抗日，都甚囂塵上，弄得我們撲朔迷離。然而于此可見帝國主義者間的勾心鬥角了，我們就可利用他們這種縱橫捭闔的局面而施展其有助于平民大衆的神出鬼沒的外交手段，雖則各帝國主義對于宰割殖民地壓抑殖民地民族革命是關係于帝國主義本身生命是有其共通利害會常常聯合起來的。

七　用什麼經濟政策。

上面已經說了：國家資本主義是爲由現階段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底經濟結構，所以平民政權建立以後，當然就應立卽消除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經濟統治勢力，消滅封建的殘餘，在集中與干涉兩個原則下面建設國家資本。

樹立國家資本有下列幾個前提條件：

1.關稅權絕對的自主　并用高度的保護稅政策以保育本國工商業的發展及救濟農業的衰頹。

2.收回一切銀行鉄路航業通訊機關鑛山及其它重要的由外資經營及外人管理的企業。

3.設置國家特許的租營制度，在一定年限内，以完全遵守中國的法律及其它有利于財政及工人爲限，允許外國投資團在本國經營企業。中國政府有完全制御的權柄。(以上三項是對外的)

4.廢止釐金制度，包稅制度，廢除現行稅率，特别是一切苛捐雜稅及不合理的田賦。

5.消滅惡幣，不換紙幣，軍用票等，以及其它一切軍閥的財政設施和其依存的掠奪制度。

6.消除官僚軍事机關的浪費。

7. 消除產業發展的障礙，特別是佃租，高利貸及地方公所行會等不合理的制限。(以上四項是對內的)

這幾個前提條件完全做到了，平民政權下的經濟建設才能迎頭猛進，今更進而一言其計劃。

甲 金融機關的國有便于吸收人民儲蓄，利用外資，推廣國際貿易，統一幣制，調濟金融，發展產業，以及其他一切控制資本運用資本等事。

乙 大產業，關鍵產業，獨立性產業的國營公營及促進合作社的組織，這不但可以防止及救濟生產者與生產手段脫離的弊害，并且可以養成生產者管理產業經營產業的技能及共同生活的習慣，爲將來產業社會化的階梯。

丙 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辦法爲土地國有的過渡以免地主的奪取和剝削。

丁 注意城市與農村經濟的平衡發展，消滅城市繁榮農村凋敝，城市膨脹農村萎縮，城市集中鄉村零落等剪刀形式的發生，避免社會主義建設路上的巨大障

礙。

八　社會文化事業的方針

平民政權建立的目的，既然是以社會主義社會為其鵠的，那末一切設施，毫無疑義的自當朝着社會主義路上前進，但是中國之離社會主義基本條件相去甚遠既如上述，自亦應有與過渡時期的政治經濟相適應的社會教育等事業的方針。

為要救濟社會上現存的弊病起見，應施行下列幾種社會政策：

a.改良工人生活：

b.確定女工童工保護法，危險工作保護法，地下工作保護法，

c.確定八小時工作制(地下六小時)確定工人罷工權；

d.確實施行工場法，使工人逐漸參加生產管理；

e.施行種種社會保險，成立職業介紹所；

f.規定工資與生活增加的比例，縮小勞心勞力職員薪俸的差額，提高士兵和

警察的生活，給退伍士兵以土地與資本，使其耕種。

g.創設無償的平民醫院，育嬰堂，鄉養院，孤老院。

h.禁止納妾或蓄奴及人口買賣。

i.限期推行無償的義務教育制。

j.普及政治教育。

k.舉辦普通的農業教育，勞動教育，及其它教育，其目標在使農民子弟及各職業團體的職工能直接受必需的教育，使學得其用，用本于學。

l.關於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教育以實證的應用的研究爲着眼點，使其普遍的深入于全國各地學校。幷極力防止學術脫離社會，陷于空談，教育產生士大夫階級的危險。

m.確定教育經費，改良各級教師之待遇，保障教師職業之安全，規定養老年金制，

n. 認教育為社會事業，只由國家監督，不由國家包辦。

o. 確立國家會考制，打破學校修業期滿獲得文憑制。

p. 停止教會在中國的文化侵略工作，一切教會學校應由中國收回自辦，其它外國文化機關亦然。

q. 限制文言，流通白話。

r. 限期普及注音符號及簡字并統一讀音。

s. 普及文盲救濟運動。

上面所臚列各條，皆為資本主義國家曾經標榜而為吾人所爛熟者，然而資產階級不過在危急時候用來一緩和平民羣衆的憤慨。及至事過境遷，依舊暴露其猙獰面目了。這在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條件之下是無論如何沒有完全實現的可能的，祗有平民羣衆掌握了政權之後，基于自己階級的需要，方能切實做個澈底，以驅使社會主義社會早日實現于吾人之前。

鄧演達先生的主張，約略的介紹于上了，我們不要戴上什麼着色的眼鏡，來看一看中國社會是否如此？是否應遵照鄧先生所指示我們的道路才有改造的可能？我想任何人都該首肯吧！

但是鄧演達先生已在這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買辦資產階級重重包圍的氛圍中犧牲了！已爲了不甘同化不甘屈辱而要領導平民大衆與這重重統治階級反抗而犧牲了！已被獨夫用不顧道義不合法律的卑劣手段把他送上了另一世界永遠不能再來喚醒我們領導我們了！

不過鄧演達先生雖然瞑目長逝了，而他留給我們貧苦農工大衆的南針是永久存在的。鄧先生的犧牲適足以證明鄧先生對于現社會認識的眞確。對于改造現社會方案的有力，在在均足以搖撼現統治階級的既得政權。所以現統治階級對于信奉史丹林主義及託洛斯基主義的信徒可以筆下留情，對于國內一切以革命來欺騙民衆來麻醉民衆的新舊士大夫階級全可以勾結儘可以分贓，而獨于鄧先生是不敢

有絲毫放鬆的。這不是對鄧先生個人有什麼恩怨在其間，完全是鄧先生的主張足以根本消滅他們的統治啊！

鄧演達先生留給我們這一尋求出路的寶貝，我們未死者該如何運用以副鄧先生在天之靈，而蘇被踐踏得快要窒息的農工大衆之命啊?!

天是在震怒，地是在動搖，風是在狂叫，樹是在發抖，無衣無食的大多數農工平民羣衆們便在這當中跳躍，焦頭爛額體無完膚，我們的責任很重呢！

鄧先生與中國青年

予之

一

今年十一月廿九日，正值革命導師鄧演達先生被毒惡的反動的獨裁主義者蔣介石暗害的一周年。全國無數覺醒了的平民大衆正在很悽楚洒着無量的熱淚痛喪着我們的領導者；全國無數堅苦奮鬥的同志正忍淚吞聲準備洒着無量的熱血爲我們的領導者雪恨報仇！我們平民革命的戰士們的心靈的底裏，跳動着良心的激憤和感情的悲哀，至今亘一年之久了！

這一年，悽悽慘慘的一年啊，雖在陰慘幽暗的深谷，走向無邊際的曠野之原，也在廣遠的荒漠中，看見無影的小鬼的跳動，聽到風靡的萬千草莽的聲的呻吟，獨裁主義者暴戾恣睢，不抵抗主義者喪地萬里，空前的巨災，長期的內戰，……民族的生機和國家的命脈，早被這一般橫蠻雜種的斬斷送了——生在這境遇裏的

青年，冒着時代的艱險，挺身前去，敢於與黑暗勢力決鬥者，正遭遇那殘忍的統治者的殺戮，如宰牛屠狗一般的犧牲了！畏縮在時代的氛圍中，憂鬱感傷，自嗟生涯落拓者，則苦腦着而踡伏於空虛的生活中，這正是眼前普遍的一幅「青年園地」的荒涼慘象！更有些鄙吝之徒，在「反時代精神」的各種努力中，虫營狗苟，居然得寵於統治階級，豢養在「清一色」的黑線上，做着工具，販子的工作！

唉唉，在這慘酷，悲哀和迷惑的時代裏，追念我們的死者，更悟出了人類的不幸，更覺得在中國革命的歷程中，深刻一種峻嚴苦澀之痕，是中國革命一種無可抵償的損失！

× × × ×

二

讓我們紀念革命導領的哀哭中，檢閱這一年來青年在社會生活的現實罷！

從經濟上說，亘古至今，中國社會的結構裏，家庭占着中心的地位，這本是

農業社會的象徵。自帝國主義的勢力傳佈以後，家庭生活，便隨着農村經濟的崩潰而暗淡，而殘落了！幾口之家，饑寒交迫，妻離子散，這大概是無須細數即可明曉的事實。青年在這樣的家庭裏，有的胼手胝脚，日夜不止的苦工着；有的棄井離鄉，到處流亡的討吃着；破落的鄉村裏隨處都可看到這樣痛苦生活的青年，他們對於現實的憎惡和渴望那廣闊的生命之源泉，是有着難於抵擋的熱力的。

上面所說的青年，是平民大衆裏面最不幸的一羣；還有僥倖而生在小康之家的一羣青年，雖不胼手胝脚，到處流亡，比之上述的一羣，自是很幸運的了，但現實的醜惡擺佈在他們的前面，整個經濟的破產，擴大破滅了他們那溫和親愛的家庭，這也是已經明白顯出來了的事實！他們受着這命運的威脅，對於現實的恐懼和未來的期望，那也是同樣有着無可抵擋的熱力的。

說到身蔭祖宗之福，正在受着中等或高等教育的青年，他們能夠領受一點文化的沐浴，發展自己的智慧，自然較上述的青年更幸運多了，可是，在整個經濟

破產和家庭生活殘落的演變中，他們也無所逃於破滅的命運。近年以來，知識分子的苦悶和出路的喊叫，不是震天撼地的響着嗎？許多青年的熱血和頭顱，不是被革命的洪濤捲去了嗎？許多青年的靈魂和肉體，不是墮落在無底的深淵了嗎？在青年知識分子的營裏，任何一個都有一個被時代威脅着的問題！—即失學，失業，找業——橫陳在心頭。有許多削尖腦袋去鑽營，爲非作歹，跟着惡徒們跑上反動復古的道路；有許多冒險衝鋒，受着第三國際愚昧的號召指揮，走上違反革命的迷途；更有的陪嗟感嘆，消極自殺……。

如上所述的現狀，籠罩住了全國的青年。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舊的經濟組織已破壞，新的社會建設，沒有完成，反一天天的殖民地化，一天天惡劣了！

× × × ×

很明顯的問題擺在眼前，如上所述的這類情形，是於中國革命有利的條件；即是說，今日的青年羣衆，都客觀的非革命不可！又因整個的世界環境和社會環

境，向着革命之路突飛猛進，現時的農工羣衆又都先後醒覺，踏上政治鬥爭的舞台，今日青年知識分子，主觀的接近農工平民大衆的革命意識，這已是中國社會環境决定了的趨向。

× × × ×

三

鄧先生具着時代最高的智力，精悍的，聰明的，進取的决行反抗，如天馬之行空，爲了國家的偉業而英勇地自忘其身的拚命反抗那黑暗的反動復古的統治階級；在以農工平民大衆爲革命的中心力量的戰營里，光芒萬丈，撼動了全國平民大衆的靈魂，掀起了反動統治勢力的崩潰，發出響亮奮鬥努力的強有力的號召。

鄧先生忠實於中國革命的理論的闡述，全留在一部燦覺鋒貴的遺教裏——鄧先生遺留給我們的，就是這一部富於色彩更多血氣的洋溢着戰鬥的壯烈之氣的遺教！

在這裏，我們僅要一點述叙鄧演達主義一個輪廓的必要。

鄧先生在解說中國革命核心問題的時候，有如下三段的話：

『在經濟的意義上說：是肅淸中古時代的殘餘、特別是落後的破碎的小農經濟生產，應該加以改造，同時帝國主義侵入後的買辦高利貸經濟應加以淸盪除治，目的在：以集團的力量構成「計劃經濟」（Plan·wirtschaft）或「國家經濟」（Staats Wirtchaft），一面使生產力加速度的發展，一面使分配向着平均的路途』向着社會主義的路途。

『在政治的意義上說：鏟除官僚政治及軍事獨裁，使士大夫地主豪紳專政的傳統的政治形態澈底的掃淸。目的在：由人民直接掌握政權，而且使政治組織與經濟生活密切而不相分離，澈底的掃淸士大夫「空談誤國」及「一部論語治天下」的黃老政治及儒家政治。更是掃淸牧民宰民的毒害。

『在社會的意義上說：掃除「名分」，「偶像崇拜」甚至於買賣人口，奴役

人民的社會意識及社會行爲。特別在文化的設施上，掃除士大夫階級專有「文化」（當然他們所謂文化只是搖頭擺尾的臭東西，）的不平，及士大夫階級「寄生文化」，「腐蝕文化」，而代以人人所應有的「生產文化」，創造的勞働文化』。

從第一段看，主要的中心問題，是農民革命，是完成資產階級的革命任務；土地革命卽爲完成這一任務的中心工作。但標榜着的社會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的建設。

從第二段看，担負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的，是廣大的農工平民大衆；領導社會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前路的，是強固的平民政權！

從第三段看，強固的平民政權之建立，要廣大的農工平民都從迷夢中覺醒，打破傳統的精神上的頑愚和束縛，改造文化的內容，提高文化的水準。

這未免有描寫「太簡單」之誚；然而，鄧先生對於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的指

導，已經寫出一個明確的概念了！落後的，殖民地的國家的革命形式，必先有了一個站在被壓迫階級立場而建立的強力的政權，作為偉大的橋梁，由此渡向平民革命的勝利和解放。從這裏，我們發見了應走的路的出發點了。從這裏，我們發見了指引前進的光輝，這光輝約束着偉大的現在和未來！

× × × ×

在遺教中，我們更可體會鄧先生對於中國青年指導精神之偉大！

兩種力量，為決定中國革命復興命運的基本條件。第一，農工及青年羣衆的本身組織底擴大和深入；第二，具有農工平民意識的青年軍官能自覺的接受革命的任務，自反動的營壘中，發動出來，做掩護人民起來革命的前衞。（見鄧先生「復興中國革命的手段」一文。）鄧先生深切的認識青年和青年知識分子在革命運動的行列裏的作用，故對於青年的指導和訓練，是非常嚴格而緊張的。

第一：在思想認識方面，應該了解社會的進化是依從於社會經濟底發展。革

命者的作用，在於把握着社會進化底規律，認識社會客觀的要求，自覺的積極的行動，而且集團的去行動。一切幻想的浪漫的個人主義者都不配做革命行動的戰士！

對於中國社會，應明白認定，中國現時在封建殘餘及前期資本主義的階段，所以我們的責任：第一步在解放中國民族，建立平民政權，發展國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第二步在由國家資本主義過渡社會主義。凡違反社會客觀要求的盲動主義者都是革命行動的仇敵！

第二，在行動方面，應該注意：革命者是實際的，行動的，不是空想的或空談的；革命者是革命羣衆——被壓迫被剝削的農工小民大衆——當中選拔出來的先鋒。先鋒的作用是站在羣衆先頭作戰。所以革命行動的戰士應該不斷的去組織羣衆及率領羣衆去爭鬥。只有不斷的爭鬥，可以集聚隊伍，可以鍛鍊羣衆，可以鍛鍊自己，鍛鍊推動社會的機輪，摧毀殘酷凶惡的反動的舊社會勢力，樹立新社

會的基礎。凡蔑視羣衆，嫌惡羣衆的或空談空想的都是革命行動的仇敵！

第三，在生活方面，應該認定，現時中國工人的平均生活每月不過五元左右，農民不過三元左右。革命行動的戰士的職責是永遠代表農工平民大衆的利益而奮鬥及犧牲，所以同志們的生活水準應該和農工平民大衆的實際生活不相懸遠。為職務及工作的關係，同志們的生活固應盡力設法保持身體的健康；但，應該知道，只有農工平民大衆的生活提高以後，我們黨員同志的生活才能有提高的權利。所以刻苦是革命行動戰士的倫理（上文為　鄧先生親手所擬，見本黨青年訓練綱領。）。

鄧先生這樣勇敢地響着鬥爭的呼聲，表露平民革命的色彩和血氣，那可驚的精力，發出新時代的曙光，如此深刻，如此悲壯，如此熱烈，如此豐饒地在青年羣衆的心靈的深處跳動着！這應該是一個永不可磨滅力量啊！

四

鄧演達主義的精神在今日青年底心的深處作用着，旣爲無可置疑的事實。縱使反動的統治階級如何誣衊，侮辱，毀謗，摧殘，也不能動搖這牢固的根基了！

然而，我們的導師已離開革命的戰場而長逝了！革命行動戰士們對於未來昏暗的墮落和有傷革命進展的迷行，則站在鄧演達主義立場上的我們，是不能不戰慄的及早加以注意，担負復興中國革命責任的青年，更應該研究鄧演達主義意義的精深，認識鄧演達主義精神的偉大！

× × × ×

站在農工平民大衆的立場，從事領導中國革命的鄧演達主義，是和着今日困苦顚連的平民大衆的實際生活打成一片的；平民大衆們，已經開始明白了人類生活的改造，明白了黑暗反動的統治階級的猙獰，醜惡；那荷鋤者的叛亂，那工場裏發出來的鬥爭的響聲，那輾轉呻吟於破廟荒村中的飢餓者的慘叫，那……凡這些，綴成一幅悲慘的圖畫，統治者對此顯然露示窘狀，高壓的屠殺政策，也無能

為力了！平民大衆開始走向他們應走的路線——平民革命，平民革命的領導者——我們的黨，受着平民大衆的貧苦的洗禮，必發生一個共通的意識，不消說，那卽是革命底精神。

說到革命底精神，非指感傷的詛咒和不顧前後的亂闘，專以玩味革命爲快之流的意味。革命行動戰士的底精神，是從鄧演達主義裏薫育發展的，作爲平民革命的前驅，以最猛烈，最果决，最誠篤的意志，貢獻其生命於平民大衆，鄧演達主義者的革命底精神，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和平的，勞働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

× × × ×

鄧演達主義恰恰站在反資本主義的立場上，和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是不相容的，以此和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相對立，正照耀出鄧演達主義者非個人主義底精神的輝煌偉大。在這精神作用之下，生長了革命的平民階級的意識，有着新的內

容，擴大的，深入的充滿着戰鬥的精神，和那軍國主義，金力主義一類醜惡的支配勢力宣戰；能夠保持集團的生活，把那游離的，混雜的，分離革命勢力的阻礙物，乾淨掃除！

× × × ×

非個人主義底精神的延長，卽爲世界主義底精神，十八十九世紀以來偏產業主義理智主義，卽資本主義的發展，使世界的生機息息相關的聯繫着，瀰漫了現世界的改造的大機運，已不是鎖國主義的，而是國際主義的了，用銳敏的眼光來審察今日世界的動搖，卽可明白今日世界人心的不安不滿和對於資本主義的憎惡痛恨，無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更可看到最近世界大戰的危機的暴露和世界革命的呼聲的激盪，以及弱小民族鬥爭的叫號，都可看做世人想從資本主義的壓迫下救出平民大衆的奮鬥和努力。在這意義上，鄧演達主義恰在今日世界動搖的階段中產生了，活躍的嚮導着世界改造的大方針，一路指示出人類走上合於理想生

活之路來。

× × × ×

我們已經指示鄧演達主義的精神：

一，革命底精神，

二，非個人主義底精神

三，世界主義底精神

這三個精神，是革命行動戰士不可缺少的要素，要有這，纔可堅定意志，纔可打破未來昏暗的墮落和有傷革命進展的迷行。

五

鄧先生雖然死了！然而，時代的車輪瞬息不停的向前轉動着，平民運動潛伏的力量也大爲進展了！這些放出來的未來的希望底光芒，現在正生長着，演化着。對於事業的失敗和惡勢力的摧殘，我們是萬不可畏懼的。要有這膽氣，纔可知

道信仰，同時也知道戰鬥呵，

因此，我們對於現代青年所懷抱的憤惱和苦悶，是應該懇切明確的引導到孫演逸主義之下，振拔起來，共同担負復興中國革命的任務。

本文的前面，即已詳細敘述過今日青年的處境，我們認爲那是現代社會制度下一個必然的結果。更仔細檢查一番，覺得青年本身生長着許多的弱點，這也是不可掩飾的事實。

× × × ×

革命之中，青年情感非常熱烈，容易爲革命勢力所鼓動而活躍起來，革命失敗之後，又因青年的閱歷不深，意志薄弱，而容易趨向於消沉。但，深刻些去觀察，即發現今日中國青年的心靈深處，實有着兩個矛盾不相調和的慾望：一面濾脫不落舊的社會薰育下來的傳統觀念和封建關係，一面習染了西洋文明的資產階級生活的光榮，而在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之下，不僅兩個慾望不能完全達到，即滿

足一個慾望拚棄一個慾望，無論是那一個，都不可能。因此，擺在青年之前的是虛影，是幻滅，誘引到頹喪哀傷之圈裏！

這意念之出發點是個人主義的；今日正有着許多青年抱着以個人主義出發點兩個矛盾不相調和的慾望，到處活動，在找尋出路的漩渦裏，一樣也會流到頹喪哀傷之圈里的。要挽救青年頹喪傷的命運，唯有青年自己振作起來，拋棄個人主義的意念，接受非個人主義的精神，抓住一個時代的信仰，鍛鍊自己的戰鬥力量。

又從另一方面想，什麼是青年知識分子的價值呢？這并非因爲知識多，而在富於爲了眞理，有着甘願遭受無論怎樣痛苦經驗的熱情和勇氣。有着這熱情和勇氣的青年智識分子，是不會無路可出的；而且將爲這國中的中堅人物，這國中的新鮮的生機！

×　　×　　×　　×

讓我們喊着：

青年們！我們所處的時代，不是安甯的，是破碎的；不是享樂的，是需要創造的；廣大的農工平民大衆在死的血泊里掙扎生命的出路，整個中華民族，在國際帝國主義鐵蹄踐踏之下，奄奄一息。你們從何處找安甯，從何處獲得享樂！

青年們！鬥戰的精神，是從失敗中磨折出來的，信仰的確立，是從險惡中堅定的；我們要從物質的根底上，把握世界動搖的樞紐，更從這樞紐中，擴大我們奔騰策劃的領域！中國革命遭受反動獨裁主義者的刦持，煽動主義者的破壞，由高漲而低落，由順利而挫折了！但，復興中國革命的洪潮，快爲廣大的平民大衆所掀起，我們要努力準備，努力傳播革命的信號，努力鍛鍊推翻反動的政治勢力的力量！

青年們！鄧演達主義是中國平民大衆的救星，是東方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明燈，我們要勇敢的彎着鬥爭的號呼聲，深入平民大衆的羣里，辦睡着的平民大衆的沫，的心里的潛意識喚起來，將散漫的平民革命的戰士集中組織起來！

青年們！現實生活的殘酷，是促長革命危機的源泉，我們要具着對於現實冷靜明澈的探討的基礎，要具着由死而生的決鬥的精神和刻苦忍耐的毅力，正直地，大膽地，踏上鄧先生的血跡，從事於勝利的鬥爭！

× × × ×

同志們！我們用不着感情的悲哀和流涕了！在紀念中，試檢閱一週年來，對於鄧先生所指示於我們的政治主張和鬥爭的路向，盡了多少的力？今後我們怎樣去展開平民革命的戰線，怎樣澈底的去貫徹鄧先生所遺留給我們的主張！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鄧演達先生的文學主張

郭文彪

我初次會見鄧演達同志是在國民革命軍剛攻破武昌城的第三天。當時的革命空氣，十分緊張，而指導革命工作的，——軍事上及政治上固無論矣，卽在文化上似乎都是由鄧演達一個人在領導，——似乎只有鄧演達一人。

我因爲在北方住了幾年，雖然在報章上可以常看見廣東方面的革命的情報，但總有未能了了之處。並且受了個人環境的支配，對于新興的革命勢力也有不少的懷疑。到後來聽見國民革命軍居然以破竹之勢攻下了武漢三鎮，我當時在北平感着無限的驚異，于是決意辭去××中學的教務長的席位，飄然南下。動機是，一由于好奇心欲一覩革命的實狀，二由于久厭北方的腐朽無活氣的生活，想乘此機會轉變一下。說參加革命固然不敢，但說純然是南下投機，我亦不肯承認。

到了漢口，便找着二三位故友，——都是在軍政界佔有相當的地位，無needs穿

軍服的，也居然穿起軍服掛起斜皮帶來的友人。——他們都勸我不要北歸，就在這個革命的新天地中，參加國民革命的工作。

我因爲是專門研究純哲學，對于政治固無甚理解，卽對于一般社會科學亦少閱覽，談到經濟學，更是瞠乎無以對了。

『我不懂政治經濟，又不諳軍事學，有什麼革命工作可以給我做的？』

『你可以做文化工作。我介紹你去會鄧演達，他是愛才如命的人。無論是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在他都是認爲有用處的。他像是在決行他的野無遺才的主義。』

我只當是朋友們在說笑，也只是陪着他們笑了一笑。但是，聽見他說可以介紹我認識鄧演達，我又有幾分想去瞻仰瞻仰這位當時轟動全球的怪傑，同時心裏又感着微小的不快，因爲這兩位故友　竟以牛溲馬勃視我了。

到後來，我才知道這兩位朋友是以馬克司主義者自命的左稚者，所以才敢那

樣的向我放肆。

當時，武昌還沒攻下。我一個人睡在旅館裏，每晚上都聽見炮聲。我也不想管鄧演達了。只打算北京的款匯到後，便轉道上海，回北京老家去。

但是十月中旬的一天，那兩位朋友之一，忽然送了一張紙條來，叫我于明早清晨到南洋兄弟香煙公司大樓去和他一路過江拜會鄧演達，並且說，他已經先和鄧演達約好了，他也極願意見我。因爲我雖在法國留學，但曾在柏林住了半年之久。鄧演達到德國時，我和他雖失掉了見面的機會，但他薄薄知道我的名字。

那時候，鄧演達真是很忙，和我只談了五分鐘。他和我握了握手後，便笑着問我：

『你在法國多年，對于無政府主義，很有研究吧？』

以後便略談些革命的問題。我雖然不十分了了，但也敷衍了幾句。我的老友便乘機打了一下傍邊鼓：

『郭先生也願意進來參加革命工作。』

鄧演達立即答應了要我担任一部分的國際情報工作，特別是西歐方面的。

總之，鄧演達給我的印象是意想外的良好。最初，我只當他是年少氣盛，不容易接近的人，尤其是聽見他是廣東人。廣東人的性質雖然樸直，但多是胸地狹窄的。未見鄧演達以前，我斷定他也難逃此例。但會見之後，我才震驚于他的渾雄偉大。他之接見我，沒有半點虛飾，他固然不假裝出禮賢下士的醜態，但也不取高踞臨下的態度。他對人是取純平等的，眞摯的，朋友兄弟的態度。並且我還直覺着他並不以牛溲馬勃視我。

我想在工作之餘，翻譯些革命的文學作品。（當時共產黨氣焰頗高，我之無辨別地自動做這種工作，及今想來，確是有三分投機。）很想和鄧演達作詳細的長談。但因他太忙，終無機會。同時又有許多既成作家，幾個文壇偶像，高踞在我的上面，——由主張血淚文學以至戀愛文學等等大家，應有盡有，鄧演達均羅

致之于一堂，作孟嘗君之養士，——似無勞喧越俎代謀。不久，我便辭了職。但不是俱逃出赤都，而實是不甘只吃飯而不做事。

受盡驚恐才經過上海，回到北京，我仍舊繼續我的粉筆的生涯。

歸後三年間，完全沒有聽見鄧演達的消息。

十九年冬，我因失業，又南流到上海來了。在上海住了不久，便有一位朋友來約我去會鄧演達。見面之後，回憶到舊日在武漢時的情景，真是感慨無限。不過這種廉價的無益的感傷，(Sentimentalism)我們是無需要的。他和我略談了些他的政治主張之後，便提出文化運動，——特別是文藝工作——的問題來和我討論，並要我在這方面多負點責任。

文藝是文化材之一，故欲知鄧演達同志之文學主張，當先明白他對于文化的見解。他在他的『中國內戰與文化問題』裏面說：

「……一切舊時代的倫理，哲學，科學，藝術的渣滓都要隨時代所遺傳下來

的臭虫，虱子，蚊虫……等污穢而被擯清洗滌。新的一切，要從偶像的供奉與自然的威脅等危險當中樹立起來。在『人的』覺悟上面，和舊時的一切鬥爭。同時中間『人的』覺悟恰好在世界的文化轉變期，——由『個性自由』的奴隸文化轉變到『社會自由』的創作文化的階段，負担中國歷史任務的人們，實在有極重的責任！』

在這段裏面所述，我們要注意到鄧演達同志所極重視的『人的』文化，『社會自由』的文化，及『創作文化』！

他還繼續着說：

『……批評的精神是在現時初覺的中國社會所必需的。一定要有批判的精神，才能了解過去的污暗無光。一定要有批判的精神　才能徹底的了解歐洲文化的意義，及其與中國的關係，而系統地輸入進來。……我們所要的精粹是批判的文化。我們所反抗的是傳統，是偶象的崇拜。』

由上述，我們又不難知道鄧演達同志不僅欲打破傳統的文化，並且熱烈地要創造新的文化。爲要創造新的文化，他不惜輸入外國的良好的材料，而用『批判精神』這個機器，加以製造。即應中國的現時代，現社會的客觀的需要，融化外來的文化，而製成我們的固有的創造的文化。他是絕對排斥偷換商標的現成的舶來品，——無論其如何新奇，他是反對囫圇吞棗地以外來的現成文化爲自己的文化！

他的這種主張，當然可適用于文藝上來的。在當時曾一時支配着中國全文壇的所謂普羅文藝，受了政治的干涉，稍稍下火。替之而興的，是憑着統治階級的惡勢力，掛起『以禮義廉恥爲立國之本』的老招牌，雖曾闊步橫行于一時，但終于因爲無社會礎基，不爲客觀的廣大民衆所要求的腐朽的偏隘的滓渣文學，——所謂民族文學。此外尚有些舊式的文化，——在農業文明大部分的沉淪之後，所遺留下來的殘砂散礫，以恬淡，幽默，嚴肅，單調爲其內含的一面，而亂雜及幼

稚又爲其內含的他一面之隱逸文藝，　專講幽默的趣味文藝，對于中國之現社會，現民族是完全無關痛癢的，若更落一步，便會變成糞坑裏的爬虫，愈爬愈臭而已的文藝。

由前述的鄧演達同志對于文化之主張，當然，我們都不能滿意于上舉之三種文藝。我們所要求的是在客觀上，適應中國現社會，現時代廣大的被壓迫羣衆之需要的，依我們的批判精神而創造出來的『人的』文藝！

我們暫稱這種文藝爲平民文藝。

普羅文藝是囫圇吞棗地輸入來的，可以說是一種傀儡文藝。民族文藝是因襲的渣滓文藝。（中國的史實，十分之九以上是一種民族文藝，無毋再煩勞統治階級去提倡。）而專講幽默的文藝，說好一點是骨董文藝，說壞一點是骷髏文藝。

——魯迅是這派的大將。

今更進一步，對于我們的平民文藝，　『人的文藝』，同時是『力的』文藝

，——本鄧演達同志的主張，略加解釋之如下。

本來，一種理論之創造是不容易的事業。鄧演達同志以百忙之身，並且在短少的時間內，欲指導我們完成一種文藝的理論，本是無理的要求。所以下面所述，只是略具大綱而已。若欲作更進一步之研究，當然是我們後死者的責任。我們無論在任何方面，都要竟死者之志，始足于對我們的革命導師鄧演達同志，亦始足于對中國現在的廣大的勞苦平民大衆。

(A)什麼是平民文藝？

文藝是生活的最高表現。文藝的作用不僅是在傳達，而且必需代表創造的時代要求，作新時代的『篝火』和『動力』，特別是在情感方面去喚起羣衆使羣衆的覺悟力，實行力，更加強大，並使他們相信將來的理想，以戰勝當前的困難和痛苦。

平民文藝應當是平民革命的前奏文藝，一種『動力』的文藝，特別要注重于

情感方面之推動，以之爲我們進行革命時的先驅的『篝火』，故知平民文藝的任務是非常重要的。

平民文藝是代表廣大的被壓迫羣衆之要求，代表着被壓迫的平民羣衆要求解放的理想。——一方面對過去及現存的制度加以批判，——對于現實生活的批判，一方面爲將來創造，——由平民大衆的革命達到沒階級差別的社會而加以描繪及推動。故平民文藝是具有羅曼諦克性的，（注意，這不是通俗的所謂浪漫性，而是在文學史上二大潮流，寫實主義，Realism 與羅曼主義，Romanticism 相對照之羅曼諦克性）即是具有一種情熱與理想。因爲它要以高超蓬勃的熱情去反抗一切的壓迫，反抗舊制度之虛僞黑暗，而達到人的解放。同時它又是帶有『理智性』的，因爲它要求生活之合理，以合理的生活代替虛僞的生活，代替『勞而無功』的生活，使生活的效能提高，使生活豐富化！

平民文藝是『人』的文藝，不是機械的文藝！它反抗一切特權階級，反抗『

奴視人』，『役使人』的特權階級。故平民文藝在主觀上雖是廣大的被壓迫羣衆的文藝，而其最高鵠的是，『人』的文藝。因之平民文藝的理想是，創造的勞働，自由，平等，博愛！

(B)平民文藝在題材上之着眼點。

(1)對于現社會描寫。

黑暗的，殘酷的東方社會，應當絕對地加以排擊。關于現實的暴露，實爲着手批判的前提。對于各階級之現實生活，應與充分地把它們暴露出來。

(2)對于廣大的平民羣衆在過渡時代的悲哀與希望之深刻的描寫。

現時代的象徵只是一個過渡。過渡時代的特徵是失望與希望。失望之點，應該是悲壯的。希望之點，應該是熱烈而活躍的。如果我們以爲(1)項工作是消極的，靜的寫實。那末，本項的工作就應當是

積極的運動。

（3）關于倫理的批評與積極的主張。

整個的中國舊時代的倫理，我們認爲是宗法的，封建的。至通商口岸的買辦階級們所實行的基督教倫理，則是拜金主義的奴隸倫理。故我們在消極方面是要『反對孔教，反對基督教』。在積極方面則應有如下的主張。

（1）對于婚姻認爲絕對的自由，但以絕對平等爲條件。

（2）對于家庭認爲應守人人有職業的原則，不許寄生與供奉。但在過渡期中應該相對的互相扶助。家庭的組織須達到以夫妻爲主體而打破大家庭的舊習。

唯不能因此妨碍了積極的工作。

（3）對于子女應負絕對的責任。重質不重量。故應提倡有條件的生育。

對于子女之愛，應特別加重。我們須移對父母之愛於子女，因爲將來勝于過去。

(4)對于朋友應積極的提高友愛的質量，並增加其分量。封建時代的豪俠與忠貞，在友誼上是應該保存並推廣的。

(4)關于文字上的注意：

我們的平民文藝，自然是主要的以廣大平民羣衆爲對象，故文字務求淺顯，凡非日常用語及語法，務須避去，只求其平易而能表現微妙深切的情感。對于外國語法應在淺易的範圍內，逐漸引用，因爲由此可以增加中國文字的質量及分量。

(5)對于中國古典文藝的態度：

我們認爲中國文藝有其固有的相當的價值，特別是詩，歌，辭賦，及曲部小說，一切有崇高的生活理想與現實寫眞的文藝，都應該相

當地推賞。但須注意的是在吸取其精華而棄其糟粕。

（6）平民文藝與普羅文藝及民族文藝：

平民文藝，如上所述，它的本質及趨向大概確定了，由是我們可以明白它和普羅文藝及民族文藝的區別。我們認為普羅文藝本身是否能夠成立一個整然的系統，尚是問題。即使勉強能成為一個系統，也不過是一個過渡的象徵，——反抗資產階級文化的『口號』而已。何以言之？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無階級的，故普羅文藝在社會主義社會是無對象的。同時我們認為中國的社會不是西歐的資本主義社會，故普羅文藝在內容上說是自相衝突的，在外延上說，是不合于中國社會的要求的。它的結果不是失之狹隘，就是成為自覺的工具主義，而喪失了文藝的意義。

最近有所謂民族文藝的產生。我們承認民族的共同要求，在歷史的

條件上固然有相當的意義與必然性。但是祇限于政治的及經濟的之一時的對策，絕不是社會生活之最高形態。我們認爲拋棄了社會大衆的解放，而專着眼于民族，結果不是自大，——帝國主義的，——就是落後，——中古時代的鎖國政策。——並且有陷于 Chauvinism 之弊。故單純的民族文藝亦是不合于中國社會之要求的。因爲它將不自覺地淪爲資產階級的工具，（在德法兩國此種例最多，）及帶有復古的落伍性。

以上是鄧演達同志的平民文藝理論的大綱。至其發揚與光大，則我輩後死者，——尤其是從事研究文藝的同志們——所不能辭其責了！

一九三二年鄧同志死難一週紀念日謹誌

革命雖然是失敗了，我們的歷史任務却依然存在。我們的責任是在挽救革命，而且要轉敗爲勝。中國革命的開始已八十餘年，中間的失敗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次。但是每經一次失敗，隨即得着一次新的勝利，人民的覺悟力量即增加一分。

鄧演達先生「文藝觀」的探討

楊大荒

（一）文藝是什麼？

『文藝要超越一切，它是如何的高貴和清幽喲，它是不受時代的瘋狂所牽動。所以，詩人和文學家也好比它的作品一樣，一樣的高貴和清幽；一樣的不宜捲人時代的漩渦……。』帝國主義的租界，資產階級的洋房是它們的「象牙之塔」，它們閉了眼睛自己在吟誦消閒外，還把這些爛調來向別人痲醉。于是，詩人們必須吟風弄月望天河，小說家舞弄起筆尖，把社會落伍的心理傳揚。如果它們問進步的一流，那麼，不是介紹些西歐前世紀的文學，那便是穿上一身Amrioainsm的外衣，替洋大人傳話，幫資本家辯護，它們對藝術的見解，其形成：認做是「一種天才的發展，」其功能：要不是「爲藝術而藝術，」那麼免強說着：『Art fop humanlife。』的濵糊話。

在中國，很早文字與語言間起了很大的差別，文字的用途，偏側到統治者及智識份子中。如在朝庭官衙間的「詔書」與「奏章」等有特要的用處，而在民間所需要于文字的，不過賬目的記錄，契據的套語等等而已。一般勞作的人民，多無暇及此，只有少數有閒的豪富子弟，去灣腰曲背地翻閱經史典集。于是，又幾乎再進而為「統治者」及「士大夫」的專有工具。在勞作的人民間，所謂「書包翻身」，那是絕無僅有的湊巧。一般民間的文藝，正因為失却了工具——文字除掉詩歌外，(因為詩歌的創始，不一定先用文字去記錄。)簡直產生與流傳得很少。但，古人對詩歌的認識怎樣呢？詩經的大序裏說：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後來朱熹註詩經，他的序又說：

『或有問于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詠歎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

而在劉勰的文心雕龍明詩篇說：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綜合上面的意義，便是說，詩歌發源于「感」，由「感」加上「語言」「嗟歎」「節奏」的技術，便是詩歌了。但是詩歌的意義，是不是就這樣包涵了呢？文藝的範圍裏只有詩歌麼？

人的「感」與「想」有鴻溝區別着，感是直覺的，想是把它連繫觀念的。這兩種機能的效力，前者發動到藝術的系統去，而後者向科學的系統去了。

從「感」的表現到藝術形態，必須加上技術。例如用音調來表現，那麽便是

音樂；用色調和線條來表現，那麼便是圖畫；更如用之于土木金石方面，那麼便是建築與雕刻等；像文藝，那便是應用文字的術技來表現。用文字表現的，包涵還是很廣，如小說，詩歌，戲劇，甚至與文藝關連的彈詞電影漫畫等等。

「感」的發生，由于「感觀」接觸到外界的刺激。但是兩個人同一個境界裏，會發生判然不同的感；也會產生兩種不同的藝術品，爲什麼呢？例如龐大的廠房與軋軋的機聲以及工廠警衛軍的刺刀，這些在工人看來，是剝削壓迫與屠殺他們之怪物，使鼓動了怨忿，恐怖，仇恨的情緒，而在資本家看來，這是自己的聚寶盆與護符，適足以自豪。所以外界事象可以刺激出人們相異的「感」。這樣，能夠決定「感」的，除掉「外象」的作用外，還有「內在」的作用了。內在作用主要是什麼？是「意識」了。上例，就爲着資本家與工人意識的不同所使然。這裏更值得注意的，意識的組成，是由于社會形態複雜的總合，是社會決定個人的意識，而不是個人去自由決定。文藝的表現，也是如此的。所以說，中國當前象

牙塔裏的藝術家，也隨了他們的象牙塔，一座座搬上火山的爆裂線上，他們的吟詠與情緒，也必然地隨了象牙塔而飛迸。

意識形態(意提渥洛奇)既然不能決定個人的自由支配，它並且是一定的取決于社會的經濟構造。革命的意識形態，可以鼓動革命的羣衆，革命的文藝，可以使革命羣衆的互相欣賞與砥礪。總之，它可以把落後的意識刷洗，把革命的潮流推進，所以鄧先生說：『文藝是生活的最高表現。文藝的作用不僅是在傳達，而且必須代表創造時代要求，作新時代的「篝火」和「動力」，特別是在情感方面去喚起羣衆，使羣衆的覺悟力實行力更加強大，並使他們相信將來的理想，以戰勝當前的困難和痛苦。』

革命的時代裏，文藝應當被革命羣衆運用做新時代的篝火與動力是無疑了。革命羣衆一方面自己去創造革命文藝，另方面去欣賞革命文藝，助長自己的興趣；再方面還可以鼓動後起的羣衆。

所以已往列甯把握住俄國革命中，對於藝術所要求的說：

「藝術非爲着全民，是爲幾百萬勤勞的大衆——就是非爲着工人農人而存在不可。藝術，非成爲這些人們的東西不可。藝術的根底，應該深的埋在民衆裏面。藝術非使大衆理解不可　非使大衆愛好不可。藝術應該和他們的感情，思想，意志結合，而使他昂揚起來。工人農人大衆，正在需要黑麵包的時候，我們難到將一點甜蜜的餅干送給少數人就行了麼？

(二)Right Wirg是工具，Left Wing也是工具。

但是，在這轉變的時代裏，中國文藝界是怎樣的情況呢？

從雜亂的中國文壇裏，比較可以注意的，有兩個不同的口號，他們也走的不同的方向。這兩個便是：(一)向後轉的民族主義文藝，(二)偏激的普羅文藝。

第一，先說民族主義文藝。「民族」這個口號，假使單純要地把它喊起，那本是最適合于資產階級的口舌。資產階級一只手拿着國家主義的牌照，向封建的

割據的社會裏招魂；一只手却舞弄着民族主義的牌照向工人說：『工人啊，我們是同一血統，共通語言，合用文字，一塊兒疆土住着……耐苦些做工吧；我們資本家和你們同是中華民族啦。』但是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裏的民族主義是不是，這樣的應用呢？這種狹義的「民族」，是否把「民權」「民生」忘掉呢？對外「民族」與「民族」間要發生如何的反響呢？文藝是不是拿這「民族」來做產源和鵠的就算了事？

轉變期中的中國，國際與國內的情形較之于六十年前的日本維新運動時期，彼此各有不同的方向，當時日本所愛戴的「民族主義」的口號，可以把它抄襲麽？同樣的道理，前世紀西歐各國所喊的民族主義，可以剽竊來應用麽？

就實際所表現「民族文藝」的，羣衆裏並沒有這種傾向，只有一部分被買辦資產階級收買了的文人，勉強地吹唱。可是在理論上，還是互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在創作上，也並沒有把「民族」的什麽表現出來，即使有些，那便是非牛非

馬，絕少藝術的評價。他們的動機便是効身做「Right Wing的工具」，所以，即達到他們的目的，也只是「工具」吧了。這一派可以把南京的文藝月刊做代表，而他們的朋友是「新月派」「長風社」。

所以鄧先生說：『最近有所謂民族文藝的產生。我們承認民族的共同要求，在歷史的條件上固然有相當意義與必然性。但是祇限于政治及經濟之一時的對策，絕不是社會生活之最高形態。我們認為拋棄了社會大衆的解放而專着眼于民族，結果不是自大——帝國主義的，——就是落後，——中古時代的鎖國政策；並且陷于Chauvinism的危險。故單純的民族文藝亦是不合于中國社會之要求的。因為它將不自覺地淪為資產階級的工具（在德法兩國，此種例最多），及帶有中古的落伍性。』

第二，普羅文藝。它有最近的五年內，中國比較具體的喊起那樣的口號。無產階級在文化落後的中國，本身在文藝方面能否有些創作或能力（包括技術與時

問），已經夠我們的疑問了。且慢些檢討這五年內有否無產階級的文藝，先問五年前的文壇上，有否普羅文藝獨樹一幟的影子？難道那個時候沒有產業工人麼？雖然一九二七國共分家的一幕，是買辦資產階級地主和軍事領袖士大夫們的離開了革命戰線，進而向農工壓迫，可是，自認為無產階級政黨聽從了對中國情形隔漠的國際底指揮，以致演成盲動與亂動，于是，反動勢力壓迫下的文人們，戴了「普羅的臉罩」，單鎗匹馬擧了國際的大紅旗，排頭一個喊起「普羅文藝」，大家也接着喊起「普羅文藝」，普羅文藝在那裏呢？普羅他們沒有自己撰稿啦，他們也僅有絕無的去欣賞啦。但，他們雖繼不斷的爭鬥中，從太陽沒落後，幾個「普羅秀才」做了拓荒者，到萌芽止，算一個方向，後來掉過筆頭，漫漫長夜裏閃出的北斗與文學月報，也不容于政府，封閉了。此刻的普羅文壇上，只剩下寂寞的空氣。這些裏面，果然不能稱做「是普羅的」，連『為普羅的』成分也包涵得很少，比較給大家印象深些的：口號式的新詩，與民族文藝一律的技術，高貴的

審價，幾個古老作家的大名。若進一步講，那麼這個運動的結果，主要在建造與開拓幾個「文閥」的地盤而已。

中國普羅列塔利亞自己的意識，還沒有到鞏固程度，怎樣夠把它來領導別人與支配別人？中國普羅列塔利亞自己不能把技術加到意識上，來產生文藝，怎樣又把「文閥」們的寫作稱做普羅文藝？這個正是：失之毫釐，差於千里！況且，文藝的要戴上普羅的帽子，在乎反資產階級上應用，到得社會主義實現的將來，是否應該把文藝還壓抑在普羅帽子的底下呢？所以鄧先生說：『我們認爲普羅文藝本身是否能夠成立一個整然的系統，尚是問題。卽使勉強能成立一個整然的系統，也有問題。卽使勉強能成爲一個系統，也不過是一個過渡的象徵，——反抗資產階級文化的口號而已。何以言之？因爲社會主義社會是爲階級的，故普羅文藝在社會主義社會是無對象的，同時，我們認爲中國的社會不是西歐資本主義社會，故普羅文藝在內容上說是自相衝突的，在外延上說是不合于中國社會的要求

的。它的結果不是失之狹隘，就是成爲自覺的工具主義，而喪失了文藝的意識。』

所以幾年來，所謂普羅文藝運動失掉他本身意義的原因，就是爲着這些。

所以幾年來，中國革命文藝的幹流，他的右翼是工具，他的左翼也是工具。

(三)形式與內容

什麼是中國革命文藝的幹流呢？

『文藝是生活的最高表現。』是誰個生活的最高表現？無疑的應屬之于革命的羣衆。

革命的羣衆是誰？『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剝削他人的，無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參加生產行程的份子，都應該是勞動者，也就是我們所代表的人們：如直接參加生產的各種工廠工人，手工業者，自耕農，佃農，雇農，及設計生產，管理生產與擔任運輸分配等等，及其他輔助社會生產的人員。這些直接的及間接的參加社

會生產的人們，都是被現存封建勢力及資本勢力壓迫着，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所以我們總稱上述這些人們爲：平民羣衆。」換幾句話來說：平民羣衆是勞動者，是社會永恆的主要的成員，而在前資本主義階段裏徘徊着的中國社會，它——平民羣衆——遭受壓迫最重，痛苦最深，無論主觀與客觀方面，都有革命的要求，救中國是平民羣衆，實現新社會也靠平民羣衆。和世界革命羣衆攜手的，也是平民羣衆。而在現代，必須平民羣衆自己的力量團結，好去開拓新社會。

平民羣衆的革命意識底決定下，便構成了革命文藝的內容。以平民羣衆的粗淺底技巧。便構成了革命文藝的形式。革命文藝的形式與內容的構成條件具備了，所以，這種文藝必然的產生。這是什麼文藝呢？就稱做平民文藝。

『平民文藝是代表廣大的被壓迫羣衆之要求，代表着被壓迫的平民羣衆要求解放的理想，一方面對過去及現存的制度加以批評——對于現實生活的批評，一方面爲將來創造——由平民大衆的革命達到無產階級差別的社會而加以描繪及推

動。故平民文藝是具有『浪漫性』的，因爲它要以高超蓬勃的熱情去反抗一切的壓迫，反抗舊制度之虛僞黑暗，而達到人的解放。同時它又是帶有『理智性』的，因爲它要求生活的合理，以合理的生活代替虛僞的生活，代替『勞而無功』的生活，使生活的效能提高，使生活豐富化。』

『平民文藝是『人』的文藝，不是機械的文藝，它反抗一切特權階級，反抗『奴視人』『役使人』的特權階級。故平民文藝在主觀上雖是廣大的被壓迫羣衆的文藝，而其最高鵠的是『人』的文藝。因之平民文藝的理想是：創造的勞動，自由，平等，博愛。』這裏，鄭先生又把平民文藝一般的內容告訴了大家。同時，在題材方面更具體的兩點：

『(A)對于現社會的描寫，

黑暗的殘酷的東方社會應該絕對地加以攻擊。關于現實的描寫，實爲着手批評的前提，對于各階級之現實生活應充分地把它們暴露出來。

『(B)對于廣大平民羣衆在過渡時代的悲哀與希望之深刻的描寫：現時代的象徵只是一個過渡。過渡時代的特徵是失望與希望。失望之點應該是悲壯的，希望之點應該是熱烈而活躍的。如果我們以爲(A)項工作是消極的，靜的寫實；那末本項的工作就應當是積極的運動。』

以上可歸入文藝描寫的主點，其次關于批評的主點：

東方古國的舊文明，籠罩住舊的社會秩序。統治者忍心採用愚民的策略，把社會前進的動力拉住 。于神鬼的學說方面：地面有統治的帝王 ，天上也有玉皇大帝。要使民間白日見鬼，輔助國法宗法之不足，那麽，郡有「郡廟」，山有「山神」，土有「土地」，田間驅蟲有「猛將」，牧場防疫有「牛欄」，商人問買賣的好壞，可以求之「財神」，家庭間的消鬼禱福，可以訴諸「竈君」，甚至于橋有「橋神」，宅也有「宅神」，路頭還有「小鬼」，漁夫們出海捉魚，先得請示于「娘娘菩薩」，木匠的建造房屋，必須翻「魯班」。這是鬼的桎梏。關于

倫理的方面‧佈防着禮教的繩索，所謂四維靈——「禮義廉私」——之上，還有「孝悌忠信」。君使臣，臣治民。不過臣少民多，臣對于治民的工作不能全般顧到，因此又利用宗族的法規，所謂族有族長，家有家長，長治幼，父治子。于是又怕執行的不嚴厲，那幾句話「君欲臣死，不得不死，父欲子亡，不得不亡。」，就引用做鐵律。再，對于男女問題，它們採用絕端的禁慾主義，在男性統治下，男尊女卑，每個女子困鎖在三從四德的鐵鍊上。而在社會趨向于平衡的狀態裏（只在一種的經濟制度裏徘徊。），顯出「長幼有序」，「男女有別」的太平盛世(!)了。

這樣制度爲什麽崩潰，這裏且不用去說明。普遍的事實告訴我們，那種舊社會秩序，顯然不足與新時代抗衡，不足與新文明對壘，「人」假使要踏入進步的新時代之門，他必然的自己覺醒，先和這種束縛的鎖鍊掙扎。看哪，羣衆們已經本擁擺了。

舊禮教已經自動的崩潰，而且我們促進它的崩潰。可是，社會的動亂，只見有加無減，爲什麼呢？這裏，果然特別要歸到建造下層基礎的經濟的原因。但，有關到倫理本身的問題，平民文藝運動，應負起批評與積極的主張：

『整個的中國舊時代的倫理，我們認爲是宗法的封建的。至通商口岸的買辦階級們實行的基督教倫理，則是拜金主義的奴隸倫理。故我們在消極方面是要「反孔教，反基督教」。在積極方面則應有如下的主張：

(A)對于婚姻認爲應絕對的自由，但以絕對平等爲條件。

(B)對于家庭應守人人有職業的原則，不許寄生與供奉，但在過渡期中應該相對的互相扶助。家庭的組織須達到以夫妻爲主體而打破大家庭舊習。惟不能因此妨礙了積極的工作。

(C)對于子女應負起絕對的責任。重質不重量，故提倡有條件的生育。對于子女之愛，應特別加重，我們須移對父母之愛于子女，因爲將來勝于過去。

（D）對于朋友應積極的提高友愛的質量，並增加其分量；封建時代的豪俠與忠貞，在友誼上是應該保存並推廣的。」

其次是形式的問題，所謂形式，主要的在技巧。文藝的技巧，像詩歌的聲調，韻律，結構等；小說的結構與造句等；戲劇的編幕和說白等。律詩絕詩的形式上說，不是低落藝術的評價。章炳麟嚴復等的文章，不一定缺乏內容的分量。可是士大夫們所獨占的文章，它——文章——是「經國之大事」，歷代迫壓在下層的勞苦人民，沒法去學習。而在士大夫們更須「咬文鍊句」「引經舉典」，互相「出奇制勝」。最滑稽的有個福建李某，他寫一篇很簡便的游記，全篇只三百多字，可是他每句引用典故，把裏面的字大都採用古體寫法，一篇文章做了好幾天，後來請別人欣賞，果然沒有一個能夠全般看懂，這輩欣賞的「宿學」，也大家稱道他這篇文章做得奇妙。可是過了幾個月，這篇奇妙的文字，連作者自己也莫明其妙了。這樣，便是形式阻礙了內容。

一種文藝的演進，可以分做三個時期來說它的形式與內容的，譬如：被壓迫羣衆的的意識，可以代表社會前一派，但是，它們雖然有前進的意識和熱烈的情緒，去搆成文藝的內容，惟在技巧上——就是說它們的文字技術、正是它們沒有機會學習，一定不容易高明。這是一種文藝的第一個時期，便是內容勝于形式的時期。在這一羣被壓迫者，依循社會變化的法則，它們奪取得政權，自己成了統治者以後，對于文藝方面的欣賞與創作加多，他們有機會知書識字。于是，在技術上也必然的進步與提高。那時，文藝的形式與內容並盛，我們歸之于第二時期。到得第三時期，正當那統治者沒落期，文藝也同樣的入于沒落，瀕于沒落期的統治者，他的文藝失却了前進的內容，轉到「人生的消閒」方面去了，于是什麼花呀水呀，所能夠殘存的只有形式。這個時期，即是內容弱于形式。

中國封建勢力中所產生的文藝，就是咬文嚼字的富于感傷——特別是詩。它們偽歎自己統治的動搖，倫理的破壞，同時，看到新興的敵人．．平民羣衆——

覺有一天要把它們澈底肅清，因此，它們的文藝內容，只傾向到哀悼——對自己新挖的墓地哀悼，很少能夠對平民文藝作正面的攻戰。

至於中國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文藝，它們的來路，也似乎在某某號，或是某某己Maru（九）裝運來的，它的立足地只在沿海（中國）帝國主義的商場，它——文藝和它的執筆人一樣，穿的是洋服（「和服」包括在內），吃的是麵包和百塌油，拉的，自然也是洋屎了。換句話說：那種文藝，像它的執筆人一樣，一樣含着買辦性。它的內容果然不能獨立的存在，而它的形式，也無異乎「督軍」「司令」們買來的西洋新式軍器是一八六六年普法戰爭的殘物。

所以啦，中國的平民羣衆所綜合力量，是產生新社會唯一的力量。它們綜合的意識，是向着新社會推進的意識。唯有平民的意識，足以充實中國的新文藝運動的內容，現在，當它成長的第一期，在技術上——卽形式上的差遜，是命運註定了的事實。所以鄧先生說：

『我們認為：特殊的士大夫階級專有智識，平民羣衆無法及無機會識字知書，更說不到專門智識，這件事是中國廣大平民羣衆的痛苦及屈辱原因之一。我們為着消除士大夫階級，為着解放大多數平民羣衆，必須堅決的主張下面的文化政策：

A 文字普及政策：

(一)限制文言，流通白話。

(二)限期普及注音符號及簡字并統一讀。

(三) 普及文盲救濟運動

B …………』

在目前平民文藝的作者，文字上應注意到的，鄧先生告訴我們：

『我們的平民文藝，自然是主要的以廣大平民羣衆為對象，故文字務求淺顯，凡非日常用語及語法，務須避去，只求其平易而能表現微妙深切的情感。對于外

國語法應在淺易的範圍內，逐漸引用，因爲由此可以增加中國文字的質量及分量。』

平民文藝的本身，決不是開天闢地獨創個世界者，它決不認爲『前無古人』，它承認是由舊社會裏必然脫娠出來的文藝，它能吸取古今中外的文藝上有精采的部分；尤其是中國古典文藝。『我們認爲中國文藝有其固有的相當的價值，特別是詩，歌，辭賦，及曲部小說，一切有崇高的生活理想與現實寫真的文藝，都應相當地推賞。但須注意的，是在吸取其精華而棄其糟粕。』

(四)消極的，積極的，勞動的，永恆的。

『文藝卽是宣傳』，『文藝是無產階級戰鬥的工具』。是無產階級的學者，他們對『普羅文藝』是這樣地運用，這樣地確立文藝的意義。但，平民文藝決不是這樣的單簡。

平民文藝始終是勞動羣衆的文藝，（也許有人要直捷說「勞動文藝」。）在內含上它是眞實的激發勞動者的情感。只有勞動羣衆本身被統治被鎭壓在下層的時

候，平民文藝也隨了勞動羣衆，與統治者宣戰了，但，這是消極的，一時的。只有勞動者是社會不斷的生產者與創造者，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而平民文藝便建築在這樣的基礎上，不斷地創造。那是積極的。永恆的。美的。

(五)擴大言之

文藝本是藝術的一個部門，文藝也是藝術主要的部門。鄧先生在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封建殘燼，雜着武夫士大夫的連合統治下，領導廣大的平民羣衆起來鬥爭，因爲他負的責任很多，時間又很短促，所以在藝術方面，它只告訴我們平民文藝的梗概。這自然，是時代的必然性，我們應把它演繹出平民藝術——音藝(音樂)平民化，形藝(圖畫)平民化，工藝(建築等)平民化。其實，『藝術平民化』的口號，早已高唱在民間了。

就藝術方面講，也是如此：凡是鄧演達主義的信徒，應當把鄧先生的學說加深的研究，發揚到平民羣衆裏，要使大家來把本身的痛苦與要求，與鄧先生的學

說對照，再行把方案由大衆討論出更具體的條文，一直到實施。

現在的平民文藝運動怎樣呢？只簡明地指出幾個焦點：

(A)貧產與流產　平民們縱有豐富熱烈的情感，因着技術的幼稚與生疎，它的歌曲近于文藝者，也只得不成文的在口頭傳唱。即使把它寫出來，也沒有刊物記載下來去廣汎的傳佈。所以在這個階段裏，平民自已對于文藝，困在難產期中，也是必然的。在有些自吹自唱的文人們，捧住老牌作家們的作品，什麽『成熟啦』，那便是欺人的話。換言之，『是平民的』作品，此刻還是『難產』。因此，現在所期望的是『爲平民的』。爲平民的作品，大都出之于智識份子的筆下，革命的智識份子，是所謂『革命伴侶』，他們意識的不準確，企圖的不單純，甚至文字逼成爲商品的買賣。于是過剩的生產，淺陋的流產，如新時代編者曾今可君文稿可作代表。

(B)小集團主義　這一種傾向的形成，由于個人主義的發展，它們大都與書

商「互相爲用」。如果不在統一的旗幟下集合，流弊如：造成不準確的立場，彼此互相攻訐，反把眞正的敵人放棄，文壇上的渙散與紊亂，難得收拾。卽如號稱做『左聯』的內部，還是形成若干派別在紛爭。每個『社』或是『團』往往對某個刊物輪稿包辦，因爲這樣，容易激起外間人的高喊『文閥』。如這樣問題，平民文藝運動者在充分的注意中。

（C）農村的偏枯　農村文藝運動的偏枯，和當前經濟的偏枯出于一個軌道。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要把農村的經濟，吸收到城市，只顧到城市的點綴。平民革命的軌道，要使城市與農村發展的均衡。便是此刻，平民文藝運動特別要把荒落的農村裏的革命羣衆運動起來，創作，溝通，領悟。現在，城市裏的作者只顧到片面的活動，可以說它們的創作，充分地含有『城市依賴性』。

其他的流弊，自然還不被上面三點包括完盡，這裏也不能分別的舉出。惟其如此，平民文藝運動當前的急務，首應注意到上列幾個不好的傾向。組織『平民

文藝作者同盟』，去消除小集團主義的傾向　怎樣救濟難產與治療流產？怎樣改革文藝運動的農村的偏枯，如舉辦農村通訊，組合農村作者等？更如防止「他愛主義（Altruism）的傾向，促進平民文藝的成熟，都有待于『平民文藝作者同盟』成立後的進行。

一九三二，十一，十八，於廣州。

鄧演達先生之逝世及中國上層政治之危機

公亮

鄧演達先生——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唯一具有偉大人格的新興革命指導者，他不獨以銳利的理論來闡明近代中國革命的指導原理，而且以他的忠實而不屈的高尙人格來誘掖站在岐途上的中國大多數農工平民大衆——尤其是對於我們一輩的靑年。大凡曾經接近過先生和靜領過先生的言論的人們，誰都受過先生的熱烈情緒的洵融，得到近代中國革命途徑的正確指示。他的像鋼鉄一般的剛毅的意志，他對廣大勞苦羣衆要求解放的同情，他在大革命運動中所建立的偉大的殊勳，只要稍稍明瞭中國近十年來的革命史的人們，誰也不能加以否認。當先生在十四五歲的時候，他在鄧仲元先生的面前，已經很堅決地決定了他的對於中國革命

的意志了；所以當時鄧仲元先生曾經對陳可鈺先生表示，認先生爲中國近來稀有的人才而加以激嘆。其後驅逐陳烱明，籌設黃埔黨立陸軍軍官學校，消滅盤據廣州的楊劉等等的功績，無一不是先生直接或間接的努力有以促成。直至北伐之後，常徹夜不眠，工作每天平均超過十八小時以上，而在圍攻武昌城的時候，往來於炮火交加之中，流彈斃其乘馬，而先生的態度依然不改其恆，而且愈益鼓勵他的部屬從事猛攻，卒於雙定的國慶日的一天一舉而將稱爲金城湯池的武昌城攻破。直到武漢政府的上層份子開始動搖，與農工利益背道而馳，先生遂毅然去職，隻身間道從西北出國。凡此等等，都可表示先生忠實不屈的高尚人格的一班。那些卑污淫穢的新興軍閥官僚如蔣介石，汪衛精，何應欽，王柏齡，吳稚暉等輩，所以嫉忌先生而加以危害，就是因爲先生高尙嚴正的人格與主義絕對是和他們站在對立的場所的原故。先生的遇害，不獨延長了中國革命的成功期，而且正當中國上層政治發生重大的危機而要大多數平民大衆一致起來努力進攻的時候，我們

失去了這一位革命導師，這不能不說是重大的損失而令我們傷心。不過我們知道先生的精神和主義，決不跟着肉體的消滅而失去的，在社會客觀情勢益發利於革命的現時，先生的精神和主義，好像春播後的穀種一般，漸漸跟着時間的推移而滋生長大了，豫料在不久的時間內，爲復興中國革命而死的靈魂，一定會使廣大羣衆潛移默化，負起民族偉大的解放任務而向前挺進。

× × × ×

中國革命的中心是土地革命，因爲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遭受封建剝削的最大多數是農民大衆；所以農民革命的指導，其需要點比較工人運動有過之無不及。回顧民國十五年北伐的時候，北伐軍之所以有破竹長驅的進展，就是因爲當時湘，鄂，贛的農民理解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豪劣紳，取消一切苛捐雜稅！」等政治口號，同時，農民本身的組織，也得到了農民協會等的新武器，廣大農民由覺醒而團結，因之北伐軍就到處得着農民的協助，而北洋軍閥便

望風披靡了、不過自從武漢政府解了體以後——不，自從鄧演達先生離開了中國的本土而到外國去了之後，上層份子便開始跋扈飛揚，隨着反動勢力的抬頭，整個中國便重新陷入舊統治的勢力圈裏，結果使廣大的平民大衆無所依歸，而共產黨便在第三國際撫育抱持之下，得以乘機興起，終而弄成現在中國中央部而且是農業中心地域的湘，鄂，贛三省空前未有的大勢力。鄧演達先生說：「中國本身應該不會發生共產黨出來，更不會發生蓬勃的共產黨出來，而中國平民大衆，應該早就要形成本身的政治組織，却是因爲歷史的社會的條件所限制，使國民黨的領導整個的被豪紳高利商人所篡奪……」。這一指示，是非常正確的，現在中國所以弄成岌岌可危的局面，無疑是平民大衆沒有形成本身的政治組織的原故。到了現在，共產黨的勢力日益強大，反動中央政權已感着無法應付，而同時中國的革命使受着空前的失敗與挫折。這裏可以明白看見中國上層政治的危機已經不是將來的問題，而是迫到眼前來的一回千眞萬確的事實。

所謂上層政治的危機，即是支配階級自身在自己的本體內，將政府的支配力弄成四分五裂而激化了內部的矛盾的危機，即支配階級趨於腐爛，終至崩潰沒落的危機。

這種上層的危機，在現在的中國，很明顯地暴露了出來。譬如軍閥戰爭之結果，在某一軍閥敗退之後，便在一定的廣大地域之內發生此種現象。拿一個例來講：兩年前馮閻和蔣介石的戰爭，結果是馮閻敗退了，於是在山西等省的廣大地域之內，所有從前隸屬馮閻系統的軍閥，便對於戰爭的結果所生出來的種種處置發生不滿，而且舊的元首已去，新的支配者又不能給以充分的費用來養育士兵，於是不絕地發生叛亂。更有一層，新的支配者又因為恐怕降伏的軍隊靠不住，便用改編或縮編等的手段來離散或消滅曾經敵對過自己的軍隊，因此發生不平而叛亂舉動也就越難制遏。就是前往鎮壓的軍隊，也因為餉彈的不足，往往不肯服從上級幹部的命令。即如現在江西所謂剿共的軍隊，也因為這種原因而投入匪軍；

我們只看剿共軍的某將軍曾經向蔣介石報告的一段話就知道了。他說：「我軍斃敵達二萬人，但是我軍的兵士投入共匪的也達二萬人」，這是對於中國現在的政治情勢值得注目的一回事實。這種上層政治的危機，現在普遍了中國的全境，最近山東的韓劉之戰，四川的二劉相爭，以及黔省內爭，都有發生這種情勢的可能性，况且軍閥和軍閥的勾結，官僚和官僚的結合，完全站在偶然利害關係的上頭的，而猜忌和嫉妒，仍然愈弄愈深，結果爲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和擴充自己的勢力起見，就不能不勾心鬥角來互相暗爭，最後衝突加深便祇好出於一戰。其他，廣東和廣西間的矛盾，胡漢民和蔣介石的對立，汪精衛和張學良的暗爭，西南和中央的猜疑……等等，都是最近中國上層政治的危機。

中國的農工平民大衆，在這種上層政治的危機之下，遭受着怎樣的命運呢？不用說，中國農工平民大衆受了這種上層政治不絕地發生衝突的影響，生活條件便極度的惡化下去，結果弄到現在徬徨於饑餓線上。換一句說話來講：中國的平

民大衆不單爲了支配階級之對於被支配階級的普通的壓迫和剝削而痛苦，就是支配階級發生了政治上的危機的時候，也隨時可以影響到生活狀態的惡劣化。本來中國的平民大衆在這種生活狀態已經瀕於饑餓線上的時候，平民大衆的革命活動應該要抬頭起來，因爲平民大衆受了上層政治的危機的影響而瀕於死線的時候，他們一定忍受不住切身的苦痛，會使平民革命的昂揚，要起來積極鬥爭，在相當的時期內，平民大衆的聲勢定要威脅支配階級上層政治的危機愈深，被壓迫階級的不滿和憤激愈濃厚，雖說目前上層政治之表面得以暫時結合，但這完全是由於利害關係，這種關係的成立，當然不出威迫和利誘，其基礎是極不穩固。所以鄧演達先生說：「祇靠威迫利誘的卑鄙方法，祇靠放縱荒淫的方法去保持政權，那即是宣告了牠自己的滅亡，宣告了牠的壽終正寢，滿淸末造是如此，袁世凱的末年是如此，蔣介石的統治也正是如此」，這正是指摘上層政治自身發生了危機而崩潰的引證。其次又說：「蔣所領導的南京統治所以會失却精神上的威權及使用

最卑鄙齷齪殘暴手段去保持政權的原因在：一種制度的存在。這種制度祇是代表最少數的利益，違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及要求。南京統治的財政政策只是掠奪，只是無情的掠奪。南京統治的經濟政策祇是叫全國農民破產，工人失業，一切有職業的無所依歸。極少數的官僚軍閥祇有公開的掠奪貪贓剝皮及骨，不管大多數的人民輾轉溝壑。這是官僚政治及軍事專政的特質，這是整個制度所產生」。這就是暗示上層政治一定會使平民革命的運動抬頭起來，終而在不滿和憤激之中得到爆烈的一天。在那個時候，「只要全國人民起來，多數必然會壓到少數的獨夫與民賊，必然可以洗滌舊時代舊制度的卑污」，而所謂上層政治的崩潰，當然是在意料中的了。

中國又是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國家，所以中國上層政治的危機，還有一種嚴重的性格。

中國真正的支配者是帝國主義，所以我們時常看見軍閥不惜用種種賣國手段

求助於其主人公帝國主義而發揮支配力。軍閥政權之危機的存在，無論何人也不能否認，應該早可以摧陷廓清，不過因有帝國主義這種東西站在背後，使中國的農工平民革命運動，不容易順遂地前進。所以我們現在要想促速中國農工平民革命的成功，那就要堅決的打倒各帝國主義，肅清牠在中國的勢力。固然，現在各帝國主義國家都遭受着空前未有的經濟大恐慌，而且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反抗也日益增大，這是帝國主義不可挽救的危機，但正爲了這個原故，他們，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遂拚命向中國進攻，而統治階級之無恥投降，亦益露骨，如果中國廣大的農工平民不急起直追，必然是整個中國人民的危險。

總之，中國上層政治的危機，已經在廣大的範圍內一天天深刻化了，革命爆發的前夜已到來了，每個鄧演達先生的信徒，都須握住時代的使命，起來推翻反動統治！

現在就拿鄧演達先生所指示給我們的幾種主要方法。寫在下面作爲本篇的結

果。

（一）要徹底的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同時要喚起幷組織廣大的民衆，使其覺悟的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幷且應該與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階級聯合起來作鬥爭的同盟，而排斥及抗拒不以平等待我，蔑視中國民族要求的勢力及民族，才能解放中國。

（二）平民羣衆要取得政權，必定要用平民羣衆的本身組織形成堅強的力量，去推翻千餘年來傳統的官僚政治。

（三）要實現社會主義，一定要以直接生產的工農爲重心的平民政權確固以後，運用政權去發展生產，統制生產，使生產組織化及社會化。

（於學生宿舍）

鄧演達先生的生活

方述

一，鄧演達先生與其家庭

二，鄧演達先生與其朋友

三，鄧演達先生二次出國的經過

四，鄧演達先生治學的綱要

五，鄧演達先生歐遊的踪跡及其所見

六，鄧演達先生歸國後的祕密生活

一，鄧演達先生與其家庭

大概稍微接近一些鄧演達先生家庭的朋友們，誰都知道他的父親鏡人先生是一位曠達豪爽老而彌健的長者；他的母親是一位極慈祥極親切而極愷惻的女界模範；他的哥哥競生先生是一位純粹的軍事學者，專在技術上爲國家服務而從不入

政治底漩渦的。所以鄧演達先生與其手足間，雖友于之情，極篤且厚，而關於政治上的主張和行動是從來不相聞問的。惟乃翁鏡人先生，則極同情於其抱負，故先生益得肆其力，奮其志於革命事業。

先生與其夫人鄭立眞氏，還是舊式禮教下的結合，立眞女士出自農家。初未嘗學問，雖伉儷間的生活極機械，極平淡，却絕少違言。蓋先生深信中國婦女都是在監獄那頭，都受着人家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只有幫助她們，解救她們，尤其反對一般『時髦男子』，拋棄舊妻子去討『時髦老婆』，故對於他那位早年失學的夫人自結婚以至二次出國十餘年間極力設法使之補習學藝，助其自立。當十五年北伐時，他的夫人已能隨軍擔任救護工作，及先生二次出國後，復繼續入廣州某醫專研習醫理，而先生至是則反決意欲和她離異，這個動機是由這樣出發的：

a，他和她因爲政治環境的關係，不能同居。

b，他的工作她不能夠協同。

。，他不能得到一種生活刺激，使他更加進步與奮。

但是這種要求，他的夫人當然是不能同意的，而且此時他夫人學力無論在文字上藝術上都已很深造，對於他每次通信，更有許多纏綿悱惻的表示，愈使先生非常難受！但是先生因爲工作上的關係，終覺沒有改變他巳下的决心。二次回國以後，雖曾晤談過幾面，却並沒有再賦過同居！蓋先生以寄託之重，兒女之事早巳付諸度外矣。

二，鄧演達先生與其朋友

先生對於曾經共同在患難中奮鬪過的朋友，無論在思想上有若何的差離，但是先生的關懷縈念，總是沒有一天不牽罣着的！尤其是對於死難的朋友們及監獄中的朋友們以至於其家屬有關係的人，無時無刻不想法從精神上及物質上去慰安和援助。但先生猶每自謂：『我是一個最對不起家庭及朋友的人，一面雖以理性制裁自己，但一方却仍免不了懸念！』又嘗自己歎恨：『可憐我一個漂蕩的人巳

不能和舊社會的秩序融合無間，又不能使新社會的秩序和生活相融會，結果遷累一切和我有關係的人，我眞是應該受一切人的責罰！』

這些至誠惻怛的地方，實在是值得我們欽佩而感動的啊！

先生對於朋友們的通訊，無一次不是對於時局和社會作深刻而有力的分析，對於思想和學術上的探討及研究，特別注重的是：農業社會的疾苦和農民的切身要求。間亦雜以詼諧和謾罵，宋慶齡先生曾說：『看他的信，像看小說一樣，希望這個小說是永遠不完的能看下去！』

先生在朋友中知交最深而思想衝突最甚的，要算是嚴立三先生了，他們倆一見面一通信涉到問題的討論時，就很容易動火，他倆遇到政治上走不通的時候一個總是漂海，一個總是入山；一個要深入民衆，一個只要結合他所謂的「賢人君子」！一個說他開倒車，一個他說開飛機飛到天外去！但是他們倆相互間人格上的信任和感情上的關切是沒有幾個朋友比得上的！立三嘗說：『我和他思想上的

根本衝突之處，不是少數言語所能說明的！我愛之深故恨之切！」而先生則總是要竭盡他朋友的貢獻和責任要拉他出去！嘗謂：『像這樣一個人活埋在宇宙裏，實在是可惜的！』

三，鄧演達先生二次出國的經過

當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從河南班師以後，武漢政府幾個上層的領袖如汪精衛譚延闓徐謙唐生智何鍵等開始搖動革命的戰線而背叛民衆時，先生已覺得楚歌四面，孤掌難鳴了，於是就決心擺脫一切，遠適異國。但是當時的長江下游是由蔣家軍封鎖着的，豫陝已是馮軍的勢力範圍，馬二先生正與蔣總司令秋波頻送，從事勾搭；先生乃化裝爲查電線桿的工人，於六月三十日徒步沿京漢路至鄭州，西行經陝甘蒙古的大戈壁，越一月又十五日而始達莫斯科，途次曾兩次被人識破眞面，幸而識者無甚惡意，致未留難。有一在馮軍服務的黃埔生，竟因此棄職而遁，先生過潼關後始得混入俄顧問隊中安全乘汽車同行，幾經勞頓而至莫斯科

。當時俄京要人，備極歡迎，曾數以中國革命問題與先生相商，先生的結論是說：「共產主義革命，僅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適用，中國是封建經濟佔主要成份的半殖民地國家，解決土地問題，實行耕地農有，是一個當前革命的主要任務，否則定然延長中國革命。」因先生的論調與共產黨人格格不入，故深招斯達林，托羅斯基等忌嫉。先生隨又旅行一度高加索，深受當地人士的熱烈歡迎，但因不能見容於蘇聯當局，故留俄不久，即轉往德國，從事經濟學，政治學之深邃研究，手不釋卷，甚至忘寢廢食，治學極精，篋中常見藍紅色手拔。

四，鄧演達先生的治學綱要

先生對於中國現在還殘留着的一切老莊的空幻虛無思想，及孔子的中庸苟且愚蒙思想，佛教否認現實的思想，耶穌的妥協調和思想，都深惡痛絕，而決以左手執革命綱領右手拿機關槍的態度和行動，把吃人的禮教和庸師宿儒紳士道學家者流一概摧陷廓清，把孔子廟及貞節牌坊祠堂廟宇等一齊掃滅淨盡，而代以新的

『人』的，社會的，樂觀的，有希望的『人生觀』和『社會觀』，使男女同胞們一齊衝出目前這個中國的黑暗地獄，跑上新鮮活潑的大道，才能有革命成功的可能，而過這種新的人生觀和社會觀，必然要在偉大的以農工為重心的『平民革命』以後，在新的生活條件上，才可以實現出來的！先生以為這個思想上的戰線，我們同志，必然要加一番澈底的研究，和澈底的認識，才能負担改造中國革命的使命！所以他自二次出國以後即以絕大決心從自然現象的解釋特別是社會發展的因果律，作系統的研究，1928年在柏林時甚至欲閉門謝客幷謝絕一切政治討論以專攻理論，他所常常助勉同志們研究社會科學的程序是：

第一，史的研究，尤其是世界通史的研究，研究這個才曉得世界的由來，才曉得世界各部的互相關聯，（這種史一定要站在社會觀點上做才能適合要求的）中國的近代史更是切要，因為一切社會變遷底條件都是在最近百年內急劇的發生和變化，研究這個，可以曉得牠之成敗的歷史社會原因和結果！

第二，經濟史的研究，祇有這個才可以確實。說明現時各國社會的實際狀況，及其來由，及其客觀底要求。

第三，經濟學的研究，祇有這個才能夠說明現時人類社會底生活要求，及要求底法則。

第四，政治制度底研究，由此可以批評及推測中國將來所需要底政治制度。

第五，各國政治——尤其是最近各國革命史的研究，以考查各國變動程過中的方法和結果。

此外關於中國問題經濟組織，農民問題財政外交等，自然是至切要的問題。先生以爲以上所說各種研究當中，自然不是短時間裏所能夠完畢，更不是每個人都要充分的詳細的研究全部，一方面我們一定要分工，一方面要獲得最小限度的認識，所謂最小限度的認識，是指上述各部門中的綱要，完成這個綱要以後

，才能適應中國問題的需要，才能便利自已去詳細深造！

五，鄧演達先生歐遊的蹤跡及其所見

1，北極圈旅行遇險

開亞洲人足跡的新紀元

1928年夏季先生因休養身體及利用暑期起見特於七月十七日由漢堡乘輪到北極圈附近旅行，沿途經挪威各海港，越七晝夜至尖島（Shitrb gln）歐洲極北部島嶼彼時正當夏季故一入北緯67°28′即半年爲晝不復有夜，亥子時太陽猶高懸正北方，周圍者冰山，晝夜太陽炳耀，不知黑暗爲何事。惟所乘之船因將近入港時遇大羣浮冰，碰撞太多，致頭部受傷甚重，入水數尺，幸近挪威西海岸，即駛入停泊，設法補救，而該船人員都無法修理，乃電附近之俄國碎冰船克拉辛號（此船已救北極探險隊人員甚多，聲譽滿世界）乞援，因彼有潛水人員可設法補救，經其三四日之修理始得安全南返，照計劃，該船本須北行至北緯八十度處爲止，但

以該船傷痕難期全愈，且北方浮冰更多，萬難再進，故遂折回，此事在歐洲各處當時都有恐怖的消息傳出，該地雖已絕無人烟，而附近人骨獸骨甚多，蓋歷次探險隊在此附近犧牲者，已不知道多少了——意大利的飛船探險失事亦在此附近——是役同行者有千五百人，百分之八十爲教員及機關辦事人，百分之二十爲商人及學生，而亞洲人的足跡到此者恐尙以先生爲第一人！

2，遊歷南德各部的印象

參觀一所最著名貧苦的鄉村生活

襯衣每人少至十件

皮鞋每人至少有四對

先生於1929年九月因友人的介紹得無償的乘一拖貨小輪由 Regeus Bung 城順多腦河而下，遊歷歐洲著名的中古時代式的城市甯不爾格 (Nünferg) 及巴騷(Passcui)門羅(Murcleue)等處，其印象最深爲(a)甯不爾格城市民的自治權，此

治城除爲政治的中心以外還是一個重要的手工業城市（特別是冶鐵業，一切中古時代兵器甲胄均多出於此城故特別爲各封建諸侯所重視），在中古時代一切政權雖由封建諸侯或王室把持，而城中的商人及手工業者，都極不像中國城市市民的消極！尤其是商人，在中古時代中葉以至於末期（14—15世紀）無時不和封建的統治者爭鬥，終果各城市均爭得市政的管理——因此在十二世紀有市政所的設置；爭得貨幣的發行權；爭得市場的管理權；以及其他一切所謂『市民的權柄』，維護此種權柄者，大都是由市民自己所組織『市民軍』的武裝，故封建諸侯無法強制！

(b)歐洲人民的宗教生活，自羅馬被日耳曼族滅亡以後，日耳曼自己各族也開始信仰基督教，基督教會當時實爲一切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的中心，一切教育，藝術，科學，農工商業的技術，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的經驗，都集中在教會，集中在教會中的傳道者，因此不但封建諸侯及市民彼其影響領導，而且教會的『教區』往往兼領一切政治的統治權，這個就是歐洲社會，受宗教影響最深的原因，這

種狀況在德國南部爲最顯著的事實，至今仍存在着。先生在巴不爾格及其他南部各城，常見終日無數善男善女——即一切壯年的工人和學生亦然——在禮拜堂內祈禱，跪拜虔誠過於中國鄉村中信佛之老嫗，即如小孩，亦不須長者的領導，自行出入禮拜，無稍逾越常規。日常見面的問候，已不稱『早安』『午安』『晚安』而稱曰『教禮上帝』！城市如此，鄉下更不問而知，整個的南德天主教範圍內，可以說還多數保持着中古的遺跡！故先生以爲研究歐洲古代史，不可不到希臘羅馬，而研究中古史，則不能不到南德各邦——尤其是 Bagesm（擺恩邦）

先生認歐洲中古時代的宗教爲全社會的指導者已如上述，故非待至近代（由美洲發現開始）商業的發展，自然科學的發明使新興的資產階級覺悟的去指導新的社會，則中古時代的宗教關係及政權尙無由打破！南德所以今日還能保持中古時代的宗教權威，實由於大地主經濟之普遍的存在，德國目前的人口，約40%在鄉村爲農民60%在城市爲各種職業，而大農的組織（往往每地主佔地數百千頃以

上）在東普魯士及擺恩邦爲最多，故宗教的信仰亦以這些區域爲最固。此外因爲工商業在此比較落後的緣故，一切學校及文化機關，都常握在教會手上，如在Regue bress小城，人口不過八九萬，而學校的教育，不但關於宗教的聖經及宗教歷史等由傳教師或男女和尙尼姑教授，卽其他各課，亦甚多由教會包辦。一個社會的文化經濟生活，掌握在宗教手上，則宗教之支配社會生活自無足怪，（擺恩邦十之八九人口是天主教徒）先生於此嘗把歐洲的宗教生活和中國孔教比較，固然中國的『孔教』是否可以叫做宗教，還是費爭論的問題；然其束縛人心，軌範社會生活，則爲不可否認的事實；然而因爲1，孔子的學說因和實際生活的要求脫離，故與廣大的生產民衆——農民手工業者——無深密的關係，所得保存的，祇有和拜物教相伴的迷信：祖宗，鬼神，生殖崇拜，2，因文字的限制，使廣大民衆無從認識比較抽象的生活描寫或傳述，3，因統治者的慘酷而禁錮人民的活動，用愚民政策，合此三者遂使中國的廣大民衆，始終生活在極原始階段，無由發生更

深切的生活要求與生活理想。一切文物制度典章，除極少數的『書香家』以外無人了解，其了解上述各事的『學者』又都從事於傳統的腐朽的官吏生活，專門以剝削人民爲事，故使廣大民衆的要求，不但不能相應，而且爲廣大民衆所厭惡，故大概的說，中國人民從未受過歐洲式的宗教教育和生活風味，他們所領受的不是孔教而是宗法社會的祖先崇拜和其他的自然偶像崇拜，他們惟一從孔教領受得的是剝削和人道的永遠屏棄，拿這種宗教生活和歐洲相較，自然比宗教的作用更低，更應受現社會的反擊！

（c）以中古以至近代歐洲統治者和中國統治者比較：先生以爲最顯著的特殊點是：歐洲的統治者和社會的生產者發生密切的關聯，能了解且竭力提倡生產者，在當時自然是農業及手工業爲重；中國的統治者除少數形式的規定以外——如『天子先農，帝后親蠶』之類，——大多數只有純粹的做寄生剝削的生活，對於生產行程完全懵然，更不要說他們完全和生產無關了，歐洲中古及近代統治者對

於生產的注意，不但在經濟史上可以窺見，即在藝術文學及詩歌上面，亦可以有顯著的事實可尋。先生在寧不爾格的時候，曾參觀過兩個『聖人』的住宅，一爲畫家，手工業者出身；一爲民衆詩家，鞋匠出身，二者皆終其世於手工業，在十六世紀時舉世欽仰，封建諸侯亦皆下拜，至今德國奉爲『聖人』這不過是一例，英法在近代對於世界的貢獻甚多，而其對於生產社會的密切聯繫，爲其貢獻的先決條件之一。

(d)民衆生活的比較：先生在南德時曾因個人的關係得參觀過一處最著名貧困勞苦的家庭工業工人區的生活。他們絕不受任何的束縛及迷惑，直到山中村內的最貧苦人家由地窖到樓頂，由睡的食的穿的到夫婦的微細生活都一一看到，先生曾把他們的生活狀況列成一表來叙述：

職業：家庭工業(德國最貧苦的職業)

家庭人數：夫，婦，小孩二(小孩尙幼不能做工)

工作時間：平均8－10小時(均用電力推動機工作)

收入：男工平均每小時工資大洋四角

　　女工平均每小時工資大洋二角半

因夏季生意較淡，冬季較旺，故平均夫婦二口的共同收入約每月大洋五十元(100馬克)

支出：所得稅，營業稅，職業稅，疾病保險等：

　　合計每年約二十元每月平均約二元

　　房租：每月五元

　　燃料：每月二元

　　食料：(成人二小孩二)每月三十五元

　　衣服娛樂：每月六元

　　共計：五十元

并說明此村內因人口變動很少，所有新生的剩餘人口，都向外城移動另尋職業，故多數人家，尙能由遺產得到私有住屋，僅少數人須租屋居住，其住所大都是一大廳，一臥房，一衣櫃亭，一廚房，大由木床二，另小孩床，被褥的整潔與城市人家同，均絨氈被蓋，襯衣每人至少十件，外衣大抵有禮拜日衣服，和節日用衣服及工作或常穿着用的分別，皮鞋每人至少四對，臭虫很少，每日早點用咖啡牛奶牛油及麵包，午餐食肉及麵包及山芋（爲德國最多用食品），午後咖啡點心，晚餐多冷食卽香腸小麵包及茶，其滋養之富恐爲中國中等以上人家所僅及！其兒女的生活，如果小孩已大，普通由八九歲起入學，課餘時間，多幫忙父母做工。其已由職業學校完畢的學徒，除多餘人口必須離父母到他處另謀生活外，多留村父母家幫同工作。父母（普通是父親管賬）按定價給值，價值照那時規定約爲每小時男子三角——四角，女子二角——三角五，男女工值所得普通每禮拜付給父親（8——10馬克）四元——五元，爲食住報酬，其餘則工作的男女均自給自足

，父母不管，先生以為此種家庭的資本主義化，表面似殘酷不仁，狠刻的算賬生活，但比之『東方文明』的『仁愛』或者更仁愛些，因為結果是要強迫大家做工，大家才有飯吃！

先生嘗說我們拿這個來對照中國人民的生活，真是無法比較，因為現時全世界的工業品價格，除了很少數實行保護關稅的國家以外，差不多各國都是相同的。其次因為南北美的農業十二分發達的緣故，中國農業品的價格只有平均比美國更貴。而我國每個工人每月的收入僅有十元——十五元，每個農民每月收入僅有二元——四元，所以農工生活的苦痛真如在地獄一般。這種地獄生活，是否還能容忍？是否應該改革？而且是如何的改革？這就是我們目前的問題！

3、對保加利亞的重視

先生於1929年的七月即決心要到巴爾幹半島的保加利亞去生活，因為國內的狀況既不許他回來居住，并且工作不能有效。在歐洲的研究效果較大，而保加利

生活最便宜（每月六十大洋即足），又有相交甚好的朋友在那邊；但因種種人事的關係，直至翌年（1931）的二月下旬始得履踐到保加利亞的都城蘇非亞。經十餘日考察，一切城市及農村中的生活都得先後嘗過。先生以爲這一次旅行所得的印象，爲到歐洲以來最好的。他相信保加利亞是中國將來最好的模範，尤其是關於農民問題方面，他以爲中國的青年學生——決心爲人民奮鬥的青年——應該到那裏去求學，絕不應該到西歐去。他本來預備要把在那裏所得的情形，詳細發表出來，貢獻給大家做參改，可惜現在連他那本旅行的日記都不知道去到那裏去了！

4. 觀光新土耳其的感想

先生於1930年三月初旅行到土耳其的新都 Angora（安哥拉）他覺得那邊一切的景像，都十二分的新穎，千二百萬人口的新土耳其，現時居然有一萬三千的新式國民，學校教員，五十萬小學生，并其他中學及高等大學相當的數量，只此一項已經可以證明土耳其文化的程度高中國多少倍了。

政治的組織，已完全掃清了舊時土耳其時代的官僚政治，做模歐洲式的民主政治，當然還是初段。經濟的設施，現時正在打算建設民族的工業，并且大部份的日用品，已由本國製造，社會的分化正在猛烈的進行，一切政府的職員大部分是由舊都君士但丁堡教育出來的，進步的軍人，都佔政治領導地位，但是無論如何，現時土耳其的政府是站在商人的地位爲主，而意識是代表『全民族』的，無論何部職員都能了解他們的歷史任務和社會經濟的組織并將來設施。這一點與中國士大夫——或稱智識份子——壟斷政權，完全與生產的社會脫離者，相去眞不止天壤！

先生以一個大學生的資格去遊，一切方便都能得到，和農業，商業，教育部等均談過很多次的話，并且從統計局得到許多很新的材料。不過那裏的生活費是十二分的貴，比戰前約高一倍，而比君士但丁堡又約貴三分之一，（旅館每日六馬克，約中國四元，）這是使先生不能久住的原因。

其次先生對於回教民族的生活習慣，也是特別感到興奮的，他以如麼罕默德所付給他的信徒的，不但是統一的爭鬥的可蘭經而且是美潔的生活習慣：地氈舖地，沐浴，入教堂前的洗滌手足，每年的定期免食，星期五的整日休息，拔去無用而易藏汚穢的毛髮（如兩腋及生殖器的部份）白潔的襯衣，甚至死後的洗滌及拔毛用白潔的布包裹尸首還是十二分的重要，送葬的隆重，爲其他民族及教徒所僅見。這不是空洞的儀式，而是集體的併合生存的社會團體的一種要求，即是一村中，或一市街中，有一同教者死亡，全村及全市街信徒，都完全合起來去送葬，幷且絕不僱用流氓乞丐孝子（在中國各都市或鄉村中，對於送葬的儀式大部份是僱用上述的一羣人，併且在廣州有僱用孝子哭靈的笑話！）而是輪流的由送葬的人抬扛，直到葬地，先生於離安哥拉後，曾在小亞細亞內部所經城市停留，參觀了哥尼亞附近幾個極小的鄉村；那兒的生活雖然十二分簡陋，但有幾個特徵可以表現回教民族，特別是在土耳其的回教民族富於爭鬥團結而容易生存於近代的

優長，信仰的統一，音樂的好尙，身體的健康，虔誠的信徒，每日到教堂五次祈禱，卽在田野中工作，亦按時向聖地麥加拜禱無間，幷不需偶像與牲品，比起中國鄉村及城市中多頭的拜物教，自然進步；甚至東羅馬的聖像及儀式崇拜也要高明。每次祈禱時，不但由教師（特別是禮拜五的休息日祈禱）宣讀講解可蘭經的遺教，——遺教中都是切合於社會生活的規條，而不是像四書五經的祗替『冠帶元士』說話的！

先生於此對於中國的禮教更是非常的憤恨而發氣，他以爲中國社會的殭化，大半是因爲孔教的窒塞人欲，國家的孔廟已因爲特殊的士大夫所獨占，人民高不能攀，平常的人民的娛樂，特別是打花鼓十八摩等的通俗戲曲和音樂，又被禮教的先生們禁止，斥爲淫亂，傷風敗俗。故特殊的紳士先生們可以蓄妾營高貴的生活，而大多數的人民不是流於變態性欲，就枯槁待死！一切由戰國及秦代所盛行的音樂，文學，特別是村謠民歌，都被禮教所鎮壓埋毀。象形文字旣爲統治者所

提倡，金石家的士大夫所心折，大多數的人民被經濟的力量所束縛，祇有永遠做『文盲，』被文化棄掉！

土耳其的文字在革命以後即改用拉丁字母，比舊時沿用以阿剌伯文字爲根的字母已容易得多，但先生以爲無論如何，阿剌伯文字還是拼音的文字，世界上的象形文字祇剩下中國一處，巴比倫時代的象形文字早隨其統治者的滅亡而消滅，代之者爲後起的拼音字母的變字，故土耳其及阿剌伯民族即使無拉丁字母的改用，他們的文化開展，也必然的會比我們中國容易百倍！

先生每每在土耳其的小城市中看見在警察所及市政府局郵政局旁邊代寫書信的先生們（因爲他們國內不識字的人約還有20%）已經是用最新式的打字機，會爲之流淚！因爲他追想着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不識字而少數的士大夫禮教先生們，把持舊文字及禮教的殘酷！一切社會上及政治上的文書，在土耳其已經用最新式的打字機進行着，而中國奴隸式的公文，往往用比百姓生活高百倍的秘書師爺擬稿

，書記謄稿，司書抄寫，一天辦不到百十件，反過來看現時的歐洲，士耳其不在例外，每日出版的書報，及一切應用的文書，恐怕比中國二十四朝合共出版的及謄寫的數目還要多的多！書信及電報的寫錄傳用打字機及直接記錄複寫，至少要比中國快千百倍，拿這種情形來比較比較，眞是相隔天壤，怎不令人痛哭！

5，憑弔巴比倫故城的所見

『巴比倫獅子』和年輕女子交媾

1930年三月先生由哥尼亞經巴格達預備至波斯灣乘船赴印度的旅行中，因爲巴格達附近有一小鉄路站離巴比倫故城不遠，化錢不多，時間亦來得及，故特於匆忙中趕去一看。因爲那裏文明建設起於六千年以前，一切發掘古物的工作，到處都進行着，到處都有幾千年前的遺跡，四千年前的古宮已被發現出，先生對於那些古蹟，倒也覺不到什麽奇怪，不過特別有趣的是著名的『巴比倫獅子』矗立在遺跡上面，這獅子立着，其下面仰臥着一年輕的女子，這明明是象徵着，雄糾

科的男子——國王——在和牠交媾。此外還有許多裸體女子的小石像。先生以爲這種狀況在宮闈祕史內幷不爲奇，但是由統治者提倡成爲美術，成爲生活的組合象徵，則爲歐洲文化的特徵。這種歐洲文明，自然是由希臘傳遞出去的，但是與起希臘的，或若就是巴比倫文明的遺留？這個獅子和女子交媾的形式，或者可以代表當時巴比倫的人生底一面？如果這樣，那我們不得不拿他和中國的文明對立了，幷不等到希臘，羅馬，及現時的歐洲，來和中國對立！

6、瞻仰釋伽牟尼證佛地

先生於1930年的歸程中旣看過了巴爾幹及新土耳其便道到印度一行抵得利都城後卽於四月八日特至菩提伽耶——釋伽牟尼證佛地叅謁，見二千餘年的聖跡至今祗有多少由緬甸，錫蘭及西藏去的僧徒住持着。一切荒野殘廢的狀況和中國各地的寺廟無別，先生以爲這已可以證明了佛教徒之脫離社會的結果！

先生在拉和爾及特利時，先後均得機會擠進農村裏去，詳細和各階級的農民

談話，知到他們的一切狀況，覺得印度的農民正在極深的地獄中，——要比中國的地獄更深更暗！但他們的獨立運動已十二分的擴大，甘地於1929年底受全國國民會議的委托，全權執行印度獨立運動的工作，那時正在西部農村中運動，并先行拒絕買政府專賣的鹽與英國的布，這種辦法雖然還說不上獨立工作，但先生以爲不久必會一天一天的加深及擴大；因爲他們城市的成份比中國較爲進步，且英國爲剝削印度的緣故，不能不多造鉄路等新工具以擴大市場，而結果却成爲印度獨立的好基礎！於此可見帝國主義自挖墳墓底一般！

六，鄧演達先生歸國後的秘密生活

先生於1930年五月歸國以後，眼看着國內新舊軍閥的私鬥和專橫、黨衙門及一切官吏的貪污兇暴，社會經濟的衰落破產，農工平民的痛苦，眞是『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而號稱領導中國革命的政黨，都已先後變成了反革命或宣告破產。

先生以爲國民黨因領導者底相繼背叛民衆，已完全變成了軍閥官僚地主豪紳的機關，造成了南京政權下的反動統治，固已不可救藥，而共產黨要在中國建設蘇維埃政權叫中國做蘇聯的屬邦，蔑視中國民族獨立的要求，已由客觀的事實，證明是絕對的空想，失墜了牠領導中國民族革命的使命。

先生於此考慮又考慮，深思復深思，甚至廢寢忘食和許多有學識有研究的同志朋友們交換意見，反復討論，結果認爲復興中國革命的任務，是非常迫切的落在他身上，於是察度大多數痛苦羣衆的需要，以至力從事於革命綱領的草擬。

先生認定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性格是帶着民族性的「平民革命」！但中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是有不同點，卽中國無比較發達及自覺的人民（資產階級包涵在內），因此，中國革命當爲民族解放的廣大運動，而且爲破壞封建殘餘的民主革命運動，却不能爲資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又不同於俄國的十月革命，因爲中國無廣大的自覺的產業工人，所以這個革命應該是農工及其他城市鄉村被壓迫剝削

的成份的革命，而決不是無產階級獨裁的革命，但却帶着非常濃厚的『社會革命』的色彩，因此之故，這個性格可以叫做『農工平民』的『民族革命』！不過這個『平民』的涵義和舊時代僅與『貴族』相對待的解釋是不同的，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剝削他人的，如直接參加生產的各種工廠工人，手工業者，自耕農，佃農，雇農，及設計生產、管理生產與擔任運輸分配等等及其他輔助社會生產的職業人員，現時都是被政治勢力及資本勢力壓迫着的，所以統稱之爲『平民』，換句話說，也就是以農工及其他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作階級爭鬥的同盟，共同爭取社會政治經濟的解放，以求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先生的政治主張都是以這種階級聯盟的共同利益爲出發點，絕對不許有任何單獨的破壞聯合戰綫的爭鬥行動及綱領。所以他對外主張：絕對的抵抗帝國主義——收回一切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凡贊助中國的民族獨立自由爭鬥者，皆與作友誼的聯合；對於第三國際及蘇俄，固極希望而且需要他們的援助，然絕不能以民族革命的運命一切委託於第三國際；同

時對於中國的共產黨在階級的聯合戰綫上，雖亦極願與之作友黨的聯合，但在政策及主張上根本不同之點，則批評駁斥，毫不客氣。對內主張：以眞正的全國人民會議建立平民政權，肅清官僚政治，組織各種職業的自衛軍以造成人民自己的武裝。發展國家資本以促成社會主義；這個具體的綱領經許多同志的集體討論，終於1930年的八月十九日由十個省區十九位幹部同志的決議一致通過。——就現在外間所流傳的單行本的『政治主張』同時卽舉行莊嚴痛快的結黨式。

從此以後，開始積極進行，全國的革命羣衆，有若百川入海，萬派歸宗，各地方之請求接見，及遞達報告意見者，日必數十起，先生更運其健全的腦筋，敏捷的手腕，日則親自批答處理幷撰著文稿，普通者逕交機要工作人員執行辦理，重要者提出幹部會議決定，而一到電燈放光，則立卽出外，分赴各處會晤同志及來賓，指導接洽，若農夫之『日出而作』者然。每夜都到十二時以後，甚至三四時以後始能返寓，返寓時除因身體過於疲乏之外，常自徒步而歸，蓋先生在白晝每

偪促一室，苦無健足之餘地，而夜深路遠，則正可勞其筋骨，以步行運動，先生嘗自況爲『耗子的生活』。

先生的寓處最初是由團體中負責任的同志給他賃過兩度專用的房子，一度是在愚園路的愚園坊，一度是在格羅希路的大福里；但先生都以爲太不經濟了。其實月租也都不過四五十兩左右，現在一般的所謂革命領袖的居處，有幾個不是高樓大廈，富麗堂皇的；但先生却力主不可，他以爲現時中國工人的生活，平均每人每月不過五元左右，農民不過三元左右；我們的職責是代表農工及平民大衆的利益而奮鬥犧牲的，我們的生活爲着職務及工作的關係，固應盡力設法保持自體的健康，但是總應該和農工平民大衆的生活，不相懸遠，不但目前的生活，要有勞苦平民的鍛鍊，卽在將來革命進展或至獲得政權時，我們革命者的生活標準，亦不能提高，我們如果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標準拉平，不能把担當革命前綫的兵士與高級軍官的生活拉平，則腐化，貪污變節及與羣衆脫離的結果，必不能免，革

命必不能成功，而且根本失却了革命者的修養。先生以爲只有農工平民大衆的生活提高以後，我們的生活才能有提高的權利，他以爲刻苦是革命者的『倫理』。不過先生的意志雖然堅决的要這樣，但是在上海這樣一個環境裏工作活動，怎能允許他呢！尤其是他那種魁梧奇偉的體格，鶴立不羣的精神，在在足以引起人們的注意；所以以他這種情形，爲應付現實的環境計，倒不如化裝一個官僚或買辦的樣子，反容易行動的多，因此他的寓所總也要有相當的陪襯和掩護。後來幸而有位同情於先生的一個在買辦社會服務的朋友，招待先生住在他家一所中等小洋房的三樓上，所好他家出入的人既不多，往來的朋友也都是沒有政治關係的，一切起居飲食，都很方便，房租和伙食的費用，更是說不上，當然完全揩油的了；所得公私的餽贈，撥數拿去應付工作，和接濟貧困的同志，自己沒有車資零用時，反而向管財政的人手裏去討！但每月也用不掉十許元。總之先生半世的生活，雖然始終沒有完全脫離經過非常的貴族式生活，但是他的出發點，他的基礎，總

是純粹建築在平民的性格上的。先生初回國時，卽脫去西裝，改着一自由布袍布掛，跑到幾位排場較大一些的朋友家去時，他們的娘姨和僕侍等，都叫他做『鄉下人，』先生唯笑而頷之。但有些同志，以爲這樣恐怕很容易使外人發生懷疑，要替先生改裝，製幾件好一些的衣服化化裝，但先生總是不許，結果還是他一位稍有幾個錢的至好朋友，拉着先生叫成衣匠量身，甚至還送些曾經穿過的外套及皮袍等，先生也就毫不客氣，樂而受之了。

先生平日在思想上雖然深惡痛絕中國歷來相傳的『克己』，『窒欲』，『無我』等這一類先王之道，聖人之教；并且極力主張提倡人欲，——人人日日所不能離的人欲。他以爲『中國社會的殭化，大半是因爲受了禮教先生們窒息人欲的影響，祇有人人起來，覺悟着，追求着不能離的人欲，然後現時的枯死兇殘的中國社會關係才會打破，才能造成新的社會，人的社會，一直達到人類的博愛與互助。不然，徒然幫助了反動的殘酷，』但他自身却并沒有怎樣縱欲過，一年到頭

的獨身生活，當然有時也會發生性的衝動和煩悶，但是只要革命的工作一緊張，再不然，見了幾位知己的朋友『百無禁忌』地說一陣，笑一陣，也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每次政局發生變化的時候，穩有許多革命的販子爲各方的軍閥或巨頭奔走拉攏，先生只有感覺着中國社會的空虛而變幻無常，他因爲要立定脚根樹立一個社會運動的法定形式，所以絕對不願意像一般的『革命偉人』（？）一樣，今日罵甲而明日復聯甲；今日聯乙而明日復倒乙，一切的離合去就完全要以革命的綱領和行動爲準。當1931年寧粤合作之前，粤方推崇備至，陳友仁輩更是屢次親自出馬勸駕，先生總是峻拒，僅允在革命的戰綫上與以相當的贊助。

先生平日很痛心於中國文化的落後，每思以畢生的精力從事於此，歸國後不多時因客觀環境的要求，即忙於實際的運動，但百忙中仍時時設法提倡，幷嘗親自著論爲文，自1930年五月歸國至1931年八月被捕，中間僅一年餘，寫的文

章也已着實不少，最重要的如：

平民文藝的原則提綱

中國到那裏去？

世界經濟危機與內戰中的中國

中國內戰與文化問題

南京統治的前途及我們今後的任務

南京欽定的國民會議和我們所要求的國民會議

現時國際及中國的形勢與我們鬥爭的路向

怎樣復興中國革命？

這些都是先生針對着中國目前廣大農工平民的需要之不朽的傑作，可惜在殘酷野蠻的反動統治底下，有幾個人能看得到？

先生的文思常如潮湧，運筆快捷若飛，每篇文萬言立就，惟排印時手民都不

能讀先生之原稿，以故常須找人抄寫，平常先生一人所寫之文，往往二三人抄之而不及，先生於此每歎惜於中國文化工具之滯笨，實在不夠他發展腦筋的運用！

附言

唉！先生被害已經足足一年了，以這樣的天才，這樣的人格，當局者竟不能相忍爲國，試問這一年來獨夫之所得者爲何？而我中國人民所受的損失是怎樣？蔣氏前途固不足惜，其如我大多數的勞苦民衆何？我每回想到先生在黃埔軍校訓練學生的情景，北伐途中奔馳的態度，以及武昌城下指揮，臨穎壕頭的督戰，一種生龍活虎的氣慨，一種勇往邁進的精神，我的一枝拙筆實不能寫其萬一，爲問中國果還有這樣的一個人嗎!?還有這樣的一個人嗎!?

革命行動的青年士戰的工作：

在革命時期——現時——的中國青年，只有無條件的加入農工平民的行列，學習生產的意識與技能，從事於組織和活動的工作——革命工作，才能洗滌舊時代的卑汚。這是第一步。

在農工羣衆中，一面從事於組織的活動，一面形成政治的，經濟的軀幹，行自己支配自己的內在發展。這種組織愈是擴大而深入，則新社會的條件愈見成熟。這是第二步。

自然，所謂政治的生活軀幹是包含政治管理，軍隊，警察等等職務機關而言。所謂經濟的生活軀幹，係指合作社，公營及國營生產機關及其他一切金融運輸等等機關而言，必定在潛伏的時期，在政治爭鬥的行程中，已經行着內在的發展，才能於革命勝利以後執掌政權，才能形成新的政權，才能着手新社會的建設。而執掌政權以後，這種工作，更是公開的發展出來。這是第三步。

追憶鄧擇生先生

永井龍大郎
秋萍 譯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眞可以說是聳動了世界之視聽的最偉大的現象。尤其是國民革命軍之北伐的進展，以連戰連捷之勢，在長江流域肅清了軍備充實的北洋軍閥。當時日本全國人，盡都驚心動魄，不斷地注意于中國的革命。

一九二六年，革命軍終于佔領了武漢。于是日本人的視察也羣集到武漢來。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當時最有光輝的革命的主體，——對于全革命軍作政治指導的總政治部。這個總政治部的統率者，就是我們所欽佩的鄧演達其人。

我個人最初得親鄧氏的風采是在那年秋深的時節。當時，我和二三日本新聞記者訪鄧氏于武昌舊督軍署。我們由總政部員的領導，在會客室靜候少時，即聽見靴聲囊囊，不一刻，便看見一巨人排闥而入。這即是鄧演達氏。他的魁梧的軀

幹，眞給了我們以一種重壓。但是，他始終是含着微笑，伸出他的巨掌，和我們一個一個的緊緊地行握手禮。他那種自然不拘，態度和靄，更給我們以一種可親的印象。誰相信，這就是立于反帝國主義的第一線的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氏?!

我們向他質問到革命的問題，他不像一般現代中國的要人，閃灼其詞，模棱兩可。他態度堅決地表明他的信念。在當時，帝國主義者所最怕害的，常以之爲口實的，是中國的赤化及國民革命之共產化的問題。

『帝國主義者說：由上海溯江而上，愈進武漢，便愈聽見國民革命軍的赤化的呼聲。閣下的意見如何?』我們這樣問。

鄧氏說：『這是反革命者的宣傳！尤其是北洋軍閥之元兇張作霖，孫傳芳等的惡宣傳！國民革命軍在那一處赤化給人看了?在那一點共產化了?請認淸了事實，便不難了解吧。並且什麼叫做赤化?什麼叫做共產化?卽我自身亦相信現在中國的革命，尙未達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

當時我們想再加以反詰，也無從反詰了，只是唯唯的緘口了。

當時的帝國主義者之間，對于革命軍作種種的逆宣傳，並行其離間策。例如鄧氏赴南昌總司令部訪問蔣總司令的時候，帝國主義者又造謠了。他們的造謠是：

『蔣總司令身上還是穿着由廣東出發當時所穿的一件襯衫。鄧演達已經穿上了外套。蔣介石斥責了他，把他監禁起來了。』

當鄧氏由南昌乘飛機回到武昌來時，便招待了外國新聞記者，以自己的出席，證明了上述的只是一種逆宣傳。到後來，那些帝國主義的記者，漸次知道了鄧氏之廉潔持己，生活簡樸，不修邊幅，完全以犧牲的精神從事革命。宋慶齡女史之艱苦卓絕四字眞是鄧氏的適評。在那時候，蔣介石在南昌受了反革命的包圍，只來武漢一次。只有鄧氏一人在武漢，以不眠不休的精神，應付一切軍事政治的工作。當革命最高潮的時節，鄧氏因過勞的結果，陷于極度的神經衰弱症。然猶

不自愛惜，無日不蓬頭垢面，乘着小汽車，東奔西走，爲革命盡瘁。他的這種精神眞令我們日本人也受了異常的感動。卽帝國主義者也在暗暗的驚歎。

其後，因國民黨的反動，鄧氏深體孫中山氏的革命精神而努力于孫文主義之革命的擁護。自指揮一黨，以繼續其革命的工作。他的精神是最適于現代中國的革命，而不是共產主義。因爲鄧氏在軍隊內的革命工作有急激的進展，作蔣氏之基礎的軍隊發生了動搖，于是蔣氏加以共產黨之罪名而逮捕之。又因甯粵的議和，鄧氏遂遇害。鄧氏雖死，但凡知其爲人及人格者，不問主張主義爲何，盡都爲之痛惜不置，而益歎中國之革命人材難再得矣。

鄧氏律己極嚴，而待人則甚厚。信人極深，尤其是對于部下，苟認爲適材則必置之于適所。總政治部之所以立在革命的第一線，部內之所以人材濟濟，固非無因也。卽下野之後，在青年之間，信望益深。故由他振臂一呼，青年多奔集其旗下，而鄧氏所領導之黨亦日見擴大。又鄧氏之好學不倦的精神亦有足令人感佩

者。當革命緊張，財政上極困難的時候，但若認爲于政治工作上所需要的資料，亦必劃出一筆經費，向世界各國採購書誌，令其部下摘要譯出，以供氏之參考。

在中國革命狀態之波瀾起伏中，產生了這位偉大的人材。同時在反革命的暴壓中，喪失了這個偉大的人物。但是鄧氏雖死，其精神則仍與浩氣長存。即對于我們外國人，亦給了不少的教訓，同時爲我們所敬仰的目標。

茲當鄧氏逝世一週年，感慨無限，特草此篇以作紀念。雖有未盡之處但能對鄧氏在天之靈略表微意，則幸甚。

一九三二，一一，一五。

中國革命核心問題是：

在經濟的意義說：是肅清中古時代的殘餘，特別是落後的破碎的小農經濟生產，應該加以改造。同時，帝國主義侵入後的買辦高利貸經濟應加以清禁除治。目的在：以集體的力量構成「計畫經濟」(Plan-wirtschaft) 或「國家經濟」(Staats-wirtchaft)，一面使生產力加速度的發展，一面使分配向着平均的路途——向着社會主義路途。

在政治的意義上說：鏟除官僚政治及軍事獨裁，使士大夫地主豪紳專政的傳統的政治形態徹底的掃清。目的在：由人民直接掌握政權。而且使政治組織與經濟生活密切而至不相分離，徹底的掃清士大夫「空談誤國」及「一部論語治天下」的黃老政治及儒家政治。更是掃清牧民宰民的毒害。

在社會的意義上說：掃除「名分」，「偶像崇拜」甚至於買賣人口，奴役人民的社會意識及社會行為。特別在文化的設施上，掃除士大夫階級專有「文化」(當然他們所謂文化只是搖頭擺尾的臭東西！)的不平，及士大夫階級「寄生文化」，「蠹蝕文化」，而代以人人所應有的「生產文化」，創造「勞働文化」

故鄧演達氏之回憶

中村慶夫
平君譯

『中國國民黨早喪失其革命集團的地位，在今日已成爲不可掩之事實，亡國民黨者，非其黨外之敵人，而爲其黨內之領袖……乃自十六年寗漢分立，因蔣介石個人之獨裁與軍閥官僚之爭長，黨與民衆日益背道而馳，藉反共之名，行反動之實，陰狠險毒，貪污，欺騙，無所不用其極……最近如堅苦卓絕忠勇奮發之鄧演達，終遭慘殺，卽其一例……余不忍見孫先生四十年慘澹經營之革命基礎，毀於少數自私自利之野心黨人，尤不願見中國四萬萬民衆之國家，亡於自叛其主義之中國國民黨，不得不於此時致其最率直誠懇之忠告，孫先生爲革命而建黨，黨不能救國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顧惜……』

上面的文章是民國廿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首領鄧演達氏遭蔣介石慘殺的時候，故孫總理未亡人宋慶齡女史所發表的宣言的節錄。

× × × ×

回憶去年八月十八日，大陸報登了鄧氏被捕的消息，給中外人士以一個極大的衝動。尤其是在日本方面，當武漢時代從鄧氏——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在革命上作了最有朝氣的活動的鄧氏，——受了極深的印象的各報館，各通信社的通信員，以更大的刺激，將此消息報告本國。在滬各報亦競相登載關于鄧氏的消息。當鄧氏于八月十七日午後三時在愚園路愚園坊廿號招集黨員十五人加以政治的訓棟的期中，被當地警備司令部偵查隊會同工部局靜安寺路捕房巡捕所逮捕。不經法律的手續，卽解送南京總司令部。當時鄧氏之友人盡都深信其人格及才能，極力營救。尤其是宋慶齡女史，奔走最力。但是結果還是無效。終于十二月廿八發表宣布鄧氏的死刑，判決理由只有鄧氏對軍隊進行秘密工作的斷片的記述。在表面上，則加以危害民國的罪名。本來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條例實在是法治國稀有的反動法令。但到後來，據確實的情報，鄧氏之死，是于一個月前由蔣介氏下秘

害命令置之于死的。蔣氏之所以出此手段，完全是忌鄧氏的人格，才幹，及拓其聲望。其實蔣氏早就欲置鄧氏于死地，唯顧慮舊同志，——尤其是黃埔同學之動搖，故遲遲未決。不幸的是南北妥協問題急速進展，孫科陳友仁等又極力爲鄧氏保釋。蔣氏深恐鄧氏一出，則自巳地位必發生動搖。于是陰險卑劣至極的動機，對鄧氏下了最毒辣的手段。——這是在以孫總理的信徒自居，以國民黨員自居的蔣氏的政治生涯上留了最大的汚點。

× × × ×

在蔣介石早經不顧孫文主義之爲何，亦不問三民主義之當作如何的解釋了。他的唯一的目的只是在鞏固以江浙財閥爲背景的獨裁的政權。

蔣介石一面是陰險殘忍人物，但一方面又富于妥協性的俗物。他是一個複雜性格之所有者。他只有個人的利益。假如于他有利，即逮捕，監禁，殘殺亦有所不辭。若認爲有利用三民主義的必要時，則亦戴上三民主義的假面。又欲在部下

及兵隊之間，以革命的思想增高其聲望，則亦厚着臉皮，作革命的演說。但是一看見同志中，政治地位有比他卓越的時，他可以立卽蹴開一切的誓約，不顧信義，以殘害其同志。試看他自民國十三年來直至今日之政治的經歷，卽不難證明吾言之非妄。胡漢民，李濟琛，方振武，居正等都受過了他的逮捕與監禁。

鄧演達氏始終有一貫的主張，而又有奪取蔣氏之軍權——蔣氏只賴私恩以收買軍隊為其個人利用，鄧氏則堂堂以革命的主張可以奪取其軍權。——的聲望，這是蔣介石當然不能放過他的。

×　×　×　×

鄧氏逝去之後，滿一週年了。同志之間，有特別紀念號的發刊。我因與鄧氏有多少的因緣，特草此篇，以作紀念。

我初次認識鄧氏，是民國十五年的初秋，當革命軍橫渡長江的時節。我在那時，是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部的通譯，服務于旗艦利根號，目擊勢如潮湧的國

民革命軍壯烈地圍攻武昌城至匝月之久。革命軍佔領了武漢之後，三鎮都翻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我常常到漢口英美煙公司的總政治部及西園第八軍司令部領取一切的宣傳品，于是對于國民革命，稍有認識了。那時候，眞是國民革命的黃金時代。尤其是總政治部的偉大的活動，眞是令人驚嘆。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即是鄧演達氏。他的刻苦耐勞的革命精神，不單使在漢口的日本人發生感動，即遠在日本國內，亦盡注意于鄧氏其人。在那時候，誰都深信只有鄧氏是武漢政府內部的柱石。他的實際勢力也超乎汪精衞之上。因爲當時彼此繁忙，雖欲多與鄧氏接近，但只是匆匆一面以後，便失了機會。

我眞的與鄧氏作詳細的長談，是在去年的初夏。約一點半之久，靜聽了鄧氏的政治主張。這時候鄧氏給我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

今先就他的外貌來說。鄧氏的服裝非常的簡陋，只穿一青灰色的中國大褂，頭髮蓬蓬，沒有半點的修飾。但是他那樣魁格的體格，那樣宏壯的氣宇，眞有壓

倒一切的氣概。問答之間，時時作明顯的首肯，而態度非常的率直而且自然。我當時便想，這確不愧為一黨的領袖。

至會談的內容多是關于政治問題。在他那種自然而脫落的，足于令人親近的態度中，却含着有極堅強的個性。這是可以由他的談吐中看出來的。即任何遭遇，亦決不枉他的政治主張，在這時已經表示無遺了。

臨別時的握手，也異常的誠懇，令人感動。

此後，我常常接到鄧氏寄給我的機關雜誌革命行動，我更得着了有更詳細研究鄧氏的見識及政治主張的機會。以我所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主張，可以說是起源于民國十六年六月卅日鄧氏所發表的『警告武漢中央的宣言』及同年九月六日宋慶齡女史之『對中國時局宣言』。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亦發表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衆的宣言』。

民國十六年六月三十日，鄧氏的宣言裏面說：『在東征革命背叛者蔣介石的

工作當中，我們中央同志也生了不幸的變動，前主張討伐蔣介石的，現在忽然有投降妥協的要求，前時主張擁護農工利益的，現在忽然反而要去屠殺農民和嫉惡工友』。

他又說：

『我們的黨，如果不決定而且承認農工政策及有決心去解決土地問題，則革命的意識將完全消滅。結果，必不免于第二次辛亥革命的失敗』。

鄧氏主張的核心是在解決土地問題。本宣言是，當武漢政府分共時，反對與南京妥協，發表于鄧氏離開武漢之際。鄧氏離開武漢後，遊歷歐洲各國及小亞細亞諸地方，熱心于研究政治社會，經濟等問題。民[illegible]十九年五月歸國，組織行動委員會，常發表其政治的主張。——其間鄧氏的境遇常發生種種的變化，但其主張則與在武漢所發表的宣言要旨無殊。其機關雜誌革命行動唯益見其理論內容之擴大及尖銳化。至鄧氏之立場，仍然是國民黨的最左翼。

× × × ×

在國民黨當中，本有以左派自許的汪精衛一派。例如他的部下陳公博氏，曾發行革命評論，民衆先鋒等刊物鼓唱黨的改組，恢復革命精神，宣傳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徹底的民主主義革命論。在當時也相當的獲得了一部分的青年。但是改組派的汪精衛主義，只是反覆無常。——究其內容，只是實踐的投降，而形態則是左翼革命的變裝。——其目的只是圖個人的權利。故日前大罵蔣介石爲獨裁主義者，現在則以分得一部分的贓爲滿足，而與蔣氏同流合汚了。

我的關于政治社會等問題的見解不一定與鄧氏的全同。本來理論本身是不能以自是或設定規準而自足的，也沒有絕對不變的價値。但是理論之優否，全視其能否實踐。故我一方輕蔑汪精衛之反覆無常。同時對于始終一貫，不曲自己的政治主張，而與滔滔的國民黨的反動化的大勢相拮抗，在實踐上有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大丈夫氣概之鄧演達氏，不能不表十二分的同情！

最後，借用宋慶齡氏的評語以紀念鄧演達氏，即：『他是在中國國民黨喪失了其革命的集團的地位之國民革命的最後階段上之眞正的中山主義者，其死亦是裝飾民主主義革命之最後的一朵美麗之花』。

平民政權的特質在：

第一，平民政權是生產者的政權。牠不但要根本鏟除寄生朽腐的官僚政治，而且要積極發揮生產增進的機能。

第二，平民政權是反對特殊級級的政權。牠不但是在構成的成分上和傳統的政權不同，而且牠要適應於國內生產力發展的程度，而使全國人民生活大衆化，平民化。所謂「文武歧途」或鄙視勞作的傳統的士大夫身份差別固然要擴清，而且在勞作的報酬上加以根本的變革。在原則上，無論担任何種職務的公共機關人員，只應有職務的不同，而在待遇上應無十分大的差別。只有這樣，才可以把新特殊階級重新產生的危險免除。而且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於生產者政權；平民政權的本質。也祇有這樣才能把現時南京反動統治驕奢淫佚，掠奪貪污的穢跡鏟除，同時才能使一般勞作最多而報酬最少的下級人員——特別是士兵警察及下級服務人員的痛苦免除。當然，這種原則的實現，是和全國農工大衆生活的整個向上超升的程度相適應的。不但社會的身分差別和經濟生活的懸絕會由平民政權加以清除，而且更是在文化的設施上普遍的建設平民文化——見本政治主張關於「文化政策」之部——以解除身份及特殊階級意識形成的武裝。

附錄

鄧先生的政治主張

目錄

A　對[illegible]濟政策

B　對內經濟政策

一　金融機關國有及一般的財政政策

二　大產業，關鍵產業，獨占性產業的國營公營，及促進合作社的組織

三　『耕者有其田』及一般的農業政策

四　城市及農村經濟發展的均衡

4，社會政策

5，文化政策

陸　我們和共產黨及改組派的分界

一　中國社會的結構

政黨負着決解政治問題的責任，而每個政治問題都是經濟及社會的要求的反應，也可以說是在某個時代裏特定的社會的全般結構的反應，所以我們先要明白了解中國社會的結構，然後才能着手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現時的中國究竟是一個甚麼社會呢？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有下列的幾種，可以代表流行的見解：

第一個答案：中國現時還是封建的社會

第二個答案：中國現時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

第三個答案：中國現時正在由末期封建社會及『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向着資本主義社會過渡

上面的三種答案，各各言之成理，相互排擊詆毀。究竟那一個對呢？我們以爲必需要先有正確的定義和科學的根據。才不致陷入錯誤的爭論。並且我們知道，要了解一個社會的全般結構，必須從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三方面去觀察分析，

把牠們的結果綜合起來，然後才能得一個明確的結論。我們現在先下封建社會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定義。我們認為封建社會的經濟方面，主要的是：以政治的力量佔有土地的地主對農民（或農奴）行生產品之剝削和掠奪，並壓迫農民做無償的勞役，所謂自足自給經濟佔社會經濟統轄地位。封建社會的政治方面，主要的是：居統治地位的階級是廣大土地的佔有者，他們有軍民財政的全權。封建社會的社會方面是：在這個社會內有梯子式的階級或身分差別，各階級和各身分中間有嚴整的界限，如地主和農奴，商人和貴族，手工業的雇主與學徒，地主與士伕等等。反映這個梯子式的階級和身分差別的社會意識是『名分』，『禮教』，是『上下有序尊卑有別』的要求，是主奴從屬主義。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方面是：工廠工業的大規模商品生產佔社會經濟的統轄地位。生產者主要的是工錢勞動的工人，他們和生產手段脫離。資本主義的政治方面是：工商業者及金融資本家居統治階級的地位，國家政策，視工商業者及金融資本家的利害為轉移。資本主義的

社會方面是：社會的階級差別，主要的是工錢勞動的工人和資本家，而流行的社會意識是自由主義，是個人主義。

定義既經確定，我們再去考查中國社會客觀的內容。

如果我們只根據西北西南等落後省區的社會結構來說，那我們就很容易肯定第一個答案，以爲中國現時還是一個封建的社會，因爲在這些區域內面還是以自給自足的經濟爲主，官僚政治的封建性更保存得完整，如甘肅馬氏，不但自身擁有廣大土地，而且累代爲官，官衙的徭役供應還是十分盛行，在許多地方，人口的買賣，奴婢的養育等等，是公然由社會官廳承認的。

如果我們只是根據沿鐵路的地區的經濟結構來說，那我們又容易得到第二個答案，以爲中國已經是形成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因爲不但那些地方的農村經濟已經完全爲資本所統治，農民爲商品而生產，而且在都市中已經有近代資本主義的影像，新式工廠到處可見。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如下的事實：70%以上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差不多30%的人口住在城市中。差不多只有30%的人口住有新式工業影跡的城市裏。其餘的城市差不多只是行着簡單再生產的手工業及半農業的城市。產業工人的數量，連煤礦工人及碼頭工人計算在內也不過佔全數人口0.5%(千分之五)在各地農民所生產農產品當中，自行消費的，平均約佔40%拿去和手工業及機器工業製造交換的平均約佔15%其餘的45%的農產品是被地主，商人以田租高利貸及『不等價交換』(商業的欺騙)，等等形式，被政府以捐稅徵發掠奪的形式剝削了去。再從工業的消費量來說：農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約爲三〇元，其購入工業品的價值至多爲收入的15%，城市人民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約爲五〇元，其購入工業品價值多至爲收入的35%又中國人民全體所消費的工業品中由外國輸入的約佔45%，由本國自製的約佔55%，而且本國自製品中，手工業生產品約佔其大部分，由新式工業所製的不過佔其小部份。又，在中國新式工業當中由外國人資本經營的佔80%本國

人的不過佔20%如果我們考慮這些事實，那麼，就可以得到中國社會經濟的影像；中國的社會經濟從主要點說，實在還是農業手工業生產的階段中。在這個階段中地租雖然以土地私有及自由買賣的形式發生出來，而實際上主要是由政治掠奪發生的。商業資本的高利貸和不等價交換，雖行着極凶暴的積累，而不過是工業資本發生以前的現象，並非近代（資本主義）工業資本的本質。其他官僚的剝削及政府的捐稅也是封建政治的附屬物，與貢賦徭役實無二致。微弱的本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一方面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競爭，他方面因爲農村破產的綠故，得不到銷場，所以不但不能發展，而且最近有實行破產的現象。因此，爲中國社會經濟的主體之農業手工業生產，一方面因政治的掠奪及帝國主義經濟的競爭而日就崩壞，他方面則無法過渡到一個最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的新階段，只是殘留在原日的階段中，不絕的朽腐，不斷的爭扎，這個就是從經濟方面觀察中國社會所得的結果。

在政治方面，我們知道：現時中國的政治組織是封建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雖爲歷朝統一的集權組織的骨幹，而實則每個行政區域內的官僚首長都保有任免下級官僚及自行徵收賦稅訓練兵馬的全權。強固如元代及清初的統治，皇帝且不能多所過問，更不必說到每個朝代的衰微期和現時的腐敗統治。中央政府徒具形式的統一規模，一切放任於省區的官僚（曹吳時代有巡閱使現時有幾省剿匪司令）省區的官僚更委之于縣（清代更有道，府，州，等）最後才有縣官的瓜牙聯絡着紳士們（士大夫或地主）去宰制農村。每個官僚形式上是對職守負責，而實際是對他們的主人（長官）個人負責。這樣形成一個多層階的統治。各個層階，都是以首長官僚爲中心，而以血緣及過去的主屬關係去團結及佈置瓜牙僚屬，構成一座很高的而專以壓迫剝削人民，包辦軍民財政爲務的金字塔，塔底是農民及其他平民羣衆，塔尖爲皇帝總統或主席總司令。從官僚的出身來說，他們都是士大夫，商人不過佔少數的一部。士大夫大抵是由地主或其他佔經濟特殊地位

的家庭出身，即不然，也會在服官以後很快的變成地主，和其他經濟的統治者。士大夫的意識主要的是禮教和名分，因此我們要斷定，中國的政治組織，實際上還是變形的封建統治。

在社會方面，我們知道農村中，特別是南方的農村中，還帶着很濃厚底氏族社會的色彩。差不多在全國中，血緣關係是支配社會的生活的中心。婦女固然是普遍的奴屬於男子，而奴婢僕役的買賣及處分尤爲地主家庭中自由的事件。士大夫的『禮教』『名分』的意識支配着社會的大部。

像這樣的一個社會的全般結構，我們固然不能根據牠去承認上述第一說，以爲中國還是一個封建社會；同時我們也不能根據牠去承認第二說，以爲中國已經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我們只是認爲，中國現時的社會，在形式上固有異於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內容的性質而論的確還離不了封建勢力的支配。因此，整個的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的時代。同時又

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配着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益呈複雜的狀況。這兩重支配，都是使中國社會不能向前進展的大障碍。

(註)上文的數目字係以現存的統計及記錄為基礎引申出來的，不十分可靠，但大概可以相信的。

二　中國社會的歷史前程

由上面的分析看來，中國實在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而構成中國社會的封建殘餘成份及前資本主義的成份實比其他的成份較多而且重要，現在我們要問：中國社會底歷史前程到底是什麼？

我們在答覆以前，先要限定問題的意義：如果題意是指較遠的將來的前程，那麼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的歷史前程，中國不能獨在例外。但是我們現在所要求答覆的是緊接着中國社會現階段的前程。

推測一個社會的歷史變遷，應着眼於下述的事件：第一，一般的經濟條件；第二，各階級的力量。我們現在應用這個觀點去推測中國社會的歷史前程。第一，從一般的經濟條件去考察。

根據上述的分析，中國的社會經濟現時主要的還停滯在封建殘餘及前資本主義的階段。因此，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實未曾具有。現在要問：是否中國必需經過資本主義的革命，形成高度的資本主義，然後才能過渡到其他的社會形態？

我們的答覆是否定的。爲什麼呢？

1，因爲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半獨立的國家，主要國民經濟機關都在帝國主義者手上，帝國主義者一面挾其高度資本主義大量生產的商品和巨額的過剩資本以破壞中國的農業手工業經濟，同時壓抑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使之不能長成；他方面更挾其政治的力量以延長中國內戰，使中國不能得到資本主義所必需的統一，以維持帝國主義者自己的統轄地位。中國的資產階級實無獨立的進行資

本主義革命的能力。帝國主義者固然不許中國平民羣衆行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也不許中國資產階級形成與帝國主義競爭的中國資本主義。

2，因爲現時的中國是處在生產技術十二分發達的時代中。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歐美各國的革命，固然類似中國現時的革命一樣，同是推翻封建勢力，消滅障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底革命；但是，當時歐美各國的生產技術比較現時世界的生產技術實在已有天淵之別，因此當時歐美各國的革命，不但因爲領導革命的是資產階級，要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且在生產組織亦非形成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不可。在現時的中國如果平民羣衆掌握政權，如果農工階級能成爲政權的重心，則必然能鑒於現時歐美資本主義的覆轍，開始即應用現時的生產技術以建設國營及公營的大規模的產業，并能運用政權，防止私人資本主義的弊害，使資本逐步的社會化，絕不致於以利潤，利息及田租等形式把資本化的剩餘生產物積累在私人手裏，重新形成私人資本主義。

第二，從各階級的力量去觀察。

1，我們首先估量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中國的資本主義因受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壓迫束縛的緣故，不能順利的發展。以致本國的資產階級并非單純的工業資產階級，而是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及地主等相結的買辦，高利貸者及商業資本家爲多，即極少數的新興民族資產階級，也是依存於帝國主義的政治及經濟的勢力以保障資本的安全，因此本國的資產階級的政治意識是曖昧的，牠們一方面不能澈底的掃除封建勢力，無力改造落後的經濟組織，他方面不能堅決的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

2，其次再估量中國大多數平民羣衆特別是工農階級的力量。中國大多數的平民羣衆，特別是直接生產者的農工階級，牠們在數量上佔中國人民的絕對大多數，牠們在政治上受着嚴重的壓迫，在經濟上受着慘酷的剝削，十二分的需要解放的爭鬥。牠們現在雖然因爲反動的政治壓迫，大部份無法進行直接鬥爭的工作，

卻是已經有不少的份子從事鬥爭，客觀上，在不遠的將來，那些被壓迫剝削的大多數平民羣衆必然的會參加偉大的政治鬥爭及經濟鬥爭。也必然是要牠們參加政治鬥爭，才能形成代表牠們自己利益的平民政權；要掌握了政權，才能進行經濟解放的工作——向着無剝削的社會前進。資本主義的建設對於廣大的民平羣衆，特別是農工階級是無益而有害的事，因此覺悟的農工大衆，絕不會在自己掌握政權之後再去倣做歐美，形成近代的私人資本主義。

因此，從各階級力量去觀察，我們可以決定，需要社會主義的農工大衆力量，現時已比資產階級為大，而且在最近的將來還要迅速地增強擴大。

我們綜合以上的觀察，知道中國只有兩條出路：或者是淪為國際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叫中國永遠受帝國主義的支配；或者是由中國大多數的平民羣衆自己起來推翻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的統治建立平民政權，進行經濟的解放。

如上所述，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在中國雖還未曾具備，但是處在生產技術十

二分發達的今日，如果以農工爲中心的平民羣衆能奪取政權，則必能立即運用國家力量，進行國營及公營的大規模產業建設，防止私人資本主義的弊害，發展生產，爲產業社會化的基礎，向着社會主義前進。像這樣的經濟政策，爲由現時前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辦法，這種過渡期的經濟組織，我們可以叫牠做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的內容與趨向是因執掌政權的階級分別而不同，即：如果政權在資產階級手裏，則此種組織適爲高度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對本國的勞動階級行高度的剝削與對敵國競爭的工具，現時的德，美，意，日均有此種顯著的傾向；如果政權在廣大的勞動民衆手裏，則能在產業大規模發展的條件下面，使資本逐漸社會化，爲建設社會主義的工具，現時的蘇聯已採用這種組織的辦法。我們所主張的國家資本主義，當然是平民政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

我們認爲運用過渡期的經濟政策——國家資本主義的組織——爲平民政權建

立後必然的出路。祇有這種出路可以解放中國人民，可以達到社會主義。

叁　我們的爭鬥目的

上述的中國社會的歷史前程，是客觀的必然的趨向，然而却不是不須革命的鬥爭就可以自然而然的發現出來的，並且，只有在革命的鬥爭進程當中才能實現出來。

我們相信，實現上述的中國社會歷史前程的革命，不是一個單一性的革命——不是純民族革命，不是純民主革命，不是純社會革命——而是一個複雜性的一種革命，具有民族，民權，民生三種革命性而以社會主義爲歸宿的革命。我們更相信，這個革命不是先後繼起的三個革命——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的歷史階段合成的，而是以同時並存的三種革命對象——帝國主義者，封建軍閥地主，以及依附前兩者爲生的高利盤剝的，反動的資本階級——爲對象的。這種特殊革命方式，是由中國的特殊條件所決定，而中國廣大的平民羣衆底參加革

命的鬥爭，實爲決定將來中國命運的樞紐。

孫中山先生的主義，完全是適應上述的環境和要求而生的產物。因爲他一向站在大多數平民的立場上，所以他的思想內容，自始卽沒有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尤其是他晚年的主張，很明白的指示我們向社會主義的前途去奮鬥。不幸孫先生的叛徒們，非特曲解了三民主義，而且假借孫先生的名義去作他禍國殃民的掩護。這麼一來，不獨革命中斷，而且把三民主義弄得撲朔迷離，爲民衆所厭棄，好些革命份子遂亦因噎廢食，想拋棄了三民主義去別求蹊徑。

我們堅決的相信，三民主義這個名稱雖然被叛徒們所盜竊，牠的內容雖然被叛徒們所曲解，但三民主義的眞相，却并不因此而受絲毫損失。我們要努力去打倒這些叛徒們，恢復中斷的中國革命。只有使三民主義更加具體化，使牠更加切實的適應大多數平民羣衆的要求，並堅決的使他們的要求實現出來的人們，才是忠實的中山主義的信徒。簡單一句話，我們的鬥爭的就是實現三民主義。具體的

說，我們爭鬥的目的，是要澈底的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羣衆取得政權，要實現社會主義。

肆　我們的爭鬥手段

我們已經明白了我們的目的，我們必須更進一步的去找出實現目的的方法，這個實現的行程，就是我們的爭鬥的手段，我們應取的主要方法是下面這樣：

1.要澈底的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一定要喚起並組織廣大的民衆，使其覺悟的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只有廣大的民衆覺悟起來，組織起來，才能無畏的作反抗帝國主義之鬥爭，直接由國民會議決定，立行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復次，我們相信：中國革命可以擴大並影響於被壓迫民族與階級的解放鬥爭，同時世界被壓迫民族與階級的革命運動也可以促進中國革命，聲援中國革命。但是，中國革命與第三國際所號稱的世界革命實爲兩種相異的範疇。因爲中國革命有其特殊

之性格，而民族的要求更不能不由民族自行解決。第三國際所號稱的世界革命，是以中國革命爲手段，爲其所謂世界革命的先鋒。并且中國革命要由牠一手包辦。像這樣辦法，實在是忽視了中國民族的要求，客觀上必然會阻碍中國解放的工作，延長中國人民所受的苦痛。因爲如果把中國革命放在世界革命的範疇內面．則必然的要等待所謂世界革命完全實現之後，中國才能得到解放；此種策劃，是和事實的要求相背的。

中國革命的勢力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工作中可以并且應該與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階級聯合起來作爭鬥的同盟。所以孫先生臨死時候還要囑告同志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我們一定要聯合以平等待我們的革命勢力及民族，而排斥及抗拒不以平等待我，蔑視中國民族要求的勢力及民族，才能解放中國。

2，平民羣衆要取得政權，必定要用平民羣衆的本身組織形成堅強的力量，去

推翻千餘年來傳統的官僚政治。過去的換朝與革命，都只是新舊的建封統治者的交替，新舊的士大夫階級的交替，和人民隔離。所以人民必然的會受欺騙。過去的豬仔議員及最近的『黨衙門』都是好例。即虛偽民主的歐美流行的代議制，也不是廣大平民羣衆要求的制度，他們所要求的是和人民利益關切不離的政治權力與組織。

3，要實現社會主義，一定要在以直接生產的工農爲重心的平民政權確固以後，運用政權去發展生產，統制生產，使生產組織化及社會化。

五　我們具體的方案

上面所說，只是一些要點，現在更把各種問題，做一個具體的說明：

1，平民政權之建立

a，平民政權的涵義和先決條件。　政治制度是政治爭鬥的結晶，因此所謂政權是統治者權力的具體表現。我們的黨是代表大多數勞動羣衆利益的黨，黨的

要求就是大多數勞動羣衆的要求。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剝削他人的，無論是直接的接的或間參加生產行程的份子，都應該是勞動者，也就是我們所代表的人們：如直接參加生產的各種工人，手工業者，自耕農，佃農，雇農，及設計生產，管理生產與擔任運輸分配等等及其他輔助社會生產的職業人員。這些直接的及間接的參加社會的人們都是被現存封建勢力及資本勢力壓迫者，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所以我們總稱上述這些人們爲：平民羣衆。這個廣大的平民羣衆既要解放，自然要奪取政權．這個已經奪取得的政權，必定掌握在平民羣衆手裏，因此我們叫做：平民政權。構成平民羣衆的工人與農民，因爲他們所受的壓迫最爲利害，更因數量爲較多而爭鬥較勇的緣故，必然的成爲平民羣衆的重心。因此所謂平民政權，就是以工農爲重心的爭鬥同盟。并藉參與政權的比重，保障這個重心。奪取政權的過程就是這個廣大的平民羣衆向目前的統治者作經濟的和政治的爭鬥，即等到推翻整個的反動統治，

確實建立自己政權爲止的過程。

建立平民政權的先決條件是形成平民羣衆本身的組織。無組織的平民羣衆至於一盤散沙，雖多無益，只有在堅強組織之下，平民羣衆才能發揮他們的偉大的威力。在今日的中國，在平民羣衆的組織當中，最切實的莫過於職業的組織，如工會農會等，只有職業組織能使從事各種生產的平民發生密切的利害關係，只有職業組織能夠團結他們。其次重要的是準職業組織，如學生會，婦女組織，兵士組織等等。喚醒平民羣衆和組織平民羣衆：這是平民政權的必要的先決條件。只有這樣才能眞實的集中平民力量，只有這樣才能有力量從根本上推翻官僚政治，軍閥勢力及其他一切封建遺骸，而把政權收歸平民手裏。主張平民革命而不盡全力去喚醒平民，組織平民，從事於政治和經濟的爭鬥，等於自欺欺人，完全是假革命的行爲。至於害怕民衆組織，藉口於民衆組織之不易節制而去禁抑牠的人們，那當然無疑的是反革命了。

b，平民政權的組織　要收平民政權的實效，必須以有組織的職業團體代表構成中央及地方的政權的發動機關。因爲只有如此才可以使參加生產各部門的民衆確實的和政權聯接而不發生隔閡；只有如此才可以澈底的鏟除官僚制度及軍閥政治的積弊，不再發生新的官僚政治。同時，我們以爲：歐美流行的地域選舉代議制度，容易釀成少數操縱多數的弊害，此種弊害與中國過去的『豬仔議員』及現在的『黨衙門』等怪象都是爲民衆和政權隔離，才會發生，要消除及預防上述的弊害及怪象只有由職業團體代表掌握政權的方法。

我們主張：各職業團體及準職業團體按下列的比例數派遣代表以組成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國民大會：

直接參加生產的農民工人占60％

其他各職業團體及準職業團體占40％

臨時接收政權，議訂憲法的國民會議，應按此原則組成之。各地方權力

機關以地方的職業團體爲單位按上述組成之。

必須用這樣的組織才能使平民羣衆相信革命黨領導，才能免除那些假借『訓政』及『以黨治國』的名義去壓抑平民羣衆剝削平民羣衆的流弊。其次，我們反對歐美流行的三權分立制，而主張立法機關不與執行機關分離，一切權力屬於國民大會，在國民大會之下設立執行機關。各地方的權力機關爲省民大會，縣民大會，鄉民大會等。

C，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　我們認爲，在歷史地理及經濟的條件上，過去的中央政權都只是形式的統一，并且妨害了地方人民的發展。我們主張，應將中央權限縮小至最低限度，除外交軍事以及關係全國產業統制，全國的交通及全國的財政事項等等，必須中央舉辦者外，其餘應由各地方負責自行治理。只有這個分權的原則，才能使龐大而落後的中國，向上發展。當然我們是要堅決的反對一切軍閥割據式的『聯省自治』和無政府的『分治合作』。在另一

方面，我們主張，應於最短期間根據經濟地理國防的種種條件，將現今的省區，從新施行一種合理的劃分，因爲這樣才能使各省區均等發展。

d，政權的保持　要從根本上撲滅軍閥產生的根源，必須造成人民的武力。過去數年來的事實已經昭示我們，人民武力不是單靠什麼『以黨治軍』、『黨權高於一切』的空話可以造成的。要建設人民武力，必須一面限期實現普徧的徵兵制度，一面暫時用職業團體強迫徵兵的方法，使各生產部門的民衆，在取得政權以後按額抽丁入伍，組成眞正人民武力以保護革命。只有由組織的城市並鄉村的平民職業團體確實的掌握政權，才能使廣大的平民羣衆熱誠自動的形成自己的武力，保持自己的政權；所以平民的職業團體的政權和人民的武力二者有不可分的關係。

2，外交政策

a，國際的形勢　大戰以後的世界顯然的區分成四種力量。這四種力量，一面是

獨自形成，一面又是互相交錯的影響或排擊。我們中國的革命，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環扣，是重要的一頁。所以要了解中國革命與世界的其他政治力量的關係，就不能不了解現支配着世界政治的力量的因素：

一、帝國主義者的力量　帝國主義者的基礎在牠對牠本國的生產者並消費者的剝削，但是牠的生命却是依存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剝削的。所以各帝國主義者對於市場爭奪彼此間有不可調和的衝突；然而同時却也因此各帝國主義者才會對於革命勢力——尤其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勢力——的鎮壓有其共同的利害，常常聯合起來。

大戰以後的美帝國主義已經有壓倒英國帝國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以一九三〇年初的倫敦海軍制限會議表現得最明白。支配了世界大部數百分的英國帝國主義，自從歐戰以後，一方面因市場縮小，工業衰頹，資本輸出減少，無法減免國內的社會鬥爭的擴大。他方面更因爲不能抵抗日美的進攻，使原

日在南美，加拿大，南洋羣島印度等地方政治的及經濟的支配勢力大大的縮退，現時的英國正在防禦戰的時期。這個防禦戰的陣綫，在歐洲，是被美國所威脅，不能不對大陸——尤其是對法——取美英協調的形態；在亞洲，是被埃及，印度其正在興起的中國革命威脅，作總退却前的反攻，對於日本作繼續的讓步。這道防禦陣綫一方面是維持帝國主義聯合的依據，他方面却是構成帝國主義者相互衝突的預備。『團結大宗主國與殖民地自治邦，構成親密的經濟聯盟』，爲目前英國的政策要點。但是這種政策只是病者無聊的哀號，決不是眞能做到的辦法，因爲殖民地自治邦已經大部份具備了獨立的條件。

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後直到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前夜，英國在華的經濟勢力幾乎爲日本所侵代，因此英國的東方政策在此期爲退守的時期，而聯美抗日的傾向十分明顯。濟南事件以後英國對日的經濟爭鬥已入於反攻的局面。日本的讓步與最近美國新經濟勢力的來侵，引起英國在東方有聯日抗美的

可能傾向。因此整個英國在中國的政策是往復於聯日抗美及聯美抗日之間。

美國自大戰以後已成爲世界金融資本的中心，并且差不多掌有全世界主要生產額之半。牠一面挾其過剩的資本，使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及南美，加拿大等，爲其政治的經濟的附庸；他方面更因爲牠本國的工農業能相對的平均發展及有很大的消費力的緣故能盡量行高度合理化的生產。但是，現時生產過剩的危機却首先由美國爆發。美國內部的社會危機，現時并不比任何國家爲小，因此美國帝國主義向外發展的要求，必然更加迫切。

美國對於中國的策略始終是以『門戶開放』爲口號，想用純然的金融資本的勢力，使中國加速的殖民地化。牠想幫助南京政府用武力去統一地方軍閥，正因爲他想藉此：第一，打破各地的英日的勢力；第二，討好於希望統一的多數國民；第三，鎮壓中國的革命勢力；第四，直接扶植中國新興的資本階級，使爲已助。總而言之，牠是想藉此以發展他的帝國主義的勢力。他對

於蘇聯東部也有拓殖的企圖。像這樣的太平洋獨霸政策，必然的要和英國及日本衝突，雖然他在歐洲現時與英國正有協調的姿勢。

日本，自歐戰以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加速度的前進。他的市場差不多一半依靠中國印度及南洋，一半依靠南北美洲。他的工業原料的取給大部份是依靠中國。他的投資經營，在中國東北及東部已經有根深蒂固的基礎。因此，日本資本主義的運命，完全依存於中國及美國。更因爲敵對美國及英國的緣故不能不在中國確立更穩固的根基。這種要求就是日本對華政策的出發點。也就是牠和蘇聯妥協緣故。

日本對於中國行着一個三重政策或所謂三段姿勢(三段構)：第一段是利用中國的所謂中央統一政府，獨霸中國，（如牠對袁世凱的政策）如果這段的策略不成功，就退一步行第二策，扶助一個北方大軍閥使其替日本當守衛黃河流域以北的走狗，以防禦英美勢力的北侵（如像牠利用段祺瑞和張作霖

。）如果這一策也不成，牠第三段就用死力抓住滿蒙，使滿蒙爲日本所謂特權範圍，（如像張作霖橫死時日本所表態度。）日本關於中國問題對英美俄及中國所採用的方略，始終不出這三段姿勢的一段。

其餘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如法，意，甚至後起的德國，雖然世界政治上有很大作用，却和遠東特別是中國的關係不比上述英，美，日三國的重要。

二、蘇聯的力量　蘇聯因爲地域佔全世界六分之一，有強大的羣衆參加政治爭鬥，生產作用上有很大的潛伏勢力，并且因爲地理的位置不易爲外力所進攻，所以他仍然是一個世界力量的重要因素。但是，因爲革命後的復興問題及原來的經濟組織比西歐十分落後的緣故，現時還要集中精力的內部的建設。因此雖然在宣傳上對帝國主義取完全敵對的方式，而實際不能不和帝國主義，特別和日本妥協。蘇聯現在也是在一個防禦戰的時期。因爲是這樣，所以蘇聯對於世界弱小民族的號召，只算是一種自己本位的策略，牠對中國的政

策，只是想使中國革命勢力替世界革命「抗本楯」。

三、第二國際領導下各國社會黨力量　這個力量，特別是在德國及英國與其他中歐北歐的國家中，保有左右政權的相當能力。但是牠們的作用是限於在各該本國。並且在牠們的對外政策上幾和帝國主義者本身無甚大的差別。特別是牠們的殖民地政策，對於被壓迫民族——如印度，安南，荷蘭，中國等一一樣的行高度的壓迫政策。他們對於中國的政策，完全是跟着帝國主義者的脚跟走的。

四、被壓迫民族的力量　這個力量正在奮鬥及發展中。牠們是一面獨自的反抗壓迫牠們的帝國主義與其代理人，一面是要聯合世界各國革命的勢力增大爭鬥的聲勢及催促解放工作的完成。在現時覺醒中的被壓迫民族在近東有埃及，土耳其，阿拉伯，波斯，阿富汗；在遠東有印度，安南，中國，朝鮮，非律賓，特別是中國與印度爲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牠們的共同敵人是帝國主

義，牠們的共同目的是民族解放。

b,我們的政策：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在現時的世界中有四種相異的力量。這四種力量中的第一種——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針對牠們之間的矛盾，用種種方法努力和牠們鬥爭，第二種——蘇聯——力量，客觀上可以做我們的朋友；但是如果牠要利用中國抗木稍要干涉中國的革命，則我們不能因爲牠的口頭上的宣傳而不抗拒牠，第三種——各國的社會黨——在牠們的綱領上應該可以做成我們的朋友；但是在實際對外政策上是反對我們要求的，我們應該提防牠們，並且攻擊牠們政府的反動政策，第四種——被壓迫民族們——是我們真實的朋友，真實的政治聯盟者。我們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去反抗帝國主義，達到民族的解放的目的。

因此我們具體的外交政策如下：

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二、重新訂立完全平等的條約

三、對蘇聯，以雙方完全平等及不干涉中國革命爲限，與之恢復邦交

四、與各弱小民族結成親密的關係，建立反帝國主義的聯盟

3，經濟政策

根據我們上述的分析，我們知道，緊接現階段的中國社會的歷史前程爲國家資本主義。卽是說：國家資本主義爲由現階段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底經濟結構。

國家資本主義底本質上要在：第一，集中。以農工爲重心的平民羣衆，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國家權力把一切大產業，關鍵產業，特別是帶有獨占性的產業由國家專營，并獎勵公營的企業，使發展生產所必需的資本蓄積由國家及社會集積起來，不致於完全以利潤，利息及佃租的形式私人所有。更運用由國家集中的資力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第二，干涉。爲促進全國產業的發展，適應廣大羣衆的消費需要起見，允許經營中小規模的私人企業；但國家利用其集中的金融機關

與財政政策以防止私人資本主義勢力底膨脹，并使其逐漸的社會化。

現時中國主要的國民經濟機關，大部份掌握在帝國主義者手裏，內國的產業，一方被壓抑於帝國主義者，他方被妨害於封建的殘餘，還在十分幼稚的階段。故平民政權建立以後，即應立刻消除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經濟統治勢力，消滅封建的殘餘，在集中與干涉的兩個原則下而建設國家資本主義。

我們把經濟政策區分為二部，即A對外的；B對內的。

A　對外經濟政策

對外的經濟政策主要的在：消除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經濟統治勢力，以建設本國之產業。為國民經濟樞紐的關稅權，現時名義上中國自主雖被『承認』，而實際是為帝國主義者所限制掌握。所謂『互惠』政策，更為帝國主義片面的掠奪中國的手段。銀行被其壟斷，交通運輸機關被其獨占，鑛山為其經營。而賠款及其他政治的剝削（如私運軍火等）與毒害物品（如私運嗎啡，鴉片，高根，海綠茵，

士丁寧等）尚不在內。這些狀況如不根本改變，則全國人民生產的結果必大部份被帝國主義者掠奪而去，國民經濟無法向上發展。因此我們對外的經濟政策如下：

1，關稅權絕對的自主，并用高度的保護稅政策以保育本國工業的發展及救濟農業的衰頹。

2，收回一切銀行，鐵路，通信機關，鑛山及其他重要的由外資經營及外人管理的企業。

3，設置國家特許的租營制度　在產業落後，資本貧乏，技術落後的中國，利用外國專門家以開發各種產業，組織各種產業，實爲有利的事件。但因放任及被強迫的結果，致造成現時帝國主義經濟勢力在中國橫行的現象。不但產業無由開發，而且日就衰微。因此我們一面應如上述，絕對的取消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經濟特權和收回其經濟基礎；同時我們應設置租營制度，在一定

的年限內，以完全遵守中國的法律及其他有利於財政及工人爲限，允許外國投資團在本國經營企業。中國政府有完全制御的權柄。這樣，一方面可以免去從前的毒害，一方面可以收開發產業的利益。

B　對內經濟政策

要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向上發展，除擴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勢力以外，必須澈底肅清封建的殘餘。我們所認爲封建殘餘的，除政治及社會的領域以外，在這裏特別注重於經濟的領域：現時的中國，在割據分立的軍事封建勢力下面，造成無數的破碎支離的經濟體。這些破碎支離的經濟體，一面依賴於地方官僚軍事的壓迫勢力及商業資本爲彼此區域間接合的紐帶，他方面却正因爲官僚軍事的統治及商業資本的剝削而使以農業手工業爲基礎的落後經濟體更瀕於破滅或倒退於更幼稚的形態。這種形勢特別是在北部及西北，西南各省區爲著。地主的勢力普遍的與官僚及軍閥相結，爲剝削農民的最下的一個統治者。他們掠奪人民（特別

是農民）的形式是：佃租，勞役，自由加稅加捐，徵發物品，徵用人丁牲畜，強種鴉片，濫發紙幣等等。這些剝削的形式無不由於政治的權力，與資本主義時期的自由競爭的剝削不同，因此我們叫牠做封建的殘餘。必須肅清這封建的殘餘才能進行積極的經濟建設。

因此我們擴清封建殘餘的對策如下：

1，廢止厘金制度，包稅制度，廢除現行的稅率，特別是一切苛捐雜稅及不合理的田賦。

2，消滅惡幣，不兌換紙幣，軍用票等等，軍閥的財政設施及其他依存於封建軍閥政權的掠奪制度。

3，消除官僚軍事機關的浪費。

4，消除產業發展的障碍。特別是佃租，高利貸及地方公所行會等不合理的制限等。

上面所述只是消極的政策。我們積極的經濟政策却在於有計畫的經濟建設。其主要事項如下：

1,金融機關國有及一般的財政政策。

2,大產業，關鍵產業及獨占性產業的國營公營并促進合作社的組織。

3,「耕者有其田」及一般的農業政策。

4,城市及農村發展的均衡。

茲分別詳述如下：

（一）金融機關國有及一般的財政政策

我們知道，自由競爭的工業資本主義，到二十世紀已變形爲獨占的金融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底特質在：一切產業機關由極少數的大銀行控制，而國家的政策，主要的由金融資本家支配。這種現象在產業越發達的國家越是明顯，因此成爲帝國主義後期的特徵。金融資本不但對外有控制外交政策的力量，而且對內

爲集中資本，支配國家財政及國民收入，統一的施行經濟建設的中樞。因此金融資本主義爲資本主義發展之最高形態。在這種形態中的資本主義，牠的一切經濟的基礎和社會主義的已相差不遠了。不過金融資本的國家政權操在少數金融家手上，爲他們自己的利益罷了。資本主義發展到這個階段，無產階級只消一旦發動，把一切中樞的機關——特別是金融機關接收過來即可以實行社會主義建設。落後的中國，牠的金融機關在內國還大部份在封建的高利貸商業的錢莊，當鋪等等手上，他方面則被控制於帝國主義銀行。雖然有不少的中國資本家經營的新式銀行，但牠的業務主要的是在投機的買賣，而不是產業的控制，而且資本還是非常薄弱。這種現象，是半殖民地特有的。如果中國的平民羣衆取得政權，一方面爲着顛覆封建官僚統治，必須把那些爲封建官僚統治的財政基礎加以改造清理；一方面必須把一切可用爲國家金融機關的設備如各銀行及大錢莊等，分別由國家有備的收用；特別是帝國主義在華的金融機關，必須分別收回，以構成國有金融

機關的基礎。至於收回金融機關所需的資本，可用發行公債的辦法籌劃出來。金融機關集中的收爲國有之後，對於吸收人民儲蓄，利用外資，推廣國際貿易，統一幣政，調濟金融，發展產業，以及其他一切控制資本運用資本等等爲國民經濟中樞的事務，自然容易進行。

上述種種，皆爲建設國家資本主義的要務；但必須輔以一貫的財政政策，才能確實得到控制私人資本，使資本逐漸的社會化的效果。因此必須實行抽收累進的所得稅，資本收益稅，遺產稅等。同時，更須在廢止現行的稅率之後，切實的另訂合理的稅率，統一幣政，行實金本位制，使全國人民負担公平，使產業向上發展。這樣，私人資本的逐漸社會化便容易做到了。

（二）大產業，關鍵產業，獨占性質產業的國營公營，及促進合作社的組織

在產業落後的中國，新式大規模的產業，還十分稀少。現存的大規模產業大部份由外人及外資經營。其中關鍵產業（製造生產手段的產業，如鋼鐵工業，機

器工業，造船業等）在本國更十二分的幼稚，差不多全數仰給於帝國主義者。獨占性產業（如鐵路，運輸，鑛山等）差不多全數由外人獨占。其餘中小企業雖屬不少，而實不能應本國的需要，因此每年對外貿易入超之數日增，以致本國工業無法建立，產業日就衰落。

在平民政權建立之後，一方面用金融國有政策以集中資本，收回由外人經營的產業，及本國的大規模的私人企業。一方面即將集中的資本建設大規模的產業。在半殖民地的落後中國，也只有用集中資本的統一的計畫才能建設大規模的國家的產業基礎，才能把資本積蓄於私人手上的弊病逐漸的消除，爲產業社會化的準備。

除國營產業之外我們必須用國家權力及人民自覺的力量推行產業公營及合作社的組織。我們在政權上主張地方分權及地方自治的制度，因此自治團體——如市政府縣政府等——應行產業公營，以免一切大產業事務集中於國家，致管理官

僚化的弊病，更形擴大。自然，工人及消費者參加產業管理，實爲救濟及預防產業管理官僚化的善法，我們必須採用。同時，我們知道，在產業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和生產手段脫離，實爲社會爭鬥的動因。在中國，雖然因爲手工業及自耕農還相對的保留，生產者與生產手段脫離的弊害還不如歐美之甚。但是，大產業國營公營的辦法，尚不能包括產業的全部，小規模的私人企業必須允許其存在。使能輔助國有公有產業進行生產。因此，生產者脫離生產手段的事實還是相對的存在，所以，我們除盡力發展國營公營產業以外，必須推行合作社的組織。各種合作社，應一面由國家力量補助及提倡，一面由生產者及消費者自行組織。這樣不但可以防止及救濟生產者與生產手段脫離的弊害，幷且可以養成生產者管理產業經營產業的技能及共同生活的習慣，爲將來產業社會化的階梯。

（三）「耕者有其田」及一般的農業政策

我們爲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必須達到土地國有的目的。但是在目前的階

段，如果立刻普遍的普行土地國有，則不但容易引起農民的反感，妨碍革命的進行，而且必然的因爲生產技術落後的緣故，管理及經營均發生困難，以致農民不能安心改良土地，生產力低落，甚至使農地荒廢。這樣不但不是提高農業生產的方法，而且會更增加農民的痛苦，使農民離村的傾向，比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所發生的爲更甚。所以我們在原則上主張土地國有，而用耕者有其田爲過渡的辦法。

農民離村的傾向，普通的說，是因爲資本集中和聚中的緣故，使多數農民保不住固有耕地，所以才不能不離村別求生路；同時又因爲在大資本下面，城市工業發達，需用多數工人，所以只得集中城市去求生路。只有夢想着農業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的人們，才會承認農民離村有百弊無一利；同樣也只有中了公式主義的毒的人們，才會絕對的承認農民離村是好現象，才會主張犧牲農民利益以促進工業的發展。我們的主張主要的是這樣：一方面實行大產業，關鍵產業及獨占性產

業的國營公營，以免產業資本家之自由剝削，一方面實行耕者有其田爲土地國有的過渡以免地主的奪收和剝削。只有這樣才是合理的辦法。

中國的農業現在已快到完全破產的地步。大多數的農民除了賣身爲兵，爲奴隸（到外洋去底『豬仔』！）之外，祇有做土匪及流寇的出路，否則即不能不束手待斃（如西北各省的饑民！）并且因爲農業經濟在中國爲國民經濟的軀幹，關係於全國人民的存亡，所以我們現在要把中國農業破產的主要原因詳細敍述出來：

1，經濟的原因　構成經濟的原因的是：生產技術的幼稚，耕地的過度分裂，人口分配的不平均，地主及高利貸與商業資本剝削的凶暴，家庭手工業底破產，國際農業底競爭，農村資本底缺乏。

2，政治的原因　主要的在政治的剝削及掠奪，（如苛稅預徵錢糧，鴉片稅，不兌換紙幣，使用惡幣，勒捐軍費，徵用牲畜，及現物等）國家農業設備（如水

利，模範農場，穀倉等）底荒廢，運輸交通機關底破壞，國家對外貿易政策（如所謂（互惠）政策！及財政政策（如包稅及厘金公債等）底反動等等。

上述各種經濟的及政治的原因，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各自獨立，其實是互相關聯，而且循環的互爲因果。因爲生產技術幼稚的緣故，各級農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十二分的低下。兇暴的地主，要得到豐裕的生活，只有利用統治的威力以重租高利盤剝農民。因爲城市工業不能發展，所以城市及農村以累積的資本只有購買土地，因此自耕農日益減少；同時農村的過剩人口無法由城市容納，大部壅塞在農村中，因之佃農日益加多，農村的耕地日見分裂。耕地過度分裂的結果，更不能利用現存的進步的生產技藝，因此生產能率十分降低。因爲各地方人口分配不均的緣故，致「東北」「西北」各省區，有地缺人耕種，而東南各省的農民每戶平均不過得到數畝耕地，實在不敷生活的需求。因此農民以借貸爲生，終身受高利貸的盤剝。因此自耕農的土地被其捲去，變爲佃農，佃農變爲雇農佃農受制於地主

，必須納全世界所未有的高度佃租以求得土地耕種，半死半活的生活實在比農奴時代更爲悲慘。佃農更受着非人類的勞役的拘束，做兩足的牛馬。更有許多其他過剩的人口求爲佃農雇農而不可得，不能不流爲兵匪流寇。在閉關時代，家庭手工業還在盛行，大部份的日用品可由農村及附近鎮市自給。開關以後，帝國主義者以廉價商品侵入農村，家庭工業於是崩壞，因此農村人口過剩的現象日益加劇，而商業資本的剝削日益加深。國際的農業，特別是南北美洲，及英，法，荷蘭，日本，殖民地（印度，安南，爪哇，台灣，等）的利用其高度的生產技藝及貿易政策或特殊有利的生產條件以較低廉價格的農產品輸入中國，本國農產品無法與之競爭（特別是因運費高昂納稅繁重的緣故！），因此沿江沿海對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外國農產有壟斷市場的趨勢。因此農民的收入更加減少，農業的荒廢衰落無法倖免。至於農村資本的缺乏，一方是由於生產技術的幼稚無法有剩餘生產的積累，他方更由於政治的剝削使農民皮肉不存；及最近商業資本之集中於都市

，用公債，特稅，包稅，貿易獨占等方法，間接去剝削農民，使農民生產品赤裸裸的無償的被官僚軍閥買辦等所掠奪徵發，更談不上農村資本問題。因此農業的生產或完全停止，或以自殺的方法，耗費地方，使生產能率大大的降低，土地改良完全絕望。

像上面所述的經濟的現象，雖然表面上是生產行程上的結果，而實際多由於反動的政治力量所促成。政治的剝剝及掠奪，當然驅迫大多數農民陷於破產流散。國家農業設備底荒廢，當然使生產技術更加落後，更加無法改良耕地。運輸交通機關底破壞，當然使交換行程壅塞，使農民不能不低價售賣農產品，不能不高價購買工業品，而生活水平更加降低。國家的反動貿易政策只有使外國農產品更容易壓倒本國農業。反動的財政政策，只有把一切租稅負担轉嫁於農民身上。像這些的政治內素，都是促使農村速度的破產。因爲農民破產的綠故，更增強統治者的反動，行更苛酷的掠奪，以促農業經濟及全國國民經濟的滅亡。像這樣：

政治原因與經濟原因的交互循環，遂有數十年來使中國內戰不能停止，使中國民族物質的文明與文化同陷於消滅的地步。這種現象如無法消滅，中國人民必無死所，更不用說社會主義基礎的建設無絲毫希望。

我們認爲要消滅上述的現象，使農民得到解放，使全國的國民經濟向前發展，應有如下的農業政策，而政策中的耕者有其田底辦法實爲實行農業政策的先驅。因爲一切政策的經濟的剝削所加於農民的結果是：土地更加集中，大小地主剝削佃農及僱農更加利害，農民離村的現象更加普遍。就是說，都集中於土地問題。在現時，全國約50%的土地由佃農耕種，全體農民約50%爲佃農；佃租平均約佔主要生產量50%在現時嚴重的農村破產現象底下，如果無法首先使農村剝削停止使農民返村，使農業生產行程恢復，則一切其他農業政策，甚至全國的政治設施都無從着手。而首先解決土地問題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實爲消滅農村的寄生，使農民返村及使農業生產行程恢復的唯一手段。也只有如此，革命勢力才能得

到大多數農民的擁護；只有如此，工人失業的現象才能消滅，工人的生活標準才能增高。

我們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具體方案與程序如下：

甲　立行宣佈耕者有其田的法令，不耕作的人不能有耕地。

乙　立行宣佈免納佃租，其耕作中的佃農及僱農可暫行保有原來佃耕土地的使用權與收益權，聽侯詳細辦法解決。但地主同村並能實際耕作者，主佃兩方，暫時共享土地使用權與收益權，其形式以契約定之。

丙　由國民會議規定土地法，并斟酌各地方狀況，分別規定農戶佔有耕地的最高額及最低額。及國家收買土地定價法。

丁　在允許私人佔有土地最高額以外的土地，應由國家以全國國有土地為抵押，發行五十年長期土地公債，按照國民會議所規定的土地定價原則及各地方政府所決定的土地價格，收買歸為國有。在最低額以下的土地，應強迫

其相互合併或加入合作社經營之。

戊　國家以外的公共團體所有土地亦按私有土地收歸國有法，由國家買收爲國有。

己　一切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的及其他反革命的團體的全部財產應沒收爲國有。

庚　所有一切收爲國有的土地應由土地管理機關按照土地分配原則及各地方標準負責分配於耕作的農民。原日佃耕的佃農，及無地的僱農，與退伍的革命軍人等應有同等的機會領用土地，但只限於使用權與收益權。

辛　領用土地而不行耕作，或怠工，耕作不力的農民，應被剝奪其土地使用權與收益權，耕作私有土地的農民如犯以上條件則幷剝奪其佔有權。

壬　不准私行買賣土地必不得已時的土地佔有權及使用權的移轉應按土地法得土地管理機關的允許而後行之。

我們一般的農業政策如下：

甲　消滅寄生剝削的大小地主，使不耕作的不能保有土地，而要從事耕作的人民隨時可以得到土地耕種。即是實行耕者有其田，使農民安心改良土地幷提高生產力。

乙　改訂田賦，清丈田畝，依照各地收益情形及農民收益狀況，釐定稅制。

丙　積極的利用科學方法以振興水利，及一切農業改良的設備，發展內地交通，推廣農業教育及研究，辦理農業調查，廣設模範農場，務使各農村均能進行農業實驗及改良的工作。利用國內的資本廣設農民銀行，供給農村以必需的資本。

丁　提倡及促進農業合作。利用生產合作，使各農戶能自由聯合行大規模的耕作，用進步的技術以改造農業。利用販賣及購買合作以消滅商業資本的剝削。利用信用合作以消滅高利貸。這些合作的進行，即爲農業社會

化的過渡。

戊 辦理國營及公營的農業，盡量的應用新的技術及經營方法，使農民徹底的明瞭大農業及小農業的利弊。使農民能逐漸的志願的由私營及合作的階段進入農業社會化的階段。

己 速行辦理移民及墾植事務，使人口與土地的比例能相對的平均。

(四)城市及農村經濟發展的均衡

工商業支配農業及城市支配鄉村的傾向，是資本主義社會內一般的傾向：因為，在大量商品生產經濟破壞了自給自足的經濟之後那些握着大量商品生產權的城市工商業者，自然會在實際上支配並壓迫那些難行大量生產的鄉村農業。結果，城市繁榮，農村凋弊，城市膨脹，農村萎縮，城市集中，鄉村冷落等現象，便不可避免的發生出來。這些現象，從工業化的觀點上看來，雖然是進步的，而從人口及食糧政策的觀點上看來，却是反動的。為什麼反動的呢？因為城市經濟和

農村經濟的不均衡展，一方面會引起國內食糧不足，民食非依靠海外不可的畸形現象（如像在英國）；在另一方面會引起困難的翦刀問題（農工業發展步驟不一致的問題）使社會主義的建設的路上發生巨大障礙（如像在蘇聯。）

我們認爲，在經濟落後的中國，城市的繁榮，膨脹和集中也是必然的趨勢，然而我們却須得并且也能夠預防農村的凋弊，萎縮和冷落。我們一方面要用合作社的辦法，防止農村之被壓迫被支配；一方面要用金融政策及租稅政策調劑城市和農村間的不平衡的發展。我們認爲在消極的防止和積極的調劑兩種政策下面，一定可以免除國內食糧不足的毛病，一定可以解决困難的翦刀問題。

4，社會政策

我們認爲，我們在積極方面，固然應該用種種方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同時在消極方面，也應該施行種種社會政策，以救濟社會上現存的弊病。我們以爲應該竭力改良工人的生活，確定女工童工保護法，危險工作保護法，地下

工作保護法，確定八時間工作制，（地下工作六小時）確定工人罷工權，確實施行工場法，使工人逐漸參加生產管理。施行種種社會保險，成立職業介紹所。規定工資與生活增加的比率，縮小勞心勞力職員薪俸的差額，提高士兵和警察的生活，給退伍士兵以土地與資本，使其耕種。創設無償的平民醫院，育嬰堂，卹嫠院，孤老院。禁止納妾或蓄奴及人口買賣。

5，　文化政策

我們認爲：特殊的士大夫階級專有智識，平民羣衆無法無機會識字知書，更說不到專門智識，這件事是中國廣大的平民羣衆的痛苦及屈辱的原因之一。我們爲着消除士大夫階級，爲着解放大多數平民羣衆，必須堅決的主張下面的文化政策：

a，文字普及政策。

（一）限制文言，流通白話。

(二)限期普及注音符號及簡字并統一讀音。

(三)普及文盲救濟運動。

b,教育政策

(一)限期推行無償的義務教育制。

(二)普及政治教育。

(三)舉辦普通的農業教育，勞動教育及其他職業教育，其目標在使農民子弟及各職業團體的職工能直接受必需的教育，使學得其用，用本於學。

(四)關於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教育，以實證的應用的研究為着眼點，使其普遍的深入於全國各地方學校。并極力防止學術脫離社會，陷於空談，致有產生新士大夫階級的危險。

(五)確定教育經費，改良各級教師的待遇，保障教師職業之安全，規定養老金制。

(六)認教育爲社會事業，只由國家監督，不由國家包辦。

(七)確立國家會考制，打破學校修業期滿獲得文憑制。

(八)停止教會在中國的文化侵略工作，一切教會學校應由中國收囘自辦，其他外國文化機關亦然。

陸　我們和共產黨及改組派的分界

我們和共產黨的分界，共產黨純碎是國際的，而我們是帶民族性的。共產黨以中國革命爲手段，而我們的目的就是中國革命。共產黨以爲中國現時的經濟的組織已經主要的是資本主義的組織，因此牠要用共產主義革命的方式去解決中國問題；我們以爲中國現時的經濟組織還是以小農及手工業的生產爲主的組織，是被本國的高度佃租，高利貸，商業資本的剝削及其他政治的掠奪並帝國主義所窒塞妨害而日就崩潰破產的組織。我們以爲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障礙不是資本主義，而且在中國還未形成近代資本主義，因此我們反對用不對症的藥方——共產

主義革命——去破壞一切現存的經濟組織，而主張要把妨害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源除去，去發展社會生產，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共產黨只是想到用農民威刼農民，去建立一部份的工人獨裁政權，我們却是要使農工的利益都確實得到保障，使工農的利益能夠平行的發展，用這種方法建立平民的政權。共產黨只盲目的追求未來的空想，我們却要把歷史現階段上的要求得到解決。因此共產黨在目前要使中國社會更窮乏混亂化，我們却要使中國新的社會秩序早日形成。

2，我們和改組派的分界從改組派上部成份上說，牠是一大羣舊社會的統治者或半統治者的集團，他們只是因為偶然的一時的利益共同合作，只是各自尋出路。所以牠無從建立一個共同的綱領，牠的政策忽左忽右，忽而投降南京，忽而反對南京而投降北洋系和西山派。牠的工作對象只是勾串及依附舊勢力，他無決心實現革命的主張，牠只是反蔣而不反南京的統治，所以結果至多是取蔣而代之，或去一蔣介石而產出多數蔣介石。我們和改組派不同，我們不但要和現存一切的

統治勢力絕緣，而且堅決的要推翻一切反動的統治勢力。我們認定，只有抱櫫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旗幟繼續不斷的和一切叛徒們戰鬥，才能克服僞善和凶惡，而使中國民衆歷年所受的痛苦羞辱一齊擺脫洗滌淨盡。

民國十九年九月一日

鄧演達先生傳略

繼承孫中山先生中國革命的使命，站在廣大的勞苦的農工平民大衆的立場，革命的領導者鄧演達先生，於民國二十年某月日被反動的南京統治——主犯蔣介石及其同僚，走狗——所殺害而與世長辭了。在國外侮日亟，軍閥橫行，民生憔悴的今日，竟失去中國革命的唯一導師，瞻念前途，曷勝悲痛！先生盡瘁於中國革命，一生艱苦奮鬥，不避勞怨，其對於中國革命的忠實，凡知其人，無不起敬。近年來先生研究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正得到結論，領導農工平民羣衆與反動的統治開始鬥爭，無恥的殘酷的敵人在他沒落的滅亡中，竟用卑鄙的手段賊害了中國垂危的民族生命的象徵！在先生為中國革命而犧牲，為民族解放而犧牲，是算盡了責任，而他的一生革命事蹟，卻是革命後死者的典式。他的革命任務，卻待革命的後死者去完成！為着永留後蹟規範；為印證中國革命的途徑，爰述先生的事略如下：

一　革命的童年

先牛諱演達，字擇生，廣東省惠陽縣人。其所居，係惠陽縣的鹿頸鄉。從小便生活于農民區域中，該處社會組織殊爲特別，與其他農村區域不同，就是地主和佃戶，分區而處，有所謂地主區，又有所謂佃戶區。地主與佃戶間的界限極嚴，因此地主壓迫佃戶的現狀，遂曾見叠出。加以地主區的人們，豐衣足食，優游餘裕，而佃戶區的人們，則胼手胝足，鳩形鵠面，苦樂的懸殊特甚。先生適生是鄉，當時對於地主的橫暴與佃戶的困苦的印象甚深，遂構成先生的農民革命思想及土地革命思想的最原始的基礎。先生出世，適當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之後，當時國人受二次戰敗的創傷，對於國際的地位以及中國的國勢，已漸漸明瞭。且適値革命運動，活躍甚烈，革命黨人，時常將中國國勢的凌夷與帝國主義的侵略，向農村方面宣傳，先生耳濡目染，遂又種下先生的民族解放思想與反抗帝國主義思想的胚胎。當時先生已獲得了革命的基礎，又因與革命運動接觸的機會極多，於是在八歲時，即參加革命的實際行動。先生以年幼，常隨姚雨平輩作交通員，

往來於廣州佛山間，所有一切秘密函件，皆由先生一人經手傳遞，機密而且迅速，故一般革命黨員皆亟加稱許。因中法中日戰爭之後，先生習染於革命黨人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富國強兵的思想，所以年稍長即志在做一個有用的軍人。這就是先生學習軍事的動機。

二　革命的準備時代

先生十二歲時，入廣東黃埔陸軍小學，爲同學中的最年幼者。但先生聰穎奮發，輒爲師友輩所驚奇，鄧仲元先生，尤器重，至目爲奇才。辛亥之役，先生隨北伐軍出發，在姚雨平軍中，初露頭角。南北議和，民國建立，先生復回粵重修軍事學，畢業於廣東陸軍速成學校。但當時中國政治在袁世凱的軍事統治之下，黑暗萬分，革命勢力逐漸失敗，先生感覺異常煩悶，卒又於民國三年進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從事於自然科學的研究。中間，袁氏稱帝，繼以北洋軍閥的專橫

跋扈，中國政治愈加黑暗，經濟愈加破產。先生不勝憤激，擬棄其所學以事工業，但限於家庭經濟，終未果。民國五年冬，預備學校畢業，升學於保定軍官學校於研究軍事學之餘暇輒致力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民國八年，畢業於保定軍校，被派赴粵防軍入伍見習，充下級將校，旋即由鄧仲元先生召回漳州，使統率憲兵，於是先生脫離學校生活而努力革命事業了。

三　初期的努力

孫中山先生令陳炯明由漳州率師回粵，驅逐舊桂系，先生亦率領憲兵隨軍出發，及廣東恢復，鄧仲元先生成立粵軍第一師，先生即任師部參謀兼步兵獨立營營長，團結上下羅致人才，仲元先生倚如左右手。當時先生即知陳炯明輩的跋扈，是終不能爲革命努力的，只有努力培植第一師的基礎，使第一師成爲革命的武力，並以牽制陳軍，使不敢有異動。先生深知仲元先生之心，仲元先生亦深知先

生之才，二人互相倚重，以發展第一師所担負的革命事業。不久，先生又受命組織工兵營，悉心經營，努力訓練，全營精神奮發，終成爲各團營的模範，於是粵軍第一師的基礎，也就很穩固了。當時陳炯明已漸漸不能服從孫先生的指揮，對於孫先生的革命事業的發展，每多方掣肘，而且漸漸發露其軍閥割據的主張，隱然以廣東爲已有。粵軍第一師，隨着鄧仲元先生與先生的措置，每左右其間，使陳炯明的陰謀屢欲發而屢止。粵軍第一師因對於革命多方維護途遭陳炯明之忌。陳炯明知粵軍第一師必阻撓他的逆謀，但當時陳炯明受環境的影響和私慾的支配，逆謀已有不能復已之勢，故首謀消滅粵軍第一師，而鄧仲元先生終於被刺。鄧仲元先生被暗殺以後，先生悲痛着知己的慘死，報仇心急，且深知革命的唯一希望在維持第一師，因假其全力鎮壓軍心的搖動，陳炯明終莫可如何。

四　革命的護持者

孫中山先生知陳炯明終懷異志，且知先生對於擁護革命，夙具決心，於是特將先生所統率的獨立營改編爲警衞軍，以警衞總統府。民國十年，北伐軍已入廣西，陳炯明益驕橫跋扈，扣抑餉械，使北伐軍不能發展。及孫先生由桂回師。陳炯明退處東江，第一師因先生的斡旋，首先擁護孫先生北伐主張，全部出動，民國十一年北伐之役才能實現。北伐軍向北推進。第一師前鋒已過贛州，而陳炯明唆使葉舉等圍攻總統府的事變忽起。這種消息傳到前方，因不明眞相，各部隊均發生動搖，第一師亦覺無法維持，先生乃急會同陳銘樞的第四團，由信豐退據河源，先生自己則潛赴香港轉上海，見孫先生，商量善後辦法。後陳銘樞辭去軍職，學佛於南京，先生則連合陳濟棠張發奎等形成新的團結，整理軍隊，相機圖再舉。十一年冬孫先生檄調楊希閔劉震寰等滇桂軍東下驅逐陳炯明，第一師首先響應，滇桂軍遂兵不血及而佔廣州，然第一師亦從此分化矣，先生毫不顧惜，與諸將領商議結果，將軍隊重新編配，推李濟深爲師長，先生而任三個團長，於軍中

多所建樹，使第一師及其所孕育之第四軍在國民革命軍中建立不少的功績，論者每以先生的努力爲多！陳炯明的殘部既被逐出廣州，仍盤據東江一帶，而楊希閔劉鎮寰等羽毛已豐，則又復飛揚跋扈，把持財政，刼奪稅收，無所不爲，革命局面復陷於困頓的境地。孫先生困處廣州，一籌莫展，因爲驕兵悍將，早已不復知有孫大元帥，更不復知有所謂革命了。先生於此時並不畏難，益艱苦奮鬥，最先想法使第一師討滅沈鴻英殘部，馮葆初等，由江門四邑漸漸移入西江一帶，然後極力啓導廣西新興將領黃紹雄白崇禧等以革命大義，與取得相當的聯絡，於是由肇慶以至梧州連成一氣，聲勢益壯。楊希閔劉鎮寰范石生等於這種威脅之下，乃稍稍斂抑，而孫先生也就可以從容佈置了。在這時期先生作事，每獨任其勞而使他人受其名，艱苦卓絕，任勞任怨，但先生的精神與魄力，不特爲同儕所信服，亦且爲反對的敵人所欽敬了。

五　黃埔軍官學校的建設

孫先生當時外受陳炯明等的攻擊，內受楊希閔等的挾持，感覺到非訓練革命的武力，決不能建立革命的基礎，並以消除黨內的反側，乃與先生等商辦黃埔黨立陸軍軍官學校。並欲使先生任訓練部主任，先生力辭，卒推李濟琛居正而自為其副。黃埔軍校開辦之後，所有人才的招致，訓練的規劃，都由先生主持其間，悉心經營，不遺餘力。軍校開始時學生不過四百多人，在其所屬的社會成份上說，十之八九是小有產者，鄉村小農的子弟也不在少數。但在當時的複雜的政治環境——楊劉竊佔廣州時代——與全國的凝固及腐朽的政治局勢中，頗足以激勵大多數青年的憤激與努力。先生在這時候盡力於國民黨革命任務的宣傳與訓練，構成當時黃埔學生的靈魂——因為得着了這點靈魂，所以在後能和陳炯明的殘部及楊劉作戰所向無敵，發揮時代的機能，就是這種原故——這時候學生對於先生的

愛戴，和先生對學生的嚴肅與慈愛，構成當時的革命中心團結。校長蔣中正深忌先生，轉倚王柏齡爲心腹，王柏齡又援引何應欽等，深相結納，隱然對於先生取一種敵對的形勢。先生以革命事業久受軍閥的摧殘壓迫，不能有所建樹，乃悉心經營黃埔軍校，希圖造成革命的武力，以保障革命前途的發展。而此時目擊着這純粹的革命武力，又漸漸爲蔣中正等所刼持，轉趨上軍閥的途徑。於是先生翻然感悟，知中國的革命事業，應從政治的解放以達到國家建設，乃決然辭去黃埔軍校職位，而出洋赴德學習政治經濟。先生出國未久，孫先生便逝世，黨內形勢日非，革命前途危險，乃不得不忍痛放棄未成的學業，於十四年冬又回到國內來。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對於整個革命方略，多所貢獻，被選爲第二屆候補中央委員。這時王柏齡任黃埔軍校教育長，百事廢弛，精神不振，蔣中正知欲把黃埔學生訓練成材，非復用先生不可，乃強邀先生回校繼王柏齡任教育長。先生再就任教育長後，蔣中正每事邀結先生歡心，先生雖知道蔣中正包藏禍心，

但冀以革命大義糾正他的錯誤，每遇事直陳，不顧忌諱。蔣氏雖心不以爲然，但終以欲用先生之才，而極力敷衍。

六　革命的煩悶期

初先生離國後，蔣中正已逐漸鞏固其在軍校的勢力，並隨着勢力的增大，而逐漸顯露他軍閥的面目。十四年秋蔣氏藉廖仲凱先生被刺案，逐去胡漢民，把廣東政府的政權，逐漸刦持操縱，使變爲他私人的勢力。是年冬，先生回國，復任黃埔軍校教育長，乃希望蔣中正會翻然覺悟，改變他的軍閥的行爲，故悉心經營，訓練學生。王柏齡不自知其拙，因失位而深恨先生，並多方勾結一般腐敗份子，向蔣氏包圍，以擊攻先生。蔣氏亦以自己羽翼已成，雖先生力陳革命利害，每不以爲意。三月十二日之變，是蔣中正試演獨裁的第一幕，但以師出無名，不得不籍名排共。事變發生以後，王柏齡乘隙中傷先生，挑撥蔣氏的猜忌，將先生調

任汕頭軍校校長兼第一軍黨代表，而陰使他的羽黨羣起反對，以威脅先生。北伐戰起，蔣中正因事實上的需要，強先生任總政治部主任，以緩和革命份子對己的敵視。先生亦希望從北伐的進展中，發展民衆本身的力量，以制裁軍閥的繼起，中興革命的力量，遂毅然允諾担負這最有意義的繁重工作。

七　北伐途中

在北閥開始的時候，先生對部屬說：「我們應該要明白中國的農工平民大衆，受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二重束縛，我們此去是要喚起廣大的農工平民大衆自己起來解放自身的痛苦，同時我們要剷除軍閥制度，永絕中國禍亂的根源，我們更要注意並防止我們自己造成為軍閥的趨向。」只在他這幾句話裏面，我們就可以明白他的意向和苦心了。北閥軍因唐生智的轉變而順遂地進行，就愈和吳佩孚的軍隊相接近。先生在途中，除主持總政治部事務，使部員努力調查沿途的農民生

活狀況及土地分配情形外，復兼管行軍參議事項，所以先生的事務至爲忙碌，常徹夜不寐，平旦又復轉程前進，部員多有因精力不支而病的，但先生却精悍如常。先生在征途中，在軍事的百忙中，猶不忘他畢生所念念不忘的農民問題，他組織農民生活調查團及農民問題研究會，雖然在百忙中沒有具體的表現，但他對於解决農民問題的努力和系念，在當時的革命軍中實爲僅有之人！吳佩孚敗後，劉玉春陳嘉謨因守武昌城，屢攻不下。先生任攻城司令，親臨城下指揮，槍彈如雨，屹不爲動，後武昌城卒於國慶日克服，先生過漢口洗澡，脅肉盡爛，其任事之艱苦卓絕有如此者！

八　武漢政府的組織

武漢己下，先生被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經營擘劃，鞏固革命的新領土。時北洋軍閥開始崩潰，被壓迫的民衆們驟然失去了重壓，民衆運動勃興起來。特別是

在武漢，因爲當地的工商業者有相當的基礎而經濟及政治又足以綰轂長江各省，因此，現武漢的政權掩護下的民衆運動，自然可以推進并影響全中國的主要地區。民衆起來的信號到了，這足以動搖軍閥的基礎，並可由民衆的力量，發展革命的事業，先生在這時候曾力勸蔣氏拋棄軍閥主張，及說明農民解放，解決土地問題的重要，希望在這一話能轉移當時軍事當局的專橫，短縮革命的過程。殆蔣氏專恣性成，且乘軍事勝利的餘威，更飛揚跋扈，不特輕視民衆的解放運動，而且仇視民衆運動。更藉「過火」，「黨軍可愛，黨人可殺」等蜚語，唆使一般昏庸老朽之徒，露骨的表現背叛革命。時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依照決議移遷武漢，蔣氏更欲扣留在南昌，以遂其「挾天子令諸侯」的奸謀。先生認爲這是革命的危機，如果不設法制裁，則革命將一敗塗地，而且過去的努力，也完全爲新軍閥所利用。因此非常痛心，曾痛哭一晝夜，由南昌趕回武漢，與大部中央執監委員成立中央黨部，組織武漢政府，以制裁蔣氏，而挽救革命，武漢的中央黨部和政府先

後成立，先生遞補爲中央執行委員兼農民部長，並於這時向中央提議成立土地問題委員會，將北閥途中所搜集關於土地問題的材料，盡量貢獻中央，又令中央農民部和總政治部工作人員合組農民問題研究會，各軍隊政治工作人員隨時隨地組織農民問題研究會，盡量招致農民實際參加討論。使中國革命核心的農民問題，成普遍的令人注意，又由中央農民部籌辦農民運動講習所，造成實際工作人員，確定革命的基礎工作。這時，蔣中正已經明顯的背叛革命，在南京成立反動的政府，一面盡力取媚帝國主義，一面向武漢政府攻擊，而武漢政府對於革命的大計則舉棋不定，時而主張討伐南京，時而主張北伐，蓋已充分表現出領導機關的無能！十六年夏大軍出發北伐，討伐奉系軍閥，先生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督率部員隨軍出發，並親自參加於張發奎所部鐵軍中工作，臨穎決戰，鐵軍傷亡過半，全軍準備犧牲，先生從容不迫，往來於火線中，表示與鐵軍同生死，其勇敢負責．官兵無不感動！

在武漢的政權掩護下，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先後的組織起來。城市中的工人及青年學生固能表現其鬪爭的成績，卽在鄉村中的農民也已開始搖撼地主的政權。革命羣衆的聲勢，懾服了一切當時服務的政府中的文武職員。叫他們不敢爲非作歹，叫他們不能不日夕勤勞，人人心目中都感覺着舊的一切的動搖，新的一切快要到來。然而，在這革命高潮當中，上層份子便感到不安和恐怖，當時所謂革命的領袖們——虛僞無恥的所謂民主政治者——首先搖動了，並且撫拾蔣中正的餘唾痛駡民衆運動的「過火」，根本反對民衆的要求。於是先生很嚴正的向這般動搖的領袖們警告，以促他們的覺悟。但是，這時候的矛盾並非警告所能解決，而領袖們覺悟，至多亦不能超過於本身利害之一途，先生知革命的頹勢已無可挽回，遂於十六年初冬毅然跳出漩渦，化裝工人，間道從西北出國。

九　爲民族解放而奮鬥以至犧牲

先生離國後，經莫斯科，國際共產黨曾開盛大的歡迎會，歡迎中國革命的指導者，在會中先生將中國革命的性質，詳爲解釋，並指出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任務。時蘇聯反對派與幹部派競鬥正烈，牽及中國革命問題，先生本其主張，謂中國革命不應置放于第三國際的範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第三國際祇可作友誼上的贊助，斷不能將中國解放的任務，完全任第三國際的擺佈。這種民族自決的精神，在任何環境中，皆應該存在的。此嚴正的立論根本與第三國際革命的策略相背馳，因此先生備受攻擊。遂祕密離開莫斯科轉赴柏林。

十六年冬先抵柏林，專研究政治經濟，博覽羣書。並考察各種實際問題，尤其是對於歐洲各國的農民問題，曾經極留心的考察，並且親自到歐洲各國農村裏面去探訪，調査各當地農民的生活狀況，考察各國解決農民問題的方案。他在德國時間最久，英，法，匈，奧，波瀾。立陶宛，意大利，巴爾幹半島諸國家，斯干的納維亞半島諸國家，以及新興的士耳其，殖民的印度，皆遍留足跡，實際的

體驗各國政治，並借此作中國革命的參考。十九年春先生從歐洲回到中國來，回到反動勢力籠罩着的中國來，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集中一切革命的力量，準備與惡勢力奮鬥，復興中國革命。

先生在歷年來的經驗，和從理論上的推斷，決定『中國現時的社會，在形式上因有異於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內容的性質而論，的確還離不了封建勢力的支配。因此，整個的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的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的時代。同時又因爲帝國主義勢力支配着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會呈複雜的狀況』。因此決定中國革命是以農工爲中心的平民革命。在歷史的系統說是繼承孫中山先生革命未竟事業，打倒一切孫中山主義的叛徒們，恢復中斷的中國革命，具體的說，『是要平民羣衆運用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權，徹底的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根本的推翻封建的軍閥官僚政治，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建設，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所以對中國革命核

心問題，在經濟上主張肅清中古時代的殘餘，對小農經濟生產加以改造，同時對帝國主義侵入後的買辦高利貸經濟，應該清蕩除治，而以集體的力量，構成「計劃經濟」或「國家經濟」，向着社會主義的路推進。在政治上主張剷除官僚政治及軍事獨裁，使士大夫地主豪紳專政的傳統的政治形態徹底的清除，而由人民直接掌握政權。在社會上主張掃除「名分」「偶像崇拜」甚至於買賣人口，役使人民的社會意識及社會行為，特別在文化上掃除士大夫階級的「寄生文化」，而代以人人所應有的「生產文化」，創造『勞働文化』爲達到上述的目的認定「一切爭鬥的總和是政治鬥爭，標出建立以「農工爲中心的平民政權」爲鬥爭的總目標。對於農民問題的解決，『在原則上主張土地國有，而用「耕者有其田」爲過渡的辦法』。這是先生解決中國問題的主張底大略。

先生爲求更明瞭實際的社會情況起見，於二十年春間親自到東北及華北一帶調查考察各種情況，不久即回到上海來，指導各地的同志們發動一切的鬥爭。因

爲先生的主張和行動，一切反動派——地主，軍閥，豪紳，買辦，新舊士大夫，帝國主義，盲動工具主義者——所嫉忌，尤其是反動的南京統治，經先生暴露出其罪惡，領導農工平民大衆，直接的搖動其基礎，遂不惜勾結帝國主義，嗾使鷹犬，四出羅捕先生。卒於民國二十年八月十七日爲反動軍閥及帝國主義聯合刧捕於上海愚園坊二十號，翌二日轉解南京，並於直到現在無從證實的月日，爲卑鄙的反動軍閥蔣中正所暗害。盡瘁於中國民族解放，農工平民大衆的革命導師，就這樣的像太陽一樣的西沉了。先生革命任務雖未完成，而先生革命的主義，已爲中國的農工平民大衆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先生革命的精神，亦已爲革命行動戰士們永留下偉大的典式。這樣，先生所負的歷史的使命，是終於會完成的。先生遇害時年僅三十六歲。